总路线 大跃进 人民公社化 运动始末

宋连生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指出：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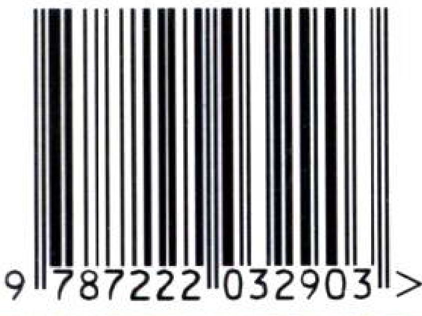


真实记录一段令人刻骨铭心的历史

准确透视三面红旗风起雨落的根源







ISBN 7-222-03290-8/D · 304

定价：25.80 元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

宋连生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宋连生著.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ISBN 7-222-03290-8

Ⅰ.总… Ⅱ.宋… Ⅲ.政治运动-史料-中国
-1958~1962 Ⅳ.D65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63488号

责任编辑 杨云宝
封面设计 鞠洪深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

宋连生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650034
云南国防印刷厂印装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25 字数：320千
2002年1月第1版 2002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222-03290-8/D·304 定价：25.80元

序 言

本书所叙述的是共和国历史上一段令人刻骨铭心的往事。

1956年年底，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一年秋天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分析了国内形势，提出了党的总任务，确定了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1957年，尽管发生了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但从总体上说，我国经济繁荣，政治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然而，从1958年开始，以片面强调高速度为标志的总路线，以瞎指挥、浮夸风等为标志的大跃进和以“一大二公”、“政社合一”为标志的人民公社化运动风起云涌，迅速席卷全国。这种暴风骤雨般的群众运动，造成了社会秩序的剧烈震荡，严重冲击了国家正常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秩序。从此，我国走上了一条艰难曲折的社会发展道路，并最终导致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

历史是不能忘记的。当年，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制定总路线、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初衷，是要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尽快地实现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美好理想。而且这条总路线及随之而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至少在开始的时候确实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热烈响应。当时在全国上下、南北东西到处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在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冲天干劲和无私精神，就是在今天想来仍令人感动不已！然而，岁月作证，历史无情，人们的美好理想和善良愿望只有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才能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如果脱离

了客观实际，美好的理想和善良的愿望不仅不能造福于社会，还会产生消极的甚至是破坏性的作用。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回顾历史我们应当铭记：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困难的时候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在胜利面前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而且从历史上看，越是事业发展顺利的时候，就越容易滋生骄傲自满的情绪，容易头脑发热，容易忘乎所以。在夺取全国胜利前夕我们党所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此，他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以后的历史发展表明，毛泽东同志当时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他的告诫十分及时。正是由于全党执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正确方针，在巨大的胜利面前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我们才取得了建国后迅速恢复国民经济，顺利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在新的胜利面前，一些党的高级干部，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本人没有能始终如一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而是滋生了一种自高自大、盲目乐观、急于求成、急躁冒进的思想，并在这种思想支配下，错误地制定了总路线，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我们党的事业遭受了重大挫折，使我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遭受了重大损失，使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遭受了重大伤害。这一惨痛教训我们一定要认真总结，永远牢记！

概括起来说，我们党之所以会犯总路线、大路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样全局性、长时间的路线方针的重大错误，我认为有五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在思想意识方面。由于建国后在领导各项政治思想运动、恢复国民经济、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社会主义改

造中取得节节胜利，于是助长了骄傲自满情绪，进而好大喜功，希图在国内乘胜跃进，一步登天，在国际上跃居前列，抢先进入共产主义。二是在思想认识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误解和曲解，把按劳分配误当作资产阶级法权，把平均主义错当作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不认识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急于在落后生产力的基础上建立“一大二公三高四纯”的社会主义，还急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三是在思想方法方面。主观片面，自以为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在国际上不对英美等发达国家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进行科学分析，妄图在短时间内超英赶美。在国内不对某些地方上报的“大跃进”事例进行认真核实，不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轻信了不切实际的论证和材料。四是在思想作风方面。盛行个人崇拜，夸大群众创造力，浮夸急躁，粗枝大叶，大轰大嗡，一哄而起。经济建设本来需要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由于缺少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主要凭行政权力瞎指挥、乱平调，势必破坏经济发展规律。五是在组织制度方面。建国以来，我们党内权力过度集中于个人，在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中的个人集权制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从而导致重大失误的出现。如果仅仅是思想观念存在问题，还不至于使我们党犯这么大的错误。因为在党内，尤其是在领导集体中总还有头脑比较清醒或者较快觉醒的英明之士。只要党内民主较为健全、充分，就能够集思广益，少犯大错，或者及早纠偏改错。所以只有从端正思想观念和改革组织领导体制两方面着手切实纠偏，我们党才可能避免重犯重大错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我们实行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拨乱反正。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包括三面红旗在内的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科学的评价，使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得以稳步前进。

在改革开放20多年的时间里，通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不懈努力，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前景充满希望、充满信心。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越是在胜利面前，越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因为机遇与挑战并存，成就与风险同在，前进的道路从来都不是笔直而平坦的。特别是处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世界大潮中，我们既面对着巨大的发展机遇，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就更加要求我们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同时还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从而使我们党在思想观念和组织制度两个方面都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最近，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他指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既是对我们党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更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三个代表”的思想为指针，发扬光荣传统，铭记历史教训，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妥善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高　放

2001年10月12日

于中国人民大学寓所顶斋

内容简介

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曾被称之为“三面红旗”，它对于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所产生的影响至深至巨。这是一段人们无法忘记，同时也不应当忘记的历史。本着再现历史，汲取经验教训，稳步地把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的指导思想，本书较全面详尽地叙述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来龙去脉和台前幕后的全过程，真实客观地记录了这一过程中发生的一件件惊心动魄的重大事件，生动再现了活跃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个个不同面孔的历史人物，深刻透视了三面红旗兴落的历史背景和主客观因素。

目　录

引　子　1958年北戴河之夏 …………………………………… 1

第一章　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 4
1. 在一个个胜利面前，急于求成的情绪也在悄悄滋长 ……… 4
2. 批判“小脚女人”，呼唤农业的社会主义高潮 ……………… 5
3. 贪多求快的倾向很快就波及到经济建设领域 …………… 11
4. 在一段时间里，周恩来几乎逢会必讲反冒进 …………… 16
5. 当毛泽东主张再追加一笔大数额的基建投资时，周恩来直言劝阻 ……………………………………………………… 20
6. 刘少奇为《人民日报》反冒进的社论开了绿灯 …………… 24
7. 编制“二五”计划的指导思想：既反保守，又反冒进 ………………………………………………………………… 27
8. 中共八大确定了以反冒进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建设方针 …… 32
9. 八届二中全会将反冒进推向了高潮 …………………………… 36
10. 陈云提出了财政、信贷、物资三大平衡的著名思想 …… 40
11. 国际形势风诡云谲，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 ………… 43
12. 中共开门整风，民主人士响应号召积极“鸣放” ……… 49
13. 反右派斗争使政治形势紧张起来 ………………………… 52
14. 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开始不点名地批评周恩来 ……… 56

第二章　发动“大跃进”，出台“总路线” …………………… 60
1. 冬修水利和积肥运动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 ……………… 60

2. 打一场除四害、驱麻雀的人民战争 …………………………… 63
3. 赫鲁晓夫的一个设想，对毛泽东是一个很大的刺激 ……… 65
4. 毛泽东的批评声色俱厉，周恩来被迫公开检讨 …………… 68
5.《人民日报》关于反冒进的社论遭到逐段批驳 …………… 72
6. 刘少奇也就反冒进问题作了检讨 ………………………… 74
7. 毛泽东提出要区分两种不同的个人崇拜 ………………… 76
8. 在鼓吹跃进的氛围内，计划指标节节攀升 ……………… 81
9. 人们的热情极度高涨，总路线在成都出炉 ……………… 84
10.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树起了总路线和大跃进两面大旗 …… 88
11. 对反冒进问题穷追不舍，做检讨的人越来越多 ………… 93
12. 有人描绘出一幅“想象中的共产主义”前景 …………… 97
13. 周恩来提出辞职，中央认为他应继续担任现任职务
…………………………………………………………… 100
14. 大跃进的战车开足马力向前奔驰 ……………………… 101

第三章　高产“卫星上天”，钢铁“元帅升帐” …………… 105
1. 毛泽东提出，中国要变成世界第一高产的国家 ………… 105
2. 以高指标为特征的“浮夸风”已在不少地方刮起 ……… 107
3. 不少专家、学者出面论证高产“卫星”的科学依据 …… 109
4. 高产“卫星”竞相上天 …………………………………… 111
5.“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 113
6. 高产“卫星”的一面旗帜——湖北省麻城 ……………… 116
7.“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以钢为纲” ……………………… 124
8. 1958年，钢产量干脆翻一番 …………………………… 128
9. 为完成1070万吨钢而奋斗 ……………………………… 135
10.“小土群”上阵，千军万马上山 ………………………… 142
11. 数字是完成了，但东西并没有那么多 ………………… 145

第四章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 149
1. 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 ………………………………………… 149
2. 小社并大社，人民公社初露端倪 ……………………………… 151
3. 中共高层领导人纷纷“吹共产主义公社” ………………… 155
4. 毛泽东表态：合并后的农业社“还是叫人民公社好”
…………………………………………………………………… 161
5. 中央决定：在徐水进行“共产主义试点” ………………… 169
6. 北戴河会议正式通过了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 …………… 172
7. “一大二公”，“政社合一”，一哄而起 ……………………… 175
8. 在极度热情的气氛中，吃集体伙食也成了“共产主义”
的象征 …………………………………………………………… 179
9. 开始流行“吃饭不要钱” ………………………………………… 182
10. 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 …………………………………… 185
11. 人们把“共产主义”弄得五光十色、洋相百出 ………… 189

第五章　残酷的现实给人们泼了盆冷水…………………………… 193
1. 徐水“共产主义试点”的夭折 ……………………………… 193
2. “共产风”的败象在一些地方逐渐显现 ……………………… 195
3. 刘少奇逐渐从过于乐观的情绪中冷静下来 ……………… 198
4. 对准备继续放“卫星”的人们，周恩来直言相劝：不要
再放了 …………………………………………………………… 200
5. 田家英等人向毛泽东汇报了人民公社的两个突出问题
…………………………………………………………………… 203
6. 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划清两个界线 ………………………… 206
7. 武昌会议，压缩空气 ………………………………………… 210
8. 人民公社还是要维护的 ……………………………………… 214
9. 彭德怀对即将公布的产粮数字表示怀疑 ………………… 219
10. 问题越来越多地浮出水面 …………………………………… 222

11. 一些被当作右倾保守批判过的观点又重新提了出来 …… 226
12. 在经济困难的形势下，刘少奇当选为新一任国家主席 …… 231
13. 在农村自留地等问题上，邓子恢与谭震林唱起了“对台戏” …… 235

第六章 历史在庐山拐了个弯 …… 241
1. 离开燥热的环境，中共要员聚首庐山开“神仙会” …… 241
2. 彭德怀的发言虽然尖锐，但并未引起太大震动 …… 247
3. 眼看会议就要结束，彭德怀送出了一封不同寻常的信 …… 252
4. 风向初变，毛泽东要求会议“评论这封信的性质” …… 255
5. 庐山会议风向剧变 …… 258
6. 彭德怀的问题被定性为“反党”，支持他的意见的人则成了“反党集团” …… 264
7. 刘少奇在庐山会议上讲个人崇拜问题 …… 271
8. 彭德怀被撤职，林彪取而代之 …… 273
9. 反右倾运动开始 …… 276

第七章 经济调整，一波三折 …… 279
1. 反右倾、鼓干劲、再跃进 …… 279
2. 坚守公共食堂的“社会主义阵地” …… 282
3. 城市人民公社也来凑兴 …… 285
4. 农村的形势越来越严峻，毛泽东认为是少数坏人兴风作浪 …… 288
5. 各地粮食告急，经济调整提上日程 …… 290
6. 毛泽东号召大炼“争气钢”，周恩来提出“八字方针” …… 294

7. 信阳大量饿死人的报告终于送到最高领导层 …………… 297
8. 实际情况比人们能够认识到的还要严重许多 …………… 300
9. 为了刹住“跃进”战车，各项应急措施纷纷出台 ……… 303
10.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确定了关于调整经济的“八字方针”
…………………………………………………………… 306

第八章 调查研究，扭转时局………………………………… 310
1. 毛泽东发出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 310
2. 邓子恢通过调查提出一系列调整农村政策的建议 ……… 313
3. 调查研究的第一项重大成果——《农村六十条》 ……… 317
4. 刘少奇轻车简从返故乡，深入农家体察民情 ………… 321
5. 把饭碗还给百姓，乡间农舍又见炊烟升起 …………… 328
6. 周恩来武安调研与农民交朋友 ………………………… 336
7. 修改“六十条”，抛弃不得民心的“共产主义因素” …… 341
8.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说：总结经验，我看是
时候了 ………………………………………………… 345
9. 陈云四下青浦，研究解决农民私人养猪和家庭副业问题
…………………………………………………………… 350
10. 再上庐山，毛泽东提出开一个心情舒畅的会 ………… 356
11.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人民公社体制基本形成 ……… 358

第九章 应该结束了，其实并没有…………………………… 362
1.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少奇的讲话震撼着七千名
与会者的心………………………………………………… 362
2. 毛泽东公开做了自我批评，但林彪的发言却别出心裁 … 367
3. 谭震林就“五风”问题主动检讨，承担责任 ………… 370
4. 陈云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伤筋动骨”的调整 ……… 372
5. 周恩来抱定“壮士断腕”的决心，安排经济调整 …… 379

6. 为了摆脱困境，越来越多的领导人主张实行包产到户
…………………………………………………………………… 382
7. 中南海游泳池，毛刘之争，惊心动魄 …………………… 389
8. 八届十中全会大讲阶级斗争,风声从此一日紧似一日 …… 393

结束语：二十年后辨是非　三面红旗尘埃落定……………… 399
后　记…………………………………………………………… 409
主要参考书目…………………………………………………… 410

引　子　1958年北戴河之夏

1958年的夏天，雨量充沛。北戴河海滨，风景秀美，凉爽宜人。建国以后，这里成了中共中央领导人夏季避暑和工作的固定地点，人们戏称为“夏宫”。

8月16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来到了北戴河。此前和几乎与他同时到达北戴河的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几位常委，他们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坐在他左侧的是刘少奇。

中共主要领导同时聚首北戴河并不只是为了避暑，他们要在这里召集一次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史称“北戴河会议”。

北戴河会议是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以及国家机关各部门党组负责人。会议从8月17日开到30日，开了近半个月。与当时正在全国开展着的大跃进运动相吻合，会议的议题有一长串，包括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第二个五年计划、当前的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问题、商业工作问题、教育方针问题以及加强民兵工作等问题。会议制定和通过的文件多达40件。

半个月的会议作出如此众多而又重大的决定，真正是大跃进的速度，充分反映出当时只争朝夕的气氛。

北戴河会议通过的最主要的文件有两个：一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会议公报，一个是《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前一个文件决定1958年的钢产量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上，干脆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从而把“大跃进”运动推向高潮；后一个文件决定在全国广大农村全面推广建立“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这两个文件无论是对当时，还是对以后的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这两个文件的诞生又都与一个基本估计有关：中国的粮食已经接近和达到了饱和。

在北戴河会议前的三个月，也就是1958年5月，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另一次重要的会议——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那次会上，制定了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用当时总路线制定者的话来说：总路线的灵魂就是高速度。会后，在总路线的指引下，大跃进运动在全国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特别是在农业生产领域，丰

产措施花样百出，高产“卫星”遍地升空，亩产两三千斤已经不在话下，五六千斤也已是“小菜一碟”，能够被称为高产“卫星”的至少也要在亩产万斤以上，甚至出现了亩产几万斤、十几万斤的情况。于是农业和农村遇到了从未遇到过的新问题：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粮食多了怎么办？”的考虑，北戴河会议决定将大跃进运动的主要战场由农业生产转移在钢铁生产上来；而在农村，则由发展生产力转为改变生产关系，也就是在全国农村普遍地建立人民公社。

当时著名的“反修战士”康生曾用一句口号来说明人民公社的好处：“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在当时和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被人们称之为“三面红旗”。本书所要讲述的就是三面红旗的来龙去脉和台前幕后的故事。

第一章　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

1. 在一个个胜利面前，急于求成的情绪也在悄悄滋长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的历史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毛泽东曾经把进城接管政权看成是一场“考试”。应当说，第一场“考试”，毛泽东和他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2年底，他们先后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肃清了大陆上的国民党残余兵力，开展了广大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剿灭了全国境内的大量土匪，成功地平抑了市场物价，开展了抗美援朝，恢复并初步发展了国民经济。到1952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了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三年中平均年递增率为21.1%。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已经超过建国前最高水平。随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结构改善。文教卫生事业得到相应发展，工人、农民收入增加，生活有所改善。全国人民安居乐业，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刚刚通过了第一场“考试”，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又迎来了第二场“考试”。这是一次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考试”。也就是当时人们所说的“一化三改”。

按照中共中央在当时的解释，“一化三改”是个相互联系、缺一不可的整体。其中“一化”，即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主体”；“三改”，即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两翼”。“化”与“改”之间，以及此“改”与彼“改”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制约，体现了发展生产力与变革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总路线。“化”和“改”都规定必须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并且规定必须逐步进行和逐步实现。当时估计，需要三个五年计划即 15 年时间来完成这个“一化三改”。也就是说，毛泽东和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在 1953 年走进这个“考场”时，准备大致用 15 年的时间来完成这场“考试”，大约到 1968 年的时候开始“交卷”。

开始的时候，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但逐渐地，毛泽东等人有些着急了，他们想快一些完成这次“考试”。

问题首先从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暴露出来。

2. 批判“小脚女人”，呼唤农业的社会主义高潮

1952 年 8 月 4 日，毛泽东批示同意刘少奇的建议：国家进入建设时期，由于工作繁重，需要增设机构，调各中央局书记来中央工作。

在决定增设的机构中有一个专门协助中央领导农村工作的部门，叫做中央农村工作部。原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奉调进京担任新成立的农村工作部部长。

邓子恢从 1953 年 2 月中央农村工作部组建之后，就开始按

照毛泽东同意了的工作思路，指导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他主张普遍发展农业生产互助组；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在面积较大的老区，适当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

可是农村的发展态势，并不像邓子恢想象的那样井然有序。1952年冬天以来，伴随着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热情的提高，互助合作运动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村中急躁冒进倾向滋长，不顾主客观条件，盲目办社，引起社会动荡。春耕在即，农民的生产情绪不稳定。

邓子恢主张及时纠正互助合作中的急躁冒进偏向。3月3日，在中央农村工作部部务会议上，他提出了调整五年互助合作发展指标的具体打算，老区组织农业户数的80%，其中合作社占45%；新区组织农业户数的60%，其中合作社平均达到12%就可以了。他说：互助合作运动不能凭主观愿望，一定要按照群众运动的规律进行。我们打算10年、15年或许再多一些时间，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要匆匆忙忙地把两到三个五年计划的事企图在一个五年计划内做完。

3月8日，邓子恢向毛泽东作了农村工作情况汇报，随后又送上书面报告。强调，在新区，土地改革完成不久，贫农确有些生产困难，需要从组织起来互助变工中求得解决，但同时必须广泛深入宣传党的保护农民私有财产的政策，克服干部中的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打消农民“怕归公”的顾虑，以安定农民的生产情绪。为了纠正互助合作运动中的急躁冒进偏向，他代中央草拟了《关于缩减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发展的五年计划数字给各大区的指示》、《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代中央为《同意中南局关于纠正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急躁冒进的报告》写了批示。这些代拟的指示、批示，经毛泽东同意，先后于3月8日、14日、16日、17日作为中央文件下发。

由于发现问题及时，采取的措施比较有力，一些地区的急躁

冒进倾向得到纠正，广大农民群众情绪趋于稳定，原先一些地区缺耕畜、农具、资金的困难得到缓解，春夏生产得以顺利进行。曾经消沉一时的互助组又开始活跃，并有很大发展。

随着农村的紧张情况逐步安定下来，毛泽东对互相合作运动有了新的考虑。1953 年 10 月 15 日，毛泽东找陈伯达、廖鲁言谈话。在谈话中，毛泽东表示不同意对发展农业合作社在数量和规模作出限制，他说："只要合乎条件，合乎章程、决议，是自愿的，有强的领导骨干（主要是两条：公道、能干），办得好，那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在毛泽东的大力推动下，到 1954 年年底，农业合作化运动形成了一个高潮。全国的农业合作社从 10 万个发展到 48 万个，并计划到 1955 年发展到 60 万至 70 万个。

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在一大批新建的合作社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不少地方出现了农民贱卖与滥宰牲口，滥砍林木的现象，农村再度全面紧张。

1955 年 1 月初，邓子恢向刘少奇汇报了农村的紧张情况。他说：现在看来，有些省份，如河北、山东、河南，农业生产合作社数量大了一些。1 月 4 日，他又以国务院七办简报的形式，向周恩来汇报了农村的紧张情况。简报说：今年 12 月间中央批准全国共办 60 万个合作社，下面积极性很高，将计划提高到 70 万个。现在看来，真正办好 60 万个都是不容易的。

刘少奇、周恩来将邓子恢的这些意见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1 月 10 日，经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刘少奇签署了《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通知》宣布，当前的合作化运动，应基本上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阶段。并列举不同地区应区别对待，有的应该停止发展，全力转向巩固；有的应认真巩固已建立的社，有准备地在巩固中继续发展；有的要切实帮助整顿社的工作，在不伤害积极分子的热情，而又保证新建社质量的原则下，允许已有的社数和社员数作必要的合理的减少。这些原

则后来被简化为“停、缩、发”三字经。

3月18日，刘少奇约见邓子恢，提出农业合作化第一个五年计划发展1/3，第二个五年计划1/3，第三个五年计划发展1/3。显然，刘的思路还是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所设想的15年时间完成“一化三改”。

对于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反映的情况，毛泽东最初是相信的；对中央制定的停止发展、整顿和巩固合作社的方针，毛泽东也是同意的。但后来，他的想法又发生了变化。

1955年4月下旬，毛泽东到南方考察。他沿铁路公路两旁，看了农田庄稼的长势，听了地方领导人的汇报，对农村形势作出了新的判断。认为：“说农民生产情绪消极，那只是少部分的，我沿途看见，麦子长得半人深，生产消极吗？”“所谓缺粮，大部分是虚假的，是地主、富农以及富裕中农的叫嚣。”

在此之时，中共上海局书记柯庆施向毛泽东讲了一个情况，说他经过调查，县、区、乡三级干部中，有30%的人反映农民要“自由”的情绪，不愿意搞社会主义。柯庆施是中共党内老资格的高级领导干部，他的这几句话，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很深。毛泽东立即想到，这种“不愿搞社会主义”的人，下面有，省里有，中央机关也有。

5月5日，毛泽东约邓子恢谈话，向邓提出警告：“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错误，否则又要做检讨。”

4天以后，也就是5月9日，毛泽东约见了邓子恢和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农业部长廖鲁言、粮食部长陈国栋等人谈话，周恩来也在座。毛泽东说：今后两三年是农业合作化的紧要关头，必须在三年内，打下合作化的基础。他问邓：1957年化个40%，可不可以？邓答道：上次说1/3，还是1/3左右为好。毛泽东不便发作，勉强表示说1/3也可以。接着他又说道：农民对社会主义改造是矛盾的，农民是要“自由”的。这种思想

党内也有。据柯庆施同志说，县、区、乡干部中有，上面也有，省里有，中央机关干部中也有。毛泽东在这种场合转述柯的那番话，给谈话平添了不少紧张气氛。

6月下旬，毛泽东再次约邓子恢谈话，提出原定1956年春耕前合作社发展到100万个，同现有的65万个比较，只增加35万个，即只增加半倍多一点，似乎少了一点，可能需要比原有的65万个增加一倍左右，即增加到130万个左右，基本上做到全国20多万个乡都有一个到几个社，问邓意见如何。邓说，回去考虑考虑。

邓子恢回到农村工作部，找互助合作处负责人商量。结果认为还是坚持100万个的原计划好。第二天，邓去找毛泽东，说上一年由11万个社一下子发展到65万个社已经太多了，发生了冒进的问题，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才能巩固；下一年发展到100万个，都要巩固下来，更不容易。如果发展到130万个，那就超出了现有的办社条件许可的程度。还是维持100万个的计划比较好。为此，双方发生了争论，争论持续了好几个小时。

7月底，柯庆施到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有意将7月28日浙江省委常委林乎加向中共上海局的电话汇报交给了毛泽东。这个汇报说："我们认为坚决收缩是正确的，但在收缩中有缺点，这就是把一些可以不收缩的也收缩了，很多地方当成了运动，主要搞收缩，有些收缩得很草率，善后工作没有处理好，部分农民吃了亏，伤害了他们的积极性。"这份汇报对毛泽东的刺激很大，尤其是汇报中说的伤害了农民的积极性，更使毛泽东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毛泽东当即批示，印发参加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的全体成员，并对汇报中"我们认为坚决收缩是正确的"一句加了批注："这种估计不对。"

7月31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一开篇就火药味十足："在全

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当时邓子恢也在会场，他无论如何想不通：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的不同意见，怎么成了“像一个小脚女人走路”？他立即找到刘少奇对有些情况作出解释，刘少奇劝他要正确对待主席的批评。



1957年5月，邓子恢陪同毛泽东在怀仁堂接见福建省龙岩女红军张龙地。

8月26日，毛泽东指示："通知中央农村工作部：在目前几个月内，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由中央直接拟电答复；并告批发此类来报的同志，不要批上'请农村工作部办'字样。"这样就等于让中央农村工作部和邓子恢"靠边站"了。

毛泽东对邓子恢的批评，在党内造成一种紧张气氛：谁不跑步前进，谁就是"小脚女人走路"。这就大大改变了农业合作化的原定进程。到1955年底，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已占全国农户总数的64.9%；到1956年上半年，达到90%以上。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原来计划用15年时间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结果只用了四年时间就基本完成了。这种胜利使毛泽东欣喜不已。他对秘书田家英说：很高兴，1949年全国解放时都没有这样高兴。

3. 贪多求快的倾向很快就波及到经济建设领域

毛泽东在批评"小脚女人"的同时，对于经济工作也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不满，认为："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都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我们有不少同志正走着这条保守的路线。"提出：当前的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针对负责经济工作的一些领导人习惯于强调搞综合平衡的情况，毛泽东还说：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断被冲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办事，按平衡办事的单位就有问题。

1955年夏，国务院在北戴河开会，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要求，讨论编制15年（1953—1967年）远景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轮廓问题。按照各部汇报，会议确定1967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6000亿斤，棉花产量5600万担，钢产量1800万

吨，煤炭产量 2.8 亿吨。毛泽东认为这个数字太低了。

1955 年下半年，以农业合作化为先导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兴起。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开始越来越关注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还是采用推动农业合作化的老办法——批判在这个领域中的右倾保守思想。他指出：我们党内，特别是领导机关的思想，总是落后于实际。他认为，这种落后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反对右倾保守思想，这在中央各部门、地方各级党委都是值得注意的。他还认为：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在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而是要不断地批判在农业的生产、工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商业同其他经济部门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工作同各种经济事业的配合等等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使之适应整个情况的发展。

基于这一认识，1955 年 11 月中旬，毛泽东在杭州和天津分两批召集华东、中南、华北、东北地区的 15 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商讨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的前景，并主持制订了《农业十七条》。这个文件一方面大大提前了在全国基本上实现农业合作化的时间，另一方面又规划了 12 年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规定到 1967 年粮食产量达到 1 万亿斤，比原来设想的产量增加了近 1 倍。

《农业十七条》中关于粮食产量的规划已经有些异想天开的味道了，因为它所规定的粮食到 1967 年所达到的 1 万亿斤的指标，直到几十年后仍是中国农业的一个奋斗目标。1990 年，中国农业粮食产量达到 8400 亿斤。那一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10 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确定，中国粮食产量将在 1995 年达到 9000 亿斤，到 2000 年达到 1 万亿斤。

毛泽东还以这个不切实际的指标作为推动力量，要求继续在

各项工作中反对他所认为的右倾保守思想。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以农业十七条为基础，制定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这一文件的中心任务是要求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迅速地、大规模地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发展农、林、牧、副、渔等生产事业。要求粮食、棉花的产量每年应分别以8%、10%以上速度递增，从而保证到1967年分别达到1万亿斤和1万万担。

农业远景规划中的高指标，必然会引起其他经济部门的连锁反应，迫使它们相应地修改1955年夏天国务院在北戴河确定的比较接近实际的各项指标，并据此编制整个发展国民经济的远景计划。1955年10月，中央批准国家计委提出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是：基本建设投资112.7亿元，比“一五”计划规定的投资多12.4%，但是据计委1956年1月5日报告，各省市、部门要求的投资已达153亿元，后来又增加到180亿元、200亿元，比1955年预计完成数增加1倍多，而全年财政收入只增长9.29%。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5年内限额以上基本建设项目694个，建成的455个；1956年初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基建会议将建设项目追加到745个，建成的追加到477个；几个月以后，又将建设项目追加到800个，建成项目追加到500多个。当时的形势正如周恩来所说：“各方面千军万马，奔腾而来。”

1955年这一年，国民经济发展的情况相当好。农业获得了大丰收，总产值比上一年增长7.6%，其中粮食和棉花的产量分别增长8.5%、42.6%，工业总产值比上一年增长5.6%，其中重工业产值增长14.5%，手工业总产值比上一年增长72%，基本建设投资比上一年增长1.4%，农村水利建设实际完成的工作量比上一年增加65%，各方面的工作呈现出一派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这种情况也增强了人们认为可以大大加快发展速度的乐观情绪。

对于毛泽东加快经济建设的意见，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开始是同意的。刘少奇当时说："经济上要有框子，财政上也要有框子，互相冲突，就把保守主义冲掉"。他认为，只要克服了经济上的保守，财政上的保守主义就好办了。

1955 年 12 月 5 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集有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 100 多人参加的中央座谈会。会上，刘传达毛泽东关于召开八大的指示，并对八大准备工作作出部署。他说："在关于八大的准备工作谈话时，主席提出：中心思想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计划。

主席说过，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的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的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就可以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这也是客观要求我们加快发展。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我们不快建设，农业未合作化，私营工商业未改造，工业未发展，将来一旦打起来，我们的困难就更多；如果完成了就好办。因此必须加快速度，在我们的一切工作中都要反对保守主义，一切工作要办得又多、又快、又好，要求我们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更大的成绩。这不是急躁冒进，而是实际与可能的需要，是稳步前进。"

刘少奇还转述了毛泽东这样的意思：要站在群众前头，不要做群众的尾巴。要鼓励群众，不要泼冷水。在较短时间内得到较大成绩，这就是现在中央所实行的路线，这就是稳步前进。另一条是按常规走路，照老样子前进，时间拉得很长，群众没有士气，成绩不大，这是保守主义路线。我们有不少同志却正在走着这条路。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这次会议正式决定：把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作为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要求全党在一切工作部门展开这个斗争。

在西楼座谈会上，周恩来也表示：最近政府在各方面的工作，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保守。反对盲目冒进是对的，但又带来了副作用，必须打破这个副作用。在刘少奇传达毛泽东的意见，说冲破了平衡是好事，不要怕时，他还插话说：池塘的死水是臭的，活水才不臭。把计划的平衡比喻成“死水”，而把打破平衡说成是“活水”。

半个月后，在国务院第21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就全面规划和反对保守主义问题讲话说：农业合作化运动以来，各项工作都受到了推动。毛泽东主席从外地视察回来，提出了发展农业的十七条办法，这是一个推动力量。政府的各项工作都受到了推动，变化很大，影响了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并且改变了五年计划和远景计划中的一些指标。过去设想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后，钢生产1800万吨，现在改成2400万吨，粮食生产将达到1万亿斤。过去没有设想那样多。

12月29日，周恩来向全国厂长、矿长会议的代表作《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又说道：在国内，目前农业合作化大发展，并在下一步往高级社前进，反右倾时也未估计这样快。私营工商业改造，经过两个会议也可以提前，这就使得两翼前进，主体被动。前进不能慢，不允许落后，所以要求国营工业提前完成五年计划。

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元旦社论，第一次正式公开了“提早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的号召。社论指出：现在农业合作化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进入了新阶段，第一个五年计划有可能提早并超额完成。这样，在工业、文教事业的面前，就摆着一个问题：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自己的事业。这是第一次公开提出“多、快、好、省”的口号。这个口号到大跃进时期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

主干内容。

在各方面胜利的冲击下，毛泽东此时已在考虑赶超美国和苏联的问题了。

1956 年 1 月 20 日，他在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和 25 日召开的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都讲到：美国那点东西，1 亿吨钢，几百个氢弹，不大算数，中国要超过它，第一步是接近它。稍后，他还说，我们的发展速度可以超过苏联的头几个五年计划。

4. 在一段时间里，周恩来几乎逢会必讲反冒进

周恩来不同于毛泽东，虽然他也希望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进行得快一些，并且在起初，他也曾发自内心地支持毛泽东关于加快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步伐的主张。但是，他是共和国的“总管家”，每天都要处理各方面出现的新的经济问题。很快，他就发现：如果按照各系统提出的这些高指标去做，那么，在 1956 年，国家统一分配的 8 类物资 250 余种产品中的大部分将是紧张和严重不足的，其中最突出的是钢铁严重短缺，差额达 70 多万吨，这将使 1956 年经济建设受到严重损害。

1956 年 1 月 14 日至 20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大会开幕那天，周恩来代表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主旨是讲，在过去的 6 年时间里，中国知识界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由于看到经济建设中已经开始出现盲目冒进的苗头，在 20 日大会的闭幕会上，周恩来在总结讲话中讲了一段似乎与知识分子问题没有多大关系的内容。他说：在经济建设中，

不要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这大概是最早对冒进提出的直接批评。

此后，周恩来几乎逢会便讲反冒进问题。

1月30日至2月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开幕式上，周恩来作《政治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会上，当有人提出《政治报告》中为什么没有讲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时，周恩来解释说：讲提早完成工业化应慎重。这就是说，工业化比三大改造困难得多。要实事求是，不要没有根据地提，要区别提，不要混同提。因此，《政治报告》中说加快速度，但不是提前完成工业化。大家要认识工作是需要时间和知识的。

2月8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会议讨论了《国务院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草案）》，在讨论会上，周恩来说：应重视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改造工作。然后他话题一转，说道：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条件不成熟时等一下不要紧，因为政权在我们手中，这是很大的保证。我们要使条件成熟，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在这次会上，他又一次强调了不能提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他说：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

义社会有什么不好，这还能鞭策我们更好地努力。针对有人害怕反冒进会给干部、群众泼冷水的顾虑，他说道：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12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当然反对右倾保守是主要的，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

当时，经济建设方面的冒进问题突出地表现在基本建设方面，各省市、各部门要求的基建投资数字不断追加，造成各方面的紧张。防止和反对冒进，关键在于控制基建投资。2月6日，周恩来召集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和李先念等人开会，对他们说：各部专业会议订的计划都很大，计委、财政部要压一压。10日，经与李富春、李先念等研究，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实施了对各部专业计划指标“压一压”的方针，较大幅度地削减了一些严重脱离实际的计划指标。会议决定：中央各部基建投资总额削减6%，全国基建投资由170多亿元减到147亿元。会后，国家计委依此决定修订《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

2月下旬，周恩来又两次召集国务院常务会议，责成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和计委副主任张玺邀请各工业部门、有关的交通运输部门分别节约钢材4%和2.5%。

这就是后来所说的“二月促退会议”。

尽管开了“促退会议”，各项经济指标仍然居高不下。

3月25日，国务院下达压缩后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压缩后的一些主要指标仍然很高。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物资的供需矛盾。到4月上旬，经济建设急于求成、齐头并进造成的严重后果已经突出地表现出来：不但财政上比较紧张，而且引起了钢材、水泥、木材等各种建筑材料严重不足的现象，从而过多地动用了国家的物资储备，

并造成了国民经济相当紧张的局面。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部门仍旧要求追加基本建设投资。

为了避免因再追加投资而带来更加严重的物资供需上的矛盾，减轻建设中已经出现的比例失调问题，4 月 10 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计委《关于 1956 年基本建设计划安排和要求增加部分投资的补充报告》。这次会上，突出地提出了基建规模同实际所能供应的物资条件严重不相适应的矛盾。周恩来说：搞计划必须注意实事求是。生产是主要环节。我们要自力更生，要靠自己，首先就要进行很多平衡工作。搞生产就要联系到平衡。一定要为平衡而奋斗。数量上平衡以后，还有品种和时间上的平衡问题。

在毛泽东几次讲要打破平衡的情况下，周恩来明确提出要为平衡而奋斗。这一方面表明了周恩来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精神，另一方面也表明，当时在中共党内政治生活还比较正常。

针对各地基建项目过多、过滥的情况，周恩来强调：保证重点建设的次序也不是死的，要实事求是。有的没有材料，只好不建。薄一波也在会上说：现在基本建设遇到的最大问题不是财政问题，根本的是生产潜力和材料、设备、物资平衡问题。

4 月中旬以后，周恩来和国务院副总理陈云根据 4 月上旬以来国民经济出现的相当紧张的局面，作出十分肯定的判断：压缩后的 1956 年国民经济计划仍然是一个冒进的计划，相应地规定了 1956 年、1957 年和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建设速度的远景计划自然也冒进了。这样，能否从领导干部思想上坚决清除急躁冒进情绪，确立一个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已成为关系到经济建设能否健康发展的大问题。

5. 当毛泽东主张再追加一笔大数额的基建投资时，周恩来直言劝阻

4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再追加一笔大数额的基建投资。与会者除个别人外都表示不同意这样做。周恩来恳切陈词，直言劝阻。他说，我召开国务院会议研究过，如果还要追加建设投资，经济秩序就要搞乱了，将会继续加重物资供应的紧张程度，增加城市人口，还会带来其他的一些困难。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仍坚持自己的意见。会后，周恩来又向毛泽东反复说明不能追加基本建设投资的理由，并说他以自己的"良心"担保不能再追加基本建设投资了。

周恩来的态度使毛泽东很不高兴。曾做过毛泽东的兼职秘书的李锐在一部回忆大跃进的著作中讲到，长期担任毛泽东专职秘书的胡乔木曾对他说：主席爱听好事，鼓舞人心之事。透过大量的事实分析，胡的这种说法是站得住脚的。毛泽东确实喜欢听鼓舞人心的事，听鼓舞人心的话，而对于告诫他遇事要冷静之类的话就难以听得进去。这种情况在大跃进前夕和大跃进过程中尤其明显。当时，他正处在农业合作化和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高潮的成功喜悦中，正雄心勃勃地要加快工业化步伐，力图使中国尽快赶上并超过世界各经济发达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不仅向他领导下的干部群众"泼冷水"，甚至当面向他"泼冷水"。对此，他确实难以接受。

"五一"国际劳动节后，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外地去了。他感到北京的气氛太沉闷，他要到外面去呼吸些新鲜的空气，去寻求新的支持。

5月11日，国务院召开第28次全体会议，各省市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调整国务院所属财经部门组织机构的方案》和《关于批准国务院设立专家局的方案》，准备将这两个方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针对急躁冒进倾向并没有得到有效制止的情况，周恩来在就这两个方案作说明时，再一次强调："反保守、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

几天之后，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重点讨论了双轮双铧犁问题。5月下旬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再一次讨论双轮双铧犁的问题。

双轮双铧犁的推广和应用问题，是一个毛泽东十分重视的问题。1955年，毛泽东曾亲自主持制定了一个指导农业生产及农业发展未来远景规划的文件，开始叫《农业17条》，后来经过补充修改，成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在这个文件中具体规定了推广双轮双铧犁的数量：在3至5年内，推广双轮双铧犁600万部。这个规定当初就受到一些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人的反对。陈云就曾指出过：在南方水田，这种犁不便于使用，尤其是淤泥中更难以使用。因此不宜生产太多。后来，在周恩来主持的有关会议上，将这种犁的生产数量调整为350万部。

在周恩来主持的这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有人提出年初经过调整后确定生产350万部双轮双铧犁的指标还是过高，坚持这样做会给生产、使用和销售都带来一系列问题。周恩来在5月中旬的会上说：我们并不否定它的作用，但也不要生产太多，可考虑减为生产180万部，到第4季度不够时，还可以设法生产。在5月下旬的会议上，当有人提出生产180万部的指标还是过高，数量太大，因为这种双轮双铧犁根本不受农民欢迎。强行销售就会引起农民的不满。周恩来听后当即表示：既然不行，何必提倡？绝对不要强销给农民。会议最后决定：双轮双铧犁的生产，

有些省如果还能压缩的，还可研究再行压缩。

除基本建设和双轮双铧犁的生产之外，计划指标的修改与压缩是反冒进的另一个重要领域。6月1日，周恩来、陈云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在讨论《关于1956年度计划的修改问题和编制1957年计划控制数字的进度安排问题的报告》时，周恩来说：首先要承认今年的计划搞得不十分妥贴，国务院有责任。超过客观经济条件的可能去搞，结果不是窝工，就是粗制滥造。

6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讨论准备向一届人大三次会议提出的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初稿。这份由财政部起草的报告初稿上，根据5月中央会议的精神写上了："必须全面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针，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在会上，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介绍了上半年因为经济建设急躁冒进所带来的种种矛盾和不平衡问题，提出继续削减财政支出、压缩基本建设投资的意见。10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预算报告初稿，并提出要加重反对急躁冒进的分量。会议指定胡乔木对报告初稿作进一步修改，修改后的预算报告进一步加重了反对急躁冒进的分量。报告指出："在当前生产领导工作中，必须着重全面地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克服片面地强调多和快的缺点。

生产的发展和其他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

在中共中央提出反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的第二天，即6月5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商议贯彻执行这个方针，研究继续压缩1956年国家预算问题。会上，李先念指出：今年财政预算看来是订高了。他说：我看现在下马比年底下马好。针

对有人不同意削减预算一事，周恩来说明，计划和预算应该是统一的，预算高了就一定要削减。强调要打破预算不能修改的观念。他指出：既然认识到不可靠，就应该削减。昨天党中央开会决定了这个精神。今天在会上讨论，把数字减下来。明知原来的预算完不成，又在报告中列出去，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是没有告诉他们实际情况。他强调：右倾保守应该反对，急躁冒进现在也有了反映。这次人大会上要有两条路线的斗争，既反保守，也反对冒进。周恩来综合李富春、薄一波在会上提出的意见，确定按5%削减国家财政预算，把基本建设经费由147亿元再次削减到140亿元。

6月12日，周恩来和陈云一道主持国务院第30次全体会议。在讨论《1955年国家决算（草案）和1956年国家预算（草案)》时，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不同意向全国人大会议提交的财政报告中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问题，认为这是同去年夏季以来开展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精神相背离的，会引起思想混乱。针对这种意见，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讲话说：从去年反保守到现在，注意了发掘群众的积极性，所以各方面都出现了高潮。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高潮，推动了各项工作，迎来了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但也带来了一些不切实际的主观主义的要求，带来了急躁冒进。去年12月以后冒进就冒了头，因此，现在的情况和去年不同了，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了！如果冒进继续下去，又会脱离实际，脱离今天的需要和可能，不能向群众泼冷水，但也不能把少数积极分子的要求当成群众的要求。周恩来还说：今年的收入不能打得太冒，要打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应该加强计划性。首先搞生产计划，然后搞人力、物力计划的平衡，最后搞财政预算。向即将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提出的这个报告是工作报告，我们可以以此检查和推动政府的工作。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这个文件，决定提请第一届

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审议批准。

由于周恩来等人的努力，李先念在6月15日召开的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写进了反对急躁冒进的内容。报告明确指出："在当前的生产领导工作中，必须着重全面地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克服片面地强调多和快的缺点。生产的发展和其他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李先念的这种意见，为全国人大会议完全接受。

6. 刘少奇为《人民日报》反冒进的社论开了绿灯

当时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也是支持反冒进的。这年5月，刘主持召开一次中央会议，为即将在6月召开的一届人大三次会议做准备。这次会议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要实行既反保守主义、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在这次会上，刘还要求中宣部长陆定一组织中宣部代《人民日报》起草一篇社论，宣传贯彻中央会议的精神。

随后，陆定一在6月1日召开的部分省市委宣传部长座谈会上透露了中央的这个精神。陆定一说：反对右倾保守，现在已高唱入云，有必要再提一个反对急躁冒进。中央要我们写篇社论，把两个主义反一反。与此同时，陆定一便安排中宣部的王宗一负责具体起草刘少奇交办的社论。

6月11日，王宗一将初稿送陆定一审阅，同时根据陆定一的意见，另送胡乔木一份。陆定一对社论作了几处修改，删掉了颂扬反保守主义的几句话，强调了在农村的扫盲工作也是"急躁冒进的"突出的例子。胡乔木补充了几个急躁冒进的例子，其中就提到了双轮双铧犁的例子。他补充道："双轮双铧犁的计划定得太高，没有考虑到南方水田的条件，以致南方许多地方大量积压。"

陆定一和胡乔木的两处修改，都直接触及到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因为《纲要》规定"从1956年起，5到7年内基本扫除城乡居民中的文盲。"规定："在3年至5年内，推广双轮双铧犁600万部。"

6月12日，陆定一把社论清样送刘少奇审定。在社论清样上，陆写道："少奇同志：嘱写社论，已由本部王宗一同志写好。我认为可用，特送上请审正。"

刘少奇看了社论清样，作了多处修改，其中四处修改都加重了反冒进的语气。刘又将清样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清样上只批了三个字："不看了"，便退了回来。

毛泽东的批示中，没有讲同意，也没有讲不同意。后来他曾多次提到过这件事，按他后来的说法，"不看了"就是不同意。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的讲话中谈到了这篇社论。他说："这是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不是一个指头有了病。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了'三字，骂我的，为什么要看?"

毛泽东的讲话一出口，与这篇社论有关的中央负责人如周恩来、陈云乃至刘少奇都纷纷作检讨——此是后话。

带有毛泽东批示的社论清样送到《人民日报》社。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邓拓看出了毛泽东的不满情绪，这使他陷入两难境地。在《人民日报》成立50周年的1999年6月15日，此

时邓拓早已长眠于九泉，邓的夫人丁一岚面对记者诉说了邓当时的两难境地："你说发了吧，毛泽东主席不同意。不发吧，少奇同志和周恩来总理那边又没法交代。……他毕竟还是书生气十足，原来社论是4号字，他改成了5号字，想着字小一点，这样可以避免特别醒目，引人注意，其实这无济于事。因为这件事，毛泽东主席对邓拓很不满意，就批评他是书生办报。"

6月20日，这篇社论在《人民日报》发表。诚如毛泽东所言，社论虽从两方面提出问题，但着重点强调了反对急躁冒进。社论在谈到当前工作中存在的缺点时指出：

"缺点现在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一些工作中仍然有右倾保守思想在作怪，另一方面是在最近一个时期中在有些工作中又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偏向，有些事情做得太急了，有些计划定得太高了，没有充分考虑到实际的可能性。这是在反保守主义之后，发生的一种新情况。这种情况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

"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一出来，各个系统都不愿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而且都要求得很急，各部门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绩来。中央几十个部，每个部一条，层层下达，甚至层层加重，下面就必然受不了。现在中央已经在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纠正这种不分轻重缓急，不顾具体情况的急躁情绪。各个部门和各个地方的工作中的冒进倾向，有些已经纠正，有些还未纠正，或纠正得不彻底，但作为一种思想倾向，则不是一下子所能彻底克服的，需要我们在今后经常注意。"

这篇社论对于形成中共八大经济建设的方针起了重要作用。

7. 编制“二五”计划的指导思想：既反保守，又反冒进

从1956年6月底开始，中共八大政治报告进入具体起草阶段。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刘少奇几乎全力投入政治报告的起草。而从7月开始，周恩来也以主要精力关注准备提交八大讨论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编制、起草工作。

“二五”计划是指1958年至1962年期间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鉴于编制计划是件非常艰难的工作，中共中央决定及早编制这一计划，以便提交八大审议。早在1955年8月国家计委就汇总国务院各部提出的建议，编制出第一个“二五”计划指标的方案，于10月5日报送中共中央、国务院讨论。随后，对经济形势的估计出现了新的变化。1955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中指出：“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因此不断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当时正在召开或即将召开的计划会议、基本建设会议、财政会议就大大加温。国务院各部门自动否定了原来向国家计委报送的第一个“二五”计划方案，把粮、棉、钢等重要指标都大大提高了。1956年1月14日，国家计委将各部门提出的第二个“二五”计划方案汇总报中共中央、国务院讨论。

1956年6月，周恩来在北戴河主持编制“二五”计划的工作，7月3日到5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二五”计划的第二方案，磋商编制一个符合客观实际的新方案。

周恩来指出：制订新方案是为了贯彻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方针。他以充足的理由说明，第一个方案冒进了，第二方案确定到1962年粮食产量达到5500亿斤是不可靠的，有危险的，甚至定为5300亿斤也值得考虑。这是因为，农业合作化后，虽然农业生产的积极因素增加了，但消极因素并未减少。我们还不能排除歉收，水、旱、虫灾总要起作用，它们天天都在管着农业生产。因此，农业生产在“二五”计划期间也会有丰年、平年和歉年，所以粮食生产每年很难以6%以上的速度增长，搞这个假设不好。他严肃地指出：农业生产指标算高了，农业税、轻工业利润、基本建设投资和财政预算等一系列数字都受到影响。这是一个根，而这个根是我们最不容易掌握的。农业指标一旦达不到，必然危及整个国民经济计划。

在财政收支指标问题上，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一致认为：“二五”期间，财政收入和支出每年以16%的速度增长，要实现5年累计2600亿元的指标，实际上达不到，结果还会使重点建设项目的资金也保证不了。因此，这个框框可以推翻，应该压下来。在工业生产指标问题上，周恩来、陈云、薄一波等指出：设想到1962年钢铁产量达到2700万吨至3000万吨，这是高的想法。我国工业化的关键不在于钢能否达到这个数字，而在于我国的水平。现在，英国、德国都没达到2000万吨钢，但他们国内什么机器都能生产，就是工业国。对于我们来说，更重要的，也是各种机器都能制造，技术高，有发展的余地。因此，设想钢铁生产少一些，煤炭生产指标、基本建设投资等相应地都可以少些了。经过认真讨论后，与会者一致认为，“二五”计划的第二方案仍不稳妥，同意继续精打细算，按5年财政总收支2350亿元至2400亿元来安排，相应减少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基建投资，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搞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作为向八大的建议。

可以说，这是一次把高指标的幅度往下降的带转折性意义的会议，从思想上反对和清理了离开中国经济建设实际、离开综合平衡的急躁冒进倾向。这样，向八大提出一个接近实际的“二五”计划的建议已经成为可能。

在整个7月里，周恩来同计委负责人薛暮桥、王光伟、陈先等不断磋商、反复计算各项指标的可行性。他指示计委应根据“一五”计划已有的经验，做好各项平衡工作，留有余地，要正确估计工农业生产增长速度和国民收入总额，在此基础上安排积累与消费比例，妥善处理农、轻、重的比例关系，提出稳妥的投资总额，以此编制出可行的方案来。在7月2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讨论财政问题时，他又说：今年计划就是冒进了。保守固然是错误的，但是，冒进了更不好受。

从这番话里，我们可以看出，周恩来在这时已经将冒进看作比保守主义更为严重的错误了。8月3日至16日，周恩来、陈云在北戴河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7月下旬提出的“二五”计划第三方案和该方案的调整意见中的部分指标又作了调整。这样，国务院各部门多次修改计划，国家计委多次汇总上报，先后修改了6个方案。交毛泽东审阅了3次。毛泽东原来对第二个方案是满意的，还认为其中有些指标低了。当国务院提出修改方案时，毛泽东没有坚持原来的意见，最后与周恩来等人取得了共识。

当时，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和第一副主任张玺正在苏联商谈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的经济援助项目。周恩来要计委副主任薛暮桥负责起草“二五”计划的建议文件，由国家计委长期计划局副局长陈先协助。据薛暮桥后来回忆：“我们根据手中掌握的资料，很快就估算出1957年的国民收入总额，再以‘二五’时期工业生产年增长15%、农业生产年增长5%计算（‘一五’时期工农业年增长分别为18%和4.5%），估算出‘二五’时期国

民收入总额为4000亿元。积累按25%计算，‘二五’时期的投资总额就为1000亿元，而‘一五’时期积累占24.2%，投资额为588亿元。”

薛暮桥等向周恩来和陈云汇报了上述估算。周恩来、陈云基本同意这个投资总额。陈云还说，农业年增长5%，是高了一些，因为农业有丰有歉，荒年还要减产，要留有余地。接着，薛暮桥、陈先参照“一五”时期的比例，将投资总额在各部门之间进行初步分配，与在北戴河的各部部长共同讨论，定出主要产品可能达到的产量。与此同时，国家计委各局进行详细计算。计算的结果与薛、陈估算的数字基本一致。框架定了以后，他们用了大约一个星期时间写出《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第一稿。

这个文件汇报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又组织一些人对《建议》初稿作了反复讨论、反复修改。常常是边念边议，讲思路，当场改。周恩来还自己动手，多次作了修改。基本定稿以后，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毛泽东主持了政治局会议，周恩来作了简要说明。讨论后，毛泽东基本同意，决定回北京后再作修改。

回到北京后，张玺已由苏联回国。张玺同薛暮桥便对《建议》再次稍作修改。张玺、薛暮桥都住在北京百万庄，常常晚7点钟开始在薛家客厅讨论，到深夜结束。因为时间紧迫，他们连续讨论了几天。修改完毕后，一起到总理办公室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对于每处修改都要询问，张、薛等一一作答，一直讨论到次日早晨。

不仅如此，周恩来等人还对一些过高的中短期生产指标数字进行了调整。7月17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讨论国家经委《关于1956年钢材、水泥、木材供需上存在问题和处理意见的报告》时，周恩来指出：搞生产必须要根据可能，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计算生产潜力，除人力条件外，还必须考虑到物资等

其他条件。根据目前材料的紧张情况，在安排今年下半年生产的时候，应该为明年生产作准备。他强调说：近几个月以来，我们得到一条教训，既不要右，又要敢于抗大流，这就要摸实际情况，每年下去看看。

几乎与此同时，国务院常务会议又一次讨论双轮双铧犁的产销问题。会上有人反映，东北有大片旱地，大马匹，马比牛听话，推行双轮双铧犁比较好。南方是水地，用的是牛，90%以上的双轮双铧犁没有用。根据这个意见，几经削减之后的180万部的生产数量仍然显得太多。但对于这样一种毛泽东热心推广的农具，再进行削减，有人感到为难。周恩来在会上说：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做了些好事，用最大限度的集中权力，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的利益，得出了最大的成绩，这样做是必要的，但有时也会出现这种状况：忘记了民主，结果是滥用权力，强迫命令，官僚主义。上面有官僚主义，下面有强迫命令。反下面的强迫命令，必须检查上面的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和强迫命令的结合，是我们行政工作部门的大问题，是我们国家制度上的一个问题。他还提议，对这个问题八大开会时应该讲一讲，我们每做一件事，总要有所得。

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国务院作出《关于双轮双铧犁减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今年双轮双铧犁的生产计划最高方案曾达500万部。根据计算，全年最多能销售140万到150万部，因此决定今年的生产计划削减到175万部以下。

关于双轮双铧犁的讨论，至此终于算是告一段落。生产、销售双轮双铧犁的指标从最初确定的600万部，经几次削减后确定为175万部以下，削减幅度应该说是很大的。但即使这样，国家确定的数字仍然过大。事实上，这一年国家虽然加紧生产出170多万部，却只销出80万部。后来又被退回15万部，没有退回的，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只能挂在墙上无法使用的“挂犁”。

在中共八大召开前夕，周恩来在反冒进方面还有一个重大的步骤就是向“多、快、好、省”这一冒进口号发起了挑战。

由于反对右倾保守的持续开展和急躁冒进情绪的严重存在，对于多、快、好、省这一口号，人们看重和追求的往往是多和快，忽视和忘记的常常是好和省，因此，这个口号并没有起到预期的积极作用。鉴于这种情况，周恩来等在对建议草案进行第三次修改时，在重要位置出现的“以多、快、好、省的精神”一语即被删掉了。这以后一年多时间里没有人再提“多、快、好、省”了。

9月初，周恩来在阅读修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时，将别人改动后的“到 1962 年要求粮食生产 5200 亿斤，棉花 5200 万担”，恢复为“到 1962 年要求粮食生产 5000 亿斤左右，棉花 4800 万担左右”。并以坚定的口气在一旁注明：“粮食产量是经过多次商议并与陈云同志谈过的”。由于周恩来的坚持，这两个比较实际又很重要的指标才最后确定下来。

8. 中共八大确定了以反冒进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建设方针

1956 年 9 月 15 日至 27 日，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新建成的全国政协礼堂隆重举行。这是中共在全国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共 1026 人，代表着全党 1073 万党员。50 多个来自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团以及国内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应邀列席大会。

9月 15 日下午 2 时，当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康生、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

彭德怀、林彪、邓小平，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以及中国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登上主席台时，会场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2时5分，毛泽东致开幕词。他说：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大会的第一个议程，是刘少奇代表中央向大会作政治报告。

这个政治报告是近一年来刘少奇等人的主要工作成果。1955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决定：在1956年下半年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此后，刘的主要精力就转向主持八大政治报告方面来。

为了准备起草八大的政治报告，从1955年12月7日到1956年3月9日，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刘少奇先后约请中央和国务院37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汇报座谈，内容包括工业、农业、商业、财政、交通运输、文教卫生、体育等各个方面。5月28日，刘又分别听取新华通讯社和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负责人的汇报。为了开好这些汇报会，刘少奇在这几个月内，除了出席外事活动和参加中央有关会议外，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件事情上，座谈会常常从白天一直开到次日凌晨。

通过这次调查，使刘少奇对中国的经济建设状况，对各部门各行业存在的问题，心中大致有了数，这就使起草八大政治报告有了坚实的基础。

这时，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得知刘少奇正在系统地听取各部门的汇报，十分称赞这种方法，表示也要用这种方法做一番调查研究，要薄一波帮他组织。于是，从1956年2月中旬到4月底，毛泽东也先后听取国务院34个部委的汇报。

这就是毛泽东后来说过的他在建国后所进行的两次调查研究中的第二次，第一次是为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

而阅读了大量的汇报材料。与那一次相比，这第二次调查研究显然要更接近实际一些。汇报会结束后，毛泽东集中这次调查研究中的成果，经过政治局几次讨论，形成了《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路。

刘少奇和毛泽东先后主持的这两次汇报活动，是建国以来中共中央对经济建设中各方面问题进行的时间最长、内容最系统的调查研究，为中共中央在八大制定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做了重要的准备。

从 1956 年 6 月底，八大政治报告进入具体起草阶段。

为了写好这个报告，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一个由刘少奇主持的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6 月 30 日，刘少奇召集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李维汉、王稼祥、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胡绳、邓力群等开会，布置报告的起草工作。这以后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无论是在北京，还是中间有一段时间移到北戴河，刘少奇几乎全力投入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终于顺利完成了。

报告提出："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我们党现实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八大政治报告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确定了"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经济建设总方针。报告指出："党中央委员会所建议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发展速度是积极的，同时又是稳妥可靠的。发展速度必须是积极的，以免丧失时机，陷入保守主义的错误；又必须是稳妥可靠的，以免脱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使

人民的负担过重，或者使不同的部门互相脱节，使计划不能完成，造成浪费，那就是冒险主义的错误。”

9月16日，邓小平向大会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这个报告特别强调了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发展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对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等内容，并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邓小平说：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它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要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和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继续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

八大通过的党章中还引人注目地增加了一项内容：在必要时，中共中央设立名誉主席。后来毛泽东在解释这一条时说：必要时由谁做名誉主席呢？就是鄙人。联系到随后他就在党内提出，不再担任下一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务。人们不难从中看出，他这时已经有了从中央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打算。只是由于后来发生了许多他认为越来越严重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中的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对“三面红旗”的不同看法，毛泽东的这一打算才没有能够付诸实施。

周恩来在八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这个报告主要是用来说明《关于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由邓力群主持执笔，参与起草的有梅行、房维中，陈先提供情况和数字。张玺和薛暮桥参加了报告的讨论修改。

周恩来所作报告的基调可以说是既反保守又反冒进。报告总结了中国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情况，就近年来领导经济工作中所感到的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意见。指出，我们在领导经济工作中取得的基本经验是，第一，应该根据需要和可

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第二，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使国民经济各部门按比例地发展，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相应地促进农业和轻工业生产的发展；第三，应该增强后备力量，物资储备，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年度计划的顺利执行，并应付可能遇到的意外的困难；第四，必须正确地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财政收入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财政支出也必须首先保证经济的发展。

周恩来代表中央所作的这个报告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指导性文件。后来，这个计划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但在经历了大跃进的严重挫折之后，又重新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1960 年 6 月 18 日，毛泽东在他写的《十年总结》中谈到高指标的教训时，深有感触地说："1956 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下了三年的余地，多么好啊！"

9 月 27 日，大会闭幕。在闭幕式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 年——1962 年）的建议》。这个决议是前一天在毛泽东召集的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后提交大会的。《决议》明确规定把既反对保守主义又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坚持在综合平衡中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指导方针。

9. 八届二中全会将反冒进推向了高潮

在中共八大会议结束后，周恩来、陈云等人将主要精力转到了对 1957 年国民经济计划各项指标的研究和计划的编制工作上。

1957年计划的控制数字是国家经委从1956年7月开始编制的。当时各部门各地区向经委提出的基本建设投资额高达243亿元。当经委把投资压到150亿元时，各部门各地区反对再往下压。

面对这一情况，周恩来对学习秘书范若愚说，这样搞计划不行，仍然是冒进的。我准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讲一讲这个问题。

1956年10月20日至11月9日，在3周的时间里，周恩来主持召开了10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检查1956年计划执行情况和磋商1957年计划的控制数字。出席会议的有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习仲勋、贾拓夫、宋劭文、谷牧等。

会上，薄一波介绍了1957年计划控制数字的编制情况，他报告说：基本建设投资现在已压缩到140亿至145亿元，这就要求财政收入能达到318亿元，但达到这个数字有困难。如果就这样定下来，计算一下，损失很大。他为难地说：这个情况，使计划的制定处在想上上不去，想退退不下来的困难状况中。计划到现在还搞不出来，大家意见很多。他还介绍说：苏联1936年冒进了一次，结果物资不够了，工资增加了，消费品供应不上，人民骂娘，很难受，退了3年才扭转过来。

但是，有些人对1956年急躁冒进造成的危害看得并不清楚，仍主张下年度的指标可以订得高一些，说：1956年的计划是冒了，但又因为执行计划时松了，所以才形成到处紧张，投资分散，百废俱兴。为了适应三大改造高潮的需要，计划出了些冒，在执行中也不应该松。

周恩来当即表示，不同意这种为了政治需要而有意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做法。他恳切地说道：三大高潮一来头脑热了，前进得快了。经济建设主要是冒了。不但年度计划冒了，远景计划也冒了，而且把年度计划带起来了。因此，现在我们主要也应该批“左”。李先念支持周恩来的意见，指出：今年成绩很大，但问题

不少，如不把今年的经验很好地加以总结，明年就压不了。认为，搞明年计划，首先要把党的思想统一了才行。

从统一思想的目的出发，11 月 9 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作总结发言，比较系统地陈述了自己对工业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的看法。他指出：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批判斯大林以来，暴露了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少问题。苏联发展重工业多，束紧腰带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农业发展缓慢，经过 39 年，产量仅高于沙皇时代的最高年产量。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忽视农业的影响，苏联现在还没有纠正过来，这是需要时间的。他说，从我们国家这样大，很落后，人口多的国情和既要建设，又要注意人民生活的原则出发，我们现在根据可能把速度比原来设想的放慢，不能算是错误。明年年度的计划必须采取退的方针，目的是保持平衡。这不发生“左”倾、右倾的问题。不像政治方面，“左”了就是盲动，右了就是投降。他强调：搞重工业不要失掉人民，否则就没有了基础，就成了沙滩上的建筑物。

由于反冒进已经进行了几个月，急躁冒进给经济建设带来的危害，在各部门特别是国务院领导成员中感受更加深刻，又由于这次会议把重点放在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而不是追究个人责任上，因此，使总想把工业多搞一些的少数人也认识到过去想法有些片面和主观。

国务院常务会议一结束，11 月 10 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开幕。全会着重讨论了国际形势和 1957 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

开会第一天，刘少奇在全体大会上作了《目前时局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 1957 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的控制数字的报告》。

刘少奇在报告中，主要通报了东欧的局势和最近他访问苏联的有关情况，同时也就中国经济建设的比例关系和建设速度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我们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就是国家的积累，

用多少资金投资，积累应该多少？重工业与轻工业和农业发展的比例这么一些问题，以及我们工业建设中的速度，放在一种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什么叫稳妥可靠呢？就是群众总不能上马路，不能闹起来，还高兴，还保持群众的那种热情、积极性。他在报告中还引述了陈云的一段话：昨天陈云同志也讲，他主张宁愿慢一点，慢个一年两年，后两个五年计划，每个五年计划慢上一年稳当一点，就是说“右倾”一点比“左倾”一点好一些，还是“左倾”好？

周恩来的报告集中讲经济建设问题，报告的基调是反冒进的。他认为，1956 年的经济工作有冒进性质的错误。周恩来说：1953 年小冒了一下，今年就大冒了一下。过去设想的远景规划，发展速度是不是可以放慢一点？经过八大前后的研究，我们觉得可以放慢一点。

周恩来在报告中以钢产量为例，说道：原来设想钢产量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要达到年产 3000 万吨，肯定地说，照现在这个速度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硬要定到 3000 万吨，其他就都要跟上去。那就会像我们常说的，把两脚悬空了，底下都乱了，不好布局，农业、轻工业也会受影响，结果还得退下来。

周恩来说：八大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所提出的数字，也只是个建议，有某些达不到的指标是不是可以修改？我觉得是可以的。建议中有些数字当时觉得是恰当的，现在发现还有矛盾需要解决，那就应该解决，我想这是许可的。

他还谈到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他说：这也是一个建议，是一个草案。草案现在执行快一年了，事实证明有些是需要重新研究的，这些并不是不可以修改的。比如扩大耕地面积，要求 12 年内开垦 1.4 亿亩显然是有困难的。如果每年开垦 1000 万亩，就要投资 5 亿元。这 5 亿元的投资，明年度无论如何也挤不出来，今后也不是每年都可以挤出来的。这两个文

件经过我们研究以后觉得可以修改。上不去，就不能勉强，否则把别的都破坏了，钱也浪费了，最后还得退下来。

在报告中，周恩来提出了一个究竟应该怎样估计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问题。他的答案是：经过国务院常务会议多次讨论，大家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上是正确的，成绩很大，但是错误不少。为什么会犯错误呢？他认为是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和知识。为了在今后经济建设中不犯错误，他认为待“一五”计划完成后应该做全面总结。这样，就可以得出更多的经验教训，就会比八大时的认识更完全更深入。

这个报告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周恩来提出了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在继续前进的基础上，保证重点，适当收缩。他说：总的方面是要收缩一下的，不然站不稳，那就会影响我们的货币、物资、劳动、工资等各方面。

尽管有人在会上提出了相左的意见，但是，刘少奇、周恩来在报告中所阐述的重要意见和制订1957年计划必须坚持的“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经过充分讨论后仍被八届二中全会接受并且在会后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

10. 陈云提出了财政、信贷、物资三大平衡的著名思想

1956年11月17日，周恩来出访亚欧11国。陈云担负起了主持制订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重担。

陈云在八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成为中共党内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早在1954年，陈云就提出，经济建设必须按比例发展，搞

好综合平衡。1956年初，当大家都争着上基本建设项目时，3月6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陈云即主持将基本建设拨款削掉了7亿元，由原来的125亿元削到118亿元，削减了6%。在这次会议上，他还指出：根据中国的情况，每年总要有些结余才行。

1956年底，在讨论编制1957年预算和控制基本建设投资时，陈云更是多次阐明了反对冒进的观点。

12月4日，陈云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他在会上发言说：二中全会决定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为126亿元，关键是看材料，材料够就搞126亿元，如果材料不够就砍下来。

根据再次摸底后的情况，12月17日，陈云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商讨进一步减少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问题。陈云提出：把投资压缩好，我们责无旁贷。不要怕别人说机会主义。明年计划的投资，削了以后，不仅明年平衡，将来也可以平衡。当然，削多少要研究。过去照顾基本建设多，照顾生产少。今后应该首先保证必需的生产，其中主要部分应该保证最低限度的民生，有余再搞基本建设。这样基本建设就是冒也冒不了多少。会议决定再将基建投资压缩到114亿元。待进一步算账后提交中央讨论。

12月18日，陈云主持国务院第41次全体会议，他在会上说：要把建设和民生的关系摆好，从财政和金融贸易这方面看，主要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财政预算和现金收支必须是平衡的，不能有赤字，而应略有结余。二是预算中建设规模应该和物资的供应相适应。首先应该照顾到必需的民生的生产，有余再搞建设。三是每年人民购买力与供应人民的消费品应该求得平衡。四是我国的建设需要的外汇大体上依靠农产品出口，农业对工业有很大的约束力，工业不能不管农业而为所欲为。

当时，中共党内的急躁冒进情绪是比较浓的，因此，关于1957年的基本建设投资问题，争论很大。12月27日，陈云再次

就这个问题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作了发言。

他警告说：现在马跑得很危险，这样骑下去，后年，大后年更危险。他还说：明年要削减投资，必须要搞些死办法，灵活了不行，哪些东西不搞就是不搞，人不准增加就是不能增加，要砍就砍下来。当然，我们共产党最好是按辩证法办事，但这样不行，不来个绝对主义办不了事。

会上有人提出，投资削减以后，有些项目就不能搞了，工人也不好安排。对此，陈云指出：我看不能搞就不能搞，计划完不成就完不成，工人能做别的就做别的，不能就照发工资。这样对不对呢？我看不会不对，如果到明年 8 月我们看不对，8 月以后再搞也来得及。我们是个大国，明年不稳当心里不安。

他还鼓励国务院主持经济工作的一些干部要敢于负责，勇于负责。他说：经济工作还是大家讨论，我们做决定，我们向中央负责。我们责无旁贷，少奇同志管党的工作，小平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总司令也不管这些事，总理忙得很，首先是我们几个人负责，我们肩上担着 6 亿人的事，如果搞得天下大乱，打我们的屁股。

为了深入总结 1956 年经济工作急躁冒进的经验教训，有利于 1957 年计划的制订和今后经济建设的顺利开展，1957 年 1 月 18 日，陈云在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财政经济工作问题》的讲话。他强调：适当压缩基本建设的投资额，这样做的目的是使 1957 年基本建设的规模，适应于国家财力和物力的可能。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像我们这样一个有 6 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据此，陈云提出了财政、信贷、物资三大平衡的著名思

想，强调：一是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节余。二是物资要合理分配，排队使用。三是人民的购买力要有所提高，但提高的程度，必须同能够供应的消费物资相适应。四是基本建设规模和财力物力之间的平衡，不单要看当年，而且必须瞻前顾后。五是我国农业对经济建设的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他指出应当用财政、信贷、物资三大平衡这样的制约方法，来防止经济建设超过国力的危险。

陈云的这些话，在当时对于压缩基建投资，反对急躁冒进情绪起了重要的作用。

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之后，国务院进一步对 1957 年计划中的各项指标和财政支出指标进行了核算和压缩，并在二三月间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安排了 1957 年计划。到 4 月，从国外出访归来不久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第 44 次至 46 次全体会议，讨论批准了对基建投资、行政经费、军费、社会购买力、劳动计划和文教卫生等指标都作了压缩的《1957 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

在 1957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指导下，中国国民经济进一步健康发展，工农业总产值、财政收入稳步增长，基本上实现了财政、物资、信贷三大平衡，保证了市场的稳定，使 1957 年经济工作成为建国以来最好的年份之一。

11. 国际形势风诡云谲，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

当国内反冒进势头正盛的时候，毛泽东正将注意力集中于国际问题。

反冒进是 1956 年的事。1956 年，毛泽东称之为“多事之秋”。所谓“多事”，主要是就国际形势而言。

1956 年 2 月，苏共召开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2 月 24 日，

在苏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的当晚，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突然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长篇“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时期的许多阴暗面。

苏共二十大并不只是苏联一个国家的事情。当时，有55个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团应邀到莫斯科列席会议。中共也派出了以朱德为团长的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大。

据陪同朱德出访的资深翻译家师哲回忆说：“赫鲁晓夫作报告时，没有请中共代表团参加。他们事先对中共代表团解释说：我们对中共代表团没有什么秘密可保，但对其他代表团就不一样了；因为其他代表团不列席这次会议，你们也就不便参加了。

赫鲁晓夫作完‘秘密报告’后，立即把这个报告的速记稿送来了。大家看了以后，议论纷纷，意见很多。

朱德说：这讲的是他们自己的事，我们到这里是来作客的。

邓小平坚定地说：斯大林是国际人物，这样对待他是胡来！不能这样对待革命领袖斯大林。

谭震林认为：我们不应该随便同意他们的意见，应有自己的态度。但这是他们的内政，我们不一定能影响他们。”

苏共二十大闭幕以后，中共代表团回到国内。3月1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杨尚昆、胡乔木、张闻天、王稼祥、吴冷西等人到会，商讨对策。

与会者议论纷纷，愤愤然。一是对苏共事先不向兄弟党通报不满，认为这是突然袭击。二是认为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严重错误。显然大家对这突如其来的事件没有思想准备。

毛泽东却显得特别冷静，并不大惊小怪。他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特别是这个报告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现在全世界都在议论，我们也要议论。

接着，毛泽东谈了他的最初看法。他说：现在看来，至少可

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漏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他捅了漏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

毛泽东的两点意见，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定了一个基调。

“1956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的上述讲话，坦率地表白了他对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喜惧参半的心态。

最初，这种喜惧参半的心态中，“喜”的成分占着上风。那是因为“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

1956年4月4日，在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即后来所说的“一论”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说：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得到什么教益。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他说，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

建国之初和“一五”时期，中国提出了“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口号。这种学习出于需要，也得到了一些好处。因为自己没有经验，只能基本照抄苏联的办法。这种情况使得毛泽东总觉得不满意。

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国内开始吹出一股“解冻”之风。贝利亚的被清除，一批重要的历史冤假错案开始平反，苏共内部发生了农业政策的争论；马林科夫下台，苏联与南斯拉夫两党恢复关系。所有这些使毛泽东觉察到，斯大林和苏联并非一切正确，一切都成功。那时，中国自己在建设上已积累了一些经验，同时发现完全照搬苏联不行。据薄一波回忆，早在1955年底，毛泽东就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斯大林问题披露后，使毛泽东

的“以苏为鉴”的思想更加明确。据李慎之回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传出不久，就听胡乔木讲述毛泽东的心情说：“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毛泽东主席日思夜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来。”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东欧一些国家引起了程度不同的混乱。当然，各国的波动程度不一样。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仅仅引起了较小而短暂的混乱，但在波兰和匈牙利则不同，那里的局势本来就不稳，现在更是炸了锅。

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贝鲁特也参加了苏共二十大，当他在莫斯科听到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后，可能是预感到波兰将要发生一场大的混乱，惊惧万分，竟猝死在莫斯科。

贝鲁特的预感真的应验了。1956 年 6 月，波兰西部的工商业城市波兹南发生由于工人的某些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引起的流血冲突事件。尽管事件很快得到控制，但它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内部产生了重大分歧，并且愈来愈公开化。

波兰局势的发展引起了苏共中央的极度焦虑。他们认为在波兰党内出现了一股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的倾向，必须坚决制止。10 月中旬，苏联开始在通向波兰的交通要道上集结军队，两艘苏军巡洋舰要求进入波兰港口。与此同时，苏联军官指挥的三个坦克纵队包围了波兰首都华沙。10 月 19 日，正当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开幕的时候，赫鲁晓夫亲率一个包括 3 名政治局委员、华沙条约国部队总司令、苏军总参谋长以及 10 余名陆军上将在内的庞大的苏共代表团，在未经波方邀请的情况下突然飞抵华沙，要求波党暂时休会，同苏共代表团举行会谈。迫于苏方的压力，波党只得停止会议，连夜同苏共会谈，但对赫鲁晓夫等人的蛮横态度并未屈服。波兰局势处在十分严重的时刻。

中共中央密切关注着波兰局势的发展。10 月 19 日和 21 日，

苏共两次就波兰局势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认为波兰局势十分严重，要求中共派代表团去莫斯科商谈如何处理波兰问题；并要求代表团的规格要高，最好由刘少奇或周恩来率领。接到苏共来电后，中共中央在20日和21日接连召开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波兰局势和苏共的要求。会议认为，在目前这种关键时刻，中共中央应当采取紧急措施，向苏共中央发出严重警告，坚决反对苏联对波兰采取武装干涉。波兰局势虽然比较复杂，但看来还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走入西方集团，应当承认目前波共中央的领导，在平等的基础上同它合作，争取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里。会议决定，由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组成中共代表团去苏联。21日和22日，毛泽东两次约请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请他向苏共中央转达中共中央反对武装干涉波兰的态度和对波兰局势的看法。

23日上午，刘少奇、邓小平一行启程赴苏，当晚抵达莫斯科机场，在机场受到赫鲁晓夫的迎接。到下榻住地后，赫鲁晓夫不等客人安顿下来，就急迫地向刘少奇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介绍波兰的情况。

就在中苏两党领导人交谈时，又传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发生动乱的消息。这一事件被称为“匈牙利事件”。

匈牙利事件是继波兰之后在东欧发生的又一起举世瞩目的严重事件。苏共二十大以后，在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政治气氛下，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内和社会上一部分人强烈要求改变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要求对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在斯大林时期所犯错误进行彻底清算，要求摆脱苏联的控制争取独立自主，由此引发了匈牙利党内的严重分歧，并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西方势力乘机积极参与。10月23日，布达佩斯街头出现了示威游行的群众队伍。示威游行队伍越来越大，占领匈牙利党和政府的一些机关，发生同保安部队的冲突，造成了流血事件。23日深夜，也就是中共代

表团到达莫斯科的当晚，局势仍在继续恶化，匈牙利党和政府逐渐失去对局势控制的能力。

24日，应苏共中央的邀请，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共代表团成员出席苏共中央为讨论波匈局势而紧急召开的主席团会议。26日和30日，中共代表团又两次出席苏共中央的此类会议。30日，中共代表团从苏方得知匈牙利国内局势继续恶化、全国处于无政府状态、反政府势力已占优势的情况以及苏共中央准备从匈撤出军队、放弃努力的态度后，紧急讨论了一整天，并把讨论的结果在电话中向北京作了请示汇报。在晚上举行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代表团向苏共中央提出：反对苏军撤出匈牙利，认为在现在这种局势下苏军撤出匈牙利，把匈牙利交给使用暴力手段的反政府势力是不妥当的。

中共代表团的意见对苏共中央的决策起了重要作用。31日晚，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共代表团成员启程回国，赫鲁晓夫以及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主要成员到机场送行。在机场举行的会谈中，赫鲁晓夫告诉中共代表团，苏共中央经过研究，已经决定在匈牙利采取进攻方针，尽全力挽救匈牙利的局势。

这以后，波兰和匈牙利国内的社会秩序逐渐恢复。但这件事给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层以强烈震动，引起他们的深思。据薄一波回忆，仅仅从1956年10月21日到11月9日的20天时间内，中央常委和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十几次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及有关问题。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之所以如此关切波匈事件，是因为这两个事件不仅关系着波匈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而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影响，在中国也发生了一些罢工、罢课事件。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提出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决定中共开展开门整风。

12. 中共开门整风，民主人士响应号召积极“鸣放”

1957年的春天来得很早，来得很不寻常。

这一年的2月27日，毛泽东召集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向1800多位各方面人士讲话，从下午3点讲到7点，讲了4个钟头。

几天以后，也就是3月6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包括党外专业人员160余人在内的80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开始，先让大家听了毛泽东2月27日讲话的录音。接着，毛泽东分别邀请到会的教育界、文艺界、新闻出版界的部分代表开座谈会。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这两次讲话总的精神是解除党内外各界人士、尤其是一些党外高级知识分子的顾虑，动员他们积极鸣放。

与全国宣传会议召开的同时，3月5日至20日，在北京还举行了第二届全国政协第三次全体会议，主题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民主党派负责人都发言拥护中共关于推进争鸣的新方针。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一结束，经过3天的准备，从3月16日开始，毛泽东启程到一些城市去向地方党的干部宣讲新的方针，目的是消除党的地方干部的疑虑，要他们不要害怕新方针，不要怕人家鸣放。

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首次在报纸上正面阐发毛泽东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社论说：“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并不是什么一时的、权宜的手段，而是为发展文化和科学所必要的长时期的方针。还说，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围，他们的思想必然在学术文化领域内有所表现，这问题只能用说服的方法解决，如果采取压服和禁止的办法，那么，对于党和马克思主义者说来，这并不是实现自己的任务，只是取消自己的任务，而且这样作的结果只能是压而不服，禁而不止。社论还认为，“双百方针”只能帮助而不会妨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毛泽东很赞赏《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当时，他刚从外地回京不久，便把《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邓拓和几个副总编辑及编委找去，特别指名要这篇社论的执笔人王若水也参加。毛泽东在自己的卧室与他们谈了一个下午。

毛泽东肯定了《人民日报》的社论，并询问了写作的过程。

邓拓说：是王若水同志写的。

毛泽东对王若水说：我要请你吃饭。

王若水说：胡乔木同志作了不少修改。

毛泽东说：修改也总有个基础吧。

毛泽东还与邓拓等人谈到了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说，争取知识分子，用什么办法？一种办法是压，这不会使人心服。1953年统购统销时，党和农民的关系很紧张。现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相当紧张，知识分子魂魄不安。党内也紧张。还要继续紧吗？我主张松，这样他们就靠拢我们了，有利于改造，不能紧，越紧他们就和我们的距离越远。

4月，中央统战部召开了第七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贯彻“双百方针”。认为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上已经过去的时候，处理统一战线内部各种矛盾要贯彻“放”的方针，鼓励党外人士唱“对台戏”。“对台戏”这种提法也是从毛泽东那里来的。这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

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文件指出：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剧烈的伟大的变革中，党在实现自己目标的斗争中必须同时改造自己；而执政党的地位使许多党员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处理问题，一部分人还沾染了特权思想。因此决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告知省部一级的党组织，说：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量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指示》明确地说：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

为了贯彻执行这两个指示，各地各系统都举行了许多座谈会。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举行的座谈会。在这些座谈会上，一些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纷纷发表意见，表达了对于中共开门整风的合作态度。但其中也出现了一些令中共决策者感到不安的说法。

担任教育部长的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在发言中谈到，中共在工作中有四种偏差：第一，好大喜功；第二，急功近利；第三，鄙视既往；第四，迷信将来。民革中央常委陈铭枢也讲到了类似的话。但他的话更加刺激一些，因为他的矛头是直接对着毛泽东的。他曾用四句话批评毛泽东：好大喜功，喜怒无常，偏听偏信，鄙夷旧的。陈铭枢在发言中还讲到了取消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无党派人士陈叔通希望中共在整风中能检查两个问题，其中第一个就是：检查一下8年来的工作中，

究竟是由于保守所造成的损失大，还是由于冒进所造成的损失大。他说，一般说来，非党员多是比较保守，党员多是比较激进。

当时的《人民日报》和其他报纸对这些座谈会都作了比较详细的报道，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发言在全国引起了比较强烈的反响。再加上其他方面的原因，社会上开始出现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和人们上街抗议等事件。

5月16日，座谈会发言完毕时，主持会议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宣布：从明天起，这个座谈会将休会几天，成立一个小组，把大家所谈的问题，加以排队，准备以后继续开会。

这是开门整风将要转向的一个标志，虽然当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了这一点。据李维汉回忆："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同志并没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为了反右而开这个会，不是'引蛇出洞'。两个座谈会反映出来的意见，我都及时向中央常委汇报。5月中旬，汇报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时，已经放出一些不好的东西，什么'轮流坐庄'、'海德公园'等谬论都出来了。毛泽东同志警觉性很高，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们自己头上，决定把会上放出来的言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并且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在这次汇报之后，我才开始有反右的思想准备。"

13. 反右派斗争使政治形势紧张起来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起草了党内指示——《事情正在起变化》。这是一篇宣告决策改变的重要文件。文章一开篇，毛泽东就论证了左比右好的道理。左，或者说是教条主义，毛泽东认为，持有这个立场与态度的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克服了这种片面性，

他们就会大进一步。而右，或者说是修正主义，毛泽东认为，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如果说前一段整风鸣放的锋芒主要是针对教条主义，那么现在到了把方向转过来的时候了。文章认为，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而且，这篇文章认为，前一段的批教条主义，有批过头了的，有批错了的，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一些工作上的错误。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被一些人误认作教条主义而加攻击。这种情况当然必须纠正。

经过调整部署之后，中共中央统战部邀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代表人士继续座谈。休会之后的第一次座谈会在5月21日举行。表面看来还是那样一些人，还是那样一种热烈的发言，还是照旧每天详细登报。看不出气氛有什么变化。座谈会的主持者，如李维汉等人当然是成竹在胸，但他们还是一如从前的主持着会议，号召人们大胆地“鸣”，大胆地“放”。与此同时，各高等院校、新闻出版单位、党政机关、人民团体的各种形式的座谈会也在继续召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社会各界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不知祸之将至，还在不知深浅地对中共和国家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提出各式各样的批评意见。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向“资产阶级右派”发出了第一支林中响箭。

这是毛泽东亲自撰写的一篇社论。社论以民革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收到一封“匿名信”为由头，告诫人们，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但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思想战线上尤其如此。

事过几十年之后，当年直接参与其事的原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回忆道：

“6月7日，毛泽东主席找胡乔木和我到他家中谈话。当我

们一起到他卧室时，发现没有其他人参加这次谈话。

我们刚坐下来，毛泽东主席就兴高采烈地说：今天报上登了卢郁文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说他收到匿名信，对他攻击、辱骂和恫吓。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动反击右派的好机会……

毛泽东主席说，这封恫吓信好就好在他攻击的是党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员；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它不是某个有名有姓的人署名。当然署名也可以作为一股势力的代表，但不署名更可以使人们广泛地联想到一种倾向，一股势力。本来，这样的恫吓信在旧社会也为人所不齿，现在我们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这样的恫吓信就显得很不寻常。过去几天我就一直考虑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机会发动反击。现在机会来了，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社论的题目是《这是为什么?》，在读者面前提出这样的问题，让大家来思考。虽然社论已经把我们的观点摆明了，但还是让读者有个思想转弯的余地。鲁迅写文章常常就是这样，总是给读者留有余地。”

为了迅速造成声势，指导和推动反右派斗争，《人民日报》在6月8日之后，几乎每天发表一篇反右派的社论。6月9日社论的题目是《要有积极的批评，也要有正确的反批评》；10日社论的题目是《工人说话了》；11日是《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团结起来》；12日是《正确地对待善意的批评》；14日是《是不是立场问题》。

6月19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经过修改的毛泽东2月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讲话的题目改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将公开发表的“标准本”与原讲话相对照，可以发现有很多不同之处。其中最大的区别是公开发表的讲话中，增加了“六条政治标准”：

“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认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

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种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其中写道：

“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

这是第一次出现了“章罗同盟”这个缩写的专有名词。所谓“章罗同盟”就是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民主同盟。经过一场疾风暴雨般的揭发和批判，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和各地的负责人大都被划为右派分子。中央和北京的有章伯钧、罗隆基、叶笃义、陈新桂、储安平、范朴斋、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黄药眠、陶大镛、吴景超、潘光旦等人，上海有沈志远、陈仁炳、彭文应、王造时、孙大雨、陆诒、吴茵等，江苏有陈敏之等……。其他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中，也有不少被划为右派的。

反右派斗争，不仅在党外进行，而且也要在中共党内进行。

1957年7月中旬，毛泽东在青岛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部署反右派斗争。毛泽东把他在会上谈话的一些要点写成《1957年夏季的形势》一文。文章说：

“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右派，包括混入共产党内和青年团内的一些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人，他们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向党猖狂进攻，因此必须充分揭露，并把他们开除出去，借以纯洁党团组织。”

7月28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这个讲话的精神发表社论，题为《反右派斗争是对于每个党员的重大考验》。社论提出：“必须对党内外的右派分子‘一视同仁’地展开斗争。”

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从中央机关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政府，一直到县、乡、村党政领导系统中，普遍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将一批党政干部划成了右派。如在中央机关的有监察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王翰，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潜、研究室主任鲁明健等；在省市党政机关的有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沙文汉等人；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孙殿才，省政法党组书记、副省长陈成义，省委委员、银川地委第一书记梁大均等人；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李世农，省委委员、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检察长杨效春等人；云南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长郑敦等；河北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长刘洪涛，省委候补委员、省工会联合会主席杜存训等；广西省委常委、副省长陈再励，省委常委王梦周等人。他们被划为右派大多是由于提了一些改善党委领导方法的意见与建议，而有些人被划为右派则只是由于与党委“第一把手”意见不和。这种情况就不能不助长领导集团中的“一言堂”现象。

14. 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开始不点名地批评周恩来

毛泽东最初对发动整风运动还有一个考虑：就是1956年发

生的党内对经济工作的争论并没有结束。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本来准备讨论这个问题，由于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发生，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国际问题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就没有充分展开，只形成一个被称作“七条的妥协方案”。毛泽东后来说：那七条是筑一条堤坝，挡一下水，问题解决得不彻底。这一次，他想借整风统一思想。

在1956年那场争论中，毛泽东对周恩来等主张反对急躁冒进是不满意的，但是，究竟以什么方针来进行建设，他还在思索中。到1957年秋天，国际上波匈事件已经过去，国内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超额完成。随着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又开始着重考虑经济建设方面的问题，反击反冒进的观点也更加明确起来。

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上，邓小平作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陈云作关于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和关于农业增产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的报告。

10月9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他从整风讲起，提出了“要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要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的响亮口号，并总结和肯定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群众斗争形式。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还修改了八大的政治路线。他郑重表示，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是不对的，还是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正确：“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在经济建设方针上，毛泽东的意见是“促进”。他批评说：1956年经济文化有了一个很大的跃进，可是有些同志低估了成绩，夸大了缺点，说冒进了，刮起一股反冒进风。因此，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

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他认为，反冒进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而且给右派的猖狂进攻以影响，因右派是促退派，共产党永远是促进派，因而影响了 1957 年经济特别是农业的发展。这样，毛泽东便把反冒进同右派向党进攻联系了起来。

许多党史工作者都已经指出，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带有试探性质，属于一次“火力侦察”。他要看一看自己发动反反冒进的斗争，在党内，尤其是在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中会不会遭到公开的抵制和反对。毛泽东后来自己也讲：三中全会，我讲去年砍掉了三个东西，没人反对，我得彩了，又复辟了，就又有勇气找部长谈话了。

毛泽东的这番话大概是发自内心的。在八届三中全会上他也说：对于多、快、好、省，农业四十条和所谓“促进委员会”这三个东西，现在可不可以恢复？如果大家说不赞成恢复，一定要组织促退，你们那么多人要促退，我也没有办法。

遗憾的是，对于毛泽东的上述公开反对八大决议、明显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言论，中共中央的其他高级领导人都没有出来讲过任何不同意见。这种情况对毛泽东显然是一个鼓舞。

周恩来此时已经放弃了反冒进的主张。还在反右派运动正处在高潮的时候，周恩来已经意识到反冒进与新的政治形势的不相协调性。6 月 26 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在反右派运动高潮中举行的一次会议。在会议开幕的第一天，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讲了这样一段话：

“有人认为，我国的发展国民经济在 1956 年全面冒进了，在 1957 年又全面冒退了。很明显，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我国 1956 年的计划是在改造和建设的高潮中拟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大大鼓舞了劳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他们

纷纷要求增加生产，提高工作定额。1955年农业的大丰收，又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准备了物质条件。同时，基本建设发展到了五年计划的第四个年度，也确实有扩大规模的必要。这些情况，都说明我们不但需要而且有可能加快建设的速度。1956年的计划就是适应这种情况，采取了跃进的步骤，而且在各方面取得了如前所说的巨大成就……。因此，决不能说1956年的建设是全面冒进。"

很显然，周恩来的这一番话，与几个月前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周恩来后来回想起这次讲话时说："这是我最早抛弃反冒进的开始。"周恩来的话是符合事实的。他不但放弃了反冒进的观点，而且还说1956年是"采取了跃进的步骤"。有人说，"跃进"一词就始于周恩来的这个报告。

八届三中全会还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纲要要求，从1956年到1967年起的12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黄河以北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由1955年的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以南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斤。这个草案过去曾先后在毛泽东召集的最高国务会议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十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四十六次会议联席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和修改。10月26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这个纲要。

风向逐渐向左转。经过了一个艰难复杂的探索过程，中共中央正在逐渐接受毛泽东反反冒进的观点。中国经济的车轮正一步步朝着"跃进"的轨道驶去。

第二章　发动“大跃进”，出台“总路线”

1. 冬修水利和积肥运动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

1957年9、10月间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不仅揭开了批评反冒进的序幕，同时也揭开了农业大跃进的序幕。

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基本通过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文件——《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后称四十条或农业发展纲要）。文件要求5年内粮食产量按全国人口平均每人达到2000斤，半个世纪内做到亩产2000斤。毛泽东认为，现在一人3亩地太多，将来只用几分地种粮就够吃。

修改后的纲要，于1957年10月25日重新发表。同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组织全民讨论，要求通过讨论，在全民中开展一次大辩论，目的在于认清方向，坚定信心，人人努力，改造中国。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四十条修正草案的社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各方面的工作在12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这是中共中央通过报纸正式发出大跃进的号召，也是第一次以中央号召形式使用“跃进”一词。这说明，修改后的农业四十条，实际上成为发动农业大跃进的纲领。

在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期间，即1957年9月2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规定》，要求各地要鼓起像1955年冬季农业合作化高

潮中那样一股劲头来，使这一运动成为随着目前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高潮而来的生产高潮的主要组成部分。

农业发展纲要公开发表后，上至各省、市、区，下至各合作社，纷纷召开党的代表大会、生产积极分子大会，落实农业四十条，部署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修改生产指标，与此同时，舆论机器纷纷开动，不惜版面地大量报导各地区生产大辩论的情况，为农业大跃进大造声势。

大辩论是以落实农业四十条和冬季生产为主题进行的，辩论的内容自然是农业四十条提出的兴修水利、改良工具、开垦荒地、改良土壤、增加肥料、推广优良品种等增产措施。大辩论自始至终都鲜明地贯彻着一个指导思想，就是扫除思想障碍，克服右倾保守思想。大辩论的对立面，就是那些对落实农业四十条没有信心的干部。

进入10月份以后，在进行大辩论的同时，落实农业四十条的各项措施也在加紧实施之中。

投入水利建设的劳动力，10月份二三千万人，11月份六七千万人，12月份八千万人，1958年1月达到一亿人。

这时期的农田水利建设不仅规模空前，而且场面热闹，前所未有。

1958年2月上旬，一届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来自各地的代表在发言中讲述了他们那里农田水利建设的热闹场面。

广西代表覃应机说：自去冬开始，全省掀起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的以兴修水利和积肥为中心的冬季生产运动。今年的水利建设规模空前的巨大，各族人民拿出了高度的革命干劲，千方百计设法把河水拦起来，把山水堵起来，把天水蓄起来，把地水挖出来，把低水抽上来。经费自己筹，石灰自己烧，粪箕自己编，石料自己打，沙子自己找，木料自己砍。山藤代绳索，柴火代油

灯，旧料代新料。

山西省晋宁县代表李能说：每天鸡叫头遍，村子里就人喊马叫，田里、沟里尽是做活的人；天大黑还点着汽油灯马灯干。

湖南省代表谭保余说：全省各地普遍开展了劳动竞赛。万千群众，冒风雨，破冰冻，开山凿石，修渠引水。入夜之后，打火把，点汽灯，人声沸腾，热火朝天。

黑龙江省肇源县代表巴彦胡说：冻地四尺多深，大镐刨断了，换一个再刨。农民说："一镐没刨动，二镐硬如钢……别看地冻四尺深，冻手冻脚不冻心，镐比地硬，心比镐还硬"。昼夜一齐干，农民创造了多快好省的"冰灯"，从远方沿松花江看去，好像是蜿蜒如蛇的长城，实际就是上万农民干夜班的冰灯，白天红旗招展，夜晚灯火齐明。

农村冬季生产运动的另一个中心是积肥。为了多积肥，人们充分地发挥着想象力。

还是在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上，云南省宜良县代表张惠英介绍了他们的做法。

这个县肥料来源很少，大辩论以后，发动群众动脑筋，想办法。终于找出了 18 种肥源。提出了"牲畜要有厩，家家有厕所，厕所要加盖，人人勤积肥，路上无粪便"的口号。很快掀起养猪改厩积肥高潮。

张惠英介绍说：社员们提出："要想庄稼像个样，粪箕要挂在肩膀上"，"冬季比粪堆，秋季比谷堆"的竞赛口号。全社不分男女老少，个个积绿肥，铲火土、扫烟筒、挖老墙土、挖沟泥、搜集乱头发，猪毛和碎皮，积小便，打扫房屋和街道卫生，真正形成了家家有尿盆，人人带尿罐的习惯。

上面提到的黑龙江省肇源县的巴彦胡代表也介绍了他们那里积肥运动的情况，为了坚决完成全县的积肥计划，许多农业社自己提出："挖出包泡底，推倒老墙根，所有粪源大翻身，坚决实

现400斤”的口号，开展了“粪坑挖净，粪源找净，厕所起净；大街扫光，粪蛋拣光，畜圈起光，城粪下乡；锅台、炕洞、碾台、井台、老尿窝、破房框都来个大翻身”的积肥运动。

空前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运动的兴起，实际上吹响了农业大跃进的号角。

2. 打一场除四害、驱麻雀的人民战争

在大跃进初期，除了冬修水利和积肥运动外，最具声势的要数除四害运动了。

所谓“四害”，当时是指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这四种小动物。在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业四十条》中就有除四害的内容。毛泽东本人对此倾注了很大热忱，把它当作移风易俗，建设文明农村的重要目标提出来。

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除四害也被赋予了非同寻常的意义。毛泽东说：除四害也要搞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如果动员全体人民来搞，搞出一点成绩来，我看人们的心理状态是会变的，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我们要使我们这个民族振作起来。

于是，全国城乡一齐发动。形成了一场全国性的群众运动。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在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上曾介绍了北京开展除四害运动的情况：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从去年12月开始以来，进入了新的高潮，声势浩大、雷厉风行。在第一次突击周中，两天里就出动了15万人上街宣传。在广大群众中人人传诵除四害，家家动手大扫除。几天功夫，全市绝大部分地方做到了蚊蝇绝迹，面貌一新。今年一月中旬，全市召开了8000人的誓师竞赛大会，城郊各地区、各机关、学校、部队都争先恐

后地投入了竞赛运动。在这以前，很多单位已经制定了加快消灭四害的计划。一浪高过一浪，一批赶过一批，接二连三的挑战应战书和决心书，像雪片一样飞到各区和市里来。

在除四害运动中，见诸报道最多的是驱赶麻雀运动。这可能与这项工作更容易形成声势与规模有关，也可能与这项工作得到毛泽东的直接重视有关。

1957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了麻雀。他说：纲要里头有一个除四害：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我对这个东西很有兴趣……有人说麻雀可以吃虫子，我看把它消灭，它与人争食。

于是，一场驱赶麻雀的人民战争开始了。

上面引述的吴晗的发言里就提到了驱赶麻雀的事。他说：广大群众说了就做，西四区福绥境的居民捉光了麻雀老鼠以后，在零下22度的严寒里，用双手捉了9只麻雀，还请小学生在房檐上捉了十几只。崇文区85岁的老人常德，一冬来用丝网捕捉了3万只麻雀，他的兄弟常明，也打了2万多只，常德嫁女儿的被褥都是用雀毛絮的。农民们背着火枪下地，歇晌的时候就打麻雀。

这场运动一直延续了一年多，在这场运动中，到底打死了多少只麻雀自然难以统计，但可以肯定，数量是十分惊人的。1958年12月13日这一天，仅上海一个地区，用最原始的武器就消灭近20万只麻雀。

12月13日凌晨，上海全市性的灭雀战役开始。全市大街小巷，红旗招展，楼房上、庭院里、空地上、马路中和郊区的农田里，布满了无数的岗哨、假人，大中小学生、机关干部、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此起彼伏地呐喊，呈现一片战斗气氛。新成区连夜赶制8万多个假人，10万多面彩旗。徐汇区斜土路居民和榆林区杨浦路居民还制作了大量活动假人。在市郊县几乎抽调了一半劳动力组织灭雀队伍，一般由青壮年负责捕、毒、打，老人

小孩守住轰赶岗位。全市工厂在保证生产的原则下，也积极地投入了战斗。市区的公园、公墓苗圃等地广人稀之处，共设有150个火枪区。南洋女中射击队，还接受了火枪技术训练。

这场驱雀运动到1959年才终止，这要归功于中国科学院的一些科学家。他们解剖了麻雀的嗉囊，发现四分之三是害虫，只有四分之一是粮食，可见麻雀基本上还是益鸟。

毛泽东在一次会上又对此发表意见：麻雀不要再打了，改成臭虫。

3. 赫鲁晓夫的一个设想，对毛泽东是一个很大的刺激

1957年11月2日至21日，毛泽东到莫斯科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庆典，接着又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同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等人进行了会谈。自从苏共二十大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和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之间已经有了不少的分歧，毛泽东本人对于赫鲁晓夫的一些做法也多次表示过不同意见，他们两人在外交政策和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是，不管他们的分歧有多么深刻，他们对于经济的看法却惊人的相似。

赫鲁晓夫和毛泽东都是经济领导工作中的乐观主义者。在毛泽东到达莫斯科后不久，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所作的施政方针的报告中就宣称："我们计划设计者的计算表明，在以后的15年中，苏联不仅能够赶上，并且能够超过美国目前的重要产品的产出量。"

赫鲁晓夫在讲话中所说的"重要产品"，是指铁矿石、生铁、

钢、煤、石油、电力、水泥以及消费品如糖、羊毛纺织和皮鞋。

赫鲁晓夫的话对毛泽东显然是一个鼓舞。在莫斯科参加会议期间，毛泽东一直处在兴奋之中。他不再像早些时候那样频频指责苏联领导人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作法，相反，苏联在人造地球卫星和弹道导弹技术领域中的成就，特别是赫鲁晓夫等苏共中央领导人对于未来美好前景的描述，使他受到巨大的鼓舞。11 月 18 日，毛泽东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的聚会上发表了他对全球两个阵营实力对比的乐观估计：

“现在我感受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

据曾经担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后来回忆：毛泽东对莫斯科这个会议非常满意。加上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毛泽东确实感到胜利在社会主义一边，提出东风压倒西风，超英赶美的口号。而且毛泽东觉得可以探索一种更高的发展速度，把群众发动起来，生产一定会出现一个大跃进。

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从莫斯科给国内打电话，批评 1956 年的反冒进是不对的，说以后再也不要提反冒进了，搞社会主义就要冒一点。

毛泽东的意见很快成为中共中央的正式决策。12 月 2 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工会代表大会的致词中，正式宣布了毛泽东提出的赶超英国的口号。他指出：在 15 年内，苏联的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或者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时期，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12 月 7 日，李富春在工会八大上所作的《关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和今后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方针》的报告，对 15 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可能性进行了论证。李

富春预计，在15年结束的时候，中国的钢产量将达到4000万吨，英国目前生产2000多万吨钢，将不可能达到那个指标。他还表示，中国在15年内将在煤、金属切割机床、水泥及化肥等方面的产量超过英国。

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发的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高潮》。社论公开指责反冒进，号召人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说1956年是正确的跃进，而不是冒进。社论号召大家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

毛泽东对这篇社论颇为赞赏。事隔半年之后，毛泽东重新看了一遍这篇社论，他于1958年5月26日给政治局、书记处成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写信说：重看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觉得有味，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两词是对立的。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此文发表时，我们一些人在莫斯科，是国内同志主持的，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通过这番话，人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对"跃进"一词的赞赏。只是他说"跃进"一词始于《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显然并不准确。因为如前所述，还在反右派运动的高潮中，周恩来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报告，就使用了"跃进"一词。

在11月份，毛泽东还过问了《人民日报》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起草工作，他在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会议期间对这篇社论作了进一步斟酌修改。社论稿带

回北京征求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意见后，于12月12日正式发表。这篇社论还以尖刻的语言批评反冒进，说反冒进的人的思想仍然停留在三大改造高潮以前的阶段，而没有认识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的新形势，没有充分估计新条件下大大增长了的生产潜力，结果就背离了多快好省的方针，变成了经济战线的懒汉。社论指责反冒进使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因此，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

4. 毛泽东的批评声色俱厉，周恩来被迫公开检讨

1957年11月下旬，毛泽东从苏联回国后，连续召开会议讨论他正在思考着的如何取得更高发展速度的问题。他感到北京的空气比较沉闷，华东的空气活跃，想以地方促北京。于是在12月8日，离开北京，9日到达杭州，到那里停留了将近一个月。

12月16日，毛泽东召集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顺元、柯庆施、叶飞、江华等人开会。周恩来正好陪同缅甸友好代表团和缅甸经济考察团到达杭州，也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会议。1958年1月3日和4日，毛泽东再次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大致还是上述那些人，只是增加了胡乔木、陈丕显、林铁、石西民、张春桥等人。周恩来这次是陪同也门王国副首相兼外交和国防大臣巴德尔王太子到杭州参观，也参加了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毛泽东发了脾气，对周恩来等反对冒进的人进行了严厉批评。毛泽东说：我不听你这一套，你讲什么呀？我几年都不看预算了，横直你是强迫签字。毛泽东还在周恩来面前发了一通牢骚。他说：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

的影响，是“个人崇拜”、“偶像崇拜”？不管什么原因，全国各地报纸、大小刊物都登载了，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为什么军队多了几十万人，招收工人学徒多了100多万人？我说各部门都有对形势估计不足的情况，反对右倾保守为什么要多加人，我不懂，我也不知道。

毛泽东还在杭州召开会议的时候，周恩来回到了北京，为即将召开的一届人大五次会议做准备。考虑到1958年预算和年度计划等需要研究确定，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是否在人大召开前先开一次党内会议讨论一下。毛泽东表示同意。

1月11日至22日，毛泽东在南宁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史称“南宁会议”。毛泽东对于这次会议十分重视。据当年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吴冷西回忆，他曾接到过一份毛泽东亲笔写的召开南宁会议的通知。通知写道：

“吴冷西、总理、少奇、李富春、薄一波、黄敬、王鹤寿、李先念、陈云、邓小平、彭真、乔木、陈伯达、田家英、欧阳钦、刘仁、张德生、李井泉、潘复生、王任重、杨尚奎、陶铸、周小舟（已到）、史向生、刘建勋、韦国清、毛泽东，共27人，于11日、12日两天到齐，在南宁开10天会，20日完毕（中间休息2到3天，实际开会7到8天）。谭震林管中央，总司令挂帅，陈毅管国务院。”

1月11日，会议在南宁如期召开。在毛泽东亲笔写的那份名单中，陈云、邓小平、张德生、潘复生没有到会，周恩来因为要送也门王国副首相兼外交和国防大臣巴德尔王太子回国，到南宁的时间推迟了两天，其他人全部按时参加了会议。

南宁会议原定重点，本来是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和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及长远规划等问题，但是，就在南宁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又提出反冒进的问题，把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反冒进的批评推向高潮。

八届三中全会批评反冒进，是从经济方针来谈。南宁会议时，前前后后，反反复复，多次谈及此事，主要将反冒进同政治联系起来，同右派进攻联系起来，是政治问题。认为这个问题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彻底澄清，否则，无法前进。

毛泽东在谈论这个问题时，语言上照例生动风趣，但辞锋犀利，有时还不免疾言厉色。毛泽东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民一泄了气，不得了。十个指头问题要搞清楚，伸出手看看，究竟有几个指头生了疮？不过一个指头有毛病，不过多用了一些钱，多用了些人；就'库空如洗'呀，'市场紧张'呀。只讲一个指头长了疮，就不会形成一股风。"

"十个指头是关系六亿人的问题。对于我们共产党，对于我们的事业来讲，总是九个指头是好的，不过一个指头有毛病。那就是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搞泄气，使整个工作受到很大损失的问题。这一点被右派抓住了，来了一个全面'反冒进'。"

"我乃罪魁祸首。1955 年 12 月写了《农业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反了右倾保守，对全国发生了很大影响。是个人崇拜也好，偶像崇拜也好，不管是什么原因，各地大小报纸刊物都登了。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后来又心血来潮。找了 34 个部长谈话（大家劲都很足），谈了十大关系，就头脑发胀了，'冒进'了，我就不敢接近部长了。……这三年有个曲折，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离右派只有 50 米远了。"

1 月 13 日晚，毛泽东约刘少奇、周恩来谈话，直到深夜。在 16 日的会上，毛泽东拿出柯庆施在上海市党代会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说："柯庆施的文章很好，上海 100 万工人，无产阶级集中的地方才能产生这篇文章。"他当众对周恩来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毛泽东此言一出，满座皆惊。刘少奇解释说，主席的批评是针对管经济工作的几个人的。当时负责全国经济工作的是由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黄克诚组成的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在这五人之上的则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当时，陈云因为身体不好没有参加南宁会议，周恩来和到会的副总理们听了毛泽东的批评后坐卧不安。当年随周恩来一起到南宁开会的经济秘书顾明后来回忆："几乎每天晚上，先念、一波等都聚在总理那里讨论到夜里二三点，商议怎么检讨等等。那时，会议的形势很紧张。"

1月17日晚，毛泽东约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谈话，明确讲到他批评的主要是陈云。因为陈云是坚持综合平衡以防止冒进的人。毛泽东在会上还讲了一大段哲学，说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过渡的；不平衡才是绝对的。平衡是革命的平衡，是积极的平衡，不是消极的平衡，不是保守的平衡。

为了给这个积极的平衡作注，2月28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一篇题为《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的社论，提出："不断地提高落后的指标和定额，使它适应于先进的指标，向先进的定额看齐，这是积极的平衡……总是企图压低先进的指标和定额，使它迁就落后的指标，向落后的定额看齐，这是消极的平衡。"

1月19日，毛泽东约周恩来单独谈话。随后，继续进行大会讨论。会议从晚上8点多一直开到深夜1点多。周恩来在大会上发言，对反冒进问题承担了责任。他说：反冒进这个问题，一段时间（1956年夏季到冬季）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反冒进是由于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改变后生产力将要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示畏缩，常常只看见物不看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这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他说：反冒

进的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会、农业四十条、多快好省，使1957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也减少了一些项目，而最重要的是群众和干部的劲头得不到支持，反而受到束缚，使我们建设走群众路线这一方针受到某些损害。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实行这个方针，不管你主观想法如何，事实上总是违背主席的方针的。越是不自觉这是方针性的违背，就越严重越危险。他表示：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5.《人民日报》关于反冒进的社论遭到逐段批驳

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还严厉批评了《人民日报》那篇《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使会议空气极为紧张。他把这篇社论的摘要在会议上印发，并且加上批语："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庸俗的辩证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尖锐地针对我的。"

毛泽东在会议过程中，多次批评这篇社论，并且把这篇社论作为当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反冒进"的证明。他逐段逐段地批判这篇社论。

毛泽东说：人民日报的社论是6月20日发表的，距离李先念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只有5天。那个报告是"反冒进"的，社论发挥了"反冒进"的思想。他说：这篇社论说的是既反右又反"左"。你不能说它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好像有一点。社论说："右倾保守思想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急躁冒进思想对我们的事业也是有害的，所以两种倾向都要

加以反对。今后我们当然还要继续注意批判和克服右倾保守思想的各种表现，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受阻碍地向前发展。”你说这些话不对？这是对的啊！但是，这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你看，这篇社论下面接着就说，“但是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时候，我们也不应当忽略或放松了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只有既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又反对了急躁冒进思想，我们才能正确地前进。”毛泽东说，这篇社论的落脚点是落在反对急躁冒进，反“左”而不是反右上面。社论的作者把文章做在“但是”后面。

毛泽东还说，《人民日报》的社论引用了我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的话。看来作者的用意一来不要冒犯我，二来是借刀杀人。但引用时又砍头去尾，只要中间一段，不引用全文，因为一引用全文就否定作者的观点了。我写的序言全文的主要锋芒是对着右倾保守的。社论引用了我说扫盲用急躁冒进的办法是不对的这些话，用来作为反对急躁冒进的根据。社论表面上既反“左”也反右，没有重点。实际上重点落在“反冒进”上面。作者引用我的话来反对我。

毛泽东说，他并不反对对某些搞过了头的东西加以纠正，但反对把一个指头的东西当作十个指头的东西来反。对过急当作主要倾向来反对就错了，这实际上是反对多快好省的方针。人民日报的社论反冒进，使用的是战国时代楚国一位文学家宋玉攻击登徒子大夫的手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第二天，毛泽东又把宋玉的这篇《登徒子好色赋》印发给与会者。

1958 年 2 月 1 日至 11 日，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李先念和薄一波分别作了《关于 1957 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 1958 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和《关于 1958 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报告强调，1958 年不仅应当使工业生产在数量方面有一个跃进，而且应当在质量方面也有一个跃进的发展。

这次会议确定，1958年的钢产量是620万吨。

2月13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南宁会议精神，继续批评反冒进问题。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

这次会议的主题还是批反冒进。毛泽东在会上说，反冒进反得那么厉害，把群众的气泄下去了，加上右派的猖狂进攻，群众的气就不高，我们也倒霉。我们这些中央委员，你就那么舒服呀？我是不舒服的。我不赞成反冒进叫马克思主义，赞成冒进才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还批评反冒进的人跟右派相距不远，大概50米远。

2月18日是旧历正月初一，民间都在热热闹闹地过春节。但在中南海怀仁堂里，空气凝重，批评反冒进的政治局会议仍在进行。

在这一天的会上，陈云发言检讨了反冒进中的错误，表示对反冒进的错误负主要责任。他还检讨说，在财经工作中，材料数字一大堆，是对毛泽东主席和政治局搞倾盆大雨、本本主义，不让中央参与对经济工作的设计的分散主义错误。继陈云之后，李先念、薄一波等人也都在会上作了检讨，承担了各自在反冒进中所犯错误的责任。

为了巩固批判反冒进的成果，毛泽东提出再到成都开一次会。他说：我们在南宁是半个中国了，华东、中南、华南这三个区域，东北找了一个欧阳钦，华北找了一个刘仁，西北是张德生，西南是李井泉。这一次我们是到成都大概是3月上旬，去谈一谈。

6. 刘少奇也就反冒进问题作了检讨

3月9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有中央有关部门领

导人和西南、西北、东北地区各省市委领导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在成都郊外金牛坝宾馆举行。各部部长和省委书记住在四层楼的宾馆，中央政治局常委住在各个小别墅。这次跟南宁会议一样，也是政治局常委的扩大会议，到会的中央有关各部部长和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各省的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和华东只有个别省委书记到会，其余的将参加定于4月1日至9日在武昌召开的会议，即武昌会议。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始终处于兴奋状态。他在18天的会议中，除了在听各省汇报时不断插话外，一连发表了6次长篇讲话，即3月9日，10日，20日，22日，25日，26日，那气势，真可谓思如泉涌，气若长虹。

3月9日，毛泽东提出25个问题，要大家讨论。

毛泽东提出的问题主要是针对反冒进的。他说明了发动对反冒进进行批评的目的：反冒进是个方针性的错误，南宁会议提出了这个问题，有许多同志紧张，现在好了。谈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的语言，做好工作，而不是不好混，我绝无要哪个同志不好混之意。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南宁会议批判了“反冒进”的错误。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采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反冒进这个口号不好，吃亏，打击群众。反右倾这个口号为什么不会打击群众呢？反右倾所打击的就是一部分人的官气、暮气、骄气，一些人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应该加以打击。

毛泽东在会上还说：要跃进，但不要空喊。指标很高，实现不了。通县原来亩产150斤，1956年提出要一年内就产800斤，没有实现，是主观主义。这也无大害，屁股不要打那样重。现在都跃进，有无虚报、空喊？不切实际的毛病？没有具体措施，工农商文都可能有此情况。现在不要去泼冷水，而是提倡实报、实

喊；要有具体措施，保证口号的实现。

周恩来说："当时确没有这样认识，等到右派教育了我，主席提醒了我，群众实践更启发了我，才逐渐认识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更深一层说也就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本质的东西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流发动群众、发展生产看不到，自然就抓不起了。"

26日，刘少奇在会上也反省了自己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些问题上，思想有跟不上毛泽东主席的地方。他说：自己的设想同主席的设想是有距离的，主席的设想确实是高明，使人折服。以前对建设速度估计不足，没有料到水利、生产运动发展得这样快。是否可以再快一点，还是有可能的。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我觉得快点慢点都可以，没有意识到是一个方针路线的争论。刘少奇接着表示，人们往往容易看到急性病，而忽视慢性病的危害。慢性病的损失不亚于急性病，我们要注意发现慢性病，去及时纠正它。"从当前来讲，右倾保守的危险还是主要的。"急性病也要防止，但即使有些地方在建设上犯了急性病的毛病，也并不可怕。

刘少奇是中共中央排名第一的副主席，是中共党内地位仅低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连刘少奇都作检讨了，别人还能说什么？

在上述中小型会议上，毛泽东顺利地开展了批反冒进的斗争，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刘少奇先后都作检讨了，这就为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总路线"的制定和"大跃进"的全面发动，作了比较充分的思想、舆论和理论方面的准备。

7. 毛泽东提出要区分两种不同的个人崇拜

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了要区分两种不同的个人崇拜

和两种不同的反个人崇拜。他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我们不是崇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吗，斯大林正确的东西也还要崇拜。对于他们，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现在既有个人崇拜，也有反个人崇拜。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不外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崇拜自己则很舒服。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开鼓吹个人崇拜，反对八大决议，但却没有一个人提出任何反对意见。于此也可以看出，中共党内的政治生活气氛已经很不正常了。

在成都会议上，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陈伯达有一个长篇发言，从多方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总路线和大跃进的一些指导思想，引发了毛泽东的不少插话。

3月18日，陈伯达在成都会议上作大会发言。他首先讲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问题。他说：昨天同柯庆施同志谈论，南宁和成都这样的会议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会呢？事实上，这是中央和各省党委的联合整风会议。从去年主席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后，经过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中国的形势起了根本变化。这个根本变化，可以这样说：一天等于20年。马克思、列宁说过，可能将来会一天等于20年。比如中国搞水利运动。解放以来8年，等于几千年。8年间，我们搞了2亿亩，现在几个月搞了2亿多亩。所以，一天等于20年，毛泽东主席这句话说中了。不仅是我们过去革命有一天等于20年的例子，现在搞社会主义建设，也出现了一天等于20年的例子。水利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大学跟一些留学生说过，真正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从去年开始的。以前解决所有制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可以说，去年以来，真正开

始了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生产力发展了，逼迫我们不能不前进。现在大跃进已成为群众的口号，实际情况正是如此。最近主席了解了一下渤海区的情况，我们去住过几天，就感觉到的确是大跃进。现在北方的水利运动向南方提出警告，将了很大的军。经过民主革命，又经过社会主义革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给我们很大的压力。中央与地方必须适应这个形势，不能适应，就将落伍，陷入被动局面。整风会议就是摆出问题，交谈认识，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以解决思想问题，达到团结。现在看来，经过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的确达到了这样的目的，就是说，党更团结了，团结得更好了。

陈伯达接着又讲到了关于个人崇拜的问题。他说：对个人崇拜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应当把必要的权威同个人崇拜区别开来，这是两种不同的事情，没有权威是不行的。恩格斯写的《论权威》的文章，轮船在海上航行，全船命运就交给了舵手。权威问题，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是一种常识，没有权威，革命就不能前进；正如没有舵手，轮船不能前进一样。任何阶级在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代表群众的中心人物和中心思想。马克思、列宁如此，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也是如此，他是我们中国无产阶级思想的中心代表人物。

陈伯达还说，苏联反对个人崇拜，突破迷信是好事。赫鲁晓夫现在是中心人物，代表中心思想。没有赫鲁晓夫不行，没有群众也不行。没有领袖，没有权威不行，这个问题，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讲得很清楚。

毛泽东在陈伯达发言过程中，作过不少插话。从这些插话可以看出来，他对陈伯达的发言是赞赏的。特别是他对陈伯达讲到的关于个人崇拜问题很有兴趣。

当陈伯达讲到：最近我看到刘晓同志关于王明的那个报告。王明对整风的看法，对过去也是对现在都是一种攻击。王明说，

整风的结果，搞出了两个东西：一个民族主义，一个个人崇拜。毛泽东插话说：说个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点。

当陈伯达讲到应当把必要的权威同个人崇拜区别开来时，毛泽东说：委员会要有一个主任，总要有一个委员长。

当陈伯达讲到，我们是国际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有权威，有代表人，有中心人物，中心思想，但并不是个人崇拜时，毛泽东插话说：怎么不是个人崇拜？你没有个人崇拜怎么行？你又承认恩格斯，你又反对个人崇拜。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就是说，正确的主张赞成，错误的主张反对。

现在人们冷静下来分析，不难看出，毛泽东当时的说法确实有不少似是而非的地方。比如他把正确的主张赞成，错误的主张反对解释为个人崇拜恐怕就属此类。但当时人们并没有谁提出过反驳意见。相反，透过陈伯达的发言和毛泽东本人的插话，人们更清楚地理解了毛泽东对待个人崇拜问题的态度。沿着这条思路，柯庆施甚至在会上提出：相信毛泽东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泽东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4 月 1 日至 9 日，毛泽东召集华东和中南一些省委书记到武昌开会，一方面让他们了解成都会议的情况，另一方面听取他们汇报“苦战三年”的打算。大体上每隔一天开半天会，其余时间让大家看成都会议的文件，并由谭震林、柯庆施和陶铸介绍成都会议的情况。

在武昌会议上，吴芝圃谈到河南正处在全面大跃进中；曾希圣谈到安徽大搞水利工程的情况；舒同谈到山东三年实现农业四十条有把握，周小舟谈到湖南也处于高潮中。

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虽然说，反冒进问题可以不再谈了，但他仍然不太放心。4 月 5 日，在周小舟发言时，毛泽东插话说：1956 年下半年到 1957 年来了个反冒进，搞得人不舒服。这

个挫折很有益处，教育了干部和群众，是反面教育。因为受了损失，是个马鞍形，两个高潮之间一个低潮——反冒进。过去说1957年比1956年实在些，这个话是不合乎事实的。1957年实际上工作差劲了，许多干部抬不起头来，上面骂冒进，下面也骂冒进，所以1957年劲头不大。去年揭开盖子，用整风反掉了右倾保守思想。盖子不解决，压在劳动者、干部身上，精神不振，生产力不解放。

4月8日，叶飞汇报时，毛泽东又插话说：反冒进中强调的稳妥可靠是既不稳妥又不可靠，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会好些。对“稳妥派”的办法就是到了一定时候提出新的口号，使他们无法稳。“冒进”是“稳妥派”反对跃进的口号，我们要用“跃进”代替“冒进”，使他们不好反对。有些人可能是“观潮派”、“秋后算账派”，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还会有人出来说“我早就有先见之明，还是我的对”。到那时又要刮台风的。党内中间偏右的人是观潮派，他们是“楼观沧海月，门对浙江潮”。

毛泽东在会上还分析了全国出现高潮的原因。他认为原因有四个：一是从前（1955年到1956年上半年）有过一个高潮；二是1956年6月起反冒进，又有了“反面经验”；三是1957年三中全会恢复了四十条、多快好省和促进会；四是整风、反右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这是最重要的。他还说，他现在担心是不是会再来一个反冒进。

毛泽东在会上再次讲到了阶级斗争问题。他提出现在存在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一个剥削阶级是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残余，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加上一个右派。另一个剥削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不同于前一个剥削阶级。我们的方针是团结后一个剥削阶级，孤立前一个剥削阶级。阶级斗争依然存在，还会有反复。

8. 在鼓吹跃进的氛围内，计划指标节节攀升

与批评反冒进、酝酿总路线同时进行的，还有各项生产指标的节节攀升。

指标升级，首先是从“两本账”开始的。

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薄一波在会上汇报1957年计划执行结果和1958年计划。由于批评反冒进的空气十分紧张，大家的头脑热起来了。为了避免被说成保守，也为了满足地方上的要求，薄一波在汇报中提出了实行“两本账”的办法，即国家一本账，为必成数；企业一本账，为期成数。

毛泽东对薄一波的发言并不满意，批评他是“中间派”。但是对两本账的建议还是接受了，并写进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完整表述为：“生产计划三本账。中央两本账，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账为标准。”

中央如此，地方层层仿效，如法炮制，搞自己的两本账，于是指标层层拔高。同一个指标，从中央到基层一路下来，已经远远不是两本账，而是六七本账的问题了。大跃进中的各种高指标，大都是通过编两本账的方法搞出来的。

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了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问题。会后，正式写进《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草案规定：在今后5年内，或者6年内，或者7年内，或者8年内，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规定。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对于这个问题应当研究一下。就全国范围来看，5年完成

四十条不能普遍做到，6年或者7年可能普遍做到，8年就更加有可能普遍做到。

南宁会议以前，安徽提出3年改变面貌的目标，毛泽东接受安徽省委负责人的建议，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规定：10年决于3年，争取在3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口号是，苦战3年。”毛泽东还采纳了农业部长廖鲁言的意见，提出了一种掌握时机的方法，叫做：5年看3年，3年看头年，每年看前冬。认为只要掌握好时机，3年改变农村面貌，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的把握就更大了。

南宁会议后，浙江、广东、江苏、山东、安徽、江西等省的省委提出，5年或者稍多一点时间，粮食生产达到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目标。在这方面，河南一开始就拉开了一马当先的架式，这种架式他们一直保持了将近三年。当时，河南省委向地县部署：当年麦收前，全省实现水利化；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等“四害”；当年实现纲要规定在12年内达到的粮食亩产指标；年底全省城乡消灭文盲。因工业集中，历年吃外调粮的辽宁省也不甘落后，他们提出，当年实现粮食、猪肉、蔬菜三自给。

对河南和辽宁的计划，毛泽东感到有些离谱。他说，也许你辽宁是对的，我怀疑是错的，你是马克思主义，我是机会主义。河南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全都能做到，可不可以还是提五年做到。今年真的全做到了，也不要登报。各省不要一阵风，不要看河南说一年完成，你也说一年完成。就让河南今年试一试，灵了，让它当第一。你明年再搞，只差一年，有什么要紧。

1957年冬天以来，毛泽东抓农业，除了十分重视指标以外，还非常重视农业的增产措施和群众的干劲。后来，《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题目叫《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可以说是如实地反映了毛泽东抓农业的基本要领。毛泽东重视的

农业增产措施，除大兴水利建设之外，就是耕地深翻改土、合理密植、工具改革、养猪积肥等。后来他用“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八个字概括农业增产措施，形成“农业八字宪法”。

毛泽东听说山东省有个大山农业生产合作社，因为深翻土地增产，不多不少，增产百分之百，就鼓励各省搞深翻。他对湖南省的负责人说：深翻换土，大有味道，宁可一亩地花100个工，几百个工也要干；又对陕西的负责人说：订个5年计划，用人海战术，把耕地全部翻一遍。

河南省长葛县县委第一书记在八大二次会议发言，专门介绍深翻土地的经验，说他们县到1958年4月底，33万亩早秋地都深翻了一遍，深度在1.5尺左右，计划年内把全县112万亩土地来一个大翻身。据他说，土地经过深翻，可以充分发挥水、肥的效能，使产量增加百分之几十以至一倍。

毛泽东5月27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时，号召在全国推广长葛县的经验。他指出：深翻一尺五寸，是一大发明。长葛县的经验向所有各县提出一个问题：如果长葛县今年一年就把全县的耕地112万亩深耕一遍，难道别的县就不能吗？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三年；三年不行，四年；四年不行，五年总可以了吧？后来，农业部在长葛县召开全国现场会议，决定大干一秋，加上明年一年，把全国所有耕地深翻一遍。

毛泽东发现南方某些高产地区水稻每亩密植3万蔸，就号召各地根据不同情况合理密植。他在八大二次会议讲话时肯定：所谓合理密植，在湖北、湖南、广东，就是3万蔸。他还亲自算了一笔细账：3万蔸共插多少根秧，共发多少根苗，共长多少谷穗，共结多少粒谷子？最后按斤折合，一亩共打820斤。他认为北方的小米、麦子也可以算，高粱也可以算，玉米、蕃薯、谷子也可以算。

在农田水利建设和深翻改土运动中，出现了工具改革的苗头。毛泽东对此高度重视。3 月 22 日，他在成都会议上指出：改良农具运动应推广到一切地方去，它的意义很大，这是个伟大的革命，是技术革命的萌芽，它有伟大的意义，它带有伟大革命的性质。毛泽东讲话之后，广大农村掀起了工具改革的热潮。

毛泽东所提倡的这些东西，有的可能在某种特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确有积极意义，但是离开了这种特定的时间、地点、条件则可能有害。再加上采用群众运动的方法进行推广，往往弄得面目全非。据后来了解，深翻土地，在一些地方变成翻得越深越好，有些地方竟有翻到 1 丈 2 尺深的。合理密植，在一些地方也变成越密越好，一亩地下种几百斤的，给插红旗，而按农民自己的经验下种的，则给插上白旗。结果，插红旗的土地只收一堆秕子，插白旗的土地倒真正增了产。按穗按粒推算产量的方法，在一些地方也演变成为制造高产“卫星”的方法之一。在工具改革中，因为搞所谓“车子化运动”、“滚珠轴承化运动”、“绳索牵引机化运动”等等，结果也事与愿违，造成很大的浪费。山西有一个和尚同一个农民合伙，在山坡上挖鱼鳞坑蓄水，这个办法合乎当地实际，本来是不错的，但是，后来一普遍宣传，并在平原地区也盲目加以推广，搞所谓“葡萄串”、“满天星”，以致给平原地区农民带来严重的灾难。

9. 人们的热情极度高涨，总路线在成都出炉

中国共产党历来是重视路线的，搞革命如此，搞建设亦然。搞大跃进运动，也要有一条路线，这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总

路线，即所谓“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关于这条总路线，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

最早出现的是总路线中的“多快好省”。1955 年 10 月 11 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作的结论中提出：要讲有些什么好办法，可以使合作社办得又快又多又好。不久，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要“又多又快又好”。12 月 6 日，他在关于反右倾反保守的讲话中说：中国农民比英美工人还好，因此可以更多、更快、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稍后，采纳李富春的建议，在多、快、好三个字后边加上了一个“省”字。12 月 14 日，薄一波在全国农具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改善企业管理，掌握新技术，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提高我国重工业的生产而奋斗》的报告中，首次传达了中央“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建设方针。1956 年 1 月 1 日，《人民日报》在《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社论中，提出“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自己的事业”，从而把“多快好省”的口号向全国公开提了出来。

后来在反冒进时，这个口号很少被提及。召开党的八大时，周恩来在修改一个文件时曾勾掉了有多快好省的一句话。周恩来的做法被批评为“促退委员会”。经过批评反冒进，又重新恢复了“多快好省”这个口号。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两个词，是在 1958 年 1 月 1 日《人民日报》那篇《乘风破浪》的社论中第一次出现的。社论指出，不仅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各项建设工作”，而且“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1 月上旬，毛泽东在上海同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谈起元旦社论，周谷城说归纳起来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认为这两个词提得好。后来在南宁会议、最高国务会

议、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多次提到这件事。

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把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完整地提了出来。1958年3月20日，他在成都会议上讲话说：只要路线正确——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这几句话更通俗）。那么后一年、二年、三年至五年完成四十条，那也不能算没有面子，不能算不荣誉，也许还更好一点。建设的速度，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凡是主观、客观能办到的，就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下，波浪式的前进，这是缓与急的对立的统一，劳与逸的对立的统一。

在谈到总路线时，他特别强调了“鼓足干劲”的问题。他说，《人民日报》2月3日的社论题目叫做《鼓起干劲，力争上游》，这两句话很好，但还不够。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干劲，在去年反击右派以后，早就“鼓起”来了，现在的问题是鼓得够不够，责任在领导。这里有一个数量问题，是鼓起三分、五分还是七分、八分？领导的责任是因势利导，使干部和群众的干劲鼓得足足的。所以我们的总路线，应该叫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这就比较完全了。

为了把毛泽东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确定下来，成都会议决定近期内召开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并决定由刘少奇代表中央作工作报告。

报告草稿已经由秘书班子起草出来，3月25日，在成都会议上，中央将准备提交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草稿》发给与会人员讨论。由于会议定于26日结束，与会人员没有来得及对《报告草稿》进行深入讨论，只有少数人提出了意见。有的人提出，总路线的提法应加上奋斗目标，如10年内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有的人提出，应当通过这个报告，把总路线在干部中明确，建议从中国的条件讲起，说明应当采取哪种路线，现在的稿子力量不够。有人提出，这个报告主要应当讲总路线，并且在理论上

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西南、西北小组提出，全文应突出写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根据南宁、成都两次会议精神，讲得更完善些，讲透，将主席重要指示写进去，写总路线形成过程是进行了斗争的；关于总路线的公式，是否不讲死，提得松动一点，留个余地；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如何衔接起来的，要写清楚，等等。

《报告草稿》发给与会者后，陈伯达又作了修改，毛泽东也作了修改。陈伯达将第 1 页上的“我们今后的任务是要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句，改为“我们今后的任务，是要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鼓起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奋斗”。毛泽东又将这段话改为：“我们今后的任务，是要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奋斗”。并批示：“此件可用。略有修改。或者还须作某些修改，可由少奇同志及小平同志斟酌处理。”

成都会议结束后，由刘少奇主持，胡乔木负责，对《报告草稿》进行了大的修改。4 月 7 日刘少奇致信胡乔木，谈了他关于修改报告的一些设想。根据他的意见和成都会议上人们所谈的意见，4 月 17、18 日改出报告初稿，篇幅比原来的草稿增加将近两倍。初稿全文分为 6 个部分，在第二部分中专门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4 月 21 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第 46 次会议，讨论准备向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稿，决定对报告稿作进一步修改。4 月 22 日，刘少奇带着修改后的报告稿到达广州，请毛泽东审定。4 月 25 日，周恩来也从西安赶到广州，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为期 4 天的广州会议。4 月 30 日，刘少奇带着经毛泽东审定过的报告稿回到北京，周恩来也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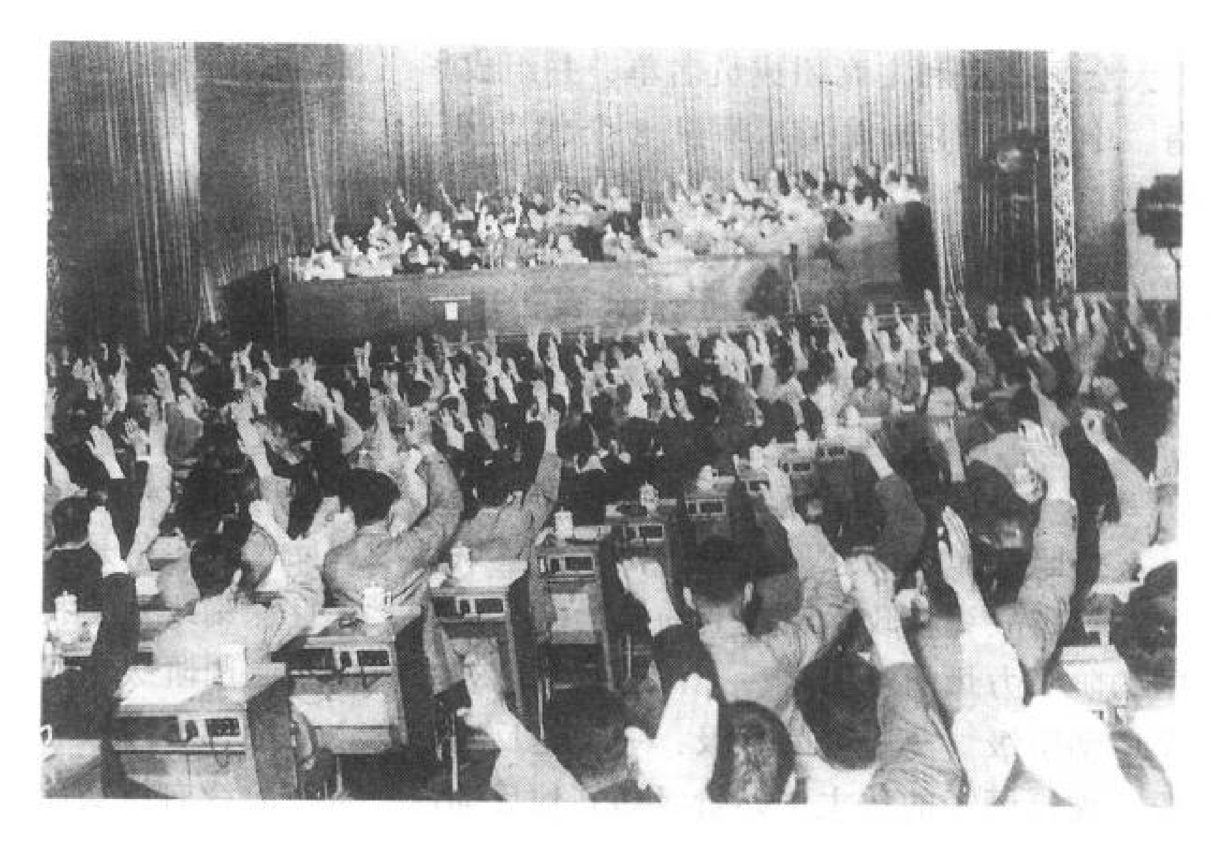
时回到北京。5月2日，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伯达、邓小平、彭真、董必武、杨尚昆、胡乔木等开会商讨有关八大二次会议的问题。随后，中央政治局第47次会议又对报告修正稿进行了讨论，决定提交八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

5月3日，刘少奇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四中全会。会议审议和通过了准备向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各项报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刘少奇代表中央向大会所作的工作报告。

刘少奇原来是支持反冒进的。但是，全国范围内迅速到来的大跃进局面，使他的思想也产生了急剧的变化，他也开始转向支持大跃进。正如他后来总结教训时所说：1958年上半年的形势，使我们“感到惊喜和振奋”。在这样的心态下，刘少奇对大跃进初期的发展趋势，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信心。4月11日，刘少奇在接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新任驻华大使汪戴尔时说：由于各方面工作的大跃进，过去拟定的计划指标太低了，需要大大地修改。我们提出了15年以后赶上英国的口号，按目前情况看来，可能不需要那么多时间，估计10年就可以赶上了。我们没有公开宣传，但是心里是作了那样的打算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需做很大的努力，各方面工作都需大跃进。

10.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树起了总路线和大跃进两面大旗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根据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全国代表大会实行常任制、每年举行一次的规定而召开的。这类会议在中共历史上没有先例，以后也没有再开过这样的大会。因而可以说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大会”。



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全面发动了大跃进。这是与会代表举手通过决议。

八大二次会议是一次在全党全面发动大跃进的会议。关于这次大会的意义，当时的《人民日报》说："这次大会是整风的大会，是大跃进的大会，是反对修正主义的大会。这次大会标志着我国人民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已经取得了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正在进入以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

八大二次会议前，5月3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中共八届四中全会。除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出席外，不是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列席了会议。全会讨论了八大二次会议议程、各代表团的组成和大会主席团的组成，通过了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各项报告。

5月5日上午，召开了八大二次会议预备会议。会上，通过

了大会的日程和主席团成员名单，并组成华北、东北、西北、西南、中南、华东、中直、军队8个代表团。大会主席团由44人组成，主席团常委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伯达、邓小平、彭真、乌兰夫、柯庆施、李井泉。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977人，此外还有列席代表387人。列席代表中有县委书记、大城市的区委书记、企业党委或其他基层党委的书记。

5月5日下午，大会正式开幕。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报告在指出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是我国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且深刻改变了我国的阶级力量的对比之后，认为：我国现在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资产阶级右派实质上是帝国主义者、封建买办残余势力和蒋介石国民党的代理人。另一个是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大多数人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处在动摇的过渡状态。两个劳动阶级：一个是农民和其他原先的个体劳动者，这些劳动者的绝大部分已经加入了合作社，愈来愈成为社会主义的热烈拥护者。一个是工人阶级，这是全国人民中的最先进的队伍，是我们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力量。

报告还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现阶段国内主要矛盾问题的论断。报告说：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

报告在充分肯定八大一次会议以来各方面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后，对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

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作了说明。指出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总路线提法上有“多、快、好、省”四个方面，但实际上，不仅是后来的实践，即便在最初理解上也只是一个“快”字，突出一个“快”字。八大二次会议之后，《人民日报》社论《力争上游》就说得很清楚：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它像一根红线，贯穿在总路线的各个方面。如果不要求高速度，当然没有多快好省的问题；那样，也就不需要鼓足干劲，也就无所谓力争上游了。社论反复强调“快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而当时人们也主要是从“快”的方面来理解和掌握总路线的，这也是总路线的首倡者的本意和真谛。

报告还特别批判了 1956 年的反冒进。报告说：在 1956 年，我国的整个经济文化事业有一个巨大的跃进，在跃进中也曾出现了一些个别的缺点。这些缺点，比之当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本来是很小的。但是当时有一些同志不适当地夸大了这些缺点，对于当时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却估计不足，因而认为 1956 年的跃进是一种“冒进”。在反对所谓“冒进”的这种空气下面，多快好省的方针，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竟然受到了某些人的怀疑。其结果是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 1957 年生产建设战线上特别是农业战线上的进展。

报告说：一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1956年1957年1958年，在生产战线上所表现出来的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亦即跃进保守大跃进，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吗？马鞍形教育了党，教育了群众。

报告把建设速度问题放在异常突出的地位，认为：建设速度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的革命就是为了最迅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经济本来很落后，我国的外部还有帝国主义，只有尽可能地加快建设，才能尽快地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刘少奇在他的报告中兴奋地说：我们现在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伟大的飞跃发展的时代。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现在需要大批敢想敢说敢做的人，敢于破除迷信、革新创造的人，依靠这样的人，我们才能够领导全国人民跃进再跃进，多快好省地完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刘少奇的报告实际上是毛泽东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说过的那些意见有条理的综合。毛泽东本人在5月8日、17日、20日、23日的大会上，先后作了四次讲话。

毛泽东说：过去几年，特别是去年一年，有些人对多、快、好、省的方针还不清楚，到底对不对，有怀疑的，反对的不少。这个情况是不可避免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是客观存在的，有些人看到了，有些人看不到；经过一些时候，经过反复看，才看到了。总路线的形成是曲折的，道路是曲折的。以后是不是没有曲折了呢？不会的，还会有曲折的。这次大会制定的总路线，还要在客观实践中去证明；虽然经过去年冬天今年春天的大跃进，已经有所证明了。过去三年是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前年高，去年低，今年又高了。有了这个变化，我们这次会就开好了。

在讲话中，毛泽东还多次号召全党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他

不只一次地讲了青年人胜过老年人，学问少的超过学问多的，并提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样一个公式，认为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即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受折磨、受刑戮的那些人。他让编印发明家的传记集来证明这一点，以此来鼓舞很多小知识分子，很多工人和农民，很多新老干部丢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对于我国 7 年赶上英国，再加 8 年或者 10 年赶上美国的任务，必然会有重大的帮助。

11. 对反冒进问题穷追不舍，做检讨的人越来越多

周恩来、陈云被安排再次在会议上进行检讨。

16 日是陈云作检讨。他说：从 1956 年下半年到 1957 年上半年的这一段时间内，我对于我国经过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以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形势估计不足，对当时大跃进中出现的个别缺点，主要是由于新职工招收得过多和某些部门工资增加不适当，一度造成商品供应和财政的某些紧张情况，估计得过分夸大了。我在考虑和提出问题的时候，一般的从财贸系统的情况出发，而对于中央工业、交通多数部门的情况，对于全国各地党的各方面工作，则注意不够，这种从部分情况出发解决问题，就不会正确地理解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因此，对于当时反“冒进”的那个方针的错误，我负有主要的责任，首先在思想影响上负有主要的责任。

17 日是周恩来作检讨。

八大二次会议前后的这段时间，是周恩来一生中最苦闷的时

期之一。经常去周恩来那里的人们发现，一向最为忙碌的周恩来总理和总理办公室，开始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

当时去过西花厅的国家计委的梅行后来回忆道：

有一天总理办公室给我打电话，说总理有事情找我，叫我去布置一下工作。我就马上去了。总理正在打乒乓球……我从来没有看到总理打乒乓球，也没看到他做其他活动，我就问总理办公室的许明：总理今天怎么打起乒乓球来啦？许明表现出心情很难受的样子，她说：你难道还不知道吗？南宁会议以后，总理的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职务被免了。……他们好几位秘书同志见到总理坐在那儿发呆，觉得很难受。后来他们自己攒钱买了一张很破旧的乒乓球桌，还买了乒乓球拍子和球，说是在总理心情很不好的时候把总理带到那去打乒乓球。

周恩来在这次会上的发言稿，是他花了10多天时间，数易其稿并经过若干次修改后写成的。在这次会议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周恩来内心显得异常苦闷。

据当时的学习秘书范若愚回忆说："在成都会议期间，周恩来对我说，要起草一个准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要我到总理办公室的宿舍住几天。"回到北京后不久，我就住到总理办公室的宿舍去了。"有一天，周恩来同志对我说，他这次发言，主要是'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他对我说"因为这是自己的检讨发言，不能由别人起草，只能他讲一句，我记一句，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5、6分钟说不出一句话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他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我发现周恩来同志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10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了。"

周恩来开始作检讨。他说：这次会议，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大会，也是一个充满共产主义风格的大会。大会的发言丰富多彩，

生动地反映了人民在生产大跃进、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设奇迹和革命气概。真是一天等于 20 年，半年超过几千年。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就不能不为这种共产主义的豪情壮举所激动，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认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建设路线的正确，同时，也就会更加认识反冒进错误的严重。

反冒进的错误，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个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多数问题上表现为经验主义，在某些问题上则表现为两者的混合。思想方法上的这些错误，结果造成了建设工作中的右倾保守的错误。这样，就违背了毛泽东主席一贯主张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总方针。

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应该从这个错误中得到更多的教训。

薄一波和李先念也分别在会上作了检讨。

薄一波说：对于反冒进的错误我是有份的。在反冒进错误的影响下编制的 1957 年计划是保守的。而且在思想没有完全解放的情况下编制出来的 1958 年计划的第一本账，也对当前大跃进的形势估计不足。今天看来，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在于生产和建设的指标高一点或低一点，而在于反冒进大大地挫伤了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的积极性，给开始出现的群众性的生产建设高潮，泼了冷水。这是必须引为教训的。

李先念在检讨中说：当 1956 年建设跃进中出现了一些个别缺点的时候，我们只是抓住了事物的局部现象，没有抓住事物的本质，夸大缺点，低估成绩，把 1956 年的跃进说成是一种冒进的错误，给工作带来了相当大的损失，这里我是有责任的。

在陈云、周恩来等人检讨以后，毛泽东在会上公开宣布：反冒进解决了，现在中央是团结的，全党是团结的。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国家经济建设还得靠这些人办事，此外没有人。同时，开展反反冒进斗争的目的已经实现，紧迫地摆在党和国家领导人面

前的新的根本性任务是全力以赴领导全国的“大跃进”运动。

在会上，毛泽东还从另一角度多次发出要注意“我们党内搞得不好要分裂”的警告。他说：假如我们党在某个时候，有些人不顾大局，像高岗那样，那就要分裂。因此，代表大会的代表同志，你们要注意一下，中央委员会要特别注意，要顾全大局，谁不照顾大局，谁就会跌筋斗。有人认为讲了分裂，心里就不舒服。我看讲了好，大家有个精神准备。

在大会发言和分组讨论中，代表们对于总路线给予了高度的赞美。会上批判反冒进和批判右倾保守的呼声成为基调。大家认为，发生反冒进的思想根源，在中央工作的个别领导人来说是思想方法问题，在地方工作的一些领导人中则不仅是思想方法问题，有些人是由于严重右倾和对社会主义事业缺乏热情或严重对党不满，因而借反冒进之名对党进行攻击。就全国说，反冒进的错误虽是思想方法的错误，但不是一般方法的错误，而是在建设路线上带根本性质的错误。

毛泽东提出的个人崇拜问题，在大会发言和分组讨论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响。许多人一方面否认党内有个人崇拜，一方面又把毛泽东作为真理的代表，发展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有人说：经过几十年革命的实践和建设的实践证明了毛泽东思想是真理的代表；拥护和相信毛泽东主席就是拥护和相信真理。我国人民有了这样伟大的领袖，对我国历史的发展，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要发生伟大的作用。还有的中央负责人说：毛泽东主席的建设路线，不是别的，就是他的经过多次革命烽火的考验、被充分证明了的、无往而不胜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对当前客观实际的掌握和运用，是对于国际的和我国的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创造。我们有了毛泽东主席这样的舵手，有了这样英明的领袖，我们只要老老实实地按照他的指示办事，就可以避免反冒进那样的错误，在经济建设上我们就可

以取得更大的成就。

12. 有人描绘出一幅“想象中的共产主义”前景

在高速度的指导思想下，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与会者纷纷再度设想加快本地区、本部门各项建设的步伐。

李富春在书面发言中介绍了经中央经济小组讨论后的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设想。李富春说：按照我们初步设想的指标来估算，1962 年工业总产值大约为 2300 亿～2900 亿元，比 1957 年增长 23 倍，平均每年增长 26%～32%；1962 年农副业总产值大约为 1200 亿～1300 亿元，比 1957 年增长 80%～110%，平均每年增长 13%～16%。李富春还介绍各项主要工业产品和农产品到 1962 年达到的必成指标和期成指标：发电量分别为 900 亿度和 1100 亿度，原煤分别为 3.8 亿吨和 4.2 亿吨，原油分别为 800 万至 1000 万吨和 1500 万吨，钢分别为 2500 万吨和 3000 万吨，化肥分别为 1000 万吨和 1200 万吨，棉纱分别为 1000 万件和 1200 万件，粮食分别为 6000 亿斤和 7000 亿斤，棉花分别为 6500 万担和 7500 万担，牲畜分别为 44.5 亿头和 5 亿头。

李富春很有信心地指出：只要我们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上述初步设想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二本帐，我国就完全有可能在 1962 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在赶上英国的基础上，经过进一步的努力，就可能在 1972 年或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美国。

冶金部负责人在大会发言中说：最近以来，我们根据毛泽东

主席的思想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再次地和各省市研究了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后，我们的结论是：明年达到1200万吨以上，1962年达到3000万吨以上，1967年7000万吨以上，1972年1.2亿吨以上，是完全有把握的。就是说，钢产量明年达到八大指标；5年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

化学工业部负责人在发言中说：我国的钢铁和煤炭，能够在15年内赶上以至超过美国，这是可以肯定的，但至今仍然处于严重落后状态的化学工业，敢不敢和美国较量？能不能够在10年内也赶上以至超过美国呢？我们的回答也是肯定的。在化学肥料工业方面，美国1957年生产化学肥料约2800万吨，今后每年以5%的发展速度推算，到1962年可能达到3580万吨。我国到1962年计划生产3000万吨，预计实际执行的结果还会大大超过，可能达到4000万吨左右。这就是说，化学肥料在5年内超过美国而跃居世界第一位，是大有希望的。

一些地方党委负责人则就地方工业农业的快速发展作了发言。李井泉在发言中说：四川省对今后地方工业的发展已经作了初步规划，我们决心争取提前3年或5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争取在5年内使地方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在1962年达145亿元，或者还更多一点。比1957年的36.1亿元增长3倍，或者更多一点。我们认为这个指标是比较有把握实现的。

陆定一在大会发言中传达了中央领导人关于共产主义公社的设想，他说：毛泽东主席和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以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警察等等。前人的“乌托邦”梦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

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在大会发言中，将上面的设想作了

更为具体的描述。他认为在 15 年内我国将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超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在文化建设方面我国也将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达到繁荣，人们的精神面貌大为改观。他为人们描述了这样一幅“想象中的共产主义”图画：

到那时，小学教育、中学教育早已普及，而且，不但是每个专区、每个县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在广大乡村中，也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我们的人民，人人“知书达理”（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理），个个都有比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像毛泽东同志曾经预言过的，大家都能够读《资本论》，大家都懂得高等数学，什么天文学、地质学、农业学、机械学、化学、物理学、电子学等等，都会变为普通人的常识。

到那时，人们将过着极为文明、卫生的生活，苍蝇、蚊子、臭虫、老鼠等等早已断子绝孙，那时的孩子们读到书上关于这些东西的记载，就像现在的一些学者们“言必称希腊”时所讲的希腊神话里的怪物一样神秘。他们听到老一辈的人说起，几千年来人们曾经忍受过这些小东西的毒害，将视为奇谈，人们只能到博物馆里才看到这些东西的标本，正如现在人们看恐龙化石一样感兴趣。

到那时，新的文化艺术生活，将成为工人、农民生活中的家常便饭，不但有了更好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艺术，而且工农兵自己也能更普遍、更高明地动手创造文化艺术，每个厂矿、农村都有图书馆，文化馆，歌咏队，演剧队，每个生产队、组都有自己的墙报、画报，都有自己的李白、鲁迅和聂耳，自己的梅兰芳和郭兰英。

到那时，共产主义的道德风尚已经基本驱逐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习惯，领导和群众、群众和群众的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关系，早已成了社会的新风尚，大家都具有为着社会公众利益进行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英雄气概。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并且保证进一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新道德，将成为人们的思

想和行动的规范。

综合上面说的这四个方面，那时，城市和乡村的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将逐渐消失，而共产主义的最后建成，也就离我们不远了。

这样描述的发展前景的确诱人，难怪人们热血沸腾。

13. 周恩来提出辞职，中央认为他应继续担任现任职务

八大二次会议闭幕后，5 月 25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了八届五中全会。会议增选林彪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增选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这种组织调整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当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只是政治局委员，林彪的升迁，使他成为十大元帅中地位仅次于朱德的第二号人物，从而为庐山会议后，林彪代替彭德怀担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埋下了伏笔。而国务院农办主任谭震林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则使他在党内的地位高于主持农业工作的副总理邓子恢，因为邓子恢从农业合作化以来一直被视为右倾。柯庆施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显然也包含着对他在大跃进初期的一些行为的嘉奖。李井泉当时对于大跃进也是非常积极支持的地方领导人之一。所有这些都从组织上保证了“总路线”的贯彻和大跃进运动的全面开展。

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周恩来曾向中央正式提出过辞职要求。

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看到周恩来亲笔写的书面辞职报告，也未看到别人直接记录下他辞职的口头报告。但在档案中却留下了中共中央讨论他辞职问题的简要记录。

1958年6月9日，中共中央就周恩来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等问题专门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会上讨论了周恩来等人的工作安排，与会者一致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会后，毛泽东嘱咐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起草一个会议纪要。6月22日，邓小平将写好的会议纪要报送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批示：“退杨尚昆存。”

杨尚昆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的确，无论在建设思路上毛泽东、周恩来之间有多大的分歧，终究他们在半个多世纪的合作共事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密切的合作关系，何况在当时的情况下，论才华、智慧、能力等综合性的素质，没有人能取代周恩来的职位。

14. 大跃进的战车开足马力向前奔驰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之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大规模展开。从党中央当时转发的《江苏省委关于传达和学习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情况的报告》就可窥一斑。

这个报告说：八大二次会议之后，省委召开了三届八次全会(扩大)，各地、市、县委书记，高校党委书记和省委各部委、各厅局党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报告说：与会者听了传达并进行讨论后，个个精神焕发，心情舒畅，雄心更大，干劲更足，坚信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能够用最高的速度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向共产主义迈进。报告说：省委全会首先大破了农业生产不能高速度发展的迷信，肯定了农业生产可以一翻再翻。报告

说：当前对跃进的认识已经不成问题了。但是小跃进还是大跃进，就是增产百分之几、百分之几十，还是一翻再翻的问题，在一部分人的思想上还是没有解决。怀疑派在这上面做文章。会议认为，有些人把农业增产问题，说得那么神乎其神，玄而又玄，是一种很大的迷信……实践经验告诉我们，要使产量成倍地翻，必须措施成几倍地翻，干劲成十倍地翻。其次，是继续大破了办工业的神秘观念，肯定了地方工业可以在自力更生为主的情况下大发展。南京市有人在会上发言说，他们要在 5 年之内，钢的产量达到 300 万吨，超过人口仅次于我国的东方大国——印度，赶上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比较发达的瑞典的水平。第三，是大破了对于“科学技术”和“科学家、技术人员”的迷信，认为科学技术并没有什么神秘，自然科学就是生产斗争的经验总结，把我们现在在生产上所干的一套总结起来，有许多就是最新的科学技术，有些还是世界科学技术的尖端（如我国小麦亩产 4000 多斤）。报告还说：“破除迷信没有底，解放思想没有边。”毛泽东关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指示，“正像一个中子打进了原子反应堆，迅速在干部和群众中间引起了连锁反应，产生了巨大的物质力量。”

1958 年 7 月 8 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认为“江苏省委这个报告很好，发给你们参考。”

八大二次会议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其在工业方面的主要表现，就是制定过高的钢铁生产指标和乱上工业建设项目。

与 15 年在钢铁等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赶上英国的口号精神相一致，八大二次会议后编制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时，片面考虑钢产量的赶超，先确定一个过高的钢产量指标，然后再据此制定其他工业品的生产计划，使中国的工业生产建设，走上了“以钢为纲”的道路。5月底，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建议将1958年

的钢产量指标提高到 800 至 850 万吨，将 1962 年的指标提高到 4000 万吨。6 月，各大协作区召开钢铁规划会议，又将钢产量指标提高了一步。华东区首先提出 1958 年钢产量要达到 600 至 700 万吨，其他大区也随着提出了各自的高指标。在此基础上，冶金部党组向中央提出，1959 年全国钢产量可以超过 3000 万吨，1962 年可以超过 8000 至 9000 万吨。根据上述报告，毛泽东提出了 1958 年钢产量，在 1957 年 535 万吨的基础上，干脆翻上一番，达到 1070 万吨的任务。



为了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实现赶英超美的目标，全国各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图为 1958 年云南省楚雄州大跃进誓师大会。

关于发展地方工业，《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和成都会议只是提出了各地工业总产值要在 5 到 7 年内超过农业总产值的要

求，八大二次会议后，中共中央又进一步提出了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任务。6月初，中共中央决定把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南、华东、华中、西北、西南7个协作区，要求各协作区根据自己的资源等条件，尽快建立大型的工业骨干和经济中心，形成若干个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8月10日至13日，毛泽东在天津视察工作时，又进一步提出，各省也应建立比较独立的但是情况不同的工业体系。这样，为了完成上述任务和地方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的任务，全国各地就出现了大办工业、乱上工业项目的热潮。

为了加快各地建立地方工业体系的步伐，根据八大二次会议的规定，中央在会后的短时间内，还把原归中央管理的大部分企业和中央在许多方面的管理权限，迅速地下放给了地方。

首先，下放中央管理的企事业单位。6月2日，中央作出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下放的规定，要求各工业部门除一些特殊的企事业单位外，其他在6月15日前全部下放。这样，中央各部门所属的企业、事业单位80%以上，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办完了下放手续，交给了地方管理。

其次，下放中央劳动管理权限。6月29日，中央批准劳动部的报告，决定放松国家对招收新工人的审批管理，确定今后劳动力的招收、调剂等项工作由各省、市、自治区负责管理，1958年的招工计划，经各省、市、自治区确定之后，就可执行，不必经过中央批准。

另外，中央还先后作出了下放计划管理权限、下放基建项目审批权、下放财权和税收权以及下放商业、银行管理权等一系列决定，把相当一部分原由中央掌握的权力下放给了地方。结果，更加促使了各地工业基本建设项目的乱上，不仅使新建的一些小型企业效益很差、浪费资源，更为严重的是，拉长了基本建设战线，膨胀了全国职工队伍，过大地增强了社会购买力，给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第三章　高产“卫星上天”，钢铁“元帅升帐”

1. 毛泽东提出，中国要变成世界第一高产的国家

大跃进运动中最荒唐、最离奇的事情，要算是放高产“卫星”了。所谓高产“卫星”，其实就是高产纪录。之所以把高产纪录比喻成高产“卫星”，那是因为1957年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两颗人造地球卫星，标志着人类开始摆脱地球引力向外层空间发展。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大事，引起全世界的震惊。以中国当时的科技水平和经济实力，还不能发射真正的人造地球卫星，但对它又充满了渴望，于是，人们便借用“卫星”来比喻那些远远超出人们想象、超越常规的高产纪录。

高产“卫星”集中在农业，农业的高产“卫星”放得最早，放得最多，放得最离奇。

农业高产“卫星”并非空穴来风，它可以说是农业高产计划指标的产物。

1957年9月至10月间，中共在北京召开了八届三中全会。全会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这个草案的第二条，就是“大力提高粮食的产量和其他作物的产量”。围绕着提高粮食产量和其他作物的产量，“农业四十条”提出了一系列增产目标。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草案还提出了

10个方面的措施，包括12年内水田和水浇地面积由1955年的3.9亿亩扩大到19亿亩左右，年产化肥达到1500万吨，增加谷种植面积2.5亿亩，国营农场的耕地面积由1300万亩增加到1亿亩左右，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危害农作物最严重的虫害和病害等具体指标。

对本来就有些脱离实际的计划指标，毛泽东仍觉得不满足。他在全会上讲话说：将来，中国要变成世界上第一高产的国家，有的县现在已经是亩产千斤了，半个世纪搞到亩产两千斤行不行呀？将来是不是黄河以北亩产800斤，淮河以北亩产1000斤，淮河以南亩产2000斤？到21世纪初达到这个目标，还有几十年，也许不要那么多时间。

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批判反冒进，指责主张反冒进的人是"促退派"。这以后，各级领导便把右倾保守思想看成了提高农业产量的主要障碍。八届三中全会以后，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社论说：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符合于客观规律的。1956年的成绩充分反映了这种跃进式发展的正确性。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因为不懂得这个道理，不了解合作化后农民群众的伟大的创造性，所以他们认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冒进了"，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他们不了解所谓"冒进"是没有实际条件，因而是没有成功可能的盲目行动，而我们在1956年的跃进却完全不是这样，是有很多可以实现的条件，因而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否则，就无法说明，为什么1956年我国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而粮食产量却超过了大丰收的1955年100多亿斤。

批判反冒进的直接后果，就是大跃进的兴起，这里的"跃

进”不是建立在客观可能性基础上的快速发展，而是把人的意志夸大到极致的结果。从此，外部客观的因素被看得可有可无，而主观意志则被夸大到无所不能的程度。人们主要甚至仅仅凭着自己的愿望，来设想提高农业产量的计划。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后，各省、市、自治区纷纷召开党代表大会，制定本地实现“农业四十条”的规划。

2. 以高指标为特征的“浮夸风”已在不少地方刮起

1958年1月，南宁会议进一步批评反冒进后，农业产量计划的高指标风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刮起。河南省2月份提出，1959年就要基本实现水利化，争取在1962年超额完成“四、五、八”，即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黄河以北、淮河以北和淮河以南的粮食亩产量，到1962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600多亿斤。广东省提出，到1962年就要实现全省粮食亩均年产800斤的目标，到1967年实现亩均年产1000斤，总产量由218亿斤增至480亿斤。陕西省提出，8到10年内使八百里秦川的粮食亩产达到800斤，总产量达到115亿斤。江西省提出，十年规划，五年完成。1958年粮食总产量由140亿斤增加到175亿斤。河北省提出，到1962年即实现“农业四十条”的产量目标，粮食亩产500斤，棉花（皮棉）亩产100斤。

如果说高指标是附着在大跃进温床上的种子，那么，高产“卫星”则是这个种子生成的果实。在大跃进的气氛下，只要有高指标，就必然会产生高产“卫星”，这是大跃进运动自身逻辑的结果。当然，大跃进运动发动起来之后，高指标和高产“卫

星”又是同时并存、彼此促成的，高指标引发了高产“卫星”，高产“卫星”又催生出更高的指标，两者形成愈演愈烈的浮夸循环。

1957年，全国小麦只在五六个地方的一二亩至多三五亩土地上，出现过亩产千斤的纪录；1958年夏收时节，全国所有的产麦区，所有的省，也几乎是所有的县，都出现了亩产千斤的纪录。亩产千斤的面积也不只是一二亩或三五亩了，如果以省为单位，已经是几万亩甚至几十万亩了。1957年末制定规划时，尽管不少地方脱离实际地提出亩产千斤的指标，但毕竟还没有敢提出两千斤以至更高的目标，而1958年夏收时报出亩产2500斤、3000斤的纪录已不是个别情况，甚至3500斤、4000斤以上的纪录也出现了。

6月8日，河南省遂平县卫星社5亩小麦亩产2105斤；6月9日，湖北省襄阳专区大面积小麦亩产1500斤；6月11日，湖北省光化县幸福社11亩小麦亩产3215斤；6月12日，河南省遂平县卫星社2.9亩小麦亩产3530斤；6月16日，湖北省谷城县星光乡替民乐社亩产小麦4353斤；6月21日，河南省辉县亩产4535斤；6月23日，湖北省谷城县亩产4689斤；6月30日，河北省安国县亩产5103斤。

6月底7月初，国家统计局在河北省保定召开全国统计工作现场会，提出统计工作必须为政治服务的方针，为虚报产量开了绿灯。此后，浮夸风刮得更加凶猛了。

7月12日，河南省发射了当时全国小麦亩产最大的“卫星”：该省西平县和平农业社社长陈颜理的2亩试验田，收了小麦14640斤，平均每亩达7320斤。陈颜理向记者介绍高产经验：下种前耕了4次，第1次耕1.2尺，第4次耕6寸到8寸；每亩播种70斤，施底肥12万斤；追施杂肥5万斤，返青时又施人粪尿450担，还上了500斤草木灰，50斤硫酸铵，20斤磷酸钙。

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河南省西平县和平农业社发射小麦高产“卫星”的消息，宣称小麦亩产达到7320斤。

3. 不少专家、学者出面论证高产“卫星”的科学依据

在大跃进的喧嚣气氛中，相信高产“卫星”的不仅有普通的干部群众，还有新闻传播媒介。许多高产“卫星”纪录，就全部是由中国最具权威性的官方传媒——《人民日报》报道的。

更加使人难以理解的是，在相信高产“卫星”的队伍中，还有一些是一贯严谨求实的科学家，他们中有的还颇有名望。

6月16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位著名物理学家的文章，题为《粮食亩产会有多少?》文章说：

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了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成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

这并不是空谈。举一个例：今年河南省有些特别丰产试验田要在一亩地里收160万斤蔬菜。虽说蔬菜不是粮食，但到底是亩产160万斤。

所以，只要我们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

这篇文章不仅肯定了已经放出的那些高产“卫星”，而且还论证了比现有的高产“卫星”高出20倍的产量出现的可能性。这时全国尚未出现亩产万斤的“卫星”，而这篇文章论证亩产有可能达到四五万斤。在你追我赶的浮夸风中，这样的论证文章所起到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1958年12月武昌会议时，毛泽东找他的秘书李锐谈话时，李锐曾问他，怎么会相信亩产万斤那样的事情，毛泽东说是看了这篇文章才相信的。

紧接着这篇文章发表之后，7月5日至9日，全国科联和北京科联还组织首都科学家同30多位种田能手（包括小麦、水稻、棉花）举行丰产座谈会，他们来自湖北、河南、河北、浙江、江苏、安徽、陕西等省及北京郊区，科学家中有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农业大学的有关负责人和专家。座谈会实为擂台赛，在上面的压力之下，科学家同种田能手展开了高指标大战。这种压力就是政治挂帅，认为科学落后于大跃进的形势，必须打破常规，解放思想，以虚带实，紧紧跟上。大家都表示，要通过试验田工作，在思想上、耕作技术栽培管理上、理论上和作物产量上来个四大丰收。会前，中科院8个有关单位还决定共同办试验田，向农民丰产能手应战的亩产指标共拟定三本账，分别为：小麦1.5万斤、2万斤、3万斤；水稻2万斤、3万斤、4万斤；甘薯15万斤、20万斤、26万斤；籽棉3000斤、4000斤、6000斤。可是一听到种田能手的报告后，大家觉得这些指标太落后了，于是改为，争取小麦3万斤、水稻3万斤、甘薯40万斤、籽棉1万斤。在分组会上，就出现了像拍卖一样，竞相抬价的局面，不仅农民能手之间互相竞赛，生物学部同农科院之间，也挑战应战。生物学部争取指标达到：小麦6万斤、水稻6.5万斤，甘薯50万斤、棉籽2万斤。河南、陕西两个农业社提出小麦10万斤，江苏一个社提出水稻7万斤。

擂台会后，生物学部当真组织了丰产试验田委员会，而且真

的进行了试验。在6亩小麦地上，作出不同耕翻深度、播种密度、施肥量的对比试验。其中深耕最深达10市尺，每亩播种量多达260斤到460斤，粪肥多达40至60万斤。试验田里，白天鼓风机齐鸣，以增加二氧化碳，强化光合作用；晚上灯光如白昼，以增加光照。如此使尽了浑身解数，迎来注定要失败的试验：1959年6月麦收时，最好的一块地，亩产只有900斤。

当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这种做法，有些科学家算过细账，如甘薯亩产要达到15万斤，则每平方米土地上，必须长有每个重30斤的7个半甘薯，像7个半小儿一样挤在一起；如果是50万斤，则需25个小儿挤在一起了。可惜他们的声音太微弱，不足以影响上层的决策和群众性的热情。

4. 高产"卫星"竞相上天

小麦高产"卫星"的竞放，首先导致了对1958年夏季粮食产量的高估。

6月份召开的华东区第一次农业工作会议预计，华东四省一市小麦比上年增产73.5亿斤，即增长57%；油菜比上年增产317万担，即增长76.2%。主持会议的谭震林估计更高，他认为，华东四省一市当年粮食增产是以70%的速度飞跃前进的；这些省市的粮食总产量1957年共715亿斤，1958年夏季即已达到203亿斤。

6月上旬，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就本省小麦丰收向记者发表谈话，说河南当年8335万亩小、大麦产量达206亿斤，其中6765万亩小麦平均亩产254斤，总产量达171亿斤，比上年增产1.29倍，有66个县、市增产1至2倍。吴芝圃还说，建国8年来河南省小麦平均每年增产3亿斤多一点，而1958年一年

即增产96亿斤，夏粮比上年增产114亿斤。

各地纷纷发出夏粮高产的喜报，新闻机构随之报道全国夏粮高产的喜讯。7月初，《今日新闻》发表当年夏粮增产350多亿斤的消息。消息说，今年全国夏收粮食达到950亿斤上下，其中冬小麦增产220多亿斤，达到640亿斤左右，我国小麦总产量已超过英国居世界第二位。消息还说，小麦增产的主要原因是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了，冬小麦每亩平均产量1957年为112.8斤，1958年为180斤左右。

小麦高产"卫星"的竞放，还刺激了更高的产量计划指标的出台。谭震林在华东区农业协作会议上提出，今年就可达到每人平均1000斤粮的目标，而且不需要5年即可完成人均2000斤粮食的任务。谭震林还说：棉花和油料也同粮食一样迅速增长，预计到1959年皮棉和油料的产量都要比1957年翻一番。按全国人口平均五年内达到每人粮食2000斤，是毛泽东在1957年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目标，过了不到一年，实现这个目标的时间也被缩短了。

紧随着小麦高产"卫星"的上天，又开始了新一轮早稻"卫星"的竞放。还在小麦"卫星"上天初起之时，6月20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水稻生产要加油》的社论，其中说道："去年，我国水稻平均亩产到350多斤的时候，小麦的平均产量才只有110多斤，水稻的产量比小麦高出两倍以上。今年小麦赶上来了，它的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已经不是百分之几、百分之十几的增长，而是百分之几十的增长了。有些省、更多的专区和县、成千上万的农业社，甚至已经以一倍、两倍或更高的速度增长了。小麦等夏收粮食作物的总产量比去年增长50%左右。小麦的产量能够如此迅速地增长，素有高产作物盛誉的水稻为什么不能呢？仅以早稻为例，今年我国种植早稻1.6亿亩，如果平均亩产增加50%，由去年的亩产300多斤增加到500斤，全国就能

收获800亿斤稻谷，约占去年全国粮食总产量20%以上。争取水稻产量更迅速地增长，对于争取全年农业大丰收，对于全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具有多么巨大的意义和作用！”

农业部发表1958年夏收粮食产量公报的当天，《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今年夏季大丰收说明了什么》，社论中说：它们说明，我国的农业发展速度，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由渐进到跃进的阶段，这是我国全体农民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贡献。一切认为农业产量只能按百分之几的速度增长的悲观论调已经完全破产了。社论还说：既然一向被认为“低产作物”的小麦都能以71%的速度跃进，那么高产作物水稻、玉米、甘薯为什么不能更加大量地增产呢？棉花的产量为什么不能跃进呢？《人民日报》的这种说法，显然起到了一种鼓励各种农作物竞放高产“卫星”的作用。

5.“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当新闻媒介一再进行早稻应当高产的鼓动宣传时，各地实际上已经开始了一场放早稻高产“卫星”的竞赛。据《人民日报》和各地地方报纸的报道：

6月26日，江西省贵溪县早稻亩产2340斤；7月18日，福建省闽侯县早稻亩产5800斤，随后又报早稻亩产7275斤；湖北省孝感县亩产15361斤，这是早稻亩产超万斤的最早的“卫星”。没过多久，该省麻城县麻溪河乡建国一社放出一个震惊全国的更大的早稻“卫星”：该社社长王全成等人的1.016亩试验田，共产干谷37547斤，平均亩产36956斤。这颗巨大的“卫星”一放出，8月13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连同福建省报出的花生亩产1万多斤的“卫星”一道庆贺。社论说：早稻亩产36900

多斤，花生亩产1万多斤的高产“卫星”，从湖北省麻城县麻溪河乡和福建省南安县胜利乡的田野上腾空而起了。这是今年我国农业生产的又一件大喜事。这样高的单位面积产量，这样高速度的增产，是古今中外所没有的。这又一次生动地证明，“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解放了的人民可以创造出史无前例的奇迹来。

这是新闻舆论中最早出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来自一份内部报告。1958年夏收时节，中共中央办公厅派人赴山东省寿张县了解农业生产情况，其成员刘西瑞写回来一封反映当地情况的信。8月23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这封信，并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作为通栏标题。信中说：这次寿张之行，是思想再一次的大解放。今年寿张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全县范围的亩产万斤粮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五万斤、十万斤乃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像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000斤、7000斤，提出5000斤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根本没有人提了，这里给人的印象首先是气魄大。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大跃进时期最为流行的口号之一。与此相联系的，还有对“粮食增产有限论”的批驳。

《红旗》杂志在1958年第5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驳“粮食增产有限论”》。文章的作者是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文章写道：

农业生产是一种人与自然的斗争。对于这种斗争，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从剥削制度解放出来的人民是力求主宰自然、征服自然呢，还是甘心处于自然的主宰之下而成为它的奴隶呢？在

"粮食增产有限论"者看来，大自然神秘得很，不可能为人们所认识，人们更不可能改造它。我们共产党人则认为，自然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当人们正确地掌握了自然的规律，就能驾驭自然，改造自然。

文章还以高产"卫星"为事例，来证明"粮食增产有限论"对自然界认识的"贫乏"。无独有偶，文章也引用了一个著名科学家的文章来证明粮食的高产"卫星"是有科学根据的。

当时还没有电视，报纸是最主要的传播媒介，而《人民日报》又独占魁首，因此，它在"舆论导向"方向发挥了其他媒介所难以企及的作用。

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今年夏季大丰收说明了什么》，社论讲道：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有把握可以说，我国粮食要增产多少，是能够由我国人民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决定了。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

《人民日报》28日的社论《今年秋季大丰收一定要实现》中，还引述了当时流行的一些口号：广大农民在总结夏季丰收的经验时说："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没有万斤的指标，就没有万斤的措施"。

8月3日，《人民日报》又发社论《年底算账派输定了》。社论说："地的产是由人的胆决定了的"，批判"唯条件论"。

既然广大农民决心使大秋作物像夏季作物一样的速度和更高的速度增产，那就一定能够以更高的速度增产。这些意思用当时的一句话概括，就是："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想得到，定能做得到。"

毛泽东本人也为高产"卫星"助威叫好。8月13日《人民日报》刊出了毛泽东视察山东农村的报道。他来到历城县北园农业社，毛泽东一边看一边向社主任李书城询问水稻的品种、深耕、密植等情况，李书城一一作了回答。当毛泽东问到计划产量

时，李书诚说：50亩高额丰产田，原来计划亩产两万斤，现在我们争取4万斤，过去一亩只产二三百斤。毛泽东听了高兴地说：好，你这个人，不干就不干，一干就干大的。

8月份，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预计1958年粮食产量将要达到6000亿至7000亿斤，比1957年增产60%~90%，全国每人占有粮食的平均数将达到1000斤左右，棉花产量将达到7000万担左右，比1957年增产一倍左右。按照7月份农业部汇总各省上报的数字新进行的统计，1958年粮食产量估计是1万亿斤以上。北戴河会议似乎还打了点“埋伏”，只公布6000亿斤至7000亿斤。毛泽东此时兴奋的心情溢于言表，这年七八月，他对来访的赫鲁晓夫说：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

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竞放高产“卫星”一浪高一浪，早稻高产“卫星”升天后，中稻、晚稻高产“卫星”又相继升空。9月18日，广西自治区环江县放出全国最大的高产“卫星”：该县红旗人民公社中稻亩产130434斤！除了小麦、水稻高产“卫星”以外，玉米、高粱、谷子、蕃薯、芝麻、南瓜、芋头、蚕豆、苹果等农作物和蔬菜、水果的高产“卫星”也相继上天。

6. 高产“卫星”的一面旗帜——湖北省麻城

大跃进中，如果要列一个高产“卫星”数量的排行榜，湖北怕是要名列前茅的。最早的高产“卫星”，最大的高产“卫星”，小麦的高产“卫星”，水稻的高产“卫星”，差不多都是由湖北升

起来的。而麻城县又是湖北放高产“卫星”的一面红旗，不仅扬名全省，而且闻名全国。

麻城县位于湖北省东北部，属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南麓，平原、丘陵、山区各占 1/3。其土壤、气候、地形条件，在农业生产方面都属中等。但自 1957 年年末以来，这个县便成了农业生产的先进县。八届三中全会大批反冒进以后，该县就报出了皮棉“百斤县”的消息。1956 年全县棉花平均亩产 60 斤，1957 年按播种面积计算平均亩产 103 斤，按实收面积计算平均亩产 107 斤，比 1956 年增产 70%。按农业四十条的目标，该县皮棉亩产量当年便达到了要求在 12 年内达到的目标。除了棉花，1957 年全县小麦 37 万亩，平均亩产 202 斤，粮食亩产 801 斤。全县棉麦亩产合计千斤的面积有 3000 亩。县委书记赵金亮还在《人民日报》介绍了自己种试验田的经验：找了一亩多“落后田”作试验，亩产籽棉 600 斤，比全县平均亩产量最高的记录还高出 30%以上。

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对麻城经验十分欣赏，《麻城报》1957 年 12 月 27 日刊载了他的文章《向麻城看齐——学习麻城县委的领导方法》，文章说：

麻城县今年取得了大丰收，成为皮棉百斤和水稻粮食亩产 800 斤的县，提前十年实现了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麻城县粮食和棉花的产量，都是跳跃式地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王任重还对前来采访的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称赞麻城和该省另一个县——红安县干部种试验田的领导方法，说：凡是采用了这种方法领导农业生产的地区，落后的很快变成了先进，工作被动的很快变成了主动，生产上立即取得显著成就。他还说：麻城、红安生产条件都不太好，但是广大群众在干部的鼓舞和指导下，革命干劲空前高涨，因此，生产面貌焕然一新，农业生产得到了大跃进。

1957年底，麻城县向全省兄弟县发出挑战：争取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为了在争取大跃进的斗争中，能够互相推动，希望和全省各县开展社会主义竞赛。粮食：1958年全县总产量比1957年提高27.5%，达到每亩平均产量950斤，争取1000斤，并创造小麦千斤亩一万亩。棉花：每亩平均产量保证130斤皮棉，并培育1万亩平均产籽棉1000斤的丰产田。

1958年1月4日，王任重到麻城检查工作，对麻城给予鼓励。2月17日，麻城县委发出春节祝词："跃进再跃进，千千万万翻一番"。

4月11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视察麻城。李先念向来以沉稳著称，但全国热火朝天的"跃进"形势也深深地影响了他。在视察中，他对麻城的竞赛给予肯定，他说：革命就凭着一股热情，一股干劲！有了热情，干劲，就没有任何克服不了的困难。他还说：干什么事都要坚持斗争，保守思想总会有的，看嘛，比嘛，保守思想就在先进事物面前甘拜下风了。

尽管如此，1958年上半年，麻城的粮食高产"卫星"在湖北全省还不是靠前的。

6月11日，《湖北日报》一版发表消息说：光化县崔营乡幸福社第二生产队有29亩小麦，经过详细验收，每亩产量达2173.7斤，其中有11亩达到亩产3215斤，创小麦单位面积产量的世界纪录。参加这次验收的，除襄阳地委、兴化县委专门组织的验收工作组外，还有华中农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湖北省农业部门的技术干部和不少的新闻记者。他们除了亲自参加打麦、过秤外，还对这块地进行了测量，查实了面积。报纸还配发了图片：光化县崔营乡幸福社小麦高产的喜讯传到了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书记处书记张平化、张体学在观看送来的3000斤小麦样品。报纸发表了王任重6月9日写的诗《新纪录——献给光化县崔营乡幸福社》：

幸福社，真幸福，创造世界新纪录。

小麦亩产三千二百一十五。

幸福社，真光荣，光荣榜上点头名。

今冬明春再加劲，争取亩产四千斤。

同日，《湖北日报》还发表了一篇社论：《三千二百一十五》，称："这是破天荒的大喜事。""这是农业生产战线的大胜利。""这是小麦生产上的一面大红旗。"

报纸还同时发表了署名"龚同文"的文章《有意思的对比》，"龚同文"是以王任重为组长的湖北省委机关写作小组的笔名。这篇文章讲到：有一些自命为比农民高明的人物，比方像某些资产阶级"专家"吧，他们自以为比农民懂得多，常看不起农民……可是一碰到实际问题，和农民比较起来，他们显得非常之不高明。就以这个"三千二百一十五"为例吧，某些资产阶级"专家"听说出了"三千二百一十五"这件事，不仅表示冷淡，而且硬说这是不可能的。当然要问他们的理由，不外是什么"世界从来没有这样的纪录"呀，"书本上也找不出理论根据"呀，等等。

大概是受到其他地方高产"卫星"的刺激，麻城县终于放出了早稻高产"卫星"。《湖北日报》在"丰收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的眉题下，发表"湖北水稻高产卫星叠出"的消息。其中说：麻城县黄市乡前进五社 1.337 亩早稻亩产 5880 斤，木子店乡光明一社 0.919 亩早稻亩产 4228 斤，孝感县六合乡五四农业社 1 亩田产 3567 斤，应城县盛滩一社 1.25 亩田亩产 31248 斤。在这组高产"卫星"中，麻城县成了第一名。

然而，麻城的第一名没当几天，又被别人突破纪录。7 月 29 日，应城县白湖乡春光农业社第 12 生产队队长甘银发等人，共同培养的 1.613 亩早稻试验田，总产干谷 17093 斤，平均单产 10597 斤。

7 月 31 日，《湖北日报》发表社论《祝贺早稻万斤高产》，

社论说：今年夏收以后，水稻赶小麦、“高产”赶“低产”的浪潮，就汹涌澎湃地开展起来了。敢想、敢做的革新家们，英勇果敢，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以似乎寻常的措施和行动，踏踏实实、满怀信心地朝着既定目标驰去，但是，在前进道路上，总还有少数左顾右盼、前怕狼、后怕虎的“小脚女人”，他们对别人这种大胆的尝试，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他们对这种群众性的革命英雄主义的浪潮，抱着一种“观潮派”的态度。革命家们的论点是“思想解放无底，土地潜力无穷”。“小脚女人”们的论点却是“山穷水尽增产到顶”了。这两种论点，究竟孰是孰非呢？如果说本报前两天发表的早稻的高产丰产纪录（5467 斤），仍没有达到亩产万斤的话，那末，今天应该说是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了吧！……这样说来，增产到顶论者，该闭嘴了吧!?

社论发出号召：要及时总结早稻丰产经验，把早稻的丰产经验，运用到晚稻生产上去。争取在晚稻的产量上，放出更大的高产“卫星”。

也就在 7 月 31 日这一天，又出了“早稻高产原子弹爆炸”的消息：湖北省孝感县朋兴乡长风农业社水稻一季超万斤，力争晚稻亩产 3 万斤。该社主任官木生和全体社员写信向湖北省委报喜，王任重当即复信，代表省委向全体社员祝贺。这两封信公开发表在 8 月 1 日的《湖北日报》头版，还配发了《敢想》、《敢说》、《敢做》3 幅漫画，对全省各地农村放高产“卫星”又是一个很大的刺激。

在高产“卫星”的擂台赛中，麻城终于后来居上。

8 月 13 日，新华社、《人民日报》、《湖北日报》、《麻城报》发表了同一条消息：麻城县麻溪河乡建国第一农业社主任王乾成，副主任冯福柄、社委王茂刚、第二生产队长罗学江等人培育的 1.016 亩籼稻试验田，共收干谷 37547.12 斤，平均亩产 36956.7 斤。《麻城报》称，这是创造了世界上水稻最高纪录。

这块田的稻谷厚到这样的程度：把鸡蛋放在稻禾上面滚动，它始终不会掉到田里去，小孩也能站立在稻穗上面。全国一些农业专家纷纷赶来参观、学习。这些专家所在的单位计有：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华中农业科学研究所、江西省农业科学研究所、湖南农业科学研究所、湖南农学院农业系、华中农学院等。这些专家和教授说，建国一社创造亩产 36956.7 斤的高产，是世界上没有的，书本上没有的。这是一个特大的卫星，它标志着我国农业生产已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还说：这块田的培育者都是土专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是有无穷智慧，是有巨大的创造性的。对照起来，我们有的科学研究人员就缺少这些。建国一社



湖北省麻城县麻溪河乡建国第一农业社的 1.016 亩早稻，创造了亩产 36956.7 斤的高产“卫星”。这是发表在 1958 年第 9 期《人民画报》上的照片，孩子们站在稻穗上。

创造的高产纪录，是我们全国的光荣，它对世界农业科学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当然农业专家只是参观者的一小部分。当年这块高产田，曾引来10万多人参观。许多参观者说，看了这块田真正解放了思想，想不到田里的稻谷有这么厚。武汉电影制片厂还为这块高产田拍了影片。

8月14日下午，王任重率湖北省委、武汉市委负责人到麻溪河乡建国一社，向亩产36956.7斤的高产创造者贺喜，并发了写有“高举红旗，争取更大面积平衡增产”的奖旗。据8月15日《麻城报》报道，王任重仔细看了谷子和稻兜以后说：多厚的谷子，连手也插不进，谁不相信高产就让他亲眼来看看。他还说：一亩田今年能产3万多斤，明年能不能高产5万斤、大面积亩产1万斤呢？王任重离开这里以后，社里决定：明年要大面积创造水稻8000——10000斤，高产试验田亩产5万斤。

正当麻城庆祝建国一社的早稻“卫星”上天的时候，天不作美，来了一场大暴雨，接连50多个钟头，随之山洪滚滚。县委提出战斗口号：“大灾保规划，小灾超规划，无灾翻规划”；“水涨一寸，堤高一尺”，“人在堤在，人亡堤倒”，100多人像打仗一样，各人守住一块地方，把试验田团团围住，面对着风的人，把竹竿横挡着；背对着风的人，把竹竿倒钩着，使稻禾没有倒伏。

麻城建国一社的这颗“卫星”，一段时间里发挥着示范的作用。8月28日，《麻城报》报道：该县山区熊家沟乡建新六社1.017亩胜利籼中稻共产干谷53493.11斤，平均亩产52599.8斤，该报于9月2日发表文章称：这是山区高产的红旗。9月17日，又报道：白杲人民公社中稻亩产突破了十万斤大关，同时发表社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0月1日还报道：龟山公社传捷报，芝麻上天大卫星——1.182亩亩产1182斤。

8月27日晚，在县劳模、先进工作者代表会和扩干会上，

县委第一书记吴德简作了《全党全民总动员，为实现1959年全面更大跃进的规划而奋斗》的报告。他说：今年我们县是大跃进了，但是麻城目前面临大的形势是一个伟大公社化运动后全面跃进的新形势。所谓全面跃进，就不是单一的农业生产，而是在工农并举方针的指引下，粮食、钢铁、机械三大元帅要升帐，电力、交通运输两大先行官要并驾齐驱。明年是毛泽东主席号召的“苦战三年，改变面貌”的决战的一年，全国各地都在争取更大的跃进。以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同志为首的省委负责同志，要亲自到我县来办高产卫星县。因此，我们一定不辜负省委的殷切期望，鼓起更大干劲，在全国更大跃进的队伍中走在前面，实现卫星县。

11月3日，《麻城报》以通栏标题登出：思想插红旗，跃进再跃进，战胜大灾害，丰收再丰收。宣布全县农业生产获得全面丰收。粮食总产101354万斤，比去年增长88.1%；棉花亩产1023斤，比去年增产259.2%；花生亩产1000斤，比去年增长233.3%。县委书记吴德简著文，用诗一样的语言赞美“大灾大丰收”：高山把头低，人定胜过天。

对湖北这样一个接一个的高产“卫星”，王任重是深信不疑的。1958年10月初，他在湖北全省文教、卫生、生活福利现场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今年我们湖北省粮食每人平均可以达到1500斤，甚至更多；省委安排明年的粮食生产，每人平均3000斤。生产这些东西作什么？出口吗？给谁？谁也买不起。这些东西卖不出去，要吃要用，谁吃谁用？我这次到宜昌，听他们说，他们种20万亩甜萝卜，可制糖1.5亿斤，全省每人平均有5斤，恩施比宜昌还多。

然而，事实上直到2001年9月初，我国超级杂交稻也才创造了亩产2393斤的世界高产纪录。

7．“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以钢为纲”

就国民经济各个部门而言，当年毛泽东魂牵梦绕的，一个是粮食，再一个就是钢铁了，而且对钢似乎看得更重。

从 1956 年开始，毛泽东就比较注意钢的问题。据薄一波回忆，1956 年 2 月，毛泽东在听取重工业部汇报时，就主张钢产量每 5 年翻一番，今后就采用一番加一番的增长法。这是在小范围内说的，而且是就钢的生产谈钢的生产。

1956 年 8 月 30 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讲话，谈到国家建设时说了一大段话：过去人家看我们不起是有理由的，因为你没有什么贡献，钢一年只有几十万吨，还拿在日本人手里。国民党蒋介石专政 22 年，一年只搞到几万吨。我们现在也还不多，但是搞起一点来了。今年是 400 多万吨。明年突破 500 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要超过 1000 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可能超过 2000 万吨。我们要努力实现这个目标，虽然世界上有 100 多个国家，但是超过 2000 万吨钢的国家只有几个。所以，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 100 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美国只有 1.7 亿人口，我国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赶上是可能的。应不应该赶上呢？完全应该。你 6 亿人口干什么？在睡觉呀？是睡觉应该，还是做工作应该？如果说做工作应该，人家 1.7 亿人口有 1 亿吨钢，你 6 亿人口不能搞它 2 亿吨、3 亿吨钢呀？你赶不上，那你就没有理由，那你就不那么光荣，也就不那么十分伟大。美国建国只有 180 年，它的钢在 60 年前也只有 400 万吨，我们比它落

后60年，假如我们再有50年、60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又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通过这段话，人们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于钢铁生产的重视程度，以至于把它同能否保住中国的“球籍”问题联系在了一起。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又谈到钢的问题。他说：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下，生产力发展一直是非常缓慢的。解放前50年间，全国除东北外，钢的生产一直只有几万吨，加上东北，全国的最高年产量也不过是90多万吨。在1949年，全国钢产量只有十几万吨。但是全国解放不过7年，钢的生产便已达到400多万吨。

还是在这年的10月13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讲话，再三表明了他对钢生产的希望和信心。他说：我们预计，经过三个五年计划，钢的年产量可以搞到2000万吨，今年是520万吨，再有10年大概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了。印度1952年的钢产量是160万吨，现在是170多万吨，它搞了五年只增加十几万吨。我们呢？1949年只有十几万吨，三年恢复时期搞到100多万吨，又搞了5年，达到520万吨，5年就增加300多万吨。再搞5年，就可以超过1000万吨，或者稍微多一点，达到1150万吨。然后，搞第三个五年计划，是不是可以达到2000万吨呢？是可能的。

看重粮食，“农业以粮为纲”这比较好理解。自古以来“民以食为天”，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几亿人的吃饭问题自是天下第一大事。看重钢铁，“工业以钢为纲”就难以理解了。这恐怕还得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以及毛泽东本人对于这些理

论的理解中寻找答案。

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的理论认为，社会资本再生产分为两大部类，第一部类是生产资料的生产，第二部类是生活资料的生产。要实现社会资本的扩大再生产，其条件必须是第一部类一年内所生产的生产资料必须多于两大部类一年内所消耗的生产资料，以便第二年有多余的生产资料用于扩大再生产。这个原理表明，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以及各部门之间，都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一旦这种正常的比例关系被破坏，再生产过程也就必然出现危机。

最早将马克思关于两大部类生产的分析，运用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并据此提出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方针的，是苏联的斯大林。斯大林在20年代阐述苏联工业化问题时说："不是发展任何一种工业化。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正是按照斯大林所主张的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的方针制定的，整个计划的重心都在生产资料（也就是重工业）方面，实际上，从这时开始，苏联国民经济始终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

中国当年沿袭了苏联的发展道路，从"一五"计划开始就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毛泽东在重工业（也就是生产资料生产）中特别注意钢，而且强调提高钢产量，把优先发展重工业逐渐变成了优先发展钢铁工业。50年代中期，苏联经济建设中的许多弊病包括片面发展重工业的问题暴露出来，毛泽东提出要"以苏为鉴"，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发展农业、轻工业。然而事情好像有些不可理解：当毛泽东看到了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的弊病，告诫人们要"以苏为鉴"的同时，他自己的意识中却萌生出一种"钢铁情结"，对钢产量的提高最为关注，甚至把钢产量的多少作为中国能否保持"球籍"的标志。这里的结果似乎同动

机正好相反：毛泽东希望能够避免重蹈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的覆辙，但过分关注钢产量却更片面。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还注意重工业内部的平衡，钢铁、石油、煤炭、电力、机械等均衡发展。毛泽东只注意钢的产量，则连重工业内部的平衡也忽略了。

这里也许可以从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抓住主要矛盾来求得理解，即想通过优先发展钢铁工业来带动其他工业的发展。毛泽东亲临前线搞大跃进，抓钢铁翻番，就是认为国务院领导没有抓住这个主要矛盾。

50年代中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阵营的赶超浪潮，使毛泽东的赶超意识更加强化了。在结束了战后恢复经济、重建家园的工作后，世界各国之间均具有某种竞争的意味。在不同意识形态体系的东西方之间，这种竞争是还带有某种“火药味”，甚至干脆被称为“冷战”。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庆典，随后又参加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及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弥漫着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气氛。在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上，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提出：通过和平竞赛，15年内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的目标。此前，苏共中央已通过一个“在今后几年中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牛奶、牛油和肉类生产上赶上美国”的口号。64个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接受了赫鲁晓夫实际上也就是苏共关于和平竞赛的提法和主张。

毛泽东不能不被这种赶超气氛所鼓舞。在莫斯科期间，他同英共领导人波立特·高兰谈话中，再次谈到了中国的钢产量目标。毛泽东说：苏联在15年后，将在总产量方面和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方面超过美国；中国在15年后将超过英国。

当然，强化毛泽东的赶超意识的，不只是莫斯科会议的赶超气氛，更重要的还有他同苏联比高低的心理。斯大林去世后，在

国际共运的阵营里，毛泽东并没有瞧得上赫鲁晓夫。在理论上，毛泽东不把赫鲁晓夫放在眼里，而且认定赫鲁晓夫把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都丢掉了。在经济实力上，毛泽东一方面不能不承认苏联要强于中国，另一方面又不服输。既然苏联在15年内要超过美国，中国在15年内也得有举世公认的成就。其实在没有说出来的潜台词中，毛泽东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欲同“老大哥”试比高。因此，中国的赶超具有双重含义：一是同西方大国竞赛；二是同苏联竞赛。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的话就说得更明白了：苏联将变成两个美国，中国将变成四个美国。

8.1958年，钢产量干脆翻一番

自从公布在钢铁工业生产上赶超英国的消息后，钢铁行业率先在全国兴起赶超浪潮。1958年1月2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消息，国家经委已向国务院建议：今年我国钢铁工业计划生产732万吨生铁，624万吨钢和482万吨商品钢材。按照这个计划，1958年生铁比上年增长24.1%，钢增长19.2%，钢材增长13.1%。冶金部提出计划，1958年将新增103.6万吨钢和138万吨铁的生产能力，等于“一五”计划期间新增炼钢能力的43%、新增炼铁能力44%。这个增长速度显然已经不低了。用《人民日报》的语言说：“钢铁战士们开始15年赶上英国的长征。”

南宁会议后大批反冒进，鼓干劲、争上游，促使各行业、各地方纷纷修订原定计划，给原指标加码。钢铁工业自然首当其冲。1958年3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鞍钢第二炼钢厂青年团结炉，在2月份创造了大型平炉炉底利用系数（即每一昼夜

一平方米炉底面积的出钢吨数）达到10.64的全国最高纪录，走进了世界先进平炉的行列。这个纪录比目前本厂其他平炉的炉底利用系数平均高出3.03，超过了著名的鞍钢第一炼钢厂青年友谊炉去年创造的10.22的纪录；接近了苏联最先进的平炉——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17号平炉去年创造的10.77的纪录。报道说，如果鞍钢所有平炉都能达到这样的成绩，就可以在完成今年增产计划的基础上再增产120万吨钢。

在这种形势下，冶金部在3月上旬修订了一个月前通过的钢产量计划，提出当年产钢700万吨。这个指标比原定指标提高了77万吨多。冶金部不仅提高了1958年钢产量计划指标，而且对钢产量赶超英国的整个计划作了修订。

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写了一篇题为《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能否设想更快一些》的文章，谈到了钢铁生产的跃进计划：最近部党组根据主席的指示，又研究了钢铁工业的建设情况，认为钢铁工业苦战三年，超过“二五”计划指标（也就是1050万~1200万吨），1962年达到1500万~1700万吨是有把握的，2000万吨可以争取。十年赶上或超过英国是可能的，即争取1962年达到2000万吨左右，1967年达到4000万吨左右；20年或多一点时间赶上或超过美国，即争取1972年达到7000万吨，1977年超过1亿吨以上。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很赞赏，在成都会议上热情地表扬了冶金部。在5月29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毛泽东更称赞王的报告是“一首抒情诗”。

成都会议后，国家经委汇总各地上报的当年钢产量计划指标，总计为711万吨。4月14日，由国家经委上报中央，这样，1958年钢产量的计划已经有了两本账：第一本账是624万吨，第二本账是711万吨。不到3个月，指标已经比原来提高了87万吨，比1957年的产量提高了近33%。产量提高的根据是什么呢？谁也说不清楚。

当计划指标层层加码的同时，钢铁行业的生产也在不断“跃进”。《人民日报》5月1日报道：我国钢铁工业基本建设工人发动了“速度快一倍、投资一当二”的竞赛。现有厂矿的生产工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断地创造“多快好省”的新纪录。1958年施工的钢铁工业基本建设项目有49个（不包括为数众多的地方小型钢铁工业），预计年内开工投入生产的项目，将使国家增加年产157万吨生铁和103万吨钢的新设备，几乎达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加的全部设备能力的一半。当年开始新建和扩建的湖南、太原、石景山、马鞍山、重庆等5个中型钢铁联合企业，打破了过去的施工常规，打算以前所未有的新速度着手提前施工。仅仅这5个中型企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全部建成后的钢铁年产量，就超过1957年全国的总产量。

同一天该报在《让高炉转炉满布城乡，让铁水钢水全国奔流，24个省区大办钢铁厂》的标题下，报道说：目前已经动手筹建的地方小型炼铁厂和钢铁厂约有60个。河北省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几乎没有地方钢铁工业，现在正动工兴建7个钢铁厂，共25座小高炉，有5座已投入生产。最近河南省工业厅组织7个专区、3个市、49个县筹建钢铁厂的人员，到苏州炼铁厂去观摩学习，拟定了一个建设小高炉100多座、土炉1000多座的具体计划。贵州省第一座钢铁厂已经在贵阳动工兴建，这是一个包括高炉、炼钢和轧钢的联合企业，建成后年产大型钢材4万吨。铁矿资源丰富的内蒙古自治区，今年7月份就有40座小高炉可以投入生产。石家庄钢铁厂第一批建设的3座小高炉，有1座已在4月13日出铁。

风急浪高的生产大跃进，反过来推动了钢指标的再度提高。

毛泽东4月下旬曾找冶金部党组几位负责人谈话。他说：你们不要怕钢铁生产多了没地方放，可以放在我的院子里嘛！1956年投资多了一些，工业生产快了一些，就有人害怕，慌慌忙忙出

来反冒进。旧的平衡总是要在发展中被打破的，然后，又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平衡，这是马克思主义。反冒进就是不懂这个辩证法。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现在才能生产几百万吨钢，太可怜了，工业不发达就要受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一个省就有欧洲一个国家大，无论人口和面积都比欧洲的一个国家的人口多、面积大；欧洲没有统一，欧洲的各国都发展起来了；而我国从秦始皇时就统一了，统一当然有好处，但中央集权也限制了地方的发展。你们应该对一个省像对一个国家那样考虑它的发展。当时冶金部负责人曾表示，1958 年钢产量肯定可以超过 624 万吨，达到 700 万吨，最多可能达到 800 万吨。

在 5 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了超过苏联的问题。他说，苏联是 20 年加半年，把钢产量从 400 万吨（1913 年的产量）搞到 1800 万吨。1957 年是 5100 万吨。我看，我们搞到 5100 万吨，不需要这么多时间。我们的老底子是 90 万吨（1949 年的产量），到 1962 年，13 年间将搞到 3000 万吨，可能是 3500 万吨，也许是 4000 万吨。从 1949 年算起，只要 7 年搞到 4000 万吨，再加一年，就可能搞到 5100 万吨。

八大二次会议讨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二本账。李富春在会上作了《赶上英国，再赶上美国，第二个五年计划是关键》的发言。他说，这次提交大会讨论的“二五”计划第二本账，是以 7 年赶上英国、15 年赶上美国为目标的。王鹤寿在大会发言时说：冶金部再次同各省、市、区研究了钢产量的发展速度后，认为 1959 年可以达到 1200 万吨，1962 年 3000 万吨，1967 年 7000 万吨，1972 年 1.2 亿吨。5 年可以超过英国，15 年赶上美国。

会后，5 月 26 日至 30 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将 1958 年钢产量计划指标提高到 800 万至 850 万吨。这样便出来了 1958 年钢产量指标的第三本账。这个指标比第一本账提高了 32.6%，比 1957 年的产量提高约 59%。也就是说，第三本账已

比1957年翻了半番还多。

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和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了各地工业总产值要在5至7年内超过农业总产值的要求，八大二次会议后，中共中央又进一步提出了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任务。6月初，中共中央决定把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西南、西北等5个协作区，要求各协作区根据自己的资源等条件，尽快建立大型的工业骨干和经济中心，形成若干个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

协作区一成立，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新任华东协作区主任柯庆施就主持了一次华东协作区会议，规划1959年华东五省市（不含山东）的工业生产，确定1959年生产钢800万吨。华东五省市煤铁资源很少，敢于作出这样的规划，对于全国影响很大。据薄一波回忆，柯庆施的这一行动，对毛泽东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讲话，在谈到了1070万吨钢闯了祸时，他说：第一个负责任的是我。至于柯老，你那个发明权怎么办？

柯庆施回答道：我也有责任。

毛泽东接着说：可不可以这样讲，你也有责任。但是，你是不是比我轻一点呀？因为你那只是意识形态。我虽然没有你那个气魄，你一个协作区一年要搞800万吨，我全国只搞1070万吨。

毛泽东的这番话清楚地表明，是柯庆施促使他闯下这个祸。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们，也把柯庆施称为"土法炼钢的干将之一"。

6月7日，冶金部向中央报送《1962年主要产品生产水平规划》。规划预计，1958年钢产量为820万吨，1962年产钢6000万吨。6月中旬，国家计委、经委、财政部对各部向中央汇报的指标作了研究、汇总，经中央财经小组讨论后，由李富春向中央

提出新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要点》认为，1958 年钢产量可能达到 850 万吨到 900 万吨。“现在看，以钢铁为主的几种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有可能不用 3 年赶上和超过英国”。对于这个《要点》，6 月 17 日毛泽东批示：“彭德怀、黄克诚：此件即刻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很好一个文件，值得认真读一读，可以大开眼界。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没有现代化工业，哪有现代化国防？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要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但是，毛泽东对这个翻半番的计划仍觉得不满足。6 月 17 日，中央政治局开会听取薄一波《关于 1958 年计划执行情况和 1959 年设想》的汇报。在钢铁生产上，薄一波谈到，预计今年钢产量将达到 900 万吨。18 日晚 8 时至 11 时半，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全体常委和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廖鲁言、黄克诚、王鹤寿谈话。谈到钢铁生产，毛泽东表示赞成提高钢指标。经研究，1958 年的钢产量的预计完成数改为 1000 万吨，1959 年的钢产量指标改为 2500 万吨。其间，毛泽东对薄一波说：现在农业已经有了办法了，叫做“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你工业怎么办？薄一波没有多加思索，回答说工业就“以钢为纲，带动一切”吧！这个口号反映了毛泽东以钢铁来带动其他工业的思想，因而颇受他欣赏，当即表示肯定。但毛泽东认为，机械工业也很重要。接着就议论起工业交通各行业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提出机械工业也是纲，电力和铁路是先行。此后，“以钢为纲”的口号风靡全国，并有所谓“三个元帅”（钢铁、机械、粮食）和“两个先行”之说。

19 日晚，毛泽东在游泳池召见一些中央负责人，王鹤寿也在被召见之列。谈话中，毛泽东问王鹤寿：去年 530 万吨钢产

量，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为什么不能翻一番？王鹤寿回答说：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当时内部决定 1100 万吨，后来公开宣布为 1070 万吨，即以 1957 年产量 535 万吨为基数翻一番。

当时也有一些清醒的人。有一次，薛暮桥和宋劭文去见陈云，希望他找毛泽东谈谈他对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的想法，陈云说：现在不是毛泽东主席一个人热，全国许多领导都热，不吃一点苦头，这些话是听不进去的。

7 月 31 日到 8 月 3 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来华访问，阿尔希波夫作为他的总顾问随同来访。赫鲁晓夫这次访问，是为了解决双方关系中所谓“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事情。结果，双方会谈闹得很不愉快。

不管怎样，双方都是共产主义同志。会谈中，毛泽东把中国当时的雄心壮志透露给了赫鲁晓夫。他告诉赫鲁晓夫，中国今年要生产钢 1070 万吨，明年是 2500 万吨到 3000 万吨。

赫鲁晓夫搞过技术，中国的工业基础有多大的家底，瞒不过他。现在中国一下子搞钢铁翻番，他当然不大相信，但也不想再为这次糟糕的会谈添什么新的分歧了。他来了一句外交辞令：中国同志提出来的计划，我们相信大概可以完成。

阿尔希波夫就不同了。他是中国人的老朋友，“一五”计划时期苏联驻华专家总顾问。

8 月 3 日，中苏双方签署《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陈云和阿尔希波夫进行了交谈。陈云把深藏在心底的疑问端出来问这位老朋友：你看我们明年的钢产量计划，完成得了完成不了？

阿氏不好正面回答陈云的问题，只是笑了一下，说：很大的计划，伟大的计划，能完成百分之八十、九十，也是很好的。

阿氏好像意犹未尽。在走向宴会厅时，他同薄一波走在一

起。他坦率地对薄一波讲：你们的计划太高了，恐怕实现不了。

薄一波回答：我们有群众路线，把土法炼铁炼钢加上去，计划一定能实现。

阿氏苦笑着说了一句：土法炼钢再多也没有用。

阿尔希波夫的话后来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愤慨，但一年后的实践却印证了他的话——此谓旁观者清。

9. 为完成1070万吨钢而奋斗

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以钢为纲》的文章。从此，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运动进入高潮，与前一个时期的大跃进不同，此后的大跃进把钢铁行业摆在最为突出的位置。

8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土洋并举是加速发展钢铁工业的捷径》的社论，指出：一个以钢为纲、带动工业全面发展的工业建设的新高潮已经形成。转炉高炉遍地开花，钢水铁水到处奔流的日子，即将到来。社论用问答式的写法向全国传达了毛泽东的钢铁翻番的构想：我国的钢铁工业能不能以最高的速度，比如说，每年产量的增长率不是百分之几、百分之十几或者百分之几十，而是百分之百甚至更高的比例发展呢？答曰：可能性是存在的，问题是我们想不想、要不要高速度？我们想要，就有；不想要，就没有。也许有人会说："要高速度就有高速度，是否有点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味道呢？"我们说，这里一点也没有唯心论，而是完全从实际出发，是有根据的。根据是什么呢？第一，我国矿产资源丰富。炼铁需要大量的煤，而在我国2000多个县中，就有1500多个县有煤；钢铁的原料——铁矿石，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探明的铁矿已达56亿吨。第二，有党的

领导和6亿人民，这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多力量大。人民是这样形容自己的力量的："我们一跺脚，大地就震动；我们吹口气，滚滚河水让路；我们一举手，巍峨大山胆寒；我们一迈腿，谁也不敢阻挡；我们是劳动人民，我们的力量无敌。"

在如此逼人的形势下，各地方、各企业纷纷再次修改计划，提高指标。中国最大的钢铁企业鞍钢，于6月份将原计划在1962年达到630万吨钢的指标取消，改为1959年就要达到生产800至1000万吨的生产能力。1957年鞍钢只生产了290万吨，1958年就要增产130至140万吨。6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华北区协作会议提出：全区1962年钢产量将达到2000万吨，比国家计委原定的1962年华北区钢产量高出700万吨。会议还确定了1959年全区生产600万吨钢的指标，其中北京120万吨，山西160万吨，河北250万吨，内蒙古70万吨。华东区则报出了两年中赶上日本，4年超过英国的设想；华东区的钢铁厂集中在上海，1957年上海仅产钢50万吨，1958年就要生产100万吨，1959年生产钢600万吨并要达到生产1000万吨的能力。到7月底，全国已建成小土高炉3万余座，仅湖南一省就建成炼铁炉14936座。8月，河南一省建成简易小高炉14300多座。

来自各地、各部门"跃进"的消息，无论是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是对未来的种种计划、设想，似乎给人一种印象，既定的目标是一定能够如期实现的。

实际情况却远不令人乐观。按照1958年产钢1070万吨的计划，平均每个月需要产钢89万吨多。但是这个指标是6月下旬才布置下去的，而1至6月全国累计产钢才310多万吨，这就是说，后6个月必须月均产钢126.67万吨才能完成年计划。可是翻一番计划布置下去以后的7月份，仅产钢70万吨。这时离全年计划要求达到的目标还相差甚远。毛泽东感到钢的计划有完不

成的危险，便赶快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下死命令，落实全年计划。

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全民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为主要标志，把大跃进运动推向了最高潮。

北戴河会议的头几天，讨论了钢铁生产问题，分析了未见起色的诸多原因。陈云把讨论的情况如实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听完汇报，毛泽东作了8点指示：一是国家经委主要抓生产；二是原材料调配要服从国家计划，分配钢材既要照顾重点，又要照顾农民的需要；三是抓紧冶炼设备的生产和安装；四是机械厂收到钢材后，第一是用来制造炼钢炼铁轧钢的设备；五是各省市自治区常委每星期抓一次钢铁生产；六是加大保险系数，冶金部直属钢铁厂今年增加50万吨钢的新任务；七是要有铁的纪律，没有完成生产和调拨计划的，分别情况给予警告、记过（小过、中过、大过）、撤职留任、留党查看、撤职、开除党籍处分；八是立即把各省、市、自治区常委主管工业的书记找来北戴河，开一次工业书记会议。

毛泽东显然是着急了，他强调，钢铁指标是政治任务，少一吨也不行，下了死命令，要用“铁的纪律”来保证。

8月21日，陈云向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传达了毛泽东的上述指示。25日，毛泽东提出的工业书记会议在北戴河开幕，由薄一波主持。

如何完成1070万吨钢呢？薄一波说：主席指示，对土炉子要有信心，不能泄气。即使在100个土炉子中，只有一个出铁，那就很好，就算插上了红旗，其余99个都应当向它学习。

陈云再次到会讲话。他讲到要依靠党委，发动群众搞土炉子，说土炉子在中国的命运还有一个时期。

统一思想后，30日下午，薄一波领着主要钢铁产区的工业

书记、鞍钢、武钢、太钢等几个大厂的党委书记，去毛泽东那里，一个一个向他当面担保。毛泽东挨个向与会者核实：1070吨，行不行？

首先问上海市副市长马天水，马说可以；问鞍山市委书记赵敏，赵也说可以；问武汉市委书记，问太原市委书记，又问主要钢铁基地重庆、北京、天津、唐山、马鞍山的工业书记，大家都说行。

问到冶金部副部长刘彬，毛泽东说：就看你拿主意啦。刘彬说：可以，我们都做了计算了。

毛泽东又问冶金部办公厅主任袁宝华：你是经常接触基层的，你说究竟有没有把握？袁宝华说：冶金工业的生产，从矿山、冶炼、轧制到机修、运输等等有10个环节，我们树了10面红旗，只要10面红旗能站得住，他们的经验能够推广，我看有希望。

毛泽东面对冶金部部长王鹤寿，问他的意见。王鹤寿说：主席只要下了决心，我们可以动员全国的力量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认为，实现这个目标是可以的。

后来王鹤寿检讨说：他所以敢于向毛泽东拍胸脯，是想借毛泽东的威望把钢铁搞上去。

毛泽东最后问到薄一波，薄说：主席，我建议把1070万吨登报，登报以后，大家都看得到了，义无反顾，就会努力奋斗。

毛泽东听了以后说：这是个好主意。根据你们刚才讲的不是1070万吨，是1100多万吨，发表1070万吨，那我们兜里还装有几十万吨。

薄一波马上打电话通知起草公报的胡乔木：1070万吨第二天见报。

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北戴河会议公报，题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

公报写道：

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用最大的努力，为在1958年生产1070万吨钢，即比1957年产量535万吨增加1倍而奋斗。

9月4日，《人民日报》再发社论：《全力保证钢产量》，提出生产1070万吨钢，是我国人民当前的一项头等重要的任务，我们必须为完成这个伟大任务，全力以赴，只能超额完成任务，而决不能少一吨钢。

当时，只剩4个月了，于是有人说，不抽鞭子是不行的。

在北戴河会议确定钢产量翻番任务时，1958年的钢产量指标才完成了450万吨，要完成1070至1150万吨的任务，在今后短短4个月的时间内必须产钢600至700万吨。在钢铁工业早已开始大跃进的情况下，全年2/3的时间才完成1/3多点的任务，要想在余下的1/3的时间内完成将近2/3的任务是不太可能的。就连毛泽东本人，在北戴河会议上也发出过“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感叹。

到1957年底，中国的钢和铁的生产能力分别为648万吨和696万吨，虽然，原先确定的1958年基本建设项目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钢铁工业，北戴河会议又在原有基础上确定全国新建小高炉12507座，中型高炉142座，各种转炉设备205套，各种电炉44台，但是即使这些项目在当年全部建成投产，加上原有的生产能力，在4个月内也不可能完成预定任务。

全国大部分地区存在着供电紧张问题，特别是东北、西南和山东等地更为严重。电力不足，成为工业生产大跃进中的一个严重薄弱环节。

但是，既已夸下海口，当然不能食言，难以完成也得硬着头皮上。1070吨这一赶超英国的指标，它的制定和公布，在当时看来，更有着不同寻常的政治和经济意义，非完成不可。在北戴

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各省、市、区党委分管工业的书记会议，提出了强行完成1070万吨钢产量指标的一系列措施。

第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从现在起，必须首先注意工业的领导，必须亲自挂帅，大抓钢铁和大抓机械。9月1日，《人民日报》在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会议公报的同时，还发表了题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的社论，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必须把领导钢铁生产当作首要任务，每个星期检查一次生产进度，采取最有效的办法，调动各方面的力量，组织各方面的协作，解决生产中的一切困难问题。北戴河会议后，中央曾先后4次召开电话会议催促。在9月4日的电话会议上。谭震林传达说：主席提出，明年粮食再翻一番，又提出今年1100万钢一吨也不能少，少了就是失败。彭真说：主席要求在9月15日钢铁有一个大跃进，因为9月是要命的一个月。9月24日，中央书记处召开电话会，要求到30日，要达到日产钢6万吨，铁10万吨，否则是不行的。9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召开电话会议，更进一步提出了从省、地、县到乡，各级党委第一书记都要亲自挂帅，亲临钢铁现场、日夜不停地指挥作战的要求。周恩来受毛泽东委托，分管冶金工业，并担任钢铁大跃进领导小组组长，多次主持召开钢铁工业会议，组织各有关部门的协作会议。周恩来也说过：世界各国的工业发展历史表明，有了钢铁就能够有机器，而有了钢铁和机器，也就能够有工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第二，让钢铁工业先行。规定除供机械铸铁所需的生铁外，其余全部拨给钢厂炼钢。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力保证钢铁生产》，要求各部门、各地方都要把钢铁的生产和建设放在首要的地位。当钢铁工业的发展与其他工业的发展，在设备、材料、动力、人力等方面发生矛盾的时候，其他工业应该主

动放弃或降低自己的要求，让路给钢铁工业先行。不管哪一个地方哪一个部门，有材料，有设备，有交通运输工具，必须首先让给钢铁工业；有制造能力，必须首先为钢铁工业而生产；电力必须首先输送给钢铁工业；煤炭及其他燃料必须首先满足钢铁工业的需要；有劳动力和技术力量，必须首先调给钢铁工业。

第三，下达死命令。北戴河工业书记会议确定：铁，9月200万吨，10月280万吨，11月320万吨，12月350万吨；钢，9月120万吨，10月100万吨，11月200万吨，12月220万吨。在地区上，钢铁工业薄弱的山西省也要生产68万吨铁，55万吨钢。几乎没有什么钢铁工业的广西，也必须生产20万吨生铁。而广西在“一五”期间总共才生产了1.7万吨生铁。9月5日晚上的中央书记处电话会议再次强调，北戴河会议确定和下达的钢铁工业指标，只能超额，不准完不成。不但一吨不能少，少一斤也不行。

第四，大搞土法炼铁。中央对八大二次会议后大办地方工业形势下出现的土法炼钢特别是土法炼铁很感兴趣，在北戴河会议上就要求各地大搞小高炉和土高炉，以生产炼钢所需的大量生铁。9月底，毛泽东向记者发表谈话时，强调发动群众大炼钢铁的重要意义，批评了“不正规”、“农村作风”、“游击习气”等说法，要求在工业战线上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人民日报》也发表了《土洋并举是加速发展钢铁工业的捷径》、《关键在于大搞群众运动》、《开展炼钢的群众运动》和《让土法炼钢遍地开花》等社论，极力宣传土法炼钢对于钢产量翻番的意义。冶金部等单位还组织召开土法炼铁、土法炼钢的现场会议，以推动全国范围的土法炼制钢铁运动，使“小土群”（由群众自办的小型的土法炼铁、炼钢）同“大洋群”（在原有的大中钢铁企业发动群众突击炼铁、炼钢）配合起来完成任务。

第五，设法解决运输问题。要求各地成立强有力的运输指挥部，统一指挥当地的交通运输，调动机关、学校、部队等一切可以调动

的力量，调集火车、汽车、轮船、飞机、人力车、兽力车甚至小汽车等一切交通运输工具，投入全民搞运输保证大炼钢铁运动。

此外，中央及有关部门还相继发出了全民大办煤炭、大办电力、大办地质等指示，要求采取各种紧急措施，保证钢产量指标翻番任务的完成。

切实有效地把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和昂扬的斗志组织起来，就能够保证社会主义建设高速度的前进。办法是，组织大辩论，成立指挥部，书记亲自上前线，组织战役，全党全民各行各业编成钢铁师、运输营、采矿队等各种野战军、后勤部，昼夜突击，突破一点，创造高产纪录，开现场会议，推动大面积提高产量。

各地党委纷纷搞动员，抓措施，力保钢铁元帅升帐。河北省委成立大炼钢铁指挥部，指挥长由省委书记亲自担任，要求第一抓领导，第二抓组织，第三充分依靠群众，第四抓生产；山西省组织了工作团、技术指导团；内蒙古自治区党委采取了“五抓”（抓生产、原料、设备、技术、运输）的办法；山东省要求所属各级党委把钢铁生产作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江苏省委要求土炉建设要普遍实行“五定”（定型、定群、定量、定员、定制度）；浙江省委要求领导同志上山下乡，“不流铁水不离炉，不见铁矿不下山”；安徽省委成立了把机械、电力、交通、建筑、物资、商业等有关部门统一组织起来的冶金工业指挥部；福建省各地党委第一书记亲自带领干部群众上山下厂猛攻钢铁。冶金部抽调各方面的技术力量派往各省、市、自治区。

10.“小土群”上阵，千军万马上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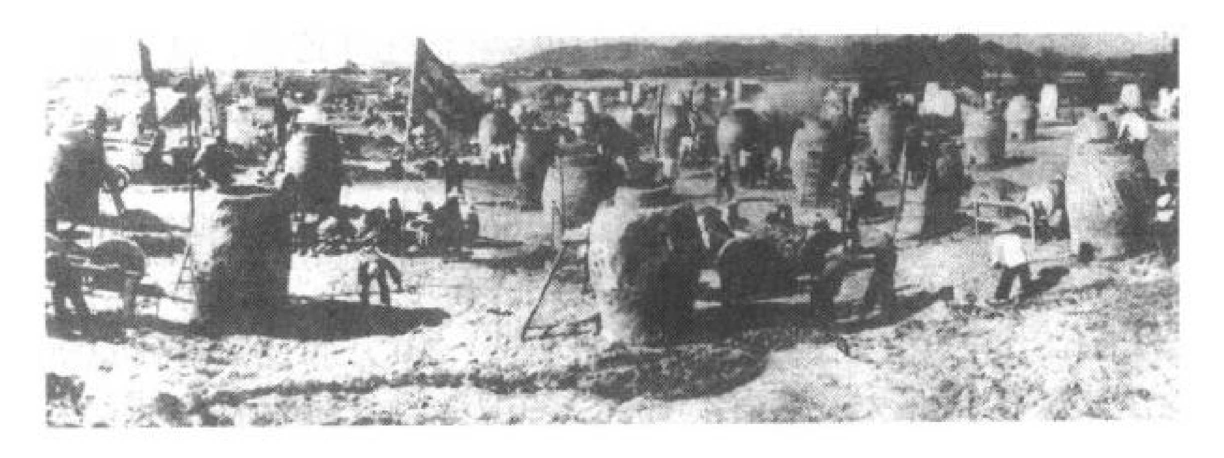
北戴河会议后，毛泽东一路南巡，亲自督战。他首先视察了湖北。到武汉的当天，他听取了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关于钢铁生

产情况的汇报，接着视察了一批钢铁企业，如武汉钢铁公司、大冶铁矿区、大冶钢厂、武昌第一纱厂小高炉等。视察过程中，他和上述企业约4万名职工见了面，赞扬了他们在大办钢铁中所表现出的充沛的革命干劲和创造精神。毛泽东非常兴奋，对陪同视察的王任重说：许多事情看来怪得很，要就没有，或者很少，要就很多很多。……全国也一样，过去9年搞了几百万吨，今年几个月就可能增加几百万吨。你看怪不怪。王任重回答：主席一再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很重要，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样一来许多发明创造出来了，许多奇迹也出来了。

全民大炼钢铁，动员了广大工人、干部、学生、居民直到乡村农民。9月24日《人民日报》曾介绍湖南邵阳专区的经验：他们组织全民大辩论，驳倒了“农民炼不出铁来”的“怀疑论”、“条件论”等右倾保守思想……在全区组织了万余名干部、93万群众投入炼铁运动。没有矿，他们说：“把地球挖穿，也要挖出矿来”。仅一个湘乡县，就发动了7万多人找到120处铁矿和51处煤矿。焦煤运不及，他们自己去挑，去搬。仅一个涟源县就发动2万多人排成长蛇阵，从山上运下6000多吨焦煤。据统计，7月底，全国用在钢铁战线上的劳动力已有几十万人。8月底，增至几百万人。9月底，猛增到5000万人。10月底，又增到6000多万人。1958年末，达到了9000多万人，加上其他战线直接和间接支援的，全国投入大炼钢铁运动的劳动力超过了1亿，占全国人口的1/6。

在当时情况下，完成指标单靠大中型企业已不可能，便把希望寄托在小高炉和“小土群”上。8月底以前，全国已建成一批年产钢在10万吨以下的小高炉。9月以后，新建了几十万个这种小高炉，到1959年春仍保留了10万个。“小土群”的土高炉，在全国更是无处不在，几万、几十万，成百万个一哄而起。不但

工厂、公社，而且部队、机关、学校，甚至外交部、安徽省委机关也建土高炉，办炼铁厂。这种高炉，大的不过几米高，小的容积仅1立方多米，不但砖瓦窑、瓷窑改成了土高炉。就连侵华日军和国民党军留下来的碉堡、炮楼，也都改成土法炼钢炉具。为了解决钢铁战线煤炭不足的突出问题，煤炭部提出，一方面，原有的大煤矿进一步加紧生产；另一方面，全民大办“小煤窑”，采取“小土群”的运动，用分散的小煤窑对分散的小土群，仅小煤窑开挖10万多个。煤炭不足，各地还大量砍伐树木烧成木炭代替。缺乏高品位的铁矿石，就用低品位的矿石代替，没有矿石，甚至把家庭用的铁锅砸碎当原料，有的家庭许多年之后仍只能使用铜盆、铜勺。在办地质方面，全国上千万人进山找矿；在大办运输方面，组成了数以千万计的运输大军，各行各业男女老幼，既用现代化车辆，也用原始运输工具昼夜不停，抢运大炼钢铁所需的各种物资。



1958年北戴河会议后，全国各地千军万马大炼钢铁。这是山西省故县利用“小土群”炼铁的场面。

北戴河会议之后，报刊不断报道各地大放钢铁高产“卫星”的情况。9月14日，贵州省首放“卫星”宣布生产生铁14000吨，提前超额完成了9月份的9000吨生铁生产计划。曾在农业方面名列前茅的河南省不甘示弱，马上宣布仅9月15日一天，

全省产铁 11894 吨，日产生铁千吨以上的县出现了 8 个，其中禹县日产生铁高达 4396 吨。9 月 29 日，是中央确定的放“卫星”的日子，全国日产钢近 6 万吨，铁近 30 万吨，出现了 9 个日产生铁超过万吨的省，73 个日产生铁超过万吨的县，以及两个日产 5000 吨钢、一个日产 4000 吨钢的省。10 月 15 日到 21 日是中央确定的高产周，10 月 26 日《人民日报》称：一周内钢的平均日产量比以前 14 天的平均产量增加了 85%，其中钢的最高日产量曾达到 10 万多吨。在此期间，毫无钢铁工业基础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后来居上，连放几颗特大卫星，环江县产生铁 6300 吨，忻城县日产煤炭 67 万多吨，鹿寨县日产生铁竟然高达 20 万吨。

这种土法炼钢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当时就有人看到了。但多数人并没有指出它的问题，因为当时的形势使人们很难讲真话。但也有人明确反对土法炼钢。例如，这年 10 月中央召开电话会议，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尖锐地指出：土高炉炼铁是弄虚作假，白白浪费煤炭，建议降低钢产量指标，停止弄虚作假。陶铸在大跃进运动中多数情况下思想激进，但在重要时刻敢讲真话。可惜这种声音当时太微弱，不能被中央采纳。

11. 数字是完成了，但东西并没有那么多

全国范围内经过 4 个月的突击蛮干，加上相当程度的虚报浮夸，钢铁产量迅速增加。12 月 19 日，《人民日报》发表消息：《一年间钢产加番，在世界钢铁史上写下了辉煌一章，1070 万吨钢——党的伟大号召胜利实现》。到年底，则宣布完成钢产量 1108 万吨，生铁 1369 万吨，超额完成了 1958 年钢产量翻番的任务。

1958 年下半年的全民大炼钢铁，从表面数字看，是完成了

北戴河会议确定的钢产量指标翻番的任务，似乎保住了“大跃进”的面子；但在实效方面，从短期内的情况看，已经暴露出它对于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危害，其代价是十分惨重的。

强调群众运动作用，强迫追求产量，从而忽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在大型企业尤其突出。由于忽视大型企业管理的特点，领导只是号召职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做“共产主义精神”，而不尊重科学技术，否定遵守规章制度的必要性，不按经济规律办事，造成许多恶果。

全国“小土群”炼铁中，到底搞了多少小土炉？据《薛暮桥回忆录》记载，1959 年他作过统计：一股风建成了 200 万个土高炉。当然，“小土群”的效果奇差，后果严重。1958 年武昌会议前夕，就全民炼钢发生的问题，毛泽东让王鹤寿写一个报告，经毛泽东批示：“此件很好”，作为八届六中全会文件印发。王鹤寿在报告中肯定这场“政治挂帅”、“真正的革命”的全国办钢铁路线时，也谈到“小土群”存在的问题：就是有不少地方，在放高产卫星的时候，所生产出的生铁，有很大一部分是烧结铁，而不是可以用于平炉、转炉炼钢的生铁。钢的生产目前要过的关有两个：一是洋炉（平炉、转炉）用土铁炼钢的技术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有时虽然能炼出钢来，但是转炉不能维持正常的寿命，影响正常的生产。另一个是土法炼钢如何提高。大部分的土钢，只能锻打成不大的体积，而不能铸成较大的钢锭，再由钢锭轧成各种钢材，因此就限制了它的用途范围。

1959 年 8 月 26 日，周恩来在《关于调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和进一步开展节约运动的报告》中，曾讲到土钢、土铁在钢铁产品中的比重：1958 年 1108 万吨钢中，合格的好钢只有 800 万吨；在 1369 万吨生铁中，土铁占 416 万吨。这些土钢、土铁质量差，含硫量超过冶金部的规定，很难加工使用，有些完全是废钢、废铁。用小高炉和土高炉炼铁、炼钢，成本费用高，1 吨

生铁的成本费，大高炉是100元，小高炉是345元，而1吨生铁的国家调拨价只有150元。据国家统计局估算，1958年土法炼钢、炼铁的亏损达50亿元，国家花费了大量补贴。为生产这些土钢、土铁，又过量开采矿石，砍掉大量树林，砸掉大量铁锅铁器，破坏了矿产和森林资源，影响了人民生活。直到1959年春，才停止了这种土法炼铁的“小土群”运动。

为保证实现钢产量翻番指标，钢铁工业本身的基本建设规模增加了，与钢铁工业有关的煤、电、运输等部门的建设项目同样增加，1958年施工的大中型项目由原计划的1135个猛增到1587个，比1957年增加595个。基建投资由1957年的138亿元增加到279.06亿元，增加84.5%，积累率由1957年的24.9%增加到33.9%。这是当时国力难以承受的。同时，由于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全民大办工业的需要，使全国职工总人数由1957年底的2451万人猛增到4352万人，超过了国民经济特别是农业负担能力，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支出和商品粮销售量，扩大了社会购买力，加剧了社会商品的供需矛盾。

由于大炼钢铁，钢铁“元帅升帐”，生产指标脱离实际，急于求成，忽视经济效益，引起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首先是工农比例失调。1957年和1958年国家用于农业投资的金额分别为12.7亿元和28亿元，在经济建设中所占比例分别为9.2%和10.5%，但是，由于工业发展过急，影响了农业的发展。一方面在大办工业、大炼钢铁过程中调用了农村中大量青壮劳力，参加农业劳动的多为妇女老弱等半劳动力。农业与工业劳动者的比例由上年的13.8:1下降到3.5:1。8～9月正值秋收季节，为完成钢铁翻番任务，约有9000万人上山采矿炼铁，不少庄稼无人收割，不少地区，粮食、棉花因无人收割而烂在地里，以至当年丰产未能丰收。根据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保守看法，1958年农作物估计有10%未收回。其次是工业内部与工交之间比例失调。

在工业内部，一方面重工业内部比例失调，铁、煤、有色金属的供给满足不了钢的高指标需要，来不及新建大企业，就逼着老企业拚命增产，大量兴办耗料大、质量差的小企业，造成资源被强化开采；设备因超负荷、带病运转而大量损坏；又因煤铁等原材料品位、质量下降，需要更大的开采量，加剧了供需矛盾，竭泽而渔，造成巨大损失和浪费。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每新增1吨炼铁能力，相应要增加4吨铁矿开采能力、1吨炼焦能力；而1958年每新增1吨炼铁能力，只新增1.5吨铁矿开采能力和0.3吨炼焦能力。工业内部比例失调还表现为轻重工业比例失调。强调工业生产“以钢为纲”，其他工业“停车让路”，调配给轻工业部门的原料和燃料大大减少，设备得不到应有供应，大量职工被调到钢铁生产大军。如8~9月份，东北三省电力不足，减去轻工业电力负荷的2/3，使纸张减产10万吨左右。工业与交通运输的比例失调表现为交通运输跟不上工业的高速发展。1958年交通运输货运量作很大努力才增长40%，而同期煤炭增长107.7%，生铁增长130.5%，因而到了年底，仍有大量煤炭、矿石运不出去。以铁路为例，有三四千万吨货物滞留在产地。在1958年的货运量中，正常的运输能力只占80%，其余20%靠全民搞运输，特别是发动农民搞突击才达到的，“以钢为纲”没有带动全局，却拖垮了其他行业。

第四章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

1. 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

1958年下半年，紧跟着大跃进高潮，在全国农村又出现了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北戴河会议后，一个月之内，迅速地实现了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化，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几乎全部转为“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

大办人民公社，从一开始就与向共产主义过渡联系在一起。

对共产主义的向往，是多少代共产党人的理想。当年马克思不愿为未来共产主义描绘完整的蓝图。然而，在《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他还是简约地谈到了共产主义的某些特征，诸如没有商品、没有货币、没有国家，消灭分工，消灭差别，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物质极大丰富等等。

马克思简约描绘过的这种尽善尽美的社会制度，成为无数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终极目标。讨论何时进入共产主义，多少年来一直是共产党领袖们最热心的话题。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列宁曾经设想，共产主义就等于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他估计，通过电气化道路，有可能在10年或20年的时间里，也就是大约在1930年至1940年的这段时间里，使俄国走向共产主义。1920年10月2日，他在俄国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现在是15岁的这一代人，就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也要亲身建设这个社会。再过一二十年就会生活在共产主

义社会里。16年以后，也就是在1936年，列宁的继承者斯大林向世人宣布苏联社会主义已经建成。1938年，他又宣布：整个苏联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日子将是在5年之内，即1943年以前。

后来的历史证明，列宁与斯大林对共产主义来临的日子都估计的过早了。但直到50年代，苏共中央的领袖们仍认为共产主义并不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1952年，斯大林又宣布，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已经完成，现在已处在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期。到1957年11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上提出，在今后15年内苏联赶上和超过美国。与此同时，又在内部确定：从1959年算起，用12年时间达到共产主义。1959年1月，苏联宣称进入了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时期。

50年代后期，中、苏两党在许多方面已经产生了严重分歧，但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两党的观念却惊人的相似。

中国在1953年公布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毛泽东就原则地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55年3月，在全国党代表会议上，他又把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具体化为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10月11日，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他把中国未来的发展进程同赶超美国、过渡到共产主义联系了起来。他讲过，大约50年到70年左右会出现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国。

但直到50年代中期，毛泽东对向共产主义过渡还不是很着急，因为那毕竟是50年到70年左右的事情。而且此时他思想中还没有确定一种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具体途径。

在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认为找到了这种途径，这就是人民公社。于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步伐就大大加快了。

人民公社可以说是毛泽东心仪久之的一个梦，这个梦埋藏在他心中已有几十年时间了。

受欧文、武者小路实笃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新村主义”和康有为《大同书》等的影响，毛泽东早年就与蔡和森等共产主义者一道，进行过建设“新村”的空想社会主义实践。他们计划在岳麓山建设“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崇尚建立一个共同劳动、共同学习、财产公有、平均分配、人格独立的制度。

这个计划的主要内容是：

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新学校之学生渐多，新家庭之创造亦渐多。

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医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

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

他还为学校安排了每日的生活时间表：睡眠8小时，游息4小时，自习4小时，教授4小时，工作4小时。

当年的毛泽东还是一个热血青年，而国家正处在内忧外患之时，他的这种“新村”计划显然无法实现。不久毛泽东投身革命，也就不再提起这个计划。然而，夺取全国政权后，这个“新村”计划似乎又有条件实行了，不过这时，毛泽东要建立的已非几个人的“新村”，而是一个有6亿多人口9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大“新村”，这个“新村”也已改变了名称，它的新名称叫“人民公社”。

2. 小社并大社，人民公社初露端倪

1955年夏秋，围绕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问题，中央农村工

作部部长邓子恢同毛泽东发生了争论。邓子恢主张发展速度适当放慢一些，巩固现有的农业合作社，老区停止一年，新区小发展或适当发展。毛泽东则严厉批评邓子恢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同年10月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以更加猛烈的攻势，发动全会批判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保守思想，并说这是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期间，关于我们党的总路线是不是完全正确这样一个问题的大辩论。

毛泽东批判“小脚女人”，批判农业合作化中的右倾保守思想，直接的后果是人为地大大加速了合作化的进程，更深层的后果是这种急于变革生产关系的思想，成了占统治地位的天经地义的指导思想。

从实践的发展过程来看，小社并大社可以说是搞人民公社的最初预演。

1955年12月，毛泽东主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即提出了搞大农业社的思想。他为《大社的优越性》一文写的按语中指出：现在办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为了易于办成，为了使干部和群众迅速取得经验，二三十户的小社为多。但是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有些地方可以一乡为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个社，当然会有很多地方一乡有几个社的。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全国农村很短的时间里就普遍办起了高级社，而且规模也比较大。例如，安徽有16个社规模在3500户以上，河南千户以上的大社有495个。这就给生产和分配带来不利影响，部分社员开始闹退社、分社。据中央农村工作部1956年12月，向辽宁、浙江、江西、四川、陕西、河南、河北等省了解情况后向中央的汇报：当年秋收分配前后，在一部分农业社

内，出现社员要求退社的情况。退社户，一般占社员户数的1%，多的有5%；思想动荡想退社的户，所占的比例更大一点。浙江省的宁波专区，已退社的约占社员户数的5%；想退社的占20%左右。广东全省已退社的约7万户，占社员户数1%，已有102个社垮了台。辽宁省在丰收之年也发生了社员退社的现象。

1957年，中共中央针对合作化运动过急过粗、遗留问题较多等情况，对合作社进行了整顿。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发展养猪生产的决定》，针对1954年以后，生猪生产连年下降的情况，提出继续贯彻“私有、私养、公助”方针，给社员分配适当的饲料地，还将生猪收购价格提高13.6%。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民主办社几个事项的通知》，要求各合作社，按时公开财务开支，社队决定问题要同群众商量，干部要参加生产，减少社员负担等。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农业合作社的指示》，内容包括：(1) 整顿干部作风，改善工作方法，提高工作能力；(2) 调整社队的组织，合作社规模过大的、不适当的，可根据群众意见划小，由社自负盈亏；(3) 统筹安排，使社员各得其所；(4) 改善管理，拟定生产规划。文件中强调，要发挥社员集体劳动的积极性，合作社规模大小应照顾技术、经济、居住、历史条件，允许有各种差别而不要千篇一律。现在部分合作社组织规模过大，应根据群众的要求合理调整，或把社划小，或保持原社，下设分社，自负盈亏。以20户左右为宜。而且应长期稳定下来。

这个指示，抓住了当时农业、农村工作的关键，如果照此执行下去，中国农业、农村工作可能是另一番景象。

但是，在毛泽东的督促下，1957年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指示各地执行。这个文件是在批评反冒进的情况下发出的。文件下发后，全国农村又开始大辩论，掀起兴修水利和积肥的高潮，与此同时，地方工业遍

地开花，带来了农村劳动力紧张。一些地方为着尽可能地腾出劳动力用到工农业生产上去，于是出现了简易的公共食堂和托儿所。为了让青年农民学习农业技术，吉林延边、河南登封、湖南浏阳等地办起了“农业大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领导人酝酿了新的农村基层组织结构问题。

1958年1月，毛泽东召开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严厉批评反冒进，认为一反冒进，人民就泄气。这是政治问题，以后永远不许反冒进。当他听说广西出现并社现象时，就说：“可以搞联邦政府，社内有社。”

1958年3月，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认为：中国农业正在迅速地实现农田水利化，并将在几年内逐步实现耕作机械化，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如果规模过小，在生产的组织和发展方面势将发生许多不便。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

这份文件还分析了农田水利建设等对于扩大合作社规模的需要，由此提出把小型农业社合并成一乡几社规模的大型合作社的意见，这一意见的提出，直接促成了1958年上半年部分农村大办大型农业合作社，并且成为1958年夏天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先声。

3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河北省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苦干三年，改变全县自然面貌》的文章，还配发社论，肯定和推荐了徐水通过小社并大社，基本上消灭了水灾和旱灾，从一个工作很平常的县一跃而为先进县的“又快又好的典型”经验。4月12日，《人民日报》又在头版头条，以《联乡并社发展生产力》为题，报道了福建闽候县在3月间，把城门、下洋、龙江3个乡合并为一个乡，把23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为1个社的消息，并以《编辑的话》的形式，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

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的主要观点予以发表。随后，小社并大社工作在各地普遍展开。5月间，辽宁省将9272个社合并为1461个社，基本上是一乡一社，平均每社约2000户左右，最大的为18000多户；河南省由38286个社合并为2700个社，平均每社4000户左右；河南省嵖岈山卫星社是4月份由4个乡27个社合并起来的，有9369户，43263人；河南省信阳地区于7月间，将5376个小社合并为208个大社，平均每社8000户；河北省徐水县商庄农业社由40个小社合并为218个社，平均每社1600户。

农业社不仅规模扩大了，职能也在扩大。在1958年1月的杭州会议、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地方工业的产值在三年、五年或十年超过农业产值的意见。国家经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起草了《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第一次正式提出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工业的问题。《意见》于3月23日在成都会议通过，并于4月5日经政治局会议批准，作为中央文件正式下达。农业社办工业，就已突破了农业生产合作这个名称的限制，实际上就提出了给农村主要的合作经济组织另找名称的问题。

3. 中共高层领导人纷纷“吹共产主义公社”

“大跃进”以不可阻挡之势迅猛发展。一时间，农业方面浮夸成风，似乎粮食会多得吃不完。农业生产开始放高产“卫星”，工业方面也开始浮夸，追求高指标，似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真是处于“一天等于20年”的形势下，人们不能不关心如何由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1958年2月至3月间，毛泽东和陈伯达谈过乡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的雏形，什么都管，工农商学兵。

“公社”一词，显然是从巴黎公社引申过来的，它一开始就具有共产主义的色彩。最早议论“公社”的不只毛泽东一个人。

在一年后的庐山会议上，面对着“三面红旗”的重重阻力，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大办钢铁和人民公社化。他说：大办钢铁的“发明权”归“柯老”，即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而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建议之权。”

按照刘少奇的回忆，“公社”一词是“吹”出来的。1959年11月7日，刘少奇回忆说：

公社这个名词，我记得，在这里（郑州火车站），跟吴芝圃同志谈过。在广州开会，在火车上，有我、恩来、定一、邓力群，我们四个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说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就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要使前一阶段为后一个阶段准备条件，我们搞建设就是这样的，开始搞前一步的时候，就想到下一步，为下一步创造条件。我们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就要为共产主义创造一些顺利条件。还吹空想社会主义，还吹托儿所，集体化，生活集体化，还吹工厂办学校，学校办工厂，半工半读。要邓力群去编空想社会主义，要定一编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下了火车，在这个地方，大概有十几分钟，跟吴芝圃同志说，我们有这样一个想法，你们可以试验一下。他热情很高，采取的办法也很快（吴芝圃插话：那个时候，托儿所也有了，食堂也有了，还不叫公社），工农商学也有了，就是不叫公社。乡社合并是老早就有的。

在广州会议期间，毛泽东和刘少奇谈到几十年后中国的情景时讲到：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

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

回到北京，中宣部长陆定一将毛泽东、刘少奇的谈话内容加以整理发挥，同年 5 月 19 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发言时讲道：

毛泽东主席和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以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超过。我们的教育方针和其他教育事业，也将朝这个目标发展。1958 年 6 月，中宣部编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这时，陆定一发现，恩格斯已经把未来共产主义的基层组织叫作“公社”。在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每一句话都视为金科玉律的时代，可以想象这一发现的价值。陆定一将这一发现推荐给毛泽东，后者又向政治局里的全体成员一再推荐。这一来，大家都相信，“公社”不仅仅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幻觉，而且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结论。

根据现在已经掌握的材料，最早公开宣传人民公社的中共高层领导人，是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

陈伯达从延安时期开始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七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大跃进运动是陈的政治生涯中一个十分活跃的阶段，也是他仕途升迁中的一个重要时期。

1958 年 5 月，中共召开八届五中全会。全会决定创办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任命陈伯达为总编辑。

据陈伯达回忆，虽然决定出版《红旗》是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才作出正式决定，但是筹备工作早就开始了。

创办一个理论刊物，是毛泽东提出的建议。最初，陈伯达并不想办《红旗》这样的理论刊物，他是想办学术性理论刊物。毛泽东不同意陈伯达的办刊设想。这样，陈伯达只得放弃了办学术性理论刊物的意见。

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以后的第五天，即1958年6月1日，《红旗》杂志创刊号便问世了。5月24日，毛泽东就题写《红旗》刊头，致函陈伯达：

伯达同志：

报头写了几张，请审检；如不能用，再试写。

毛泽东很认真地为《红旗》题写刊名，一共写了20多幅，而且每一幅的旁边还都对文字的特点作出注明。经过陈伯达和编委们细细品评，最后选中了一幅毛泽东注明“这种写法是从红绸舞来的，画红旗”的刊头。

陈伯达本来就是个“文化人”，喜欢舞文弄墨，当上《红旗》的总编辑以后，更是经常写些文章在自己管辖的杂志上发表。1958年7月1日出版的第三期《红旗》上，就发表了陈伯达的一篇文章——《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文章赞扬湖北省鄂城县旭光农业社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陈伯达在这里使用了“人民公社”这一名称，这也是中共高层领导人第一次公开宣传人民公社。关于宣传人民公社的事情，陈伯达后来回忆说：

根据当时接触过的一些材料（例如湖北），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办起了工业。

又搞农业，又搞工业，这件事启发我想起恩格斯的一个著名的论点……

我想，既然我们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能够同时又搞农业，又搞工业，而仅署名为“农业生产合作社”，似乎不完全反映这种实在发生的情况，所以，我冒昧在一篇《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短文中，说这“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我原来的设想就是这样。

6月底到7月初，在晋冀鲁豫陕京农业协作会议上，谭震林讲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变革问题。他第一次把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农业社称为“共产主义公社”。他说：农业大丰收，在农村已开始了新的变革，在合作社组织上和合作社的经营管理上、规模上开始了变革，它已经不能按照原来那些方法、那一套制度、那一套形式来发展了，需要有所改变了。像遂平县嵖岈山卫星社已经不是农业合作社，而是“共产主义公社”。

嵖岈山卫星农业社是1958年4月20日由27个高级农业合作社合并而成的。共6566户，30113人。《红旗》杂志常任编辑李友九于当年7月17日到这里来时，已改名为卫星人民公社。8月8日，他在给陈伯达的信中写道：他们这里并大社，原来也只是为了并大一点，好搞建设。到郑州一汇报，谭震林和他们讲了一番“工、农、商、学、兵”办“公社”的道理，回来就叫成公社了。“公社”这个名词，群众还不习惯，有写“共社”的，有写“工社”的。李友九随信给陈寄去《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第二次草稿）》一份，并说明这是他和河南同志“大汇合、大研究”之后写成的。陈伯达收到后，即将《简章》草稿的复制件和李友九的信转报毛泽东。毛泽东当即对《简章》作了修改，批示：“请各同志讨论，似可发到各省、县参考。”

在前面提到的那次农业协作会议上，谭震林还就共产主义社会的好处向人们作了一番描述：

第一，有好的食物，而不仅仅是填饱肚子。每顿有肉、鸡、鱼、蛋，还有更精美的食物，如猴头、燕窝、海味等等，都是按

需供给。

第二，衣服穿着方面，一切要求都可满足，有各种花色和品种的服装，而不是清一色的黑色和蓝色。将来，普通服装仅作为工作服使用，下班后，人们就换上皮服、呢绒和羊毛制服，当人民公社都养了狐狸，那时外套就都是狐皮的了。

第三，房屋都达到现代城市的标准。现代化是什么？人民公社。在屋子的北厢有供暖设备，南厢有空调设备，人们都住在高楼里，不用说，里面有电灯、电话、自来水、无线电和电视。

第四，除了跑步的选手外，旅客和行人都有交通工具，航班通向各个方向，每个省都有飞机场，每个地方都有飞机制造厂的日子也不远了。

第五，每个人都受高等教育，教育已经普及。

这确实是一幅令人激动的画面。谭震林在其中讲到的一些东西，诸如猴头、燕窝等农民可能从未见过，而电视、电话他们也只是在报纸、广播中读到或听到过，而这一切将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这不能不使他们对于未来的社会充满了美好的憧憬。

7月16日，《红旗》第4期又刊载陈伯达“七一”前夕在北京大学的讲演稿《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明确地传达了毛泽东关于一种新的社会基层组织的构想：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织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这篇文章为以后成立的人民公社的性质和特点，定下了基调。

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康生用一句使人过目不忘的“对联”概括了人民公社与共产主义的关系：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

4. 毛泽东表态：合并后的农业社“还是叫人民公社好”

在如火如荼的岁月里，毛泽东再也不能安坐北京，他要亲赴乡间，去体察农村的实际情况。每逢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总是喜欢到外地去。

8月4日，毛泽东离京南下。第一站，他来到河北省徐水县。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河北省徐水县曾经是一颗光芒四射的耀眼明星。

徐水县当时有人口31万，有土地79万亩。在历史上，徐水是个多旱、涝灾害的县。县境内有漕河、萍河等三条小河流由西向东流入海河。雨水大时，东部闹水灾；雨水少时，西部闹旱灾。1942年发生旱灾，大部分禾苗枯死。1954年遭水灾，粮食亩产110斤。1957年时粮食亩产仅为200斤。据统计，1954年至1957年4年间，遭灾面积共达87万亩，共减产粮食1.7亿斤，从全国各地调入粮食9260万斤。因而群众对根治水旱灾害有强烈愿望。

根据中央大搞水利化建设的精神，徐水县委积极贯彻“蓄、小、群”为主的方针，在1957年冬和1958年春，掀起水利化建设高潮，把全县10多万个主要劳动力组织起来，打破乡社界限，不分受益情况，实行全县水利建设大联合。还要求工商文教各部门打破常规，全力以赴为水利化建设服务。根据中央指示，县委组织全县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反对本位主义、分散主义和阻碍大跃进的保守思想，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搞群众

自我教育，把“整风作为一切工作的纲”，贯穿到水利化建设的全过程。结果，经过三个月苦战，修建山区中小型水库17座，“葡萄串”、“满天星”式的平原水库173座，还挖了自流泉，打了不少机井，即认为实现了水利化。

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之后，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到保定地区视察，听取了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的汇报，肯定了徐水县水利化建设的成绩和经验，他还在河北省委召开的三级干部大会上亲自作报告，对徐水县给予大力表彰。从此，徐水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名声越来越响。

3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张国忠的文章——《苦战三月，改变全县自然面貌》，同时配发《徐水创造了好经验》的社论。文章宣称：徐水在一个冬春就基本上改变了全县的自然面貌，1958年要把粮食产量提高一倍，达到并超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规定的亩产400斤指标，达到500斤。社论肯定了徐水县委在组织上加强第一线，拧成一股绳的措施，肯定了做什么辩论什么等发动群众的做法，并指出，徐水经验可能发展成为一套领导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完整经验。社论称赞徐水县仅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基本上消灭了水灾和旱灾，从一个工作很平常的县一跃而为先进县。去冬以来，全国各地都在组织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各地都出现了一批把事情办得又快又好的典型，徐水县就是在全县规模又快又好地组织全面大跃进的一个好榜样。

谭震林离开保定不久，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兼国务院农办副主任陈正人奉命到徐水总结水利建设的经验。3月14日，陈正人写了一份关于河北省徐水县实现农田水利化情况的报告，送中央各负责人。

报告中介绍了徐水县委在领导兴修水利高潮中的一些经验。这些经验是：在群众高潮面前，强调“思想大解放”，只要依靠

群众，什么事情都能办到，即使今天不能办到，明天也一定能够办到；作风战斗化，说做就做，坚持到底；找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强调加强第一线，一切工作深入现场；坚持个人负责与集体领导相结合；为了统一领导，努力使中心任务与各部门工作互相结合，“一切为中心，拧成一股绳”；立场、态度坚定。报告中还说：徐水县的经验，使我体会到，对于社会主义的群众高潮，必须有足够的估计。

陈正人在报告中还举了许多例子：有一个乡，由480个妇女三天三夜奋战，修成一座蓄水13000立方米的“妇女水库”；700多个学生和40多个教员，只花了一天时间修成了蓄水15000立方米的“红领巾水库”；“夫妻窑”、“姐妹窑”、“父子窑”、“母子井”也到处出现。他认为，徐水不仅水利方面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其他各项工作也都有大发展。养猪迅速由3万头增加到19万头，1958年准备发展到40万头，达到每2亩地1头猪，平均每1人1头猪。当然，他们的工作不是没有遇到挫折，也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比如去冬发展养猪，因从南方买小猪到北方，没有经验死了两万头。县委一个工作人员就把大字报贴在办公室门口，标题是《大喊救命》，要县委收兵，可是县委绝不畏缩，坚持发展方针。一个水利科长，对水利高潮采取消极反对态度，他们及时地展开了批判，后来发现他是个右派，经过揭露，有力地推动了水利化建设高潮。

陈正人的报告送到中央后，很快就被转到正在主持中央成都会议的毛泽东手中。就在陈正人这份报告上报中央的前一天，即3月13日，在成都会议上，谭震林也上交了由他主持起草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水利建设初步安排》的报告。这两份报告，一个从微观上手，一个从宏观上着眼。3月21日，毛泽东在看过陈正人的报告后，写出一段批示：“此件连同谭震林的报告付讨论。徐水县的经验普遍推广。”

3月28日，河北省委向中央正式报告了徐水县委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运动的领导经验。29日，又以文件的形式，将徐水经验印发全省各地、市、县。

4月17日，《人民日报》以突出篇幅全文刊登了《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徐水县委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领导经验的总结》，同时有上千字的《内容提要》，《总结》中这样介绍徐水：前人不敢想的事，我们现在做到了！白天赶太阳，夜晚追月亮，黑夜当白日，一天当两天。思想不冻地不冻，心硬地就软，心软地就硬。《内容提要》认为，徐水县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的主要经验，首先，抓政治思想工作；其次，加强第一线，指挥准确及时；第三，通过整风，批判了各部门干部中的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和单纯的业务观点，把各部门的力量拧在一起；第四，正确地解决了重点工作和各项工作之间的关系；第五，采取试验、参观、推广先进经验和评比竞赛等一系列的办法，使生产高潮一个接着一个，促进先进经验遍地开花。

自从毛泽东对陈正人报告作出批示之后，徐水的“创造发明”接踵而至。7月7日，县委发出《关于改革劳动组织和家务劳动普遍实行劳动大协作的指示》，基本的要求是“四化”，即行动军事化，田间管理工厂化，思想共产主义化，领导方法群众化。“四化”的核心是行动军事化。张国忠指出：要做到全民皆兵，思想行动一致；要以党的组织为核心，把全民团结在党的周围，充分发挥党员、团员和民兵的作用。乡、社、队都要实行军事化的编制，乡要建立社会主义跃进兵团，设总指挥（司令员）、政委、后勤部主任等职，由书记、乡长出任；社要建立营、连、排的组织，每个排要有政治干事，负责掌握思想情况和组织辩论；每个村为一个营或一个连。乡要划分若干战区，乡党委分片包干。使这一军事组织真正成为坚强的农业社会主义跃进兵团。

几天之间，全县打破了地界，建立了93个团、299个营、1099个连、3365个排。有的乡还根据劳动力的强弱和年龄的大小，组成“青年火箭排”、“壮年跃进排”、“妇女突击排”、“少年先锋排”。上下工要列队，并按口令行进，开工有战前动员，收工有总结评比，从而实现了统一调配劳动力的大协作。同时，社社建立了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幸福院、缝纫厂，促成了家务劳动的集体化和社会化。县委把公共食堂作为共产主义的萌芽，普遍推广，共办食堂1693个，全县在食堂吃饭的社员达225639人，占全县人口的70.5%。

一时间，徐水县成了一个大兵营。

当此之时，8月4日徐水迎来了自己的盛大节日。毛泽东视察来了！

为了迎接毛泽东，徐水县委做了充分准备：把大部分劳力、车辆集中在铁路两旁和计划参观的地方；下面按军事编制明确连、排、班负责人；路两旁的庄稼地不准有杂草，地里有人就得有红旗。县委一些“持不同政见者”，被打发到偏远的地方，不准回城。

毛泽东来到徐水县南梨园乡大寺各庄农业社，视察了粮食加工厂和供销部、医院、猪场、缝纫厂等，参观了幼儿园和老人“幸福院”，还察看了食堂、细菌肥料厂、铁工厂和农作物的生长情况。

在参观的时候，张国忠和农业社主任等人以及省、地负责人一直陪同着毛泽东，他们之间的对话随即在《人民日报》发表。

张国忠介绍说，当年全县夏秋两季共计划要拿到12亿斤粮食，平均亩产2000斤。主要是山药高产，全县共种了春夏山药35万亩。

毛泽东听过以后，不觉睁大了眼睛，笑嘻嘻地看了看屋里的人，说道：要收那么多粮食啊！你们夏收才拿到9000多万斤粮

食，秋季要收 11 亿斤呀！你们全县 31 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

大家一时都被毛泽东问住了，后来，张国忠笑答：我们粮食多了换机器。

毛泽东说：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粮食呀！

大寺各庄农业社主任李江生说：我们拿山药造酒精。

毛泽东说：那就得每一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酒精？

毛泽东呵呵笑着，左右环顾地看看大家。大家不觉都跟着笑了起来。张国忠也笑道：我们只是光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

毛泽东说：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哩！

很多人都在私下里互相小声说着：毛泽东主席看问题看得多远，看得多周到啊！

毛泽东又笑着说道：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后来，毛泽东又补充道：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吗？

在食堂问题上，毛泽东问：办食堂老年人同意不同意？

张国忠说：刚开始有思想不通的，说吃了大锅饭。

毛泽东说：你们这不是大锅饭吗？

张国忠答：我们现在正进行共产主义教育，除个人生活用品外，关于房屋、树木、羊群、自留地、大车、牲畜等等，群众都要求转为全民所有和办国营企业。农村没有小商人，城市也没有商人。社内还有个专管居屋建筑和分配的组织。我们讲，不共产，几千年是贫穷落后、阶级压迫；一共产，就大跃进，拆了旧房搞新的，因此大家都说共产好。

看到地里做活的妇女很多，毛泽东说：这妇女劳力解放得很彻底哩！

陪同视察的保定地委书记李悦农说：这里的妇女都脱离了炕台、锅台、磨台、碾台。

毛泽东说：是呀，人人都吃食堂，社社都办幼儿园，全县是11万多劳力，抽出4万多搞水利、打机井、办工业，只有7万多人搞农业吗？随后，他对省委书记处书记解学恭和副省长张明河说：他们这又解放妇女劳力，又搞军事化，全县农业社搞了90多个团，两百多个营。他们就是这个办法哩！毛泽东对这里军事化表示很满意，于是问李悦农：徐水的军事化，你们推广了没有？他还对大家说：世界上的事情是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得很多。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斤！

临离开徐水时，毛泽东说：下边真好，出的东西真多，北京就不出什么东西。他问张国忠：北京出什么？

张国忠答：北京出政治领导，出党的总路线。

毛泽东点了点头。

在徐水视察时，毛泽东曾问农业社主任李江生：这里的农业社叫什么名称，李江生回答说：叫第八瀑河农庄。毛泽东说：还是叫人民公社好。

离开徐水后，毛泽东的视察还在继续。他来到了河北省安国县。毛泽东对保定地委书记李悦农说：是不是一乡一社，是不是搞万人公社。说在平原地区8000人搞一个公社不要紧，社里工农商学兵都有。要搞全民武装，给民兵发枪。还说，县也要并大一点，并到几十万人的大县。

8月6日下午，毛泽东到达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乡。这个乡在全国第一个挂起了“人民公社”的牌子，那是在毛泽东到达前两天的事情。

毛泽东站在公社办公室门口，看到8月4日刚刚挂出来的公社的牌子，随即说：人民公社名字好，包括工农商学兵。它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

毛泽东详细地询问了这个公社的情况，参观了托儿所、幸福院、公共食堂、面粉加工厂、滚珠轴承厂。毛泽东对这个最早建立的人民公社大加赞扬。在视察公社棉田时，对陪同视察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吴芝圃说：吴书记，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



1958年8月上中旬，毛泽东视察河北、河南、山东、天津等地农村，沿途多次讲“人民公社好”。图为毛泽东在河南省长葛县农村视察。

吴芝圃说：有这么一个社就不愁没有更多这样的社。

毛泽东点点头说道：对，有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社。

在七里营人民公社，当省委负责人汇报说，人民公社是新生事物，有许多好处时，毛泽东欣喜地随口说道：好么，好么，人民公社好。第二天，被跟随采访的记者登报发表了出

去。毛泽东看了报纸，连说“糟糕”，因为毕竟此事还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过。不过，事已如此，毛泽东也只好听其自然，何况从内心深处讲，他对人民公社确实情有独钟。

毛泽东在河南视察了新乡、长葛、高丘三县农村。之后，8月9日，他又到山东省视察。当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汇报说，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泽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毛泽东视察冀、豫、鲁三省后，《人民日报》将“人民公社好”5个字用大号字登在显著位置，中央领导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尽人皆知，随后就出现了各地农村积极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毛泽东在回京途中，余兴未消。专列临时停在丰台火车站，毛泽东又视察了丰台区的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那天，毛泽东回到中南海，已是夜间11点了。一路风尘仆仆，毛泽东却毫无倦意。他对卫士长李银桥说：看来，我们这个国家还是有希望的。

5. 中央决定：在徐水进行“共产主义试点”

毛泽东亲临徐水，给这里的干部、群众以无比殊荣和莫大鼓舞。据《人民日报》报道，徐水的人们兴奋地跳起来，兴奋地心神无主地南北跑动。人们欢呼领袖，向领袖伸过手来。8月4日晚7点半，毛泽东离开徐水的当天晚上，徐水县委立即召开全县电话会议，乡乡社社都在电话会议上自觉向党和毛泽东宣誓，保证今年亩产超过2000斤，保证工业的百花也要在全县处处争奇斗艳，保证整风和思想也一定要丰收，保证各个战线上都有无数卫星上天，要把天上的星星都遮没。

当夜，大寺各庄成立了人民公社，为了纪念领袖视察，定名为徐水东方红八四人民公社。并宣布一切房子、树木、猪、羊、

大车、牲畜全部归集体。社员实行了工资制。公社党委还连夜修订跃进指标，粮食产量原计划亩产3800斤提高到5000斤。

第二天，县委又召开全县共产主义的思想文化跃进大会，张国忠作向共产主义进军的讲话。他说：向共产主义进军，北京有共产主义的思想，我们党领导群众多年，就是要为建设共产主义，使人民进入生活、劳动的幸福乐园，消灭贫困、压迫和阶级。我们这一代，在毛泽东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正在向幸福的乐园前进。今天是共产主义文化跃进大会，这是我们要向共产主义迈进，使我们的思想、文化、教育都要提高，向共产主义进军。

讲到建立公社时，他说：现在高级社改为公社，就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组织。把人民的生活、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包括在内。他把共产主义理解为现在就把一切劳动工具和部分生活用品全都共产，说：大车、牲口全要公有，粮食很多，有新房、有胶轮车、机器，哪个是个人的？存款还算自己的，生活用品是自己的。这就叫共产。越共越好，一共就富有，私产是贫苦受罪，粮食不能高产。共好了是2500斤。

毛泽东高度赞扬徐水经验，也引起刘少奇的注意。8月6日，他派陈正人再次来到徐水，给张国忠带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央要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陈正人此次到徐水，还带来了两本书，这就是：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和康有为的《大同书》。前一本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后一本则是康有为的名著。把这两本书同时带给正在向“共产主义”迈进的徐水人，实在是件让今天的人们感到哭笑不得的事情。好在当时人们头脑很热，没有什么人冷静地分析其中包含着的讽刺意味。

8月8日，陈正人召集河北省委常委、副省长胡开明，省委秘书长尹哲和保定地委、徐水县乡村干部进行座谈。他说：第二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差不多了，第三个五年计划，就要向共产主义过渡了。过去没有想到跃进这么快，今年钢的产量可搞到

1200 万吨，明年钢产量达 3000 万吨，超过英国。这样就逼我们想问题了，就要搞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试点。刘少奇同志指示：在徐水搞一下试点，搞共产主义，搞工、农、兵、学、商结成一体，在农村、学校、机关都要搞。陈正人提出，要使徐水的发展速度比其他地方走在前头两三年，按照共产主义的标准和要求，对工业、农业、文化、教育和生活搞一个具体规划。他要求大家学习《共产党宣言》和他带来的两本书。

有了中央的意图，有了马克思的著作和康有为的书作为理论指导，徐水县干部们的思想长了翅膀。



河北省徐水县遂城人民公社谢坊生产营的社员们在深翻土地，同时他们还利用生产空隙时间练兵。

由于毛泽东视察时曾鼓励了全民皆兵的军事化措施，赞美了徐水实行军事化以后劳动效率的提高和生产跃进的发展，8 月 13 日，经国家特准，徐水县决定给全民皆兵的公社社员发枪。首先在毛泽东到过的南梨园乡举行发枪典礼。发枪典礼之后，1100 名民兵战士根据命令，肩扛锄头手持枪，跑步奔赴生产战场，两

个半钟头就锄地410亩，追肥96亩，生产效率比发枪前又有所提高，人们处在从来没有过的兴奋状态之中。民兵们在上工以前和下工以后，都雄纠纠地操练一遍；在生产的时候，将枪架在地边，男战士们甚至做着活还要喊“一二三四!”几乎与此同时，他们还将全县248个农业社宣布转为人民公社，各户私有的部分农具、牲畜、房屋、树木等都转为公社所有；生产资料入社折价款的部分也决定取消。为了把现在规模很小的公社合并成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大型的人民公社，徐水县于8月15日将全县20个乡镇并为9个大的乡镇。

为搞好规划，中央、省、地、县共同组成一个有100多人参加的“共产主义试点规划小组”。8月22日，《中共徐水县委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出台。《规划（草案)》提出：我们的任务是，随着生产关系的伟大变革，继续组织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加速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力争生产的高速度发展，为丰衣足食的生活创造充分的物质基础；积极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为群众的高度文化水平创造条件。奋斗目标是：1959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到1963年即进入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

9月1日，《人民日报》向人们透露这样一则信息：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

6. 北戴河会议正式通过了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

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

议，会议议题共有 17 个，关于人民公社问题是其中最具幻想色彩的议题之一。而建立人民公社，又与摸索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途径相联系。

会前，“农林口”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准备了一份题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意见》的文稿。毛泽东对这个文稿很满意，称赞这是提交会议讨论的文件中写得最好的一个。会议开幕当天，毛泽东指示将这份文稿连同陈伯达转送他的《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印发给与会人员。

8 月 17 日至 30 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 5 次讲话，他讲得最多的是人民公社，是向共产主义过渡，是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

8 月 19 日，毛泽东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讲：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是合一的，搞公共食堂，自留地取消，鸡、鸭、屋前屋后的小树还是自己的，这些将来也不存在了。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

8 月 25 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人民公社，有共产主义萌芽。产品十分丰富，粮食、棉花、油料实行共产。

在 8 月 30 日的会议上，毛泽东说：人民公社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大公社人多，几万户，地大物博，综合经营，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人民公社都有。大了，了不起，人多势众。公，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了。看起来只要把章程搞好，全国可能很快。秋冬可能搞得差不多了。当然实行工资制和吃饭不要钱，还可能需要一个过程。二、三、四、五年，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

人民公社，一下出个章程，河南卫星公社 24 条，这是它的宪法。

这个被称之为“公社宪法”的章程，即《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就是前面提到的，是由陈伯达根据毛泽东的意图

组织人搞出来的。这个章程的第 4 条规定：各个农业合作社并为公社，根据共产主义大协作精神，应该将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原来的债务，除了用于当年生产周转的应当各自清理外，其余都转归为公社负责偿还。

这份简章的第 5 条规定：社员转入公社，应该交出全部自留地，并且将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社公有，但可以留下少有的家畜和家禽，仍归个人所有。社员私有的牲畜、林木为全社公有，应该折价为本人投资。

第 13 条规定：盈亏由社统一负责。生产队是组织劳动的基本单位。

毛泽东对这个章程很热心。他说：嵖岈山公社章程，《红旗》杂志要登出来，各地方不一定都照此办，可以创造各种形式，要好好吹一下，一个省十来个人吹。河北省刘子厚同志，找了十来个人吹共产主义思想作风，很有劲，你们回去也这样吹一下。

8 月 23 日，会议讨论农村工作。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大家都同意在农村办人民公社。29 日，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决议》认为：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很可能不久就会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一个发展人民公社的高潮，且有不可阻挡之势。因此，在目前形势下，建设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

关于人民公社的性质，《决议》一方面决定：人民公社建成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但同时又认为，这个过渡时间不会太长。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同时还认为，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

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

《决议》还预言：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8月29日，即通过建立人民公社决议的同一天，北戴河会议还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指示》，要求充分发扬“拔白旗、插红旗”的共产主义风格，就农业社如何分配和是否建立人民公社问题进行鸣放辩论，引导农民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来解决这两个问题。

这一天，毛泽东还在北戴河会议上宣布了中央的一项涉及农村工作的人事调整：今后农村工作由谭震林负责。而在此之前，这项工作是由国务院分管农村工作的副总理邓子恢负责的。

7．“一大二公”，“政社合一”，一哄而起

9月1日，由陈伯达主持的《红旗》杂志在第7期发表《迎接人民公社化高潮》的社论和嵖岈山卫星公社简章（草稿）。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从“卫星”公社简章看如何办公社》，赞扬嵖岈山卫星公社在若干方面突破了集体所有制的框框，取消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某些最后残余。

9月10日，北戴河会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公开发表。《人民日报》同日发表社论《先把人民公社的架子搭起来》。11日，《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指示》也公开发表。全国范围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迅速来临。

徐水县仍然走在最前面，北戴河会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传达后，徐水县于9月15日就成立了“徐水县人民总公社”（后改称徐水人民公社），实行县级政社合一，一级核算，将分配

权控制在总社。

在分配方式上，徐水县还实行了供给制。徐水县委认为，全县的农业社都已转为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多种经济配合的全县范围的人民公社，已由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的改变，生产水平的提高以及广大工农群众共产主义思想觉悟提高的新形势，已不适应继续采取记工分红、工资制等按劳取酬的分配制度，而需要采取一种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分配制度。于是在省委、地委的帮助下，9月20日，徐水县《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行草案》也出台了。《试行草案》要求，所有的公社社员都要尽自己的能力参加公社劳动，每个人的吃饭、穿衣及主要生活必需品的需要，由公社有限制的、按照工农商兵大体平等的标准计划供应，连洗澡、理发、看戏、看电影等15项都由公社统一包起来统称为“十五包”。为了解决男女老幼之间不同的复杂需要，还补发一定数量货币的津贴。文件规定了实行供给制的范围，包括农民、工人、干部、职员（包括教员、商业人员）及一切在徐水工作的人员。这个方案还分别对伙食、服务日用品、津贴费和卫生医疗文娱等方面的供给标准，作了具体规定，在每一项中都对农民、工人和干部规定了不同的标准。以津贴费为例，农民的津贴费，根据劳动态度、技术高低、劳力强弱分三等，每月一等的3元，二等2元，三等1元，每季评定一次。工人则分为七等，最低的一等1元，最高的七等16元。干部则分为四等，县级16元，科局级12元，一般干部及教员8元，勤杂人员6元。这个供给制是徐水县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核心。

《试行草案》公布后，当地人举行了游行，大家抬着“庆贺全民实行供给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红匾，敲锣打鼓，高喊“拥护供给制”、“以实际行动加速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口号。

以省为单位来说，河南省走在全国的前面。到8月底，河南

全省已经人民公社化了，在原有38473个农业社、平均每社260户的基础上，建成大型人民公社1378个，平均每社7200多户，入社农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99.8%。

据中共中央农村部9月底的统计：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西藏除外）共建人民公社23397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90.4%，其中有12个省、市、自治区达到100%，10个省、区达85%以上，4个省区在国庆节前基本实现公社化，云南一省计划10月底完成。到10月底，全国原有的74万多个农业社改办为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人民公社的农户1.2亿多户，占总农户的99%以上。

人民公社的特点，用毛泽东的话说，可以概括为："一大二公"、"政社合一"。

人民公社的"大"，主要是在社的规模上。

在人民公社化前，全国有74000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每社平均约有170户，2000多亩土地和350个左右的劳动力。人民公社化以后，则变成了26500个人民公社，每社平均约有5000户，60000多亩土地和10000个左右的劳动力。农业生产合作社，基本上是一村一庄，一乡数社；人民公社，则变成了一乡一社，甚至数乡一社，规模扩大了10倍以至几十倍之多。根据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统计，在11个省、市、区7589个人民公社中，5000户以下的5287个；5000到10000户的1718个；10000至20000户的533个；20000户以上的51个。河南、吉林等13个省，甚至还建立起了94个县人民公社或县联社。

人民公社的"公"，主要表现在所有制和分配两个方面。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及其他公共财产全部转归人民公社所有，实行全社统一核算；社员原来经营的自留地以及个人拥有的林木、牲畜等财产，被收归人民公社经营和转为人民公社所有，消除了生产资料方面的"私有制的残

余”；国家把粮食、商业、财政、银行等部门在农村的基层机构下放给人民公社管理经营，使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中增加了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份。

这实际上也就是“共产风”在农村的主要表现。把经济条件不同的社拉到一起统一核算，就是穷社共了富社的产；消灭所谓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残余，就是集体共了个人的产；把全民所有制的部分企业下放给人民公社，就是公社共了国家的产。

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的基本是多劳多得的按劳分配制，而人民公社，除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实行按劳分配制度外，已在相当程度上实行了以供给制为主要特点的所谓按需分配制度。当时，人民公社普遍实行的是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根据人民公社不同经济条件，供给制主要有粮食供给制、伙食供给制和生活基本需要供给制三种形式。其在社员的收入中分别占50%、60%和80%；工资制是在供给制之外，按照多劳多得的原则支付给社员一定数额的货币，其在社员的收入中分别占50%、40%和20%。实行最为普遍的是吃饭不要钱的粮食供给制 和伙食供给制。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民公社实行“七包”或“十包”的生活基本需要供给制。

所谓“七包”，是对人民公社全体人员的吃饭、穿衣、居住、生育、教育、看病、婚丧等生活需要部分，均由公社供给。所谓“十包”，就是除上述“七包”外，还包烤火、理发、看电影看戏等生活费用。

在管理方面，人民公社确立了政社合一，分级管理的体制。

在人民公社化之前，中国农村实行的是乡社分立的管理体制，乡是基层政权，社是农业经济组织。而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广大农村普遍确立了政社合一、分级管理的体制。人民公社既是一种经济组织，也是一级政权机构。它不但负责全社的农业生产，而且还对工、商、学、兵等统一管理。在人民公社内部，

将公社划分为若干个生产大队，生产大队又划分为若干个生产小队，实行三级管理。公社统管全社的生产安排、劳力调配、物资调拨和产品分配，生产大队负责生产管理和部分经济核算，生产小队则只是一个具体组织生产的基本单位。此外，人民公社的“创造”还不止这些，它还有一套类似军营化的组织和生活，即实行了所谓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

为了便于集中、调动劳动力投入各种“大办”，为了培养社员的“集体主义思想”，在大办人民公社的过程中，各地普遍实行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所谓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就是把人民公社的男女劳力，全部编成各种军事组织，实行统一的军事指挥，在各种“大办”中像参加战斗那样进行部署、调动。所谓生活集体化，就是大办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幸福院等公共事业，把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生活改变为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生活方式。当时，各地的人民公社普遍建立了以民兵为主体的劳动大军，办起了以公共食堂为主要形式的公共事业。据统计，仅到9月底为止，山西省就建立起一支429万多人的劳动大军。甘肃、四川、广西、云南等省区也都按照冶炼钢铁、兴修水利、农业生产、筑路运输等方面组织了很多“野战兵团”。河南、湖南、河北、山东等11个省区办起了145万多个公共食堂，126万多个托儿组织。此外，各地公社还普遍建立了粮食加工、缝衣洗衣等组织。

8. 在极度热情的气氛中，吃集体伙食也成了“共产主义”的象征

在中国农村，农民们在农忙时一向有集体吃饭的习惯。互助

组时期，为了早出工，出工齐，多做活，通常实行吃“转转饭”，也就是在张家干活就在张家吃饭，在李家干活就吃李家饭。伙食费用或从换工的报酬中扣除，或由就食者凑米凑菜在一起举炊。

到了合作化时期，特别是高级社以后，由于公有程度有了进一步提高，生产规模也扩大了。农忙季节劳动力紧张，于是便实行“吃集体伙食”，“吃劳动饭”，即出工劳力在一起吃饭。这样慢慢演化为“农忙食堂”，但不是常年性的，仅在农忙时开饭十几天或几十天不等。

大跃进开始后，农忙食堂最初是作为扩大生产力的重要方式而得到推广的。例如湖南省桂东县群强社为解决劳力不足问题，提出搭伙煮饭的办法。结果这个办法不径而走，不到一个月就普及了好几个乡。乡领导要求县委表态，终于得到了支持，于是便在全县范围内推广了起来。

这时的农忙食堂还基本上因地制宜，形式多种多样。大体上有三种类型：一是自愿结合，统一煮饭，各自备菜；二是集体煮，按时分开吃；三是食堂制，即粮菜入伙，集体吃大灶。一般说来，农民比较喜欢第一种形式，因为有较大的自由，吃多吃少自己掌握，又可以自我调剂，吃到可口饭菜。桂东县委曾撰文总结经验，肯定了农忙食堂的三大优点：一是提高出勤率和劳动效率。以群强农业社参加集体饭劳力占98%的情况为例，在未实行集体煮饭前，经常出工的占70%；集体煮饭后，能达到97%；大大提高了出勤率，改变了早上不愿意出工，中午、下午早收工的现象，同时还节省燃料。二是增强计划用粮。据统计，一乡全年可节省粮食一万斤。三是增强了社员的集体主义观念，逐步养成农村中新的社会风气。

农民根据农活安排，在农忙时节自愿组织起来，集体做饭吃饭，本来是中国小农经济分散劳动中，尤其是共产党提倡互助合

作过程中，行之有效的一种传统，不过是一种自愿的暂时性的吃饭方式而已，并不包含某种政治意义，更称不上代表了什么方向。可是在大跃进和公社化的大潮中，人们却对那些带有“集体”性质的事物特别敏感，并且习惯于制造声势加以过分宣传。

当然事情也有另一面，原来的农忙食堂，只同生产需要相联系，并没有正式固定的房屋炉灶，也没有专人管理。但由于“大跃进”尤其是公社化以来，农业大上，各种“大办”，突击性大规模的劳动项目越来越多，军事化的劳动生活随之而起，农忙农闲之分渐渐地没有了，集体煮饭便随之向常年食堂过渡。也就是说，集体性程度的提高，促使农村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不管大家有无思想准备，这种变化却蓦然而来，而且是中国农村的社会生活所未曾出现过的。于是被认为这是向更高一级社会结构的上升，具有无限广阔的前途和生命力。



公共食堂成了“共产主义”的象征而风行一时。图为1958年云南省大姚县的公共食堂一角。

较长期的农忙食堂普遍推广后，立即出现了不少问题，引起群众不满。以江苏省的常熟为例，意见大致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平均主义引起恐慌。由于办食堂的动机已有求公求大的苗头，因而要求农户将存粮一律集中于食堂。这自然引起群众的猜忌与惊慌。特别是余粮户反应更大，认为“共产”了。于是趁还未集中存粮

之时，把原来每天吃两稀一干改为三顿干饭。还有的怕粮食被外人吃光，四处邀请亲戚、朋友一起上门，先敞开肚皮吃几顿。更多的连夜把粮食转移到外村、外地，以免被集中。二是强迫调剂，造成不满。在办食堂之际，有的户闹缺粮，社队领导采取简单办法，在存粮多与少的户之间进行调剂，而且带有强迫性质，类似“吃大户”，自然招来群众反感，也助长了闹缺粮户的依赖思想。三是把食堂改成永久式，占用资金房舍，增加了额外开支，例如有的队要拆旧房盖新房，砌新灶买大锅，这些钱都分摊在各家各户，农民是很有意见的。这些弊端对上是有反映的，当地也曾要求加以纠正，可在人民公社化的大形势下，不仅问题很快就被冲得无影无踪了，而且吃集体伙食还成为了“共产主义”的象征。

9. 开始流行“吃饭不要钱”

当时中共高层领导人中，对公共食堂这类“共产主义”新生事物持积极支持态度的人比较多。

与毛泽东一样，刘少奇也对共产主义抱着炽热的憧憬，对各地出现的托儿所、公共食堂、供给制、家务劳动社会化、妇女解放等新事物抱有极大的热情。

1958 年 6 月 14 日，在同全国妇联党组负责人的谈话中，刘少奇说：八大二次会议上，河南代表、青年团代表都讲了公共食堂问题，江苏省常熟普遍办了农忙食堂，可见大家趋向共产主义。毛泽东主席讲三无，无政府，无国家，无民族，这将来会统统实行。毛泽东主席讲，家庭是历史上产生的现象，也会消灭的；家庭在历史上的作用是生产的单位、教育的单位、消费的单位，它的社会职能有这么多，现在家庭已不能成为物质生产的单

位了，物质生产的作用很小了，只剩下些家庭副业，但家庭还是个消费单位。

刘少奇还说，现在社会上的劳力也有很大浪费。现在家务是各个家庭操作的，家家做饭，家家洗衣，家家带小孩，家家补衣服、做鞋子……农村还有磨面等，在没有想出新的办法之前，只有这么做，但进到共产主义社会，应该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因此，我有这么一种设想：要建立很多的托儿所、公共食堂，办很多的服务性事业。河南有一个农业社，有500多户人家，其中200多户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做饭了，组织起来之后，出工人数增加了三分之一，从前200多人做饭，现在只要40人做饭，而且还吃得饱些、好些，还节省了粮食。最大的好处是200多人做饭，变成40人做饭，同时把煮饭变为集体的事业，变为大生产、大经济。

刘少奇还讲到，不只在农村，城市进而也要把生活组织起来。他说，在上海职工宿舍参观，小孩子多得很，像蚂蚁一样，哇哇叫。家属每天是带孩子、煮饭、洗衣服，情绪不高。问她想什么，她想找点事做，可是没人带孩子、煮饭。

刘少奇最后设想说：组织起来搞，怎么搞法？组织形式是什么？是叫合作社，或者叫服务合作社，或者叫消费合作社。规模稍许搞大一些，互助组已经搞了这么久了，是不是可以提升一下，高级化一下，有那几百家，没有几百家不好办，要有个几百家、千把家。大的食堂，大的洗衣房，有这样大经济生产的单位，不是一家一家生活的，这是比较有点规模的生活单位。至于以什么为单位，乡村以社为生产单位，同时也就是消费单位。城市可以工厂、街道为单位。有了一定规模，就有许多工作做，要推广洗衣、烧饭等先进经验。可以搞很多的事业，像空想社会主义所说的，小孩子多大年龄就到什么地方去，到处有花园，老人有养老院，还有戏院、小学、图书馆、电影院……搞得好，可以

达到这种境地。完全可以设想，将来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15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15年等于三四个美国。再有40年、50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

可见刘少奇当时的心态，对那些“共有”形式是颇为向往的。

刘少奇的这番话是1958年6月中旬讲的，当时对于设想中的未来共产主义的具体组织形式，还没有定型的意见，人民公社的提法还没出现，但大致的设想已经有了，这就是陆定一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那个描述。后来陈伯达在《红旗》杂志发表《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一文，又以毛泽东谈话的形式对此加以肯定，并使之定型化、权威化。

公共食堂一经兴办起来，它的意义又有重要延伸，这就是同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密切联系在一起。《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第15条规定：在粮食生产高度发展，全体社员一致同意的条件下，实行粮食供给制。全体社员，不论家中劳动力多少，都可以按照国家规定的粮食供应标准，按家庭人口得到免费的粮食供应。同时，《简章》也规定了在公社内部实行工资制。粮食供给制和工资合起来，构成了人民公社的理想分配制度。事实上，初期人民公社的架子基本是按嵖岈山这份《简章》搭起来的。

粮食供给制说通俗了，就是“吃饭不要钱”，最早发表这个创见的是柯庆施。1980年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夏衍回忆说，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亲耳听到柯庆施向毛泽东说：明年上海可以试行吃饭不要钱了。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地说：做到吃饭不要钱，在全世界的影响，可比苏联放一颗卫星大得多。

吃饭不要钱的载体就是公共食堂，也即是说粮食不再分配到各家各户，都集中于集体食堂，然后实行“敞开肚皮吃饭”。在大跃进年代，这种做法被崇奉为极高的理想境界。

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几次提到“吃饭不要钱”。他说：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又说：大概 10 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这已把话讲得非常明确了。

10. 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

为什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其他一些领导人，会对诸如吃饭、穿衣等简单的“共有”形式发生如此大的兴趣，以至不约而同地赞美它们？这其中可能有一个深刻的理论根源。而这个理论根源，就是要破除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

毛泽东就是这样看的：实行粮食供给制和“吃饭不要钱”，就是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填补社会鸿沟或差别，以建立真正的社会平等。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说：进城后，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观点不自觉，把薪水制说得神乎其神。于是，按等级发薪水，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坐椅子有等级，办公桌也有等级。这样一来，脱离了群众，战士不喜欢军官，农民不喜欢区乡干部，城里的工人也不喜欢我们。他认为：等级制度，脑力劳动者工资多，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这是资产阶级法权。“各取所值”是法律规定的，也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因此，光有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整风反右，反对官僚主义，干部下放，将军当兵，种试验田，已经相当地破坏了资产阶级法权，人民公社的建立，就是进一步的破坏。公社工资发给每个人，不发给家长，实行粮食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开展大协作，不要计件工

资，这就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继续破坏。

从这番话看来，毛泽东晚年试图在中国缔造一个共产主义模型的思路，已相当清晰可辨了。在夺取全国政权，进行必要的经济恢复和政治斗争，特别是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他开始把思考和实践的着重点放在进行共产主义的“大实验”上。尽管1956年以后，社会的物质生活比建国前有了很大的提高，建立了一套保证经济运行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但毛泽东内心却产生了从未有过的深刻矛盾。在他看来，社会的发展距离他的理想不是近了，反而是越来越远了。官僚主义、等级差别，以及脑体、城乡之间的差别，使人们之间的距离拉大了。社会生活难以变得平均、和谐，有可能使一部分人变成另一部分人的统治者。此外，人的私有观念随着生活的富足反而变得更加严重起来。总而言之，不平等、不公平和私利欲望增强了。可以说，这同毛泽东的革命初衷和理想愿望背道而驰。

毛泽东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现行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制度，在事实上保护了资产阶级法权也就是不平等的存在。他在1958年之后，多次提到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如工资制、军衔制以及各种各样的等级问题。后来，在1975年的垂暮之年，他更加明确地讲到八级工资制和按劳分配中存在着资产阶级的东西。

实行粮食供给制，即吃饭不要钱这件事，在毛泽东看来意义特别重大。它不仅是农民自身革命精神——向几千年私有观念、生活方式的挑战，而且还同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思想密切联系在一起。既是对人的世界观的改造，又是在制度上推动更高级公有形式在中国得以实现的尝试。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沿着毛泽东的这一思路，很快就有人写出了大篇幅的理论文章——《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文章的作者是后来在中国政坛上威风八面的人物，张春桥。

1958年，张春桥41岁。他当时的公开职务是中共上海市委政策调查研究室主任，实际上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政治秘书。在这个岗位上，他为柯庆施出了不少力，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著名报告，就出自张春桥之手。

1958年6月，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创办政治理论刊物——《红旗》杂志。柯庆施马上效仿，在上海也创办了一个政治理论刊物——《解放》，而且与《红旗》一样，也是半月刊。《解放》杂志于7月1日创刊。

张春桥的过人之处，是善于揣摩领袖意图。在反复揣摩之后，他发现毛泽东对于红军时期的供给制颇为欣赏和怀念，多次讲话提到了当年的供给制，而对于八级工资制则常有非议。于是，便提笔写就了一篇使他本人一举成名的文章——《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文章经柯庆施审阅同意后，发表于9月15日出版的第6期《解放》杂志上。

张春桥在他的文章中，对供给制作了多方面的赞美，而对于薪金制则指斥为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认为全国解放以后废止供给制，实行薪金制丢掉了战争年代的革命传统，是保护了不平等的资产阶级的法权。文章最后写道：

“既然大跃进的形势迫切地要求我们在调整相互关系方面跃进、再跃进，一切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同志们，一定能够站在运动的前头，把我们党的这种光荣传统，在新的条件下，彻底恢复和发扬起来，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同群众建立起平等的相互关系，上下左右完全打成一片，大家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工作，一致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这难道能有什么怀疑吗?”

遵照柯庆施的嘱咐，每期《解放》杂志都要寄送毛泽东一份。因此，毛泽东很快就读到了张春桥的文章。

毛泽东对于张文很感兴趣，当即嘱令《人民日报》予以全文转载。

《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对张文似有不同意见。为此，他写信给毛泽东，请他考虑《人民日报》转载张文时所加编者按语是否说得活一些。

10月11日，毛泽东复函吴冷西，将编者按语略为改了一点文字。经过毛泽东修改的《人民日报》编者按语写道：

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通俗易懂，很好读。

毛泽东在信中还对吴冷西讲：请你拿此给陈伯达同志一阅，问他意见如何；并将你们讨论的详情给他谈一下。

毛泽东写的“编者按”连同张春桥的文章，在1958年10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以醒目的地位发表了。张春桥的名字，第一次引起全国的注意。这一天，对于张春桥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天。

张春桥文发表之后，从10月18日起，《人民日报》和其他报刊开展了连续两三个月的讨论。绝大多数讨论文章同意张春桥的观点，把工资制看成资产阶级法权的表现，主张对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应该继续破除。有的文章认为，现在如推行供给制，将冲破人们“在劳动中斤斤计较、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庸俗习气，势必大大发扬共产主义”。一些农村干部的讨论文章，则结合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批判上中农对人民公社化的抵触情绪，认为他们“一怕归公，二怕拉平，归根结蒂是幻想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

张春桥的“成名作”在《人民日报》发表后的第六天，即1958年10月19日，毛泽东给陈伯达写信，给他和张春桥安排了一次调查。毛泽东在信中说：

伯达同志：

想了一下，你和张春桥同志似以早三天去河南卫星公社进行调查工作为适宜，不必听二十一日刘子厚同志的报告。集中精力在卫星公社调查七天至十天，为杭州会议准备意见，很有必要。可带李友九去帮忙。如同意，请告叶子龙同志，为你们调一架飞机即飞郑州。

这是毛泽东在批示中第一次提到张春桥的名字，而且要他与当时被人称为“中共第一枝笔”的陈伯达同行，还专门为他们安排了专机。可见毛泽东对他的重视。

在大跃进的动荡年代里，张春桥作为一颗政治新星正在升起。这一年，他由中共上海市委委员晋升为市委常委。

11. 人们把“共产主义”弄得五光十色、洋相百出

公共食堂大面积铺开以后，由于舆论声势和人们心理上的某种攀比欲、新鲜感，温度急剧升高，许多极端的事情都做了出来。比如说当时农民中有这样的顺口溜：“粮食供给食堂化，肚子再大也不怕。”这是形容人们敞开肚皮吃饭的情景。当时有的地方开出“流水席”，来了就吃，吃了就走，一天不断。有的地方甚至模仿张鲁的“义舍”，对来往过客提供免费食宿，真如到了大同之境。

1958年10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吃饭不要钱以后……》，该文报道了江苏省江阴县马镇人民公社，在国庆节前开始实行吃饭不要钱、不限量的情况，贫农尹积福在开始实行吃饭不要钱时，还有点不相信，开头两天不敢吃足，怕最后还

要算账。听了有关政策的宣传和鸣放辩论，心里才踏实了。他激动地对家人说：我们真是到了天仙佛国了。共产主义才沾了点边，好日子还在后头哩。

这个报道在很大程度上是真实的。一般农民，特别是生活困难的农民，对于初始阶段公共食堂的作法，往往是由忧而喜，最后欢呼雀跃，成为主要的拥护者。因为在直接利益上说，平均主义对他们最有利，使他们成为受益者。在理想层次上，贫穷农民亦易于产生空想。人民公社这种空想气氛极浓的实践，能一时之间轰轰烈烈地搞起来，是有深刻的思想和社会基础的。一时人们为它鼓舞，不少人的确出于真诚。

根据中央农村工作部 1958 年 11 月 27 日的报告，到 10 月底，全国农村已基本公社化，共建立人民公社 26476 个，共举办公共食堂 265 万多个，在食堂吃饭的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 90%。报告说这还是不完全统计。按上述数字计算，大概每个公社有 100 个左右公共食堂，平均起来不只每个生产小队一个，这个数量是十分惊人的。

公共食堂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每个食堂要有专人做饭，即占用壮劳力，还要占用房基地，要专门建造房屋，置办锅碗瓢盆，这无疑也是一笔数量可观的开支。此外，大锅饭总没有小锅菜好吃，众口难调，三天新鲜劲一过，人们不免生出牢骚。其实，所谓来了就吃，吃了就走的“流水席”，是根本维持不下去的。凡是在食堂干过的人都知道，哪里有不按钟点供应伙食的食堂呢？一个定点开饭，就限制了农民的生活习惯，甚至与紧要农活发生冲突。农民吃饭时间本来就是以农活长短早晚决定的。家里做饭自然要方便得多，起早贪晚，担到田间地头，汤水干粮很实在的就解决了问题。而冬闲时，自家可以以稀代干，减少顿数，自我调剂，显然这些都是公共食堂无法办到的。

公共食堂还极大地刺激了粮食的消费。劳力多、家底厚的社

员，本应多劳多得，现在不仅劳而无获，而且还把存粮剩米也归了公，因此马上就有吃亏的感觉。劳力少、人口多的社员自然乐于吃大锅饭，无形中他们占了别人的便宜。这两种人的心态造成一个相同的结果，这就是大家都放开肚皮吃饭——家境好的以此来补损失，家境差的则想多占便宜，于是粮食消费大大超过了正常状态。本来兴办公共食堂的一个重要依据，即“粮食多了没处放”。但当年实际粮食打的远远没有那么多，只是略有增产而已，而且各地很不平衡，这当然离“放开肚皮吃”的境界差得很远。因而很快出现了上月吃下月，寅年吃卯年的窘况。况且许多行为不端的社队干部，趁机谋取私利，开小灶，多吃多占，更使食堂乌烟瘴气。到 1958 年 12 月底，首先是由于粮食发生紧张，公共食堂越办越糟。

大约至 1958 年 10 月左右，大办人民公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荒诞剧已闹得有点不成样子了。1958 年 10 月，山东省寿张县委作出二年内“基本建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的规划，随后，山东省莒县制定出一个大战 200 天，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在河南省，最先实行一县一社的修武县，制定了三年丰衣足食、五年内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在所有这些荒诞剧中，山东省范县可以算是一个典型了。

10 月 28 日，山东省范县县委第一书记谢惠玉代表县委，在全县共产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上提出了 1960 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任务，并用诗一样的语言具体描绘了共产主义的美好图画。

谢惠玉描绘了 1960 年时范县的工业情况是：各种工厂遍地起，处处烟囱如林立，工厂机器轰轰响，大小机器自己使，生产操作按电钮，难分劳动和休息，能产钢铁能产布，能造化肥发电机，拖拉机汽车也会造，生产用品样样齐，果品罐头范县酒，何时需要何时有，电灯电话收音机，使用起来真便利，这样的日子何时到，苦干二年拿到手。

1960年范县的农业生产是：田间耕作用机器，灌溉自流用电力；粮食亩产好几万，堆大敢与泰山比；棉絮开放似雪野，花生多得不用提；丰收一年顶百季，人人喜得了不的。

根据共产主义新乐园的规划，范县的目标是：新乐园真正强，四面八方是楼房，有大学有工厂，公园街上百花香，柏油马路明又亮，汽车穿梭排成行，有电影有戏院，劳动以后去听唱，冬天室内有暖气，夏天开开电扇乘乘凉，生活真是大变样，万年幸福乐无疆。

这位书记最后总结说，1960年基本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分配制度。那时将达到：

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种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谢惠玉的报告登在中共中央宣传部11月4日编印的《宣教动态》上，11月6日上午毛泽东读到了这份报告。他饶有兴趣地提笔写下一段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

还有比范县更荒诞的闹剧。10月底，湖北省当阳县跑马乡召开全体社员大会，社党委书记当众宣布，11月7日是全乡社会主义结束的日子，8日进入共产主义，一切以共产主义的方式来办。那位党委书记无疑是把这个决定当成喜讯公布的，但万万没有想到，一宣布散会，社员群众纷纷上街"共产"，拿空了商店，就到别人家拿，你家的鸡，我家抓来吃；我队的菜，你队可以来挖；更荒唐的是，还有去托儿所认个男孩作儿子的。

往后的日子怎么过？人们谁也说不清。当时还有人问：老婆还算不算自己的？公社党委吃不准，回答说要请示上级。

第五章　残酷的现实给人们泼了盆冷水

1. 徐水"共产主义试点"的夭折

徐水名声在外，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据统计，从3月至10月，先后有40多个国家，930多名外国人和3000多个国内单位派人前来参观。苏联《真理报》驻北京记者看了后，也伸了大拇指。赫鲁晓夫知道后，坐不住，特派塔斯社记者前来察看究竟。这位塔斯社记者比较"老道"，一眼就看出了徐水的"外强中干"。于是赫氏也就心里有底了。后来他讥讽说：中国的共产主义是喝大锅清水汤，苏联是土豆烧牛肉。这话传到中国来，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愤慨，毛泽东反讥赫氏是"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并在一首词中写道："土豆烧熟了，还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山东省范县县委书记把人民公社作成了一首诗，毛泽东也很欣赏这首诗。虽然梦幻的理想是美妙的，但现实的生活却很残酷。当时徐水还是一个经济贫穷落后的县，全县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足2000万元，农民还有人在外讨饭，在这种经济背景下搞"共产主义"的供给制当然很难长期坚持下去。原来张国忠以为，徐水进入共产主义，是全民所有制了，全国6亿人口还养不活一个徐水。然而，国家哪有钱给徐水发工资。两个月后，放开肚皮吃饭的徐水人，就连基本生活品也难以兑现了，不用说15包，连每人每年两条毛巾也只发了一条就发不起了。据一些人后来调

查，当年11月间，徐水县曾筹款550万元，给全县公社社员和干部发过一次工资和部分生活用品；12月，又筹款90万元，挪用商业流动资金700万元。以后，由于财力枯竭，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了。搞了3个月的供给制，不得不草草收场。

徐水县全民所有制的情况比供给制更糟糕。徐水人民公社成立后，开始实行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全县一级核算，劳力全县统一调配，出现了全县物资和劳务的大平调。为了实现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全县共建起工厂30个，小型企业1348个，大学11所，文工团、剧团、医院也一哄而起。但很快就因资金不足，纷纷垮台。

徐水的问题越来越多地反映到中央，反映到毛泽东那里。这年10月中旬，毛泽东到天津视察，听到了河北省委的汇报，当汇报到徐水问题时，毛泽东特别指出：徐水还是全县人民的所有制，还不是6亿人民的所有制。6亿人民的所有制，要国务院发工资。徐水实行的全民所有制，还是自己发工资。他们所实行的不是马克思所讲的全民所有制。

回到北京后，毛泽东又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关于在徐水县劳动中所见所闻的情况报告，反映了徐水县普遍存在的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问题。报告说徐水县由于有些干部政治思想水平低，只强调军事化，纪律性，而忽视对社员的思想工作，他们在布置生产任务时，都是以简单的命令下达，遇事很少和社员商量，特别在处理劳动不积极、思想落后等问题时，往往采取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报告还提出了几个值得研究的口号。在商庄公社庆祝国庆的大会上，公社党委书记在报告中提出了这样的口号："1960年建成社会主义，1963年建成共产主义"，"到那时候，吃什么有什么，穿什么有什么，要什么有什么"。

徐水的情况越来越使毛泽东感到失望。在11月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多次批评徐水。他批评徐水"急急忙忙往前闯"。提

醒与会者："究竟鞍钢是大哥？徐水是大哥？有人以为中国无产阶级在农村，鞍钢8级工资制，未成立人民公社，是落后了。有些同志在徐水跑了两天，就以为徐水是大哥了，好像农民是无产者，工人是小资产阶级。这样看，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有的同志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者，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他还批评了徐水的浮夸问题，说"徐水把好猪集中起来给人家看，不实事求是。"对于徐水的强迫命令，他也颇为愤怒地批评道："徐水不止一个，捆连长、打连长，骂连长、辩连长，因此人人怕辩论，辩论变成斗争会，辩论变成一种刑罚。"

11月10日晚，也就是郑州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将《中办机要室关于在徐水县劳动中所见所闻情况报告》批转给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和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此件是说徐水县的情况的，长处短处都有，请你们研究一下。此种情况，可能不止一个社有。"写完这段话，毛泽东似觉意犹未尽，便又加了一句："此件，你们带回去，我不要了。"这最后一句，表明毛泽东对徐水失望已极。

为了解决徐水的问题，中共河北省委和保定地委组成了一个大工作组，对徐水进行了整顿。同时，徐水县委在国家计委，中央有关部门和河北省委的具体指导和帮助下，修改了《关于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加速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纲要（草案)》。尽管这个《纲要（草案)》还坚持要在徐水进行"共产主义试点"，但实际上从这个时候起，人们不再宣传、学习徐水的先进典型，不再来徐水参观"取经"。徐水的"共产主义试点"事实上夭折了。

2."共产风"的败象在一些地方逐渐显现

出问题的岂止是一个徐水县。当"共产风"刮遍全国的时

候，败象随之也逐渐显现出来。

首先是农民的家庭财产全部被充了公，有的房子被拆掉，搬进新建的“居民点”，或者搬到别人的家。公社以建立生产基地的名义，征集所属合作社和农家的财产人力，作为公社基地的物质来源。比如河南省嵖岈山公社用这种办法，制定了建设“牛场”、“万头猪场”、和“万鸡山”的计划。公社下属各村庄，均须抽出若干人员，携带树木砖瓦之类的建筑材料，集合于指定地点，建起 305 间畜舍，然后又由农民家中牵去 192 头牛，赶去 89 头猪和 2700 多只鸡。诸如此类的建设过程，被当时的报纸称为“白手起家”而广为宣传，农家中之房屋桌椅、锅碗刀筷、鸡鸭猪狗，均为“共产”的对象。按照湖北省沔阳县委的一份报告中的说法，当时的情况是：“见钱就要，见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

对于自己的财产被充公，农民当然不会满意。当时虽然公开不敢抵抗，私下里怨言还是免不了的。一个农民在给他海外亲戚的信中写道：“所有的房屋和家具都成了政府的财产，公社可以为所欲为，个人没有任何权利”。另一个人则告诉他的远方亲人，他正在想办法变卖家中财产以躲避公社的征用。他说：“你知道吗？缝纫机必须归人民公社公用，我已经同五叔爷、三妹和其他家人商量，最后我们决定尽快地把缝纫机卖掉，但缝纫机的价格太便宜了，因为卖缝纫机的人太多了。”个人在银行里的钱财大都被征用去做“投资”，据一个乡下人的解释：“把钱交给政府就是‘投资’的含义。”甚至连亲友寄来的钱也常常不能如数拿到，一个农民告诉他的海外亲戚：“寄来的钱，只有一小部分给了我们自己，其余全部拿去做公共基金。”这种情况引起海外华侨的愤怒，以至于政府高级领导人也不能不表示关注。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于是保证，所有银行存款和华侨的汇款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当时，全国至少有 4 亿人参加了公共食堂。一开始，食堂还真红火了一阵子，虽无大鱼大肉，但大锅饭管饱。然而，好景不长，食堂渐渐地捉襟见肘。其实这也是必然的。食堂有什么？不过是农民的粮食汇在一起，农民有多少家底？放开肚皮吃，一年的粮食能吃几天？这个账本来很容易算，但当时在燥热的气氛下却没有人肯去算这个账。结果，农民们渐渐地抱怨吃不好，吃不饱。

1958 年本来是个好年景，农业丰收在望。可是几千万人正在山上大炼钢铁，乡下 10 个人中有 4 人在铁炉子旁边，而且这 4 个人还都是壮劳力。真正出现了“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的景象。由于粮食无人收割，开始烂在地里。在家里的农民也不关心，集体的东西不心痛，因为直观看来，收与不收确实与他本人没有什么切身利害关系。结果是，这一年丰产没有能丰收。

然而，高产“卫星”变本加利，越放越高。按照虚报的浮夸的数字，中国人均粮食拥有量已达到了 1000 斤以上，许多地方甚至超过了 3000 斤，以至于各地普遍发出了粮食多了怎么办的感叹。在感到粮食太多的情况下，河北省安国县、山西省长治地区、陕西省长安县和山东省单县还在秋种时实行了用总耕地的 1/3 种庄稼，1/3 种树草，1/3 休闲的“三三制”，搞起了所谓农业耕作制度上的革命。

高估产必然引起高征购。虽然 1958 年的粮食实际产量才达到 4000 多亿斤，比 1957 年只增加了 2.5%，但 1958 年的粮食征购量却由上年的 962 亿斤，猛增到 1175 亿斤，增长了 22.23%，粮食征购量占总产量的比重，也由上年的 24.6% 提高到了 29.4%。

秋收后，又是刮“共产风”的一次机会，许多地方都对农民进行了掠夺式的“共产”。例如安徽省城北公社古城大队向国家卖出 12 万公斤粮食，竟然分文未能得到，全部粮款均为公社占有。山西省省委书记陶鲁笳后来发现，他领导的这个省，农民在

这个秋天里出卖的产品所得，竟被公社官员拿走了一半，用以大办钢铁和大办水利。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进一步调查的结果证明，那个冬天全国从老百姓手上收去的钱多至 30 亿元。

为了筹集大办工业、大炼钢铁的资金，银行还对以前发放给农村的各种贷款，不管是否到期，一律强行收回。

以上三个方面被概括为"一平、二调、三收款"，再加上高征购，便引起了农民的极大恐慌和坚决反抗。从 1958 年秋收以后，全国性的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就是这种反抗的一个集中表现。一方面，中央、省、地、县、社五级党委大批生产队、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瞒产私分；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几乎普遍地瞒产私分，甚至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以保卫他们的产品。农村形势骤然紧张起来。

由于农产品收不上来，而商品粮等销售量却随着职工队伍的扩大大量增加，因此，1958 年冬天，市场上就出现了粮食、油料等供应不足的紧张状况。

刚刚到了冬天，已是困难重重，来年日子怎么过?

3. 刘少奇逐渐从过于乐观的情绪中冷静下来

刘少奇的思想在大跃进前后有过很大的起伏。在大跃进之前，他是支持周恩来等人提出的反冒进措施的。《人民日报》发表的那篇反冒进社论也是由他开的"绿灯"。

但是，全国范围内迅速到来的大跃进局面，使刘少奇的思想产生了急剧的变化。例如，1958 年 7 月 5 日，刘少奇在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座谈时就说：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15 年是赶上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 15 年，七八年就行了。他还说：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多数人

可以看到共产主义。

但刘少奇毕竟是个务实的人。随着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在一步一步暴露出来，刘少奇也开始从这种过分乐观的情绪中逐渐冷静下来。

遵照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提出要“破暮气，走出办公室”的建议，刘少奇在 1958 年 2 月至 11 月中，多次外出各地视察，时间累计达到 120 多天，占这 10 个月总时间的 40%。他除参加中共中央在成都、广州、郑州、武汉等地召开的会议外，先后视察了北京、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省市的农村和厂矿基层单位。在视察中，他一方面为全国人民响应中共中央号召所焕发出来的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精神所鼓舞，另一方面，也为一些不讲科学、不顾客观条件的做法和弄虚作假、虚报浮夸的现象而不安。

9 月 10 日至 11 日，刘少奇来到河北省徐水县视察遂城和商庄两个人民公社。当县委负责人汇报今年有的地方一亩小麦播撒种子 700 至 1000 斤时，刘少奇产生了怀疑。他对县委负责人说：1000 斤种子就是 1500 万棵苗，这恐怕草也长不起来吧！他还说：我提议你们算一笔账，算一算种一亩高产作物用多少人工、肥料、畜力、水等成本费，收多少粮食；种 10 亩普通作物用多少成本费，收多少粮食，看哪个合得来。

在视察结束后同县委负责人谈话中，刘少奇进一步阐释了他的想法：你们积极向共产主义迈进，这个积极性是好的；把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这是一定要转的，但转的方式方法和步骤要很好研究，不要很急；由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也不是共产主义，还是叫社会主义。什么叫共产主义呢？社会产品和思想觉悟道德水平、文化技术水平有极大的提高，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消灭了，实现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才叫共产主义。这个标准很高，不要把共产主

义标准降低。

10月中旬到11月中旬，刘少奇到山东、安徽、浙江等地视察。随着调查的深入，看到全国各地虚报产量的现象愈来愈严重，报纸也不加核实地加以宣传报道，他更加忧虑了。在宁波视察时，他对地方负责人说：现在许多地方的产量都要打折扣，报纸登的不符合实际，不能全怪报纸，是你们地委县委自己报的。问题是干部作风问题，要反对说假话，要反对这种虚报浮夸的作风，要踏实一点。

视察外地结束回京后，在一次他和身边工作人员参加的支部生活会上，刘少奇坦率地谈到对目前国内状况的忧虑，并对自己前一段时间的盲目乐观情绪作了自责。他说：我在山东、河北视察时说过要泼点冷水，现在我也要给你们泼点冷水，让大家的头脑都清醒清醒。对群众的积极性要爱护，不能泼冷水。问题的关键在于领导。有些事，我们没有经验，调查研究不够，受点挫折是难免的。但当前的许多不实事求是的做法、不科学的口号，特别是这股浮夸风、吹牛风，并不完全是由经验不足和调查不够所造成的，我们绝不能任其发展了。有时，我的头脑也有点热，说过些过头话，我向支部作检查。

他还对石油工业部的余秋里等人说：政治是鼓动不是生产力，只是解放生产力。如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好像人的“胆”就是生产力，这是唯心的。

4. 对准备继续放“卫星”的人们，周恩来直言相劝：不要再放了

周恩来在大跃进运动中的心情是矛盾的，也是痛苦的。

这场运动是伴随着对反冒进的批判而全面展开的。面对“大跃进”的汹涌波涛，周恩来曾这样谈到自己的心情：人民的力量组织起来、发动起来以后，这个速度、广度、深度，许多都是我们没有料到的。没有人民的创造性的劳动，没有冲天的干劲，那我们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思想出现。我们东方人受压迫有几百年了，现在我们翻身了，都要求迅速建设我们的国家，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这种感情是很自然的。他还说：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是一个真正革命者，就不能不为这种共产主义的豪情壮举所激动，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认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建设路线的正确。

作为主持日常经济工作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对于“大跃进”运动中的种种问题不可能不有所觉察。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李岩后来回忆说：“1958 年‘大跃进’年代，周恩来总理处在一种特殊的地位，一方面，他要尊重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的决定，不能给群众运动‘泼冷水’；另一方面，他面对一些过头的做法又不能不管，不能看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受损失。他有自己的想法、看法，又不便于公开表露。我们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有些感觉，但总理从来不向我们说这些。总理处在这样的地位，他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根据实际情况，把主席和中央的决定加以变通，尽量减少实际损失，并尽可能地采用灵活方式纠正一些‘左’的做法。”

在成都会议期间，周恩来曾经抽空参观了附近的“友谊农业社”，他一边细心听取当地负责人介绍情况，一边嘱咐秘书记下来以便回去研究。他详细询问了友谊农业社的耕地面积有多大，亩产量多少，每户社员每年收入多少。当时，这个社提出的计划指标很高，整个计划都是增产的计划。周恩来后来对一位外宾说：当时，我不敢相信，然而由于计划是经过全体社员讨论通过的，所以我不能泼冷水，而只能向他们表示祝贺，并说，如果在

执行中有困难，我们上面帮助解决。从周恩来的内心来说，对这类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和浮夸等现象从一开始就很忧虑，尽管他当时还只把这些看作具体工作中的问题。

周恩来的经济秘书顾明回忆道：当时，“恩来同志在某市郊区亲自看了一块挂牌亩产10万斤的‘卫星田’，田亩上空，电灯通明，像灯光球场一样，这是为了加强光照，旁边用鼓风机通风，实际上是把几十亩快成熟的稻子移到一亩田里，恩来同志看了以后心情沉重，因有外宾在场，没有直接批评。”

从6月底开始，周恩来先后到广东、上海等地调查研究。周恩来南下的目的，一是为了带头贯彻毛泽东关于领导干部每年要下去四个月的指示；二是他对全国大跃进的形势，常常感觉自己估计不足。因此，他很想下去走一走，接触一些合作社、工厂、学校，从那里了解一些真实的情况，做到心中有数。

6月30日，周恩来乘飞机赴广东，先后视察了新会、台山、开平、江门等县的工厂、学校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当时，新会县青年周汉华用水稻和高粱杂交，育出穗大、粒大、抗病力强的水稻优良品种，引起周恩来的重视。他详细听取周汉华关于育种情况的汇报，还亲自到试验田观看稻苗，要求有关领导一定要保证周汉华的试验时间。他在同周汉华的谈话中，特别问到有没有亩产超千斤的水稻，周汉华说没有，周恩来点点头，没有说话。这些调查，对他能够比较客观地分析大跃进中的一些生产指标很有帮助。

北戴河会议后，大炼钢铁成为全党和全国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但这样高的指标，事实上是难以完成的。9月1日，周恩来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一起返回北京。中途，周恩来和刘少奇到唐山，向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唐山市委、地委以及唐山钢铁厂的负责人了解钢铁生产情况，发现形势确实令人担忧。回到北京后，周恩来不得不花很多时间来抓钢铁生产。

钢铁生产的高指标形成巨大的压力，逼得各省开始“放卫星”。10月底，他听说河南新乡县放出生铁102万吨的高产卫星后，问他的秘书顾明有没有这种可能。顾明说：我们在鞍钢炼一吨生铁，贫矿石要三四吨，炼焦用煤要二三吨，加上石灰石、辅助材料等要十多吨。102万吨生铁，要1000多万吨的运输量，新乡那里的运输能力怎么可能做得到呢？周恩来立刻派顾明到河南去了解情况。顾明把土法炼出的“生铁”带回来，最好的只是含铁成分较多的海绵铁。周恩来看了样品后心情十分沉重，说：这哪里是铁嘛！这块样品就一直摆在周恩来的办公室书架上。后来，有的省的领导再来要求放“卫星”，周恩来总是劝说：你们别放了，不要再放了。

为了减少盲目性，缩小损失，周恩来几乎每星期主持召开一次钢铁会议了解情况。当时，有的领导也感到那些高指标、“放卫星”不可靠，但是，不敢反映真实情况，生怕别人说自己是向群众的生产热情泼冷水，或被说成是反对大跃进。但在周恩来面前，他们还是敢说一些心里话。周恩来能够平心静气地听取意见，细心地、周密地进行调查研究，取得真实材料，使他能比较早地发现一些问题。

5. 田家英等人向毛泽东汇报了人民公社的两个突出问题

同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一样，毛泽东也觉察到了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1958年10月26日，毛泽东找来他的秘书田家英和吴冷西，毛泽东对他们说，他在夏天北戴河会议上指出，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但现在感到各级干部中有“越大越

好”、“越公越好’的倾向，为了进一步摸清情况，毛泽东让他们各自带一个小组去河南省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和修武县做一次调查研究。谈话中，毛泽东还详细地谈到他们下去调查的方法。

田家英、吴冷西二人从毛泽东的住处菊香书屋出来，便商量如何去河南开展这次调查。他们商定，田家英从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抽人组成一个组，以中央办公厅人员的名义去调查；吴冷西则用新华社的名义，由新华总社和河南分社以及人民日报社抽人组成另一个组。田家英提议，他先去新乡的七里营公社，这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田家英之所以要到那里去是因为他从合作社时起了解那里的情况，地熟人熟，了解真实情况比较容易。吴冷西则先去河南省修武县，那里全县 13.5 万人组成一个公社，是河南的第一个，也可能是全国的第一个一县一社。两个组各自调查 4 天，然后对调地点，也调查 4 天，11 月 5 日在新乡会合。按照计划，毛泽东这一天要乘专列去郑州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他们便在新乡上专列向毛泽东汇报。

10 月 28 日下午，田家英、吴冷西二人率领各自的人马乘火车离京，29 日到达新乡，同新乡地委负责人见面后，当天下午即分头去七里营和修武开展调查研究。当时，下去参加调查的人员，包括田、吴在内，对人民公社都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去怀疑它。但通过调查，却发现了不少问题，有些问题使人非常焦急。例如，当时普遍实行的“大兵团作战”，社员每天只能睡三个小时，连续一二十天，搞得人困马乏，难以为继，劳动效率大大下降。大家都希望向毛泽东反映，越快越好。

田家英还从下放干部那里了解到当地虚报产量的真实情况。当时，关于人民公社性质问题，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干部议论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田家英着重调查研究的一个问题。基层干部中不少人认为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制。田家英开始没有表示自己的看法，但从修武县委书记张洋芹的一席话中得到了启发。那

位张书记对他说：人民公社如果是全民所有制，那末，遇到丰年，修武县的农民是不会愿意把粮食无偿调出来的；遇到歉年，国家能够无偿地调粮食给修武吗？田家英听了这话觉得有道理，非常重视。

调查小组还参观了大炼钢铁的场面。那是一个晚上，在一个炼铁点上，只见人山人海，火光映天，人们通宵不眠，大干特干。指挥者不断地做鼓动工作，嗓子都喊哑了，说那天夜里要放“卫星”。当时他们这些参观者尽管对那种做法抱有怀疑，但对群众的干劲不能不表示赞叹。

大炼钢铁不仅造成了大量资财的严重浪费，更重要的是耽误了农业收获季节。田家英他们亲眼看到，就要到手的丰收粮食，因无劳力收获而烂在地里。

在七里营公社，田家英等人感到了那里分配制度包的太多。七里营公社有 3 万人，年总收入有 1000 多万元出头，但分配上实行供给制，举凡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育、学、乐，以至理发、洗澡、缝纫、电费，一共 16 项，都由公社包下来。田家英认为，中国农民多少年来，有史料可查的，至少从汉朝起，就有“吃饭不要钱”的农民社会主义思想。但是包得太多，公社负担太重，以供给制人均折款 78 元计算，就支出共达二三百万元。

11 月 5 日晚，毛泽东南下郑州，路经新乡，田家英、吴冷西一同上了毛泽东的专列。11 月 6 日，毛泽东到达郑州的当天晚上，仍住在专列上，他要田、吴二人到专列上汇报。在汇报中，吴冷西先汇报了修武的情况，主要谈了该县县委书记的顾虑。接着，田家英汇报七里营的情况，着重谈了七里营的 16 包供给制。在他们汇报会过程中，毛泽东边提问题，边评论。

田家英、吴冷西的调查和汇报对毛泽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一点，从随后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6. 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划清两个界线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史称“郑州会议”；由于随即他又在郑州主持召开过另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为了以示区别，前一次会议被称为“第一次郑州会议”，后一次被称为“第二次郑州会议”。

参加第一次郑州会议的主要是主管农村和地方工作的中央领导人，各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委第一书记。这是一次专门解决“乱子”的会议，或者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一次“泼冷水”的会议。

会议开始后，毛泽东开宗明义地提出一条：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什么叫过渡到共产主义？要搞个定义。显然，这是他试图解决的中心问题，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全国上下几乎到了各行其是的地步。

会议第二天，有的地方党委的负责人认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已经过时，提出要搞个人民公社四十条的文件。最早提这个主意的是曾希圣和吴芝圃，毛泽东同意了，当即让吴芝圃挂帅，陈伯达协助，在会议期间起草这个文件。

文件草稿起初叫《人民公社发展纲要四十条（1958——1967年)》，又叫《中国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纲要》，因为起草时有人认为中国农村正在搞公社，城市也很快要建公社，都要向共产主义过渡，还是叫共产主义建设纲要好。

在11月4日下午的会议上，吴芝圃汇报了正在起草中的人民公社四十条。吴讲到《中国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纲要》这个题目时，毛泽东当即插话说：牵涉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就大了。全世界都理解不了，尤其我们苏联同志就不懂了。你看，他

们还搞社会主义，你就搞共产主义。并且是十年！现在的题目，我看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里头有共产主义。母亲肚子里有孩子。还是社会主义为题目，不要一提就提到共产主义。建成社会主义，这好，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你说十年就过了，我就不一定相信，看一下嘛，你晓得怎么样。人家过了 40 年，还没有过。我们就快些，10 年加上 8 年，实际上才 18 年，你就把一切都过完了？人家到那个时候还没过完；看样子他还不准备过完；他口讲过，还没有动。准备过渡，你加准备两个字，机动一些。不然搞到第 9 年，说已经过了，还要提前完成，结果到第四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就叫共产主义，消灭商品！

上面的话很能反映毛泽东当时的思想状态。这就是期望尽早地实现共产主义，却又不得不顾及左邻右舍，顾及旁人的影响。同时，对怎样就算实现了共产主义，也还说不出一个确切的标准，只是在感觉上似乎觉得快了。

在 11 月 6 日的讲话中，毛泽东又谈到这个问题。他说：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要多长时间？三、四、五、六年，或更多一点时间，是不是短了？还是长了？有时觉得长了，有时又担心短了，我担心短的时候多。人民公社什么时候能达到像鞍钢一样？能不能把农业变成工厂？产品和积累能够调拨；积累不是全部要调，但必须调动的产品，则必须无条件地调动，才算全民所有制。

毛泽东还说：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四年是否可以？标准是鞍钢。鞍钢除 7200 元成本折旧，下余 10800 元，工人所得 800 元，为国家积累 1 万元，要这样的调拨。这种过渡斯大林是千难万难的，要多少年，未说明期限。这是第一个过渡。第二个过渡，从“按劳取酬”到“各取所需”。现在已开始准备第二个过渡，吃饭不要钱。苏联也吹，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我们吃饭不要钱，是各取所需的萌芽。凡是可以做的必须逐步去

做。这不能不说是共产主义因素。

毛泽东在11月10日上午的讲话中，再次谈到了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线的问题。他说：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要不要划条线？有的同志不赞成，说不能划一条线，说划了就损伤了积极性；线内也有共产主义，也有集体和全民所有制。大线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秀才都不赞成，是不是秀才要造反？毛泽东接着说：斯大林是划了线的，三个先决条件，基本上不坏，但不具体。（1）首先是增加社会产品，这是基本的。我们叫以钢为纲，极大地增加产品。（2）集体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将商品交换提高到产品交换，使中央机构能掌握全部产品。不愿划界的，主要是认为现在时间已到，以为已经上了天，你们是右倾。当然，现在鞍钢是全民所有制，但还没有过渡到共产主义，总要搞个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再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只有一部分是全民所有，大部分是集体所有。全民所有也不一定就过渡到共产主义。（3）提高文化水平。这三条的基本点是增加产品，极大地增加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就是发展生产，发展生产力。

应该说，在当年那种热火朝天的气氛中，毛泽东能明确地讲出要划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大线”，和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小线”，还是很不容易的。他之所以强调要划这两条线，除了认为那些“三五年过渡”是吹牛皮外，显然也是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现实：各单位、各地方间在贫富方面还有很大差别。由于这些差别的存在，实行产品调拨与取消商品是根本不可能的。

与产品调拨相联系的还有一个商品经济的问题。在11月9日下午的会议上，毛泽东谈到了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的许多观点。他认为，现在还是要利用这个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来作为一种有用的工具，在目前来讲

这是有用的，是不坏的。他说，我们的国家是商品很不发达的一个国家，现在又很快地进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同商品交换还要发展。

同一天，毛泽东给中央、省、地、县四级党委写了一封信，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另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他在信中说道，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有一大堆混乱思想。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当时与会者都能够听得出来，毛泽东所说的“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是指陈伯达说的。当小舟谈到，社会上怕废除票子，因而银行提款的多，发生了抢购时，毛泽东就明确说：废除货币，陈伯达就有这个倾向。

11月10日下午，毛泽东再次讲到：现在我们有些人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有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的差别，没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有一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剥夺农村中的中小生产者，我国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全民所有，废除商业，实行调拨，那就是剥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初期阶段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认为有了公社，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破除迷信又恢复迷信。有人倾向不要商品了，至少有几十万人想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我们只占有生产资料社会产品的一小部分，只有把一切生产资料都占有了，社会产品十分丰富了，才能废除商业。

应当说，这是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讲过的最精彩的也是最实际的一段话，尽管他只是笼统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期阶段”这个概念，也对商品的属性作了阶级概念的限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的差别，但在商品存在的必然性和长期性的阐述上，还是清醒的，尤其是当时那种环境下，毛泽东的话更有其特殊的意义。

7. 武昌会议，压缩空气

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炼钢铁运动所造成的“乱子”越来越严重。在第一次郑州会议开过之后，已近年末。半年大跃进的利弊得失，通过年终的算账与分配，就看得比较清楚了。于是，中共中央接着又召开了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

11 月 21 日，武昌会议开始的第一天，毛泽东就说：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压缩一下，变成固体空气。不要像唱戏拉胡琴，弦拉得太紧，太紧了，有断弦的危险。这可能有一点泼冷水的味道。

23 日，毛泽东又说：我说把空气压缩一下，不是减少空气；物质不灭，空气还是那样多，只不过压缩一下而已，成为液体和固体状态。他强调，路线还是那个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办法仍然是政治挂帅，群众路线，几个并举，三个结合，还加上土洋结合。在毛泽东看来，“空气”只是过于膨胀了一些，压缩一下就好了，不是减少空气，更不能改变空气，总路线还是要坚持的，三面红旗必须高举。

毛泽东在讲话中承认，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中国人大概是冒失鬼。

开会的前几天，11 月 15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赫鲁晓夫在

苏共二十一大上的报告提纲，这个提纲提出苏联未来 15 年的主要任务是全面地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础。毛泽东要大家看看这个提纲。他说：苏联已经 41 年了，还准备搞 12 年。看它的思想是想过渡，但并没有讲过渡。赫鲁晓夫很谨慎，他已经有了 5500 万吨钢，1 亿吨以上的石油，他还那样谨慎，还要 12 年过渡。现在国内局势，我们倒有几十万、上百万的干部，就是想抢先，都想走得越快越好，对全局照顾得不够 。这时，毛泽东批评北戴河会议讲三四年或五六年或更多一点时间搞到共产主义，是个缺点。他说，三个差别、资产阶级法权没有消灭，没有一二十年不行。现在是吃穷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我有点恐慌，怕犯什么冒险主义错误。

但是，会上有不少人的意见仍然是快些过渡。对此，毛泽东似乎不以为然。他说：整个中国要进入共产主义要多少时间，现在谁也不知道，难以设想，10 年？15 年？20 年？30 年？苏联 41 年，再加 12 年，53 年还说是准备条件。中国就那么厉害？我们还只有 9 年，就起野心，这可能不可能？从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考虑，也是苏联先进好。也许在巴黎公社百年纪念时（即 1971 年），苏联进入共产主义。我们 12 年怎么样？也许可能，也许不可能，我看不可能。即令 10 年，到 1968 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也不进，至少等苏联进入两三年后再进，免得列宁的党、十月革命的国家脸上无光。

让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这样的意思，毛泽东在两次讲话中都说过。在第一次讲话中，他就说：苏联已经搞了 41 年，再搞 12 年，还没有过渡，落在我们的后面，现在他已经发慌了。他们没有人民公社，他搞不上去，我们抢上去，过渡了，苏联脸上无光，全世界无产阶级脸上也无光。怎么办？我看要逼他过，形势逼人，逼他快些过，没有这种形势是不行的。你上半年过，我就

下半年过，你过我也过，最多比他迟三年。

同第一次郑州会议一样，毛泽东再次批评了取消商品的主张。他说，有一个时期仿佛认为商品愈少愈好，时间愈短愈好，甚至两三年就不要了，这是有问题的。我看商品时期搞久一点好，不要100年，也要30年，至少也得15年，这有什么害处呢？他还说，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如“三风”“五气”、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彻底破除，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要破，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还有用，这就要保护它，使它为我们服务。

毛泽东在会上讲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降低过高的指标。这也是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之一。

北戴河会议曾确定1959年钢产量2700至3000万吨，这个目标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会议第一天，毛泽东就提出要不要这么多钢，搞不搞得出来这么多钢的问题。他说：钢3000万吨，要不要这么多？搞不搞得出来？邓小平说：明年任务，各省自议。3000万吨他们同意不同意？不同意就得改。是不是定3000万吨，是应该考虑的。薄一波也认为值得考虑。薄一波是经委主任，对工业生产的情况比较熟，他说：今年1700万吨铁，是6000万人搞1000万吨来，实际有700万吨是估出来的，但能炼钢的高估也就是200多万吨。说钢1100多万吨，数量上可能有超过，分析内容，情况大变，好钢不会超过900万吨，可能是850万吨好钢。如到3000万吨钢，就要翻2.5倍。薄一波的估计接近事实，1958年经过核实的好钢只有800万吨。毛泽东于是说：明年是不是老老实实只翻一番，今年1070万吨，明年2140万吨。他还谈到，北戴河会议时，我们对搞工业，还没有经验，搞了两个月，钢铁运输到处水泄不通，这就有了相当的经验。总要有实际可能才好。

毛泽东在会上承认：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真正掌握客观规律，要熟悉地掌握与运用它，整个说来，还是个问题。多快好省是客观的东西，有它的客观规律，能速则速，不能速就不速，不能勉强。

第一次郑州会议搞的《关于15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毛泽东不主张作为武昌会议的重点。他说：四十条这次可以议一下，但不作为重点。郑州会议提出来了，很好，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但再议下去，没有把握，也议不出名堂。他还说，四十条如果传出去，很不好，叫做务虚名而受实祸。

毛泽东提议，把1959年产钢3000万吨降为2200万吨。但他心里仍无把握。当晚半夜里，又找李富春、薄一波、赵尔陆等人谈指标。他认为不是30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22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薄一波建议定为1800万吨，对外公布1600万吨。第二天晚上11点钟，毛泽东找各大区负责人谈钢指标，对1800万吨也表示怀疑。23日的大会讲话，毛泽东说：昨天和大区同志吹一下，究竟1800万吨有无把握？要能说服，才能打通。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远不能服。我已经是站在机会主义立场上，并为此而奋斗。打我屁股与你们无关，无非将来又搞“马鞍形”。过去是人家反我的冒进，现在是我反别人的冒进。1800万吨，我觉得现在还是根据不足。如果有充分根据，还要减到1500万吨。

除了提出压缩钢的指标外，毛泽东说，还有什么任务实在压得透不过气来，也可考虑减轻些。

任务不可不加，但也不可多加，要从反面考虑一下。会议期间，毛泽东批发了云南省委的一个报告。这个《关于肿病死人的检查报告》说，今年春夏之交，农村中因过度劳累和营养不良发病近39万人，死亡3.9万多人。有些干部发现了缺粮是肿病致死的主要原因，但由于怕犯右倾错误，不敢反映真实情况。陆良

县委委员刘云才坚持反映缺粮的真实情况，反被撤职和开除党籍。该县马街乡出现了使用皮鞭的“督战队”，强迫患病群众出工。一位县领导还在全县推广这个经验，他说：“生产不跃进是大是大非问题，打人是小是小非问题”；“打人是促进派，不打人是促退派”。于是全县捆绑吊打合法化，甚至出现了“打人是为了打一千斤”，“不打就是没有干劲”等等说法。云南省委的这个报告对自己的官僚主义领导作风，作了比较深刻的检讨。毛泽东的批语虽然没有针对陆良县的打人问题表示意见，但他还是批评干部不善于分析情况，不善于及时用鼻子嗅出干部中群众中关于人民生活方面的不良空气。同时指出，这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并提出两条解决方法：第一是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第二是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高指标的产生，同弄虚作假的浮夸风有直接关系。毛泽东在讲话里特别批评了作假之风。他说：现在横竖要放“卫星”，要出名，就管他作假不作假。没有那么多东西，就要作假。我建议同县委书记、人民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嘛，不要争虚荣。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两年扫光，我就不相信。从中央、省委、地委到县委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了。

8. 人民公社还是要维护的

武昌会议期间，对第一次郑州会议提出的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草案和1959年经济计划都进行了讨论，然后将两个文件

提交给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继续讨论、审议。

11月27日，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六中全会拟于12月2日开会，由11月28日起到12月1日止，在这4天内，请同志们阅读文件。



1958年12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会议讨论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全会按大区分组，共7个组。华北组组长林铁，副组长陶鲁笳、张苏；华东组组长柯庆施，副组长曾希圣、江渭清、廖鲁言；华中组组长王任重，副组长吴芝圃、安子文；华南组组长陶铸，副组长刘建勋、叶季壮；西南组组长李井泉，副组长宋任穷、谢富治；西北组组长张德生，副组长王恩茂、王震；东北组组长欧阳钦，副组长黄火青、李葆华。

11月28日晚7点半，邓小平主持全会的预备会议，讲了会议的日程安排和全会的任务。从29日开始，每个小组阅读了

4天文件并分组讨论。这个期间，11月30日下午，毛泽东同常委和各小组组长谈过一次话，可以看作是在全会正式开始前的吹风。第二天，各小组作了传达。毛泽东说：今年夏、秋两季，我们国家出现了两个大问题，一为人民公社，二为以钢为纲。大家有点紧张。郑州会议感到紧张，现在搞出些章程来，心情就比较舒坦了。21日开会，10天了，也比较紧张。斯大林的书过去看过，不感兴趣，现在感兴趣了。人民公社的文件是从郑州会议搞起来的，有所准备。工业问题也有所准备，但计划会议是条条搞的，中央没跟地方结合，条条没跟块块结合。块块第一书记，过去你们不是干劲冲天吗？华东现在就走下坡路嘛！过去没有经验嘛！

关于北戴河会议确定的钢产量，毛泽东说：北戴河会议一股热情，3000万吨钢，那时谁听了3000万吨钢不喜欢？现在看来，当中至少有1000万吨是主观主义。事非经过不知难。

关于农业生产问题。毛泽东说：1959年农业生产的指标，究竟提多少？今年粮食是7500亿斤，明年增产3000亿斤，达到10500亿斤，每人平均1500斤以上。苦战3年达到每人2000斤。今年来一个以多报少的方针，留有余地。棉花今年报6700万担，明年1亿担。粮食收成到底有多少？是不是增加一倍左右？可以写增加90%左右，比较稳当。现在还未收完，还要看看，这次会议不公布最后数字。明年人代会上再公布。

从以上内容上可以看出，毛泽东一方面希望与会者头脑冷静一些，对于生产指标的安排要尽可能地符合实际；但另一方面，他本人的头脑也还没有真正冷静下来。他认为符合实际，甚至是留有余地的指标，仍然属于不切实际的高指标。

分组讨论从11月29日开始，一直进行到12月8日。讨论的内容主要有两个：一是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二是关于1959年经济计划安排问题。经历了近一年、尤其是经历

了北戴河会议以后几个月的大跃进运动，不少人感到出了许多乱子，照这几个月的搞法还会继续出乱子，所以开始从狂热中有所降温。

除了11月30日同常委和各小组组长的谈话，在正式会议上，毛泽东只作过一次讲话，时间是全会结束前的一天，即12月9日。

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对一些过高的指标有所降低。比如，1959年钢产量计划，由2700至3000万吨下降到1800至2000万吨；将3年基本改变面貌的时间延长为5年，以至10年、15年；对抢先进入共产主义的势头提出了批评，说这是“性急了一点”。毛泽东号召大家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政治经济学；还认为《15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缺乏起码的根据，主张目前不定这种计划。

然而，也就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对人民公社有许多由衷的肯定，认为人民公社是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实现两个过渡，便于办很多事。他以徐水、遂平为例，说明人民公社包含了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并认为人民公社总的趋势是巩固、发展。

会议期间，毛泽东批示印发了《三国志》中的《张鲁传》，并印发给与会者一段他亲笔写的批语。这个批语主要是介绍东汉末张鲁行“五斗米道”的情形：“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徕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明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

从毛泽东写下的这个批语中人们不难看出，他对于张鲁的“五斗米道”是赞赏的，认为人民公社与“五斗米道”有不少相

似的地方。

八届六中全会于12月10日结束。这天的会议通过了四个文件:《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关于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的决定》,《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首先肯定人民公社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我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整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大跃进的产物;北戴河会议关于建立农村人民公社的决议是正确的,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认为,人民公社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并将成为实现两个过渡的最好形式。但《决议》也指出,企图在农村过早否定集体所有制,匆忙改变为全民所有制,是不适当的,也是不成功的;企图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而代之以按需分配的原则,企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共产主义,无疑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空想。

《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主要是对北戴河会议通过的1959年计划作调整,降低了一些过高的指标。在新华社发表的全会公报中,公布了这些调整后的指标:钢为1800万吨,煤为3.8亿吨,粮为1.05亿斤,棉为1亿担。在这四项指标中,钢的指标下降了,粮、棉指标没变,煤的指标还略有提高。而且就是已经降低的钢指标,后来证明也是不可能达到的。因此,经过调整的指标仍然很高。

会议期间,陈云曾向胡乔木谈到,公报不要公布这些指标,但胡乔木没有向毛泽东汇报。后来上海会议时,毛泽东批评了胡乔木,说你有什么权力不报告中央副主席的意见。同时毛泽东还表扬了陈云,说“真理有时在一个人手里”。

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对第一次郑州会议中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

与全民所有制两大界限问题，作出了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普遍存在的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激动情绪。但是，这两个界限还都是讲的人民公社外部关系问题，对于人民公社内部的管理体制并未涉及。因此，人民公社仍维持着越大越公越好的局面，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和扩大核算单位的倾向还存在着。农村中的供给制，“吃饭不要钱”，以及公共食堂这些具有“共产主义”因素的东西，还是至高无上的，“共产风”仍有增无已。

9. 彭德怀对即将公布的产粮数字表示怀疑

大跃进开始的时候，彭德怀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从这个职务来说，他并不分工负责地方的经济建设。但是，他是一个对国家负有很强责任心的领导人。有些事情，虽非他分工主管，但发现问题后，他还是要发表观点和看法。

从 1957 年 11 月中旬以后，彭德怀发现报纸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口号：“大跃进”。开始他对这个口号有些不以为然。1958 年春节为《解放军报》专栏《元帅和士兵的愿望》拟定稿件时，秘书在为他起草的署名文章里多处使用了“大跃进”一词，而他在修改时全部改为“大发展”。

彭德怀从思想上接受大跃进，是在 1958 年 3 月中共中央在四川成都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会议上的几次讲话高屋建瓴，彭德怀被他的讲话深深地打动了，对大跃进这一口号的疑虑随之烟消云散。

在成都会议后期的谈心会上，彭德怀以自我检讨的精神说道：回想十年之前，有惭愧感，对毛泽东主席的认识，不是一见如故，又不是同床异梦，而是在这两者之间。他感到，通过这次

会议使他大彻大悟，思想认识有了新的飞跃，新的提高。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以后，彭德怀到东北地区视察。他首先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这个坐落在松江平原上占地50多万平方米的培养高级军事技术人才的高等学府，和全国其他院校一样，正处在大跃进的滚滚热浪中。一座座宫殿式的教学大楼和办公大楼的墙壁上，悬挂着鼓舞人们“苦战”、“攻关”、“争放卫星”的巨幅标语，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有成群的人在辩论，在思考，在汗流浃背地忙碌着，彭德怀在哈尔滨市招待所住了一夜，第二天就搬进了学院。为的是要亲眼看一看、亲自体验一下这座学院是如何迎接正在全国澎湃兴起的大跃进的。

彭德怀深入各教学系和专业教学组，同教授们进行了交谈，察看了许多实验室、实习工厂、学员食堂和进行野外作业的帐篷。考察中，他听到的是一个又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彭德怀从哈尔滨到齐齐哈尔，又从齐齐哈尔转回沈阳。一路上，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全民大跃进的生动图景。一望无际的松辽平原上，到处是一片片刚刚建起的炼铁土高炉，白天烟雾弥漫，夜晚火光冲天。列车经过的城镇和车站的墙壁上，贴满了庆祝人民公社成立的大字标语和工人农民抒发豪情壮志的诗歌。彭德怀在火车上不禁赞叹说：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中国人民向着党所指引的宏伟目标开始跃进了！

每到一地，彭德怀都热情洋溢地鼓励干部和群众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要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在向部队干部讲话的时候，他曾激动地说：过去唱歌是“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中国人民几千年来饿肚子的问题，今年解决了！今年粮食产量是7000亿到8400亿斤，明年是1.5万亿斤。每人年平均有1吨粮，什么战争、灾害都不怕了。今年钢产量是1070万吨，明年钢产量是2500万吨，可能达到3000万吨。马克思讲过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现在证实了。我是最近才相信这番话的。

彭德怀在难以抑制的兴奋中结束了他的东北之行。在处理了国防部的一些重要军务，欢度建国9周年的国庆节以后，他又风尘仆仆地奔赴西北地区考察。他到了内蒙古、青海、甘肃、陕西等省，重点是了解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的情况。

在兰州军区司令员张达志的陪同下，彭德怀乘吉普车从青海省的格尔木出发西行。他坚持多年来视察工作的老习惯，不让事先通知要去访问的单位。当他们的车子开进沙漠绿洲中的敦煌，在县委门前停下来的时候，县委的领导人没有一个在家。出来迎接他们的是县委的一位年轻秘书。彭德怀对秘书说：小同志，我们要在这里住一宿，吃两顿饭。一顿在你们机关食堂吃，一顿到人民公社食堂去吃。大家吃什么，我们吃什么，跟大家一起吃。

晚上，由敦煌县委副书记刘孟晋介绍情况。这是彭德怀初次亲身接触人民公社这个在中国大地上正在兴起的新生事物。刘孟晋是个淳朴老成的中年人。他告诉彭德怀，这里是全县组成一个人民公社，8万人口，分8个大队。9月2日试办，11日正式成立。试办中群众写了7万张大字报，贫农最积极，要求割掉资本主义尾巴，把所有的生产资料都交归公社，不要任何代价；中农有些是被迫的，很勉强；富农的生产资料不肯全部交出来，有的把猪、羊藏起来，有的把毛驴杀掉。听到这里，彭德怀不无担心地说：你们一县一社，不一定是方向。公社并非越大越好，主要是看对于发展生产有利没利，超越现实条件就不能算是先进了。在由高级社合并成公社当中，要注意到避免发生破坏生产资料的现象就好了。

第二天，他又在县委副书记的陪同下，参观了郊区的杨家桥生产大队。沿途看到许多棉花掉在路上。在菜地里，他看到大量白菜零乱地堆放着，遍地散落着菜叶。到了村里，社员们正在开饭，彭德怀走近锅台，用勺子搅着盆里的稀面糊看了看，发现里面掺的是土豆块。彭德怀转身带着疑惑的神情，小声问刘孟晋：

这么多人一起吃饭究竟行不行？

杨家桥大队的一些景象，向他提出不少值得疑虑的问题。12月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时，当讨论到当年的粮食产量时，他提出了不同看法。当时，在西北地区的小组会上，讨论公布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数字的时候，许多人赞成公布1万亿斤或1.2万亿斤，甚至还有人说："粮食要多少有多少"。

彭德怀不同意这些意见。他直截了当地说："粮食没有那么多。"当时有人批评他："老总啊，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可怎么办呢？"彭德怀解释说："公布的数字宁可少一些，将来追加数字比较主动；公布的数字多了，将来被动。"

10. 问题越来越多地浮出水面

第一次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之后，一哄而起，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共产风"，虽然受到了批评，但是并没有完全被遏止住。至于关于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中的其他种种问题，并没有缓和下来。尤其是钢铁指标和人民公社的"共产风"，仍旧是毛泽东的两大"心病"。1959年1月底至2月初，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几天省、市委书记会议。2月2日，关于经济建设问题，毛泽东讲了一番深刻自省的话：我们搞经济建设还是小孩子，虽然我们现在年纪不小了；应该承认这一点，即向地球作战，向自然界开战，这个战略战术，我们就是不懂，就是不会；要正面肯定还没有认识到，这是我们的错误。他还谈到，这一场战争我们经验不足，我们定的这些指标，这些主观愿望，这些计划适合不适合，我们还都是从实践中找经验。关于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按比例，这个问题我是没有解决的，这个问题我不懂。现在我们似乎在这里接触到这个问题了。请大家接触这个

问题，研究研究，究竟什么叫按比例发展。

2月下旬，毛泽东又来到河北、山东、河南三省作调查研究。他发现公社化后，国家同农民的关系日益紧张，不少生产队瞒产私分，公社内部所有制方面问题太多，公社平调生产队的物资、资金和劳力，队与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搞穷富拉平，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2月中旬，他看到了广东省委批转赵紫阳关于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引起了他极大的关注。报告反映出农村严重存在的社员和基层干部瞒产私分问题。所谓瞒产私分，即社员和基层干部不堪忍受虚报高产的重负，故意向上级隐瞒产量，以便能尽量多分一些口粮，有的干脆就抵制公社的无偿调拨，保卫自己的劳动果实。因此，瞒产私分既是农民发自内心的一种无奈，又是他们对"共产风"本能的反抗。

毛泽东之所以对瞒产私分和干部高压逼粮现象极为敏感，是因为他平时对两种情况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民主人士哇哇叫，人民群众上街闹。这都是对政治大局具有威胁性的事情。因此，纠正"共产风"已势在必行，不能再耽搁了。

于是，毛泽东决定在郑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中央多了周恩来、彭德怀、陈毅、薄一波、陆定一等人，各大区和中南各省负责人同第一次郑州会议基本相同。

会议从2月27日开到3月5日，主题是如何解决"共产风"和公社内部所有制问题。当时，毛泽东已认识到，为了解决公社内部的"共产风"就不能不从人民公社内部的所有制关系入手，就必须在理论上给予必要的说明。

"共产风"这个词首先被使用，正是毛泽东在2月27日的讲话中提出的。他说，1958年，粮、棉、油、麻等大丰收，但是在最近四个月内又大闹粮、油不足的风潮。一方面，中央、省、

地、县、社、管理区六级党委，大批生产队和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即所谓瞒产私分，帽子一顶叫本位主义；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普遍一致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保卫他们自己的产品，反过来，批评公社和上级平均主义，抢产、共产，写条一张，普遍过斗拿走。我以为生产队、生产小队的做法基本上是合理合法的。他们基本上不是所谓不合法的本位主义，而是基本上合法的正当权利。公社是 1958 年秋成立的，刮起一股“共产风”，内容有几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鸭、鸡无偿归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碗、筷等无偿归公共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遍全国，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在当天的讲话中，毛泽东反复地谈到了上面这些意思，说明他在思想上已引起高度重视，其批评也是十分尖锐的。

对毛泽东说来，要纠正人民公社中的混乱现象，只能将几个月前设想的那种“大而公”的社会组织形式进行调整，即降低它的公有程度和组织方式。

2 月 27 日，毛泽东在会议的第二次讲话中说；目前全国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 1953 年和 1955 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认为我们应该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里面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但是，我认为主要的，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接下去，他作了一大段论述：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要不要有一个发展过程？是不是公社一成立马上就有了完全的公社所有制，马上就可以消灭生产队的所有制呢？我这里说的是生产队，有些地方生产大队即管理区，总之，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

展过程；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第一次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对急急忙忙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向共产主义过渡给予了批评，但是没有认识到公社内部的所有制仍有问题。所以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六中全会对积累问题、分配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而不解决这个问题，大跃进就无积极性。现在要出安民告示，现在人民公社基本上是生产队的集体所有制，公社只部分所有制。

由于对三面红旗不容怀疑，这使毛泽东在“乱”与“左”的性质问题上，有很大保留。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讲到“共产风”的原因时，他说：“只是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说，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的过远了一点”；但马上又说：“很明显，这种缺点只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的问题。而且这首先是由于中央没有更早地作出具体的指示，以致下级干部一时没有掌握好分寸。”

“十个指头”与“一个指头”，是人们在大跃进中最耳熟能详的提法了，这一提法本身就意味着对错误的淡化。

11. 一些被当作右倾保守批判过的观点又重新提了出来

经过从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一系列中央会议，到1959年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势头比以前有所减弱，农村开始整顿公社，一些工业指标也有所下降。但是，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公社在整顿过程中，陆续暴露出一些此前尚未察觉的政策性问题。工业方面问题更多，已经下降的指标，仍然同可能实现的产量有距离，而一些部门和地方为完成1959年的指标，还在争材料、争设备、争资金。上海会议东北组在讨论中说到过一件事：3月份在沈阳召开东北、华北各省工业书记会议，不许提困难，要工业书记回去动员第一书记在上海会议上也不要提困难；要拍胸膛，坚决保证完成钢铁、煤炭既定指标。

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就是为讨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农村人民公社的整顿问题，同时当年要召开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选举和决定新的政府领导人。3月25日至4月1日，先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般称之为上海会议。关于计划指标落实的讨论，是由邓小平主持的。接着，4月2日至5日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

上海会议第一天，毛泽东作了讲话，主要谈农村人民公社问题，他说：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问题，人民公社管委会、管理区、生产队的组织形式，还没有一个章程。他提出要搞出一个公社章程来，同整顿农村人民公社有关。北戴河会议虽然通过了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但对公社的组织形式只有原则性规定，比较笼统，人民公社一哄而起之后，实际上是无章可循。第一次

郑州会议之后，各地开始整顿人民公社。对公社化运动狂潮中出现的混乱现象进行清理，必须规范人民公社的各级组织形式。所以需要搞人民公社章程。上海会议和七中全会虽然没有制定出这样一个章程，但会议通过的人民公社十八个问题的文件，对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作了初步的规定，并要求各省于当年7月在全民讨论基础上提出一个示范章程草案，作为中央起草的依据。

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是毛泽东最早提出来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首先否定了现阶段搞公社所有制，指出应该基本上是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所有制。第二次郑州会议之后，公社所有制被否定并取消了，但是在生产队还是生产大队（管理区）所有制问题上，地方上产生了两种意见，湖北主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河南则主张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3月上旬毛泽东到武昌，专门把周小舟找来，问周小舟的意见，周小舟赞成河南的办法。没两天，广东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则赞成湖北的办法。究竟哪种主张好？3月15日，毛泽东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写了一封《党内通信》，他说："我感觉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关系到三千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采取河南、湖南的办法，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们觉得勉强，则宁可采用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致使我们脱离群众。而在目前这个时期脱离群众，是很危险的，今年的生产将不能达到目的。"毛泽东没有肯定哪种办法，要求征求基层干部的意见，这说明他这时不再随意作决策，而注意听听各方面的反映了。

两天后，3月17日，毛泽东在另一封致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的《党内通信》中提出，还应当讨论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问题。这次上海会议上，他要求大家重视小队的部分所有制问题，把小队搞得好不好的问题看得很重。生产小队相当于原来的初级社，生产队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生

产大队是两三个高级社的组合，无论以这三级的那一级为基本核算单位，都是从公社所有制退步。这种退步实际是向符合当年农村生产力实际状况的方向接近了一步，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

毛泽东最后谈了抓工业的问题。他说：工业、交通非抓不可，指标要低于可能性，不要放卫星。不要一要求产 1000 斤，就布置 3000 斤，这个做法不行，还是要实事求是。从武昌会议开始，毛泽东就提出要降低高指标，还说是指标要讲现实可能性，不要讲虚假的可能性。

1959 年 1 月上旬，他找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彭德怀等谈经济工作和工业问题。陈云表示：武昌会议定的指标难以完成。毛泽东说，那就拉倒，甚至于这个总路线正确不正确，我还得观察。他提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并让陈云讲话。陈云以为毛泽东要他检讨，在会上作了一番自我批评，降低指标一事自然未果。

后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曾讲过这件事：1959 年 1 月，我建议开会，这是陈云跟我谈一次话的影响，建议开会，开一个星期，仍然不动，我的意见是降低指标。作了报告，还是 2000 万吨。我希望陈云出来讲几句话，谁料到他讲的是自我批评，承认错误。

“事非经过不知难”，毛泽东在武昌会议说过这么一句话，这是他的心里话。到上海会议时，毛泽东的头脑比较冷静了，这时说出“还是要实事求是”的话，无疑包含有对大跃进以来若干教训的总结与反思。

1959 年的计划指标始终是上海会议的一个重点。1 月份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仍然维持了武昌会议确定的虽有下降但仍较高的指标。降不降指标，实际上是能否进一步降温的关节点。正是在这一点上，党内的认识很不一致。不少人从维护“三面红旗”出发，坚持较高的指标。上海会议一开始，柯

庆施、李井泉就要各省、市、自治区接受既定的指标。李井泉说，如果其他省完不成粮食指标，四川可以再分担些，无非多增产红薯，允许一斤红薯顶一斤粮（按国家规定，4 斤红薯折 1 斤粮）。柯庆施也说，如果别的省完不成钢指标，上海也可以再分担些。一些地方党委的负责人，虽然知道指标难以完成，却感到左右为难，降低指标颇为困难。

中央领导层比较倾向降低指标。3 月 26 日下午，薄一波作关于第一季度工业计划执行情况和第二季度安排的报告。薄一波谈到炼钢设备未能按计划完成时，毛泽东说：搞了十年工业，积累了十年经验，还不晓得一套套要抓。安排了 98 套（指大中型轧钢机），2 月底还报可完成 31 套，结果只搞了 16 套，还有一部分配不齐全，这是什么人办工业，大少爷。现在工业要出“秦始皇”，我看你们搞工业的人不狠，老是讲仁义道德，搞那么多仁义道德，结果一事无成。搞那么多（指基建项目）削它 500 项，如果不够，再削，削 600 项。

这时周恩来插话：要有决心，头上要沾点血。

毛泽东说：根本不要决心，干掉就完了。

周恩来说：这句话就是决心。

邓小平插话：1000 多个项目，一季度只有 20 多个投入生产。

毛泽东接着说：何必那么忙？急得要死，一定要搞 1000 多项，又搞不成。从前讲轻重缓急，现在讲重重急急要排队，算得一点经验了，重中有重，急中有急。

3 月 28 日，李先念作关于财贸工作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邓小平在此之后，讲了降低指标问题：现在提出一个计划问题，计划要放在切实可靠的基础上，中央、地方都觉得有些问题，主要是肩膀上的担子重得很，感到为难。讲出来好，应该实事求是解决。总的就是原材料不足，主要又是钢材不足。武昌会议是按

钢材1400万吨（加100万吨进口）来订的计划。王鹤寿讲过，即使搞到2000万吨钢，钢材不会超过1200万吨，加进口95万吨，不到1300万吨。邓小平说，问题摆得很明白，即使是1500万吨钢材，也不可能完成，所以存在危险。大家一致赞成这样一个办法，把计划定在确实可靠的基础上，宁肯超过，大家心情舒畅一点。想把我们的计划放在1100万吨钢材的基础上，钢1800万吨。保重点，冶金部18个企业，是1200万吨，赵尔陆的企业是100万吨，吕正操的企业是40万吨。不下这个决心，计划有危险。

毛泽东、周恩来都同意邓小平的意见。毛泽东还说：现在看，人心所向，横直没有东西，我们从来讲过的，钱只有这么多，现在是钢材只有这么多，看办多少事。

上海会议结束后，紧接着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

全会于4月2日开始，刘少奇主持。邓小平谈了全会日程：全会搞三个问题，一是肯定去年宣布的数字，确定今年的指标；二是讨论《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谭震林作说明；三是国家机构的组成方案。

邓小平在讲话中谈到1959年钢的指标落实：经过中央计委、经委、建委和各省摸的结果，加上原材料不足，从冶金设备、焦煤、采矿等方面考虑，今年只能搞2500万吨铁。最后核定钢的数字是1640万吨。即使搞不到1800万吨，搞1600万吨钢，那也比去年翻一番，钢材1100万吨也比去年增加80%，也并不丑。

周恩来讲话谈了三条经验：一是一定要有保险系数，统统打满不好，要留有余地，从北戴河以后步步退却，就是因为不落实；二是逐步提高定额，超额完成；三是实事求是。

自南宁会议批反冒进以来，周恩来很少说话，其实他在这里讲的订计划要留有余地、要实事求是的意见，以及邓小平讲的计

划要放在切实可靠的基础上的意见，早在1956年反冒进时他就提出来了。但是在大批反冒进以后，这些意见被当作右倾主张压制了下去。如今出了问题，重提这些不久之前还遭受批判的观点，大家听起来似觉如梦初醒。

12. 在经济困难的形势下，刘少奇当选为新一任国家主席

1959年4月18日至28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在这次大会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是继毛泽东之后担任国家主席的。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国家主席。到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前，毛泽东提出他不再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到适当时候不当党的主席。此后几年间，对毛泽东不再担任国家主席这件事，在党内外干部群众中已经作了充分的酝酿，1958年11月至12月举行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通过决定，同意毛泽东提出的不做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会议的决定中说：毛泽东同志是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的久经考验的领袖，在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以后，他仍然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领袖。

在酝酿新的国家主席人选过程中，曾考虑过几种方案，其中包括当时正担任国家副主席的朱德。朱德提议国家主席由刘少奇担任。他在给邓小平和书记处的信中说："我提议以刘少奇同志为国家主席候选人更为适当。他的威望、能力、忠诚于人民革命事业，为党内外、国内国外的革命人民所敬仰，是一致赞同的。"

中共中央接受了朱德的提议。在 1959 年 4 月上旬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一致通过以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向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议的国家主席候选人。邓小平在 4 月 5 日所作的《两个问题的说明（要点）——关于经济工作和国家机构的人事配备》的报告中，对这个问题作了说明："国家主席有好几位同志可做，如朱德同志，如党内几位老同志，都可以做，但是大家考虑的结果，以少奇同志担任这个职务，比较更为适当些。国家主席不单是一个很高的荣誉职务，而是有一些相当具体麻烦的事要做，例如出国、会谈、接待等等。所以，以少奇同志的能力和资望，以他现在在党内所负的责任，出而兼任国家主席职务，是比较好的。"

在 4 月 15 日召开的第 16 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就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候选人的提名方案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毛泽东进一步解释说："为什么国家主席候选人提的是刘少奇同志，而不是朱德同志？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刘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为什么是这个，不是那个？因为我们共产党内主持工作的，我算一个，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谁呢？是少奇同志。我一离开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这已经是多年了，从延安开始就是如此，现在到北京已经 20 年了。在延安，比如我到重庆去，代理我的工作的就是少奇同志。以他担任国家主席比较合适。是比较起来讲，不是讲朱德同志不适合，比较起来少奇同志更适合一点。同时朱德同志极力推荐少奇同志。"

4 月 17 日，刘少奇作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了会议议程，选出了 97 人的大会主席团。主席团推定刘少奇、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罗荣桓、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陈叔通、赛福鼎·艾则孜、程潜为主席团常务主席，彭真任大会秘书长。

4月18日，毛泽东主持大会开幕式，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

4月27日进行大会选举。会议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根据刘少奇的提名，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刘少奇还依据宪法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主席。根据刘少奇的提名，会议决定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程潜、张治中、傅作义、卫立煌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代表们用长时间热烈的掌声通过了选举结果，祝贺新的一届国家领导人当选。

当晚，全国许多大城市披上节日盛装，彩旗招展，霓虹灯闪烁，成千上万的群众敲锣打鼓，举着旗帜标语上街游行，欢庆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国家领导人，欢庆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当时有不少人在高兴之余就喊出了“刘主席万岁”的口号。后来，这件事传进刘少奇的耳朵里，他立即指示各地领导要劝阻群众喊这类口号。

当时有关方面曾就在报纸上登新任国家主席照片的事情向他请示，他坚决表示不同意：“我们是党领导一切，毛泽东主席是党的主席，登他的照片就可以了。”

这件事被毛泽东知道了，他当即表态说不登照片不好，一定要登。有人提了个折中的建议，是否让登出的刘少奇的照片比毛泽东的照片小一点儿。毛泽东生气地摇头说：“为什么要小一些，要一样大!”

从会场出来，刘少奇坐上轿车静静地回到中南海西楼甲号楼住处。西楼甲号如喜事临门。刘少奇的办公室秘书、警卫、服务人员和他的子女家人们，早已等候在门厅。刘少奇一进门，大家一齐迎上前去，高兴地同他握手，向他表示热烈祝贺。刘少奇却

表情严肃，脸上没有一点笑容。他向大家点了点头，便又像往常开会回来一样，匆匆地走到他的办公室里去了。这件事给予他家里的亲人们印象很深，以至于事过了将近 40 年后，他的夫人王光美仍能清楚地回忆起那一天的情景：

“那天知道他要当国家主席，连孩子带我 5 个，还有工作人员，都觉得应该好好祝贺，还准备了一把花，特别是孩子们，觉得爸爸当选是好事儿啊。他下车以后看见我们这么多人等候在门厅，没表情。他平常见了我妈妈都挺有礼貌，见了孩子也很亲热，那天呢，反而没表情。

大家以为他会很高兴地回来，因为他这表情，大家就有点没想到。我说：‘各干各的吧。’孩子们就散了。他上楼直接去办公室了，我跟着也上楼。我理解呢，这是受命于危难之中，在他那里，官不官的，从来没这概念。……他平时常说这样一句话：人民给你多大的权力，你就要负多大的责任。”

刘少奇没有太多的高兴，这也在情理之中。因为，此时大跃进的恶果已经逐渐暴露出来。他现在所担心的已经不是粮食多了怎么办，而是许多地方都在闹粮荒。

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使得他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的地位更加明朗化了。后来，毛泽东在与陪同英国退役元帅蒙哥马利到武汉的熊向晖谈话时，说起过这件事。毛泽东说：“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以前，两个主席都姓毛泽东，现在，一个姓毛泽东，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

可见，毛泽东安排刘任国家主席，意图是十分明确的。只是由于后来情况的变化，没有出现毛泽东所说的“两个主席都姓刘”的局面。

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再次选举周恩来担任国务院总

理。与刘少奇一样，周恩来此时也正在为遏止经济形势的日益恶化而努力工作。在4月30日召开的书记处会议上，周恩来说：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后，大跃进形势很好，但产量指标搞高了，打被动仗。总想知道一点，摸不到底，心情有些苦闷不安。去年钢的指标是不可能完成的。上海会议和人大会议，又把指标提出，还是问题。要注意党在国内外的威信，向党提出的东西，自己没有把握。不能泄气，要想办法，情况让大家了解后，大家想办法，共同努力。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这次会议决定，委托陈云对1959年计划尤其是钢指标计划进一步研究落实。陈云征求了各有关方面的意见，包括听取冶金部6次汇报以及国家计委各有关局的意见，然后召集中央财经小组进行讨论，拟定钢产量1300万吨。

5月11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厅召开政治局会议，详细听取陈云的汇报。陈云说：财经小组经常参加这次汇报会议的几个同志，富春、一波、赵尔陆同志和我，都同意钢材的可靠指标可以初步定为900万吨，钢的生产指标就是1300万吨。至于争取的数字，需待听取煤炭、机械、铁道等部汇报后，弄清楚这些部门的生产能力和运输能力，再来研究，这次暂时不议。

13. 在农村自留地等问题上，邓子恢与谭震林唱起了“对台戏”

大跃进运动中，邓子恢是被批判的对象。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多次讲话，在批评反冒进时，提到“两个速度的分歧”，一是在社会主义改造速度问题上同邓子恢的分歧，一

是在建设速度问题上同“反冒进派”的分歧。他说：邓子恢完全是资产阶级民主派那一套。搞“四大自由”，讲农民怕冒尖，认为不得了。要解除怕冒尖的恐惧，就大出布告，搞“四大自由”，这明明是和二中全会的方针作对。他没有搞社会主义的准备。

刘少奇连忙插话：问题已经解决了。

毛泽东缓和了一下，说：现在被说服了，积极了。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之后，邓子恢去庐山养病。8月底，从庐山回到北京。一回来，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就告诉他，中央指示在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试点。9月中旬，他特地随中央农村工作部机关干部去徐水参观。徐水的干部告诉他，徐水县成为一个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全县统一核算。干部还引导他参观了工厂、农田，他发现了棉田里有假，红薯地里不像亩产几万斤。他回来后心情很不平静，说徐水是“浮夸风”、“共产风”的典型。

没过几天，北京农业大学邀请他去参观学生种的水稻试验田。他高高兴兴地去了，到试验田一眼就看出是并田，许多亩并一亩。他同陪同的人员说，并田不能增产。随后，他又接到湖北省麻城县的一封群众来信，说该县领导干部强迫群众把成熟的水稻十几亩并成一亩，谎称亩产36000斤，本来是丰产反而弄成减产，要求中央制止这种作法。他立即把信转给杨尚昆，请中央公开制止。

1959年1月，邓子恢为召开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做准备。他仔细阅读各地的情况报告，从中觉察到，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解决了人民公社两个外部的界限问题，即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但对人民公社内部的体制，仍然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制度，仍然说供给制是“共产主义因素”，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这还解决不了农村“共产风”的问

题。他心中盘算，一定要设法改变这些引起广大农民不满的问题。

1月13日，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在他的主持下开幕了。会议分析了农村形势，讨论了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经营管理问题，整社问题。邓子恢在会上作了讲话，他说：公社体制原则上三级，公社、大队、生产队。公社规模不能太大，生产队100户左右，一个大队领导10个生产队。公社、大队、生产队的职权要划分清楚。对社员的生活资料，如果动了的，要先作价，后偿还，慢慢还都可以，但一定要还；对过去入社的投资也不要宣传取消。要实行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同时并举，副业生产不搞没有钱，第一步恢复有的，第二步发展新的，与有关部门签订合同。要保证多数劳动力用于农业生产。要搞好劳动组织，在农业社的基础上加以调整，不要和去年那样搞大兵团作战。社员在食堂吃饭，粮食要定量，节余归己。

听了邓子恢的讲话，谭震林说是刮西北风，第二天到会大谈大好形势和宝贵经验。邓子恢没有理会这些，他以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名义向中央写了《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报告》，对公社、大队、生产队分权问题，特别是对搞好劳动组织问题讲得更具体了，他说：要把生产队和生产小组按照各地生产条件迅速地定型和适当地固定起来，并按照“三定一奖”，即定产、定劳力、定投资和超产奖励的办法，迅速把今年的生产任务包下去。同时，田间管理到组的制度的责任制必须普遍地严格执行，有些地区继续实行农业社时期按人评工记分的办法，可以这样做。这些是为克服村与村、队与队、社员与社员的平均主义作出的努力。此外还提出了分配问题，说要保证90%以上的社员都增加收入，其余的不减少收入；争取做到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各占一半；使公社分配收入和家庭自产收入大约保持九比一的比例。他的这些意见，好些被后来中央在郑州、上海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形

成的《郑州会议纪要》、《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所吸收了。

4月中旬，邓子恢主持了全国夏收分配会议，并发表了讲话。刘少奇、谭震林到会听了他的讲话。他说这是人民公社体制下放后的第一次分配，农民在考验我们，关系到党群关系，要做到90%以上的社员增加收入。实现这个要求，需要从多方面来保证。这些方面他认为有：第一，要实行少扣多分，收入部分60%至70%要分配给社员，农业税、生产费、公积金、公益金等各项扣留不得超过30%至40%。县联社不提取公共积累。第二，粮食分配应统筹兼顾，征购任务要完成，种子、饲料要留够。第三，“三包一奖”必须坚持兑现，队与队的口粮可以不一致，社员可以多劳多吃。第四，工分和供给部分要适当调整，力求做到工分部分占60%至70%，供给部分占30%至40%。然后根据供给部分的多少，分别采用伙食供给、粮食供给或半粮食供给等不同供给办法。第五，食堂要积极办好，自愿参加。时间上可以自由，农忙时参加，农闲时可以不参加。供给部分要发给个人。第六，算账问题，必须彻底算。已算过账的，主要是退款退物；未算清的，现在是大忙季节，停一下，到秋后组织算账组，开社员代表会算。土地归队所有，调剂的要给代价，今后不能乱用地。此外，又一次讲到社队规模不能过大，过大的调整一下。

邓子恢的这些话，讲的是夏收分配，其实好多是向人民公社存在的两个平均主义发起的冲击。对邓子恢的讲话，谭震林不时插话，讲些不同意见，如说县联社可以提公共积累；粮食多劳多吃不能说；降低供给比例要非常慎重；吃饭不要钱是深得人心的，反对的是少数人；社队规模现在不要动等等，表现出了两人意见明显的分歧。

邓子恢很冷静，还是按自己的想法讲。刘少奇只是在听。不

过后来 5 月 26 日中央发布的《关于人民公社夏收分配的指示》，主要的还是邓子恢在这次会议上讲话的内容。

邓子恢从 4 月夏收分配会议上发现，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很不好，一是 1959 年的夏季农作物播种面积比 1958 年减少 1.1 亿亩，即减少了 20%，有 30%左右的春播土地缺乏底肥，今年农业任务有完不成的危险。二是夏粮、油菜籽等的征购刚开始，便出现进度很慢、远达不到要求的苗头。三是副食品供应紧张，市场上鱼、肉、蛋脱销。为挽救危局，他向中央提了两条建议：一是发个关于农业的紧急指示，强调一下各级党委的第一书记在 5、6 月两个月内，必须以抓农业为中心；必须加强麦田后期管理，保证增产；并尽量扩大春播和夏种的面积。二是宣布恢复人民公社化以来取消的自留地制度，发个关于给社员一定数量自留地以利发展养猪的指示。

自留地的问题在当时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邓子恢也知道，自留地是在对他的批判声中被取消的。但他还是不顾个人安危提出了这个建议。

中共中央采纳了邓子恢的建议，于 5 月 7 日发出了《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关于分配给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过了些时候，邓子恢感到问题的解决还不那么落实，他又代中央草拟了《关于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除了规定允许社员私人喂养家禽家畜，恢复自留地以外，还提出鼓励社员利用零星空闲的时间，把屋旁、水旁、路旁的零星闲散土地充分利用起来；屋前屋后的零星树木仍为社员私有，由社员经营。县人民委员会要把这四件事，用布告的形式向群众公布，并且认真执行。

6 月 11 日，中央发布了邓子恢草拟的这个指示。

在自留地问题上，谭震林不同意邓子恢的意见。谭震林向毛泽东汇报说：浙江、福建、广东地少人多，每人只有 1 亩地，甚

至7分、8分地，5%的自留地会影响集体生产。毛泽东听了觉得很有道理。

6月16日下午，邓子恢去中南海游泳池游泳，碰到毛泽东也在游泳池。他俩游了一会儿，一起上岸休息。毛泽东谈起了自留地的问题，提出不要全国统一规定5%，要允许各地因地制宜，并发一通知。对于毛泽东提出的问题，邓子恢当时没有做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只是说研究一下。回到家里，他感到事关重大，急忙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地少人多，每人分地只有1亩，甚至7、8分，似乎留5%会影响集体生产，我认为这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自留地是按百分比留的，不是机械规定，每人或每户几分地，分地少的地方，自留地当然也就少。……全国现有耕地16亿亩，按5%留自留地计算，总共不过8000万亩。花了这8000万亩地，可以解决5亿农民的蔬菜供应，可以发展私人养猪、养鸡、养鸭，这样做的好处，至少可以使5亿农民不再向市场来争购副食品，有的农民还可以挤出一些副食品来供应市场。我认为这是最合算不过的措施。只要把5亿农民安顿好了，我们的市场就稳如泰山。……农民留一点自留地，由他自己支配，加上供给部分分配到户，这样农民就有可能自己支配自己的生活，不致全部生活来源都掌握在干部手里，这对防止强迫命令也有很大作用。因此，我主张关于自留地问题，中央不必再发通知。

邓子恢的信第二天毛泽东就收到了。此后，毛泽东再没有提自留地的事情。农民的自留地算是保护下来了。后来自留地成了农民的保命地。

第六章　历史在庐山拐了个弯

1. 离开燥热的环境，中共要员聚首庐山开“神仙会”

1959年的庐山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重要会议。会议在大跃进期间举行，但其影响却不仅局限于大跃进运动。关于这次会议，人们有着永远也讲不完的故事，永远也发不完的感慨。

庐山会议，事实上是包含着两个会议在内的。一个是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另一个是8月2日至8月16日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

自从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中共中央通过一系列的会议，对大跃进中的高指标、瞎指挥、共产风、浮夸风等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评和制止，但问题仍很严重。为了在更大的范围内来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高层领导人决定，7月份在庐山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也包含着让人们休息一下的意思。

1959年6月13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会议，为庐山会议做准备。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方面的领导人共30多人。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工业、农业和市场等问题。

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中说：不晓得讲了多少年的有计划按比例

发展，就是不注意，横直是一样，就是高炉、平炉、小转炉，各个部门的联系，重、轻、农的联系就没有顾到。现在是6月13日，今年还可以抓7个月，这7个月就要搞平衡。

周恩来是6月9日刚结束对河北的视察回到北京的。经过半个月的调查研究，他对生产形势有了更切合实际的认识。他在会上说：工业布局上的毛病是生产资料上的指标定高了。现在要增加生活资料的生产，把生活资料的比重提高一些，比较有利。他还说：现在要公开讲增产节约，具体办法是多抓商品性生产、抓食品定量、压缩购买力、减人。他提出：对基本建设的调整，可以采取有的下马不搞、有的休息、有的慢步、有的快步的方式进行。他还要求尽快成立支农小组，先抓机械、化肥、水利。

李富春也在会上讲了话。他说：今年总的经验，第一是有计划按比例的综合平衡不够。工业方面注意了重工业，对轻工业注意不够，特别对手工业注意不够。轻工业中对大商品注意了，对小商品注意不够。

在李富春讲话时，毛泽东频频插话，讲了许多自己的意见。当李富春谈到综合平衡时，毛泽东说：工农商都要挂帅，只是工业挂帅，农业不挂帅不行，要有点霸道，不要太王道。谈到高指标，毛泽东说：本来是一些好事，因为一些指标定得高了，使我们每天处于被动。工业指标、农业指标中，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性不认识。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是不会转弯。

谈到农业究竟增产多少的问题，对“增产三成”，毛泽东表示怀疑。他说：假定有三成，全国也只有4800亿斤。今年根本不要理那个10500亿斤的指标，就是按去年的实际产量，今年只增一成、二成、三成。听说包产的结果是6000亿斤，但是我看，我们过日子还是放在4800亿斤的基础上。本来是富日子，也照穷日子过，这样安排好。工业，明年的指标切记不可高，我看大

体就按今年的指标，低一点也可以。

在谈到食堂问题时，毛泽东说：食堂，保持有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的人吃就可以了。至于要不要钱，一种人是吃饭要钱，一种人是吃饭不要钱。老、弱、五保户不要钱，其他的要钱。他还说，现在食堂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我想出去跟省委书记谈一谈。粮食要分给本人，你愿意吃食堂，就自愿参加，不愿意可以不参加。这样就主动了。

这次会议为庐山会议做了准备。从这项准备工作看来，庐山会议的初衷并没有什么“火药味”。以后会议的实际进程确实大大出乎了人们的预料。

1959 年 7 月 2 日，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中央负责人，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以及国务院和工交、财贸各部门的负责人。原来预计这次会议只开半个月。

会议开始时，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提出了 18 个问题请大家讨论。这 18 个问题是：第一，读书；第二，形势；第三，今年的任务；第四，明年的任务；第五，4 年的任务；第六，宣传问题；第七，综合平衡问题；第八，群众路线问题；第九，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提议工业产品的质量问题；第十，体制问题；第十一，协作区关系问题；第十二，公社食堂问题；第十三，学会过日子问题；第十四，三定政策；第十五，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第十六，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第十七，农村党团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第十八，团结问题。

毛泽东在会上说：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

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

国内形势是好是坏？大形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会议的方针对不对？我看要坚持。总的说来，像湖南省一个同志所说的，是两句话：“有伟大的成绩，有丰富的经验”。“有丰富的经验”说得很巧妙，实际上是：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的问题，前途是光明的。

从毛泽东的上述讲话来看，他并不认为大跃进什么都好，但是，他更愿意听到像“有丰富的经验”这类颇为巧妙、委婉的批评。而对于直截了当的批评还是反感的。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到的那位“湖南省的一个同志”就是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周小舟和毛泽东同乡，也是湖南湘潭人，学生出身，抗日战争以前就给毛泽东当过秘书。小舟这个名字就是由毛泽东叫他“小周”叫起来的。毛泽东在上庐山前，曾回老家韶山住了几天，周小舟一直陪着毛泽东在水库游泳并与村民座谈。“有伟大的成绩，有丰富的经验”就是周小舟在陪毛泽东到韶山时说过的话。毛泽东很欣赏他的这句话。但是，在庐山会议进行期间，由于周小舟赞成彭德怀的一封信中的某些观点，竟被打成了“反党集团”的骨干成员。这种结果是周小舟、毛泽东当时都不曾想到的。

毛泽东还说：今年钢的产量是否定 1300 万吨？能超过就超过，不能超过就算了。总之，要量力而行，留在余地，让下面超过。去年做了一件蠢事，就是要把好几年的指标在一年内达到。对于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问题，毛泽东说：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关系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黄敬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

毛泽东还谈到了综合平衡和两条腿走路的问题。他说：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

此外，毛泽东还讲了公共食堂不要一哄而散，都搞垮了，保持20%也好。讲了富日子当穷日子过等问题。

从毛泽东提出的18个问题及其说明，可以看出，召开庐山会议，是为了进一步总结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将各种指标落到实处，以便更好地实现1959年的继续跃进。

周恩来也曾谈到过大家初上庐山的心情。他说：那时候，是本着一年的党的总路线的执行情况，跃进了一年，大家都很忙，找到庐山来把经验总结总结。主席说了，也带一点休息的意思。这一年的大跃进成绩伟大，有些问题，逐步在解决，已经解决了不少，剩下的还在解决中，在认识上前途是光明的。是这样的心情，这样的意思上山的。

从7月3日到10日，会议按6个大行政区编成小组进行讨论。在讨论会上，大家围绕毛泽东提出的18个问题展开讨论。当时会议气氛比较轻松，白天开会、读书、看文件，彼此交谈；晚上看戏、跳舞；清晨、傍晚还有人登山观日出、游览风景、名胜古迹。加上伙食也搞得很好。毛泽东还不时作诗，别人也作诗相和。因之，这一段会议被人称为“神仙会”。

会议进行中间，中央领导分头到各小组参加会议。7月4日，刘少奇在西南组的讨论中说：1958年出了些乱子，得到了有益的教训，碰到钉子知道转弯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应当因

为碰了钉子而失望、而抱怨，碰了钉子就要转弯。大家注意在转弯的时候，千万不要泄气，而要更好地鼓气！他提出，国民经济的发展是需综合平衡的，你不管它，它要管你！它不向你让步，你要向它让步！什么叫做经济工作越做越细，就是要做到有计划、按比例、有组织、有节奏的均衡发展。高速度发展，这是从总的趋势来说的，它的发展规律，只能是波浪式前进，而不是直线上升的，不能要求每一年都用同样的速度大跃进。

在相对轻松的气氛中，庐山会议也确实解决和提出了一些问题。

7月3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了李先念起草的《中央关于在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认为这是一个好文件。7月4日，中央批准了这个指示。5日，毛泽东批发陈国栋起草的《关于1959年至1960年度粮食分配和粮食收支计划调整意见的报告》。毛泽东在批示中说：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要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余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同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肥猪收购和农村食油供应问题的几项通知》。此外，还印发了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党组《关于贯彻执行1959年基本建设计划调整方案的报告（草稿）》。

7月10日，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冬种准备会议的报告》；12日，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关于一部分公社党委的领导方法和干部作风方面的情况简报》；14日，中央批转《林业部党组关于木材生产问题的报告》；同日，印发了国家计委党组《对1960年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任务和速度的初步意见》。

2. 彭德怀的发言虽然尖锐，但并未引起太大震动

彭德怀上庐山时，心情是沉重的。

1959年初，彭德怀越来越感到大跃进运动问题严重。于是，他回到湖南家乡去作调查，决心把有些情况弄个水落石出。

彭德怀在湖南作调查，是由省委书记周小舟陪同的。

周小舟陪同彭德怀先到了湘潭县乌石大队彭家围子所在的卫国人民公社。周小舟告诉他：前些时候湖南省委开过一次常委会，会上大家都不同意把当年的粮食产量估计那么多，也不同意把次年的粮食产量指标定得那么高。所以，近几个月湖南老是挨批评，还被拔了“白旗”。可是后来证明，“插红旗”的某些省粮食相当紧张，而他们这个被拔了“白旗”的省，粮食倒还富裕。竟出现了“红旗省”向“白旗省”借粮的怪事。

谈到土法炼钢，周小舟说：全省共建起5万多个小土高炉，生了火的还不到一半，出了铁的就更少。

谈到公共食堂，周小舟告诉彭德怀：公社食堂没有给群众带来什么方便，反而造成人力物力的很大浪费。

周小舟还认为，供给制穷的时候不能搞，富裕的时候也不能搞。

听着周小舟的介绍，彭德怀发现，湖南的情况和他在甘肃河西走廊看到的情况十分相似。他更感到这次回乡作调查的必要。

为了便利于听到群众的真实反映，彭德怀没有住招待所，而是住进了彭家围子自己的旧居。到家乡的当天晚上，乡亲们都来看望，老人、妇女、孩子，挤了满满的一屋，问长问短。彭德怀

向乡亲们宣传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询问群众的生活和生产情况。在公社和大队干部座谈会上，当有的干部谈到今年粮食大丰收，吴公塘生产队亩产过千斤时，彭德怀未敢轻信。他立即同干部们步行数里来到吴公塘田边，打着手电筒，蹲下身来，拔起一兜禾茬，数着一兜禾上有多少株稻杆，每个穗上大约有多少颗稻谷，细心计算着每亩地的产量。他对干部说：我最近看过不少地方，有的讲亩产几千斤，上万斤，吹得很厉害。老实说，我是有怀疑的。我们当干部的，办事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搞浮夸。

听公社干部说，他们公社的炼铁厂出了640多吨铁。彭德怀就去看了公社炼铁厂。情况和他在别处看到的一样，是“大兵团作战”。事后，他跟公社干部算了算账：为了炼那么一点铁，集中公社、大队全部劳力运料，丢开农业生产，让稻谷烂在地里；为了解决燃料问题，拆毁了社员许多住房，砍伐了大片山林；为了收集原料，连社员的农具和做饭的铁锅都砸了……这是多么大的代价呀！彭德怀对干部和社员说：过去技术落后，民间需要制造农具用这种小土炉炼铁。现在大规模这样搞，看来不是好办法。

在乌石学校，彭德怀看了教室和教员们的宿舍，尝了学生们的饭菜；在赵家弄子大队，彭德怀参观了设备十分简陋的幼儿园；在许家塘大队敬老院，彭德怀和几位少年时代的伙伴进行了亲切交谈，得知他们每餐每人只能吃到二三两米（16两1斤），数九寒天老人们还睡在光光的篾席上，连褥单都没有，被子也破烂不堪。彭德怀紧锁着眉头忍不住说：这叫什么敬老院、幸福院！

他捐了200元钱给幼儿园，为孩子们买一些生活必需用品。还捐了200元，让干部给敬老院添置些铺垫。

故乡之行，使彭德怀感触最深，让他最感不安的另一件事情是农村干部的领导作风问题。许多乡亲们向他反映，由于上边给

的任务又重又急，基层干部的领导作风也就越来越坏。不讲民主，强迫命令，随便打人、骂人、捆绑人的现象，相当普遍，而且愈来愈严重。

彭德怀和周小舟离开乌石以后，又到毛泽东的故乡韶山公社，所见所闻与乌石大队大同小异。随后，彭德怀来到他30年前举行起义的地方——平江县。在这里他无心重温那些轰轰烈烈的往事，集中精力考察了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在参观平江县工农业生产展览馆时，他吃惊地发现有两个数字是颠倒着公布的：把收成最好的1957年的粮食高产数字，公布为1958年的产量；而把1958年较低的数字，说成是1957年的产量。彭德怀后来忆及此事，还感叹地说：如此造假，真令人害怕！

平江考察中，还有一件事使彭德怀终生难忘。一位土地革命战争时负伤致残的红军战士，在人群中悄悄给他一张纸条。彭德怀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

彭德怀小心翼翼地把纸条夹在自己的笔记本里。事后，他在笔记中写道：这是群众多么沉痛的呼声！

在株洲，彭德怀与薄一波相遇，谈到当年粮食产量时，彭德怀更有把握地说：实产粮食数字可能没有估计的那样多，今年征1200亿斤粮食是很勉强的。如果征了过头粮不仅将来返运困难，而且会影响农民生产情绪。估计征购900亿斤为宜。薄一波建议彭德怀给中央发个电报。他便写信给中央，建议把当年的征购粮减到900亿斤。

这是彭德怀在大跃进中，第一次就经济建设问题向中央提出建议。

1959年3月25日至4月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先后在上海举行，议题是检查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和通

过 1959 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会上毛泽东有个讲话，令彭德怀料不到的是，毛泽东在会上重提历史旧事，说哪些人曾反对过他，其中说到自己与彭的关系时说："彭德怀恨死了我的。"并说："我对彭德怀的态度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话分量是很重的。

这年 5 月，彭德怀访问了东欧一些国家，6 月中旬回到北京。回国后就接到了中央关于召开庐山会议的通知。由于出国的疲劳，彭德怀本不准备参加庐山会议。他对总参谋长黄克诚说：我现在很疲劳，想休息一下。庐山会议请你参加，因你是书记处书记，地方和军队情况都比较熟悉。黄克城不同意，认为，中央又没有通知我去，庐山会议还是你自己去的好。

7 月 1 日，彭德怀上了庐山。据保健人员回忆，彭德怀在去庐山的火车上，吃饭极少，保健人员问他"为什么吃这么少，是不是在车上睡眠不好?"他用手向窗外指了指，说道："看看外边，这叫人怎么能吃得下去。"原来远处站着许多人，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手把栅栏，呆望着车厢。显然都是农民。当时在车厢里还坐着中央各部委参加会议的领导人，只有彭德怀注意到了车外的惨景。

彭德怀幼年过着极其贫苦的农家生活，老祖母常带着小弟弟出外讨饭，他的一个弟弟是活活饿死的。终其一生，他没有忘本，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在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已经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朱德在一个发言中还说："彭总在生活方面注意节约，艰苦卓绝，谁也比不过他。"

彭德怀上庐山时，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已先后上了山。陈云和邓小平因健康原因没有上山。

彭德怀分到了西北组。从 7 月 3 日到 10 日的 8 天中他共作了 7 次发言和插话。主要是讲：

人民公社我认为早了一些，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就公社

化，而且未经过试验，如果试验上一年半年再搞，就好了。毛泽东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提的增产数，实际没那么多，我去了解实际只增产16%。我又问了周小舟同志，他说那个社增产只有14%，国家还给了不少帮助和贷款。主席也去过这个社，我曾问主席，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有谈这个事，我看他是谈过。

北戴河会议以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办钢铁这个口号究竟对不对？全民办工业，限额以下搞了13000多个，现在怎么办？每个协作区、省要搞个工业系统，这不是一两个五年计划能办到的事情。

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

1957年整风反右以来，政治上、经济上一连串的胜利，党的威信提高了，得意忘形，脑子热了一点。解放以来，一连串的胜利，造成群众性的头脑发热，因而向毛泽东主席反映情况只讲可能和有利的因素。在大胜利中容易看不见、听不见反面的东西。

去年忽视了《工作方法六十条》中的一切经过试验，吃饭不要钱那么大的事，没有经过试验。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有人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1070吨钢是毛泽东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有责任！我也有一份，至少当时没有反对。主席最伟大的地方在于能及时发现问题，弯子转得快，如果没有郑州会议，经济会被破坏。

政治与经济各有不同的规律，因此思想教育不能代替经济工作。毛泽东主席与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了，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乱传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

基层党组织的民主问题要注意，省、地的民主是否没有问题呢？现在是不管党委的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

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此外，在毛泽东主持的一次中央常委会上，彭德怀郑重地讲到：要高度重视粮食生产，东欧人民生活水平比中国高得多，还出了匈牙利事件。又讲全民炼铁，国家与地方补贴共 50 多亿，比一年的国防开支还大，用这笔钱去买消费物资，堆起来怕有庐山这么高呀。

毛泽东听了彭德怀的话不大高兴，就说：不会有庐山这样高。

彭德怀说：那就矮一点吧。

3. 眼看会议就要结束，彭德怀送出了一封不同寻常的信

在“神仙会”期间，参加各组讨论的绝大多数人，根据毛泽东提出的 18 个问题，都发言赞成总结经验，继续纠“左”，有些人还作了自我批评。但是，也有一些人是护短的。他们认为“左”的错误已经纠正得差不多了，现在的问题是纠“左”泄了干部和群众的气，出现了右倾错误。这样会议中便出现了多数人与少数人之间的意见分歧，特别是对大跃进运动和前一段纠“左”的看法更不一致。

针对讨论中出现的意见分歧，7 月 10 日晚，毛泽东召集各组组长开了一次会。在会上，他批评党外右派否定一切，批评党内有些干部说去年大跃进得不偿失。他说：1958 年的大跃进运动确实存在一些缺点错误，从具体事实来说，确实有些得不偿失的事。但从全局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算总账

不能说得不偿失。他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生的问题，经过郑州会议和庐山会议，已经逐步解决了。他还一再提出坚持农村公共食堂和社员分配中的部分供给制。对今后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他的设想仍然过高。毛泽东在讲话中虽然也继续指出 1958 年以来的一些“左”倾错误，但讲话重点已经转向指责党外右派否定一切，和批评党内干部的得不偿失论。毛泽东在讲话中还明显支持党内少数护短的人的意见，认为原来存在的一些缺点、错误，已经逐步得到了纠正，纠错的任务已基本完成，并想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这种认识上来。在这个会上，毛泽东还讲了会议的安排，他说会议初步安排到 15 日结束，延长不延长到时再定。

按照预定的安排，庐山会议应于 7 月 15 日左右结束。14 日，会议印发了胡乔木等人起草的《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这个记录共包括 12 个问题：第一，关于形势和任务；第二，读书；第三，宣传问题；第四，综合平衡问题；第五，群众路线问题；第六，加强企业管理和提高产品质量的问题；第七，体制问题；第八，协作关系和协作区的问题；第九，组织农村集市贸易问题；第十，过日子问题；第十一，公社食堂问题；第十二，加强农村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这个《议定记录》反映了毛泽东提出的 18 个问题和庐山会议初期讨论的情况，即肯定了成绩，也讲了缺点，并有许多指导性的具体规定。虽然它规定的工农业生产增长速度仍然过高，即工业增长 20%左右，农业增长 10%～20%。但这个文件也是一个成果和进步，如能真正贯彻到实际中去，也会起一些好的作用。然而，随着后来庐山会议进程和性质的改变，这个《议定记录》也被一笔勾销了。

彭德怀眼见会议就要结束，而并未采取解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的根本措施，心中十分忧虑。他觉得问题如果得不到纠正，计划工作不能迎头赶上，势必要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

他认为，如果自己在会上提出这些问题，可能会导致思想混乱；但如果由毛泽东提出，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纠正。于是，彭德怀萌发了给毛泽东写信反映看法的念头。

彭德怀把自己准备给毛泽东写信的意思跟周小舟说了，周小舟认为这样不好，他要彭德怀亲自找毛泽东谈谈。

彭德怀接受了周小舟的意见，他决定找毛泽东面谈一次。对这次面谈，他是很重视的，头一天夜里他就准备了谈话的腹稿。

7 月 13 日早饭后，彭德怀来到毛泽东的住处。但警卫员告诉他："主席刚刚休息。"毛泽东历来就有夜里工作，白天睡觉的习惯。而且毛泽东入睡十分困难，这是他周围的人十分清楚的，也是任何人不敢轻易打扰的。

话没谈成，彭德怀决定还是给毛泽东写一封信，陈述自己的看法。当天中午彭德怀手持拟好的提纲，向随从参谋口述了详细内容。参谋记录整理后，他亲笔修改两遍，参谋誊抄两次，于 14 日下午送与毛泽东。后来追逼这封信的起草过程时，都怀疑周小舟参与其事。为了避免连累身边的工作人员，彭德怀一口咬定是他自己一夜之间写出来的，从来不讲随从参谋作记录的事。

彭德怀的信约 4000 字，分为甲、乙两个部分。在甲部分里，彭一方面肯定三面红旗的正确和成绩，另一方面指出其缺点和错误，并提出解决的办法。他认为：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在乙部分中，彭用了较长的篇幅，强调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他指出：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在信的结尾，他写道："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

4. 风向初变，毛泽东要求会议“评论这封信的性质”

7月14日，毛泽东接到了彭德怀的信。16日，他将这封信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和“印发各同志参考”的批语，发给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人。此后，毛泽东召集各政治局常委开会，提出“评论这封信的性质”的要求。

把一封交给个人的信件冠以“意见书”的名义并印发所有与会人员，毛泽东的这一行为已属超出常规。而且他还要大会评论这封信，也就是说会议的议题开始转变，转为评论这封信。这就预示着中共党内一场新的斗争即将开始。

按照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作出决定，将会议延长一周左右，主要讨论彭德怀的信，让与会者把意见都讲出来。另外，通知林彪、彭真、薄一波、黄克诚、安子文等人上山。这后一项决定，后来被人们解释为“搬救兵”。

7月16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重新划分小组，将原来按地区分的六个小组，改为各地区穿插编配的六个小组。由于代表们开始还不理解毛泽东将彭德怀的信冠以“意见书”批发给他们的起初意图，没有理会毛泽东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的深刻含义，还由于17日又传达了刘少奇在会议前期于西南组讨论会上关于“成绩讲够，缺点讲透”的讲话，与会的大多数人没有觉察出会议将会急剧转向。

从16日至22日，会议仍按照前段“神仙会”的形式继续进行，大家围绕彭德怀的信展开讨论。对于这场讨论，彭德怀后来在自己的笔记中是这样估计的：多数同志基本上是同意的，但其

中不少人认为，某些字句值得斟酌；有些人对第二部分意见较多，认为讲得过于严重了；完全同意或根本反对的则是个别人。还有许多人没有发言。

彭德怀的估计是符合事实的。在讨论这封信的前一段，大家根据自己的认识谈对这封信的看法。很多人同意彭德怀的信。认为这封信既肯定了大跃进的成绩，又指出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但有些提法不够确当，需要斟酌，如“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等。至于对彭德怀敢于发表自己意见的精神，大家几乎是一致肯定的。

值得稍微详细谈一下的是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的情况，因为，后来他们和彭德怀一道被打成一个“反党集团”。

黄克诚是 17 日上山的。上山后刚进住房，彭就拿着他写给毛泽东的信给他看。黄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说这封信提的意见我赞成，但信的写法不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那样干什么？

彭德怀说：实际情况那么严重，会上没有人敢说尖锐的话，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视。

黄克诚说：你总是感情用事，你和主席共事多年，应该互相了解较深，这些话何不与主席当面交谈，何必写信。

当天晚上或第二早晨，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人到了黄克城的住处看望。谈起话来，三位来客意见一致，都认为：不改变“左”的方针不行，而且感到会议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黄克诚因刚来，不了解情况，就说：不要急，先看一看。

随后，黄克诚又和李先念谈了谈，李先念也认为当时的做法太过了，一定要改变才行。

接着，黄克诚又和谭震林交谈。谭是“激进派”，与黄克诚意见完全相反。而且谭还问黄克诚：你为什么先去看先念，不先来找我，你受先念影响了。黄克诚说：我和先念有些看法相同，

不能说是受他影响。然后，黄克诚就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因而和谭震林吵了起来。谭震林还发火说：你是不是吃了狗肉，发热了，这样来劲！你要知道，我们找你上山来，是搬救兵，想你支持我们的。黄克诚说：那你就想错了，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反兵”一词本为随口说出，意思不过是说自己持有一种与谭震林不同的意见而已。但后来被揭发出来，成了他反党并参加“军事俱乐部”的一个证据。此是后话。

18日到19日，开小组会，讨论彭德怀的那封信。黄克诚于19日发言，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支持了彭德怀的意见。黄克诚最担心的是粮食问题。会议上把粮食产量数字调整为7000亿斤，说是：6亿人口，人均产量超过千斤，粮食过了关。黄克诚说：不对，这个数字不符合实际情况。同在一组的罗瑞卿、谭震林不同意他的观点，发言批评他，他还与之争论了一通。

周小舟在19日的小组会上说：彭总给主席的信，我认为总的精神是好的，我是同意的，至于某些提法、分寸、词句，我认为是可以斟酌的。

21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三个小时的长篇发言，根据大量事实，客观地、深刻地分析和总结了1958年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强调应着重从思想观点、方法、作风上去探讨原因，认为民主风气很重要，领导者要造成一种风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提意见，并明确表示支持彭德怀的信。他说：“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他说，成绩是基本的，同大家说的一样，个别说法，说得多一点少一点，关系不大。”

即使在总的方面不同意彭德怀信中观点的人，对他的精神也是肯定的，说他有什么意见就讲出来，对这次会议深入一步展开讨论，起了好的作用。

但不管怎样，分歧已经产生，“神仙会”的轻松气氛不复存在，会议的空气变得紧张起来。

在分组讨论彭德怀的信的过程中，彭德怀本人在西北组作了一个很重要的插话，说他写信时的心情：大跃进的成绩是伟大的，任何人（包括反对派）也推翻不了，一些缺点也已经基本纠正了；但有些思想作风上的毛病，还需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才能克服。因此，在肯定了成绩之后，必须正视缺点，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教育全党。他听说 15 日要闭会，有些意见未讲完，心里放不下，仓促写了这封信，文字上、逻辑上有些缺点，没有能准确表达本意。建议会后把他的信收回。这个插话虽短，但表明彭德怀在听到许多反应之后，已感到不安，感到那封信在文字上“有懈可击”，怕引起不好影响，要收回自己的信，以免再向下扩散。可是，毛泽东并不想就此平息这件事，后来，彭德怀的这段话被认为是假的，不是本意。

5. 庐山会议风向剧变

庐山会议的斗争很激烈，但起初，这种斗争却被毛泽东、彭德怀之间称为“骂娘”。彭德怀对毛泽东说：“华北会议骂了我 40 天的娘，难道庐山会议骂你 20 天娘还不行?”

毛泽东对此当然十分反感，一再提起这话：“我们欠了 20 天的账，我看要补足 20 天，还是要 40 天”，还说“再加 5 天”，“满足骂娘的欲望”。

7 月 23 日之前，会议虽然有了一些紧张气氛，但讨论总起来说还是正常的。没有形成群起而攻之的局面。

对于这一段会议，毛泽东 8 月 2 日晚，在八届八中全会的小组长通气会议上说道：“23 日以前，你们并不晓得中央常委对这

封信的评论，我们没有跟你们讲过，混乱了一个星期，各人自己打主张嘛！23日以后就起了一个变化。”

诚如毛泽东所言，7月23日，庐山会议风向剧变。

7月23日早晨，会议秘书处通知大家开会，听毛泽东的讲话。据毛泽东的兼职秘书李锐讲，他们当时根本不知毛泽东要讲什么，还做过种种猜测，而且他还说：“据传，其他常委也同大家一样，是临时得到通知的。”如果李锐的这种回忆与分析可靠的话，就是说，毛泽东没有同任何人商量，便决定召开大会发表讲话，从而改变庐山会议的方向。

毛泽东的讲话，有人说是“乱石铺路”，说古论今，有一定的文彩。

毛泽东开头便说：“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一共讲了将近两个小时，涉及到了许多内容，主要是对彭德怀的信进行批驳。他讲到了“比例失调”，讲到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讲到了“有失有得”。他的一些说法很难令人信服，但态度是明确的：彭德怀是资产阶级的右倾动摇。

他说：“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二次党代大会讲过，对于1956年、1957年的那种动摇，对动摇分子，我不赞成戴帽子，讲成是思想方法问题。也不讲小资产阶级，也不讲资产阶级。如果现在要讲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什么性？狂热？资产阶级它不狂热，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的泄气性、悲观性了。我们那个时候不戴帽子，因为这些同志跟右派不同，右派不搞社会主义，那些同志是要搞社会主义，没经验，一点风吹草动，就以为冒了，于是反冒进。(讲到这里，他偏过头对坐在旁边的周恩来说）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极大，是个乐观主义了。因为

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来了，他也会站住脚的。那次批周恩来、陈云的人，这一次取其地位而代之。有点那个味道，没有那么深，但是也相当深，就是不讲冒了。不讲反冒进，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这就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往往是受资产阶级影响，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压力之下，右起来的。”

这部分讲话，通过批驳“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来点明锋芒所向是指彭德怀。后来对这个问题，彭德怀还专门作过解释，说他的信原稿里写的是“有得有失”，但秘书抄写时抄成了“有失有得”。但毛泽东仍不依不饶，一口咬定这是彭德怀“仔细斟酌了的”。其实，“有失有得”与“有得有失”在意思上没有什么不同，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咬文嚼字，确实是有些强辞夺理。



毛泽东与彭德怀在一起。

毛泽东的讲话有两点格外引人注意：一是毛泽东在讲话中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现在这个原则我也不放弃；二是毛泽东说：如果解放军不跟我走（我看解放军会要跟我走），我就跑到农村去，另外组织。这两点表明，毛泽东认为彭德怀的信是“犯”了他，他已下决心进行反击！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此外也不排除其中还有一些个人性格方面的因素。

彭德怀出身于贫寒，从小就是反抗性极强的人，而且总是带头为首。战争年代，他纵横驰骋，横刀立马，军功极大，地位很高。建国后，他对歌功颂德看不惯，而且敢于直言，从不怕得罪人。

曾有一次，毛泽东对彭德怀开玩笑似地说：老总，咱们定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可见毛泽东对彭德怀顾忌之深，而彭德怀并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说就说。

在庐山会议上，导致毛泽东、彭德怀分手的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对待大跃进运动的不同看法。

在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也在想方设法做些调查研究。但由于他的特殊地位，他已很难看到真实的情况了。他的卫士长李银桥曾回忆过当时的情景：

“毛泽东视察各地，又来到河南。请一些同志来开调查会时，毛泽东反复问：‘大食堂究竟是怎么样？好还是不好？你们要说实话。我希望你们讲真话。’

大家异口同声说好。不但举出许多优越性，还拿出许多面包来，说是大食堂烤的，（农民）就是吃这种面包……毛泽东吃着也很满意：‘嗯，要是全国的农民都能吃到这种面包，大食堂还是可以的。’

他仍然不放心。他也想搞‘突然袭击’，看看实情。记得有次专列正在急驰，他突然指着远处一个村子，吩咐我：‘通知停

车。我要到那个村子里去看看，我要讨一碗红烧肉吃，看能不能讨到?’我立刻去打电话，先打给上级有关部门，然后再去（这是制度)。等毛泽东来到那个村子，不要说讨一碗红烧肉，就是讨一只烤小猪也早准备好了。”

临上庐山前，毛泽东还到了他的老家韶山冲。在那里，他所看到的也是一番丰收景象。他很高兴，还写下了“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诗句。在这种情况下，接到彭德怀的信，他自然是不能接受的。

在毛泽东讲话时，刘少奇通过多次插话，表明了自己站在毛泽东一边。

毛泽东讲：“要快之事，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我搬出马克思来，使同志们得到一点安慰。这个马克思，天天想革命快，一见形势来了就说欧洲革命来了，无产阶级革命来了，后头又没有来，过一阵又说要来，又没有来。总之，反反复复。马克思死了好多年，列宁时代才来。那还不是急性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马克思也有啊!”

刘少奇插话：“列宁也有，讲世界革命很快就要来了。”

毛泽东讲：“世界革命，那个时候他希望世界革命来援助，他也搞和平民主新阶段，后头不行了，搞出一个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这在以前也讲过吧?”

刘少奇插话：“是一国可以胜利，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没有讲。”

毛泽东讲：“一国可以胜利，到这个时候，不建怎么办？只有一国。”

刘少奇插话：“依靠自己本国的农民可以建成社会主义。”

听过毛泽东的讲话后，彭德怀心情十分沉重。直到后来身陷囹圄，他仍清楚地回忆起当时的情形：“7 月 23 日上午，主席在大会上讲话，从高度原则上批判了那封信，说它是一个右倾机会

主义的纲领，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有目的的。并且指出我犯了军阀主义、大国主义和几次路线上的错误。听了主席的讲话，当时很难用言语形容我沉重的心情。回到住所以后，反复思索主席的讲话，再衡量自己的主观愿望和动机，怎么也是想不通，当时抵触情绪很大……当晚怎么也睡不着，直到天亮还在想：我的信是给主席作参考的，为什么成了意见书呢？为什么能成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呢？为什么说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呢？”

23 日之后，彭德怀就再没有到餐厅同大家一起吃过饭，他的心情自然是非常沉重的。23 日早上散步时，他遇到聂荣臻，聂荣臻问他对毛泽东讲话的感想，彭德怀说：“是非曲直由人断，事久自然明吧。”这是他对过去许多历史误会一贯持有的态度。聂荣臻劝他认真考虑，要作检讨，对党有利。他反复考虑，毛泽东讲得那么严重，不作检讨是不行的，否则弯转不过来。

彭德怀请了两天假，反省过去的种种问题。尽管内心矛盾重重，26 日，他还是作了检讨，承认思想方法上有片面性，信中对如何肯定大跃进的成绩，以及研究经验教训的看法，是有错误的。关于写信的原因，他说：“我写这封信时，是希望在这次会议上能够深刻地研究和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使我们的建设工作搞得更好一些。这是出发点和动机，因而就过多强调了困难和缺点方面，对于全国情况缺乏具体分析，提出了一些错误的看法。这种错误的看法，可能引起在经济建设中快和慢的摇摆。”“我的思想落后于实际，对全国情况了解甚少。当时只感到截至 13 日的小组会中，对经验教训探讨得还很不够。从会议的《简报》上看不到反面的意见。空气有些沉闷。思想上有点急躁情绪。担心有些缺点可能要重复，不利于今后的跃进。为了提起主席注意这一情况，就在 13 日写了一封给主席参考的信。那时又听说小组会在 15 日就要结束，使我心情更加急切。我感谢主席的严正批评，纠正了我的错误。”他坚持说：“这封信，当时考虑只是供主席参

考用的。信中不合逻辑、字句不妥之处甚多，提出了一些问题，也没有交代清楚。如信中的‘有失有得’，‘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紧张，是具有政治性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提法，都是不妥的或错误的。”他最后说：“这次会议意义十分重大。对我教育很大。现在会议快要结束了，建议会后收回我 7 月 14 日给毛泽东主席的信。存入中央档案，作为我今后思想检查的资料。”

彭德怀发言之后，在场的朱德放下心来，宽慰地说道：“彭总发言的态度是好的。我相信他是畅快的。彭总的发言中有一句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是农民意识。在座的天天向前进，哪有不改的。他的主观性、片面性就是这样来的。大家对彭总的批评是对的，彭总今天对大家的批评也比较听得进去了。过去就谈不进去，谈起来就吵。我相信，经过这次会议，统一了思想，统一了认识，就不会把错误当作包袱背起来了。”

朱德的话，代表了参加庐山会议的相当多的人的看法。可以说，当时大家都把事情看简单了，都以为只要当事者基本承认了错误，问题就可以告一段落，还以为会议就快结束了。

殊不知更大的风暴还在后面。

6. 彭德怀的问题被定性为“反党”，支持他的意见的人则成了“反党集团”

尽管有了毛泽东的讲话，但在 26 日之前，在各小组讨论中，发言的人态度都还是比较冷静的，语气也比较缓和。对彭德怀信的批评也基本没有脱离信的本身。

7 月 26 日是庐山会议的又一个关键性的日子。这一天，各

小组都传达了毛泽东的几句话：事是人做的，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线。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

话只有这样几句，但意义可谓巨大。此后，彭德怀的问题被上升为反党性质，批彭不再局限于那封信，而是开始算历史旧账。说他凡紧要关头都是动摇的，总是站在错误路线方面；说他在庐山上的行为，不仅是立场问题，动机不是为了党的利益，而是别有用心，是要在党内掀起一场斗争，反对总路线，攻击毛泽东主席。说彭德怀自比张飞，其实他不像张飞，而像魏延。

由于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在小组讨论发言中支持了彭德怀所写信中的观点，也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在批判张闻天时，有人还对他21日的发言作了如此的“统计”，说9000多字的发言，讲成绩只有270余字，讲缺点错误却有8300多字。发言利用“但”字作文章，全篇共用39个“但”字，只有一个好“但”，其余38个都是坏“但”。关于彭德怀、张闻天的关系，有人说一个是元帅，一个是副帅；一个是司令员，一个是政委，等等。

由于彭、黄、张、周等四人都是湖南籍或在湖南任过职，便被说成是“湖南集团”；由于这几个人在23日毛泽东讲话的当天晚上，到黄克诚的住处谈过话，出门时被罗瑞卿发现，告密到毛泽东那里，于是又被定性为“军事俱乐部”。指责他们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向党进攻。

7月29日，毛泽东召集大区负责人会议，研究会议形势。毛泽东在这次会上作了简短的讲话，其中谈道：“路线问题，究竟采取哪一条好？扯了很久，开全会再扯几天，差不多了，双方都开门见山，不搞外交辞令，横直讲老实话。疙瘩不解开，不好工作，多少时候了，不解开，当面不扯。解开了，以利团结和工作。”

此前，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办公厅已经通知所有中央委

员都上山。到29日，最后一批中央委员已经上山。于是，这次大区负责人会议上决定，立即宣布召开八届八中全会。

30日早晨，毛泽东通知要找黄克诚、周小舟、周惠和李锐谈话。这几个人，都是在小组会上曾发言支持过彭德怀的。毛泽东这次找他们谈话，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挖彭的墙角”。

关于这次谈话，黄克诚后来作了回忆：

“7月30日，主席通知我、小舟、周惠、李锐四个人去谈话。谈话时主席显得火气不大，所以我们也较敢说话。这次谈话，主席给我戴了几顶帽子。说我：一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二是湖南集团的首要人物，三是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还说我与彭德怀的观点基本一致，与彭德怀是‘父子关系’。又谈到过去的三军团的历史问题，说不了解我的历史情况等。我答辩说：我和彭德怀观点基本一致，只能就庐山会议这次的意见而言。过去我和彭德怀争论很多，有不同意见就争，几乎争论了半辈子，不能说我们的观点都是基本一致，但我们的争论不伤感情，过去打AB团时，有人要打我，彭德怀还帮我说过话，不然我那次就可能被整掉了。我认为我们的关系是正常的，谈不上什么父子关系。

主席说：理性和感情是一致的东西，我自己总是一致的。从来我不了解你和彭德怀的关系，也不了解你这个人，还得解开疙瘩。

我又说：我当彭德怀的参谋长，是毛泽东主席你要我来当的。我那时在湖南工作，并不想来；是你一定要我来。既然当了参谋长，政治和军事如何分得开？彭德怀的信是在山上写的，我那时还没有上山，怎么能在写‘意见书’一事上当他的参谋长？我在湖南工作过多年，和湖南的负责同志多见几次面，多谈几次话，多关心一点湖南的工作，如何就能成为‘湖南集团’？至于‘军事俱乐部’，更是从何谈起呢？

……

主席又把话引到他在遵义会议前，怎样争取张闻天、王稼祥

等。主席要小舟‘不远而复’。主席谈遵义会议，分明是要我们回头，与德怀划清界限，希望我们‘识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但我们的思想问题没解决，又都不会作伪，所以我们的表现可能使主席失望。”

关于这次谈话，李锐从另一个角度作了回忆：

“毛泽东找我们四人谈话，无疑是要我们不要再受彭德怀的影响，谈起长征旧事，意味尤其深远。这一点，我当时也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

谈完话出来，遇见田家英，我颇有点轻松之感，将‘解疙瘩’、‘湖南集团’是误会等告诉他。田家英说：决不能轻信，大难还在后面。当然他们知道内情，我也不便多问。这时，田家英还告诉我他们的几点看法：彭德怀是政治局委员，政治局没有开会讨论，就让小组去批斗，太不应当了。

为了促动彭德怀作检讨，毛泽东让聂荣臻、叶剑英去进行劝说。7月30日上午，两位元帅来到彭德怀的住处，在彭德怀后来写的笔记中，记下了这件事和他自己当时沉痛的心情：“他们来劝我着重反省自己，即使有些批评不完全合乎事实，只要于党于人民总的方面有利，就不要管那些细节。他们说，你不是常讲一个共产党员要能任劳任怨，任劳易任怨难吗。今天当着自己作检讨时，就要表现任劳任怨的精神。大约谈了有两个多小时，最后热泪盈眶而别，感人至深。我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决心从严检查自己。但他们走后，我内心还是痛苦的。今天的事情，不是任劳任怨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才会有利于人民和党。反右倾机会主义的结果。不会停止‘左’倾，而会更加深‘左’倾危险。比例失调会更加严重。以致影响群众生产的积极性。我给主席的信，不仅事与愿违，而且起了相反的作用，这将是我的罪恶。”

8月3日，在小组会上，聂荣臻谈到了这次劝说时的情况：“我们都提到他的桀骜不驯。剑英同志说：毛泽东同志健在时，你就这

样，将来党内谁管得了你。剑英同志说时，都激动得掉泪了。”

7月31日和8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两次开会讨论批彭问题。在7月31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对彭怀德讲：“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31年，是否如此?”

对这种不顾基本历史事实的指责，彭德怀也真的没有办法解释，他只能是“顾左右而言他”，他的回答是：“政治与感情，你结成一体，我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你提的那么高，我还没有了解。跟不上，掉队远，这种分歧多。许多历史事件，我一生无笔记，文件全烧了。”

毛泽东说：“你说发表你的信你不高兴，不一定吧。写这信的目的就在于争取群众，组织队伍。”

这时林彪在一旁插话：“完全同意这个看法。”

林彪是7月17日上山的。这次庐山会议，开始没有他，后来发生了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的事件，毛泽东感到问题严重，就将林彪作为“救兵”请上了庐山。林彪上山后，虽然讲话不多，但往往能“击中要害”，在打倒彭德怀的战斗中立了大功。

8月1日的常委会上，毛泽东又开始清算彭德怀的历史旧账。毛泽东的有些话讲得比前一天又要重了。他说：彭德怀“有野心，只是机会未到”，“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

除林彪之外的其他常委则多处于消极状态。刘少奇问过长征时的一件无关紧要的事，还讲了高饶事件中的问题；周恩来则问了彭德怀与斯大林谈话中的一个情节，也不是大事；朱德的发言只是就信的内容而谈，而且态度温和，他的话还没有讲完，毛泽东即将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几下鞋面说：“隔靴搔痒”，弄了朱德一个大红脸，干脆不再讲了。

林彪的发言与前几位常委不同，一是声色俱厉，二是击中要

害。他说：彭德怀写信是要“发表以争取群众，不发则存档。表面似好意，而用意很深，是坏意，表现个人单独政治见解。内容与形式总相反，采取迷人办法。事实证明是右倾，动机是从个人野心出发，捞一笔。”他还说：“只有毛泽东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

林彪的发言之后，刘少奇的发言调子也明显高了起来。他说：在延安，关向应病危时，我同你去看关向应。关向应流着泪说：“彭总，你不要反对毛泽东主席，闹派别，我是快死的人了”；同意主席讲的有野心。要按自己面貌改造世界。根本问题在此。

彭德怀也清楚了自己的处境，对他的批判已经远远超出了那封信的范围。他在会上提出不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但毛泽东没有批准。毛泽东说：“现在不谈此事，还是你干。”

事实上，中央领导人刚下山，军委工作就已决定由林彪来主持了。

彭德怀在会上还作了这样的表态：第一，不会自杀；第二，不会当反革命；第三，不能工作了可以回家种地，自食其力。

8 月 2 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开幕。在这一天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讨论两个问题：第一是改指标问题，第二是路线问题。在谈第二个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的路线究竟对不对，现在有一些同志发生怀疑，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所定的这条路线发生了问题。”又说：一上山，我就讲了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现在看来，所谓“问题不少”，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问题不少，而不是那些别的问题，我们反了九个月的“左”倾了，现在基本上不是这一方面的问题了，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而是反右的问题。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

这一天，毛泽东还给张闻天写了一封信。信的开头就说：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 。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信中还说道：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如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武文合璧，相得益彰。

毛泽东讲话后，全会先开小组会，后开大会。不论是小组会，还是大会，其中心内容都是揭发、批判彭、黄、张、周等人；其倾向是“一边倒”，几乎是异口同声。各种各样的政治帽子纷纷飞来，除了说他们反对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和总路线之外，对他们这样或那样的人身攻击也发生了。如有人说彭德怀伪装爽直和朴素，他对待人可以概括成“压、打、拉、推、赖、装”。全会完全开成了批判会、斗争会。

至 16 日，全会一致通过《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错误的决议》等文件，这个决议将彭德怀说成是“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说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彭、黄、张也举手赞成。周小舟因是中央候补委员，没有表决权，所以无需他举手。

八届八中全会通过的《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文件明确宣布：“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

大会通过各项文件后，毛泽东说：看来，这次庐山会议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总结经验应该是这样总结法才好。头一个阶段，还照我们那个老轨道，那个总结法不对头。后来出来了对立面，引得我们大家注意了，那个时候起草的 18 个问题，那些东西都放在第二位去了。总结经验应该像刚才通过的这几个文件这样的总结法，就是锋芒向着反右，反右倾，鼓干劲。毛泽东还说：当前形势主要是反右倾，鼓干劲，这次庐山会议，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在庐山会议闭幕的那天，宣布了对彭、黄、张、周的处理决定：“把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调离国防、

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仍然可以保留，以观后效。”

7. 刘少奇在庐山会议上讲个人崇拜问题

八届八中全会闭幕的第二天，即8月17日，还开了一个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做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待群众的态度》的讲话。

刘少奇这篇讲话最重要的内容是进一步赞扬毛泽东。他说：我们中国党，中国党中央的领导，毛泽东的领导，是不是最好的领导，最正确的领导？我看是可以这么说的。如果还不满意，还要更正确一点，既不“左”，又不右，那么，请马克思，列宁来是不是会更好一些？我看也许可能更好一些，也不见得，也许更坏一些。

刘少奇说：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我们党内也有人要在中国也反对“个人崇拜”，彭德怀同志就是有这个意见的。在西楼开会的时候，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反对喊“毛泽东主席万岁”，这次又讲了什么“斯大林晚年”，什么“没有集体领导”，毛泽东主席没有自我批评，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自己，等等。实际上，苏共二十大以后，他就一贯要在中国搞反“个人崇拜”的运动。我想，我是积极地搞“个人崇拜”的，积极地提高某些个人的威信的。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在七大的党章上就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这一条。党要有领袖，领袖就要有威信。

刘少奇还引用了恩格斯《论权威》的文章，来说明“个人崇拜”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刘少奇还说：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

拜”的运动，赫鲁晓夫搞这一手，我看也有许多不正确的地方，不应该那样搞。所以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有人要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上是对党、对无产阶级事业、对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活动。

在庐山会议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经严重地危害了党内的民主生活，刘少奇却还要再讲所谓领袖的威信，还要再为“个人崇拜”正名叫好，还要再现身说法，讲自己如何积极地搞“个人崇拜”。这种行为也真有些让人匪夷所思！

当然，刘少奇的话也不一定都是他的个人意见，他也许有他自己的难言之隐。但不管怎样，他的这番鼓吹个人崇拜的讲话，对于中共党内日益严重的个人崇拜是起了恶劣作用的。在纪念刘少奇诞辰100周年的时候，他的儿子刘源曾说过一段话：“作为世纪伟人，一代哲人，刘少奇不应该任随毛泽东的错误而一味发展，也不应该对这种发展的后果完全无知。加之，毛泽东最后得以凌驾于全党全民之上，人们自然归根到‘始作俑者’的他。就此来说，刘少奇负有直接责任。”

庐山会议后，中共党内个人崇拜之风日盛。11月27日，中共中央批示印发了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编写的《关于〈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学习提纲》。这份在党内、军内被广泛学习和讨论的文件，共讲了八个方面的问题，其中第四部分就系统地论述了个人崇拜的问题。

文件说：“否认革命领袖的重大作用，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借口反对所谓个人崇拜，来否认革命领袖的作用，实质上是企图破坏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威信，妄想由他们自己窃取领袖的地位，从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接着文件从六个方面论证了“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是最好、最正确的领导”。最后，文件得出结论：热爱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与热爱党、热爱共产主义事业是一致

的。反对党的领袖，破坏党的领袖的威信，就是反党的罪恶行为。

8. 彭德怀被撤职，林彪取而代之

庐山会议不仅是彭德怀被撤职，而且毛泽东也失去了许多东西。他失去了许多有识之士的真心拥戴，也失去了很大一部分政治信心。此后，庐山会议的斗争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他几乎时刻都在担心着有人出来为彭德怀翻案。而这种担心是他在过去与王明、张国焘等人斗争后从未有过。而且这种担忧成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动因之一。因为我们都知道，作为“文化大革命”导火线的那篇由姚文元写的文章，所批判的就是为彭德怀翻案。尽管事实证明，姚文元的批判也是一种指鹿为马的行为。

庐山会议的真正赢家是林彪，他大概是会议期间最为清醒的人之一，所以他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东西——军权。

8月18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这次会议的通知是在8月11日毛泽东讲话后立即发出的。为了最大限度地消除彭、黄在军队的影响，会议扩大的范围空前广泛：大军区领导除留一人值班外全部参加，省军区和野战军的司令员、军长、政委全部参加，其他师以上单位各派两名正职领导参加。因此，会议的参加者多达1061人，另外还有508人列席。

军委扩大会议从8月18日开始，至9月12日结束，前后将近一个月时间。会议的大致经过是：8月18日至21日，分14个小组传达和讨论庐山会议精神，阅读会议主要文件；8月22日至27日，以小组为单位对彭、黄进行揭发批判；8月28日至9月4日，将14个小组编为两个综合组，彭、黄各在一组，接

受批判和追逼；9月5日至7日，分4个小组对受彭、黄牵连的邓华、万毅、洪学智、钟伟等人进行批判；9月8日至12日，召开大会对彭、黄等人进行批判。

如此规模的会议，用这样的方式批判，彭德怀深知，一定是要在军队中把他彻底搞臭。在此情况下，他只有继续检讨认罪一条路可走。因此，9月9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完全接受会议对他的批判。他还提出，请求中央考虑，在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以后，请允许我学习或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劳动，以便在劳动人民集体生活中得到锻炼和思想改造。9月12日，彭德怀又送上了给会议的一份书面检讨。

毛泽东在收到彭德怀信的当天，即指示印发给从中央到支部的各级党组织和军委、外事两个会议的全体参加者。他在批语中写道：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在此之前，8月22日，黄克诚也在其夫人的催促下，送上了由夫人起草的给毛泽东的认罪悔过信。8月24日，毛泽东给黄克诚复信，表示：很高兴，并说，你的那种态度很好。我表示热情的欢迎。错误并不可怕，只要能改就好了。错而能改，出以真诚老实，就能逐步地见信于人，变为一个好同志。

9月11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和外事会议合并举行的大会上作了总结性的讲话，再一次论述了“同路人”的观点。他说：有几位同志，据我看，他们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到现在，他们从来就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是什么呢？是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他们只是我们的同路人，他们只是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分子混在我们的党内来。资产阶级的革命家进入了共产党，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他们的立场没有改变，这样的同路人

在各个紧要关头，不可能不犯错误。

9月12日，会议在通过《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决议》后宣告结束。《决议》认定彭、黄是十足的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这次向党进攻完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是他们个人野心发展、利令智昏，不听党的劝告，无视党的纪律的必然结果。要求全军彻底肃清彭、黄在军队中所散布的毒素和恶劣影响。

9月17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命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的决定，任命林彪兼任国防部部长，免去彭德怀所兼的国防部部长职务；任命罗瑞卿兼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免去黄克诚的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

9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委组成人员的通知》，宣布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为毛泽东，副主席为林彪、贺龙、聂荣臻，常委为毛泽东、林彪、贺龙、聂荣臻、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谭政。军委日常工作由林彪主持。

至此，林彪终于梦想成真。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他又不失时机地鼓吹起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他在讲话中说：毛泽东就是现在的马克思、现在的列宁。毛泽东思想站在现代思想的顶峰。毛泽东同志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综合了前人的成果，加上了新的内容。要好好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我们学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一本万利的事情。学习毛泽东著作，这是捷径。这并不是捧场，不是吹毛泽东主席的。这是告诉你们一个学习的简便的窍门。

在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林彪仍一如既往地竭尽全力地赞扬毛泽东。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便是刊登在《红旗》杂志1959年第19期上的《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阔步前进》。

9. 反右倾运动开始

庐山会议后，与军委扩大会议同时，还召开了一个全国外事会议，重点批判张闻天。连续不断的批斗和追逼，使张闻天的身心难以承受。先是血压骤然升高，头晕心悸。接着，在庐山上已经开始发作的前列腺肥大症又突然加剧。严重的病情，使批判者不得不允许他住进医院，接受治疗。这使他避开了猛烈风暴的袭击。但外交部的批张活动和“反右倾”斗争并未松懈。经过两个多月的斗争，外交部制造了一个“张闻天反党集团”，划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庐山会议后，周小舟先到北京，写出了检讨认罪书。9月上旬，回湖南接受批斗。9月15日，中共湖南省委召开省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周小舟同志右倾反党活动的决议》。同月下旬，决定让周小舟去浏阳县大瑶公社，担任党委副书记，接受改造。

此外，还有一些高层领导人受到了彭、黄等人的牵连。有的是因为发表了与他们的观点相近的看法，有的则仅仅因为曾是他们的部属，与他们有着较密切的工作或私人关系。如国家计委副主任贾拓夫、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李锐、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国防科委副主任万毅、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等，就在庐山会议后不久被撤销了职务，遭遇了许多不幸。

随之，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运动席卷全国。

反右倾运动在初期，主要在党政军的中高级机关进行，重点是解决中高级干部的问题。10月下旬，根据部分地区的经验，认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基层单位的一般党员干部中也有，基层单位也要开展反右倾的斗争，因而，运动的范围扩大了。

党政机关的反右倾运动，主要方式是自我检查和群众性的揭发批判，斗争对象主要是中共的领导干部。中共中央推荐的第二机械工业部的做法，反映了党政机关开展反右倾运动的一般情况。第二机械工业部的反右倾运动分三个阶段进行：一是学习文件、酝酿准备阶段，约半个月。二是一般交心和重点批判阶段，约一个半月。广大党员干部普遍进行自我检查、向党交心，在此基础上确定重点批判对象，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斗争。三是专题辩论、系统提高阶段，约半个月。辩论的专题主要是坚决保卫“三面红旗”、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阶级斗争、正确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和正确理解阶级、政党和领袖的关系等。

在农村，主要开展以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为内容的整风整社运动，斗争的主要对象是一部分基层干部和富裕中农。当时，把他们对“共产风”的批评，看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是代表了农村的资本主义势力。认为如不打退这一进攻，人民公社就不能进一步巩固，农业的大跃进也无法实现。整风整社的办法，一般是召开三级干部大会和人民公社社员大会，放手发动鸣放，让大家把“糊涂思想”讲出来，然后再选择典型人物，在不同的范围内进行批判。

在工矿企业，反右倾运动的主要斗争对象，是负责生产和技术工作的基层干部，同时，也对一些“忘本变质”的工人进行批斗。原因是他们反对在工业企业大搞群众运动，主张恢复正常秩序，加强企业管理，实行厂长负责制，依靠工程技术人员管理生产。这些主张，被视为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政治挂帅，提出和支持这些主张的基层干部，则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反党分子”。

在反右倾运动开始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共中央虽然多次强调要坚决清查和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但并没有制定出一个判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标准，因而，在运动中，各地区、各部门自

行其是，普遍发生了打击面过宽的倾向。针对这一问题，中共中央于11月4日、11月27日和1960年1月20日，分别下发和转发《关于整社运动中掌握重点打击批判对象的问题的意见》、《关于划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标准和处理办法》以及《关于在反右整风运动和农村整党运动中对于犯错误的党员干部的处分面的通知》等文件，试图加以适当的约束和控制。规定：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的人，应该限制在国家供给的、脱离生产的党员干部范围以内，不脱离生产的党员干部一律不戴帽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人数，农村重点批判对象的人数，应限制在党员干部总人数和农村总人口的1%以下。这些规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反右倾运动的打击面，但1%的比例仍然太高，仅按这一比例，受批判和打击的人数就多得惊人。

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的统计，被重点批判和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300多万人。加上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等类名目的人数更多。到1962年8月的统计，全国得到平反的干部、党员和群众共有600多万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的干部，绝大多数受到了撤销职务、留党察看和开除党籍等各种党纪、政纪处分，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的群众也受到了围攻批判和其他形式的处理。

第七章　经济调整，一波三折

1. 反右倾、鼓干劲、再跃进

在庐山会议以后，为了回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攻击”和“诬蔑”，中央改变了此前的一些说法和做法。不再承认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事实，说国民经济中主要比例关系是协调的、正常的；不再承认已经出现的严重经济困难和政治上的紧张状况，硬说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极为良好；1959年上半年因调低一些过高指标而导致某些方面的生产下降，也被指责为“由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兴风作浪”而制造的一个“小小马鞍形”。出于上述认识，为了表明大跃进的正确和反右倾对经济建设的促进，庐山会议后不久，即重新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大跃进。

在基本建设方面，9月24日，国家计委和国家建委确定新上马230个限额以上基建项目。11月22日，又确定追加13.6亿元基建投资。由于层层加码，到年底，全国基建投资在上年急剧膨胀的基础上，又增加了81亿元，增长30%，总投资规模达到350亿元。

由于基本建设战线长，投资效果差，新增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只有69.2%，比投资效果已经相当差的1958年还低5.6%，积累率异常膨胀，由上年的33.9%，猛增到43.8%，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的一年。积累额增加致使消费额比上年减少了22亿元。人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1959年，粮食总产量比上年

减少15%，而粮食征购量却比上年增加14.7%，农民口粮大幅度减少。全年人均消费水平由上年的83元降到65元，下降了22%。

在工交生产方面，10月16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工业生产会议制定了1959年第四季度的工业生产跃进计划。在第4季度内，工业总产值要完成486亿元，保证全年完成1600亿元，比上年增长37%；钢完成470万吨，保证全年产量超过原计划产量50万吨；生铁完成730万吨，保证全年产量超过原计划产量200万吨；原煤完成9700万吨。

经过第四季度的蛮干、硬拼，到年底，重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48%以上。钢产量达1387万吨，比上年增长73.4%；生铁达到2191万吨，增长60%。原煤、机床、发电量等也大幅度增加。1959年，在工农业总产值中，重工业的比重由上年的35.2%，提高到43.8%。与此相反，在重工业生产大幅度增长的同时，农业和轻工业生产却急剧下降。1959年，全国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13.6%，粮食实际产量只有3400亿斤，比上年减产600亿斤，仅为最后调整计划的62%。棉花实际产量只有3418万担，仅完成计划的74%，比上年减产520万担，下降13.2%。糖料、油料、生猪等主要农产品也都大幅度减产。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问题进一步加重。

更要命的是，虽然形势已经十分严峻，但中央的最高决策者却心怀盲目的乐观情绪。这时，全党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下，继续大跃进的"气"早已鼓起。各地报告的都是些"形势喜人"的事情。有的人甚至认为，如果早反右倾，困难就不会出现。《人民日报》浮夸虚幻之声不绝于耳。每天都有醒目的标题："形势无限好，高潮日日高"、"实现大跃进"、"大办工业"、"大办钢铁"、"大办粮食"、"大办食堂"、"大搞副业"、"大搞深翻"、"大办文教卫生"、"高速万岁"。

中共中央已经提出1960年经济建设总方针：在1958年和1959年连续跃进的基础上，要争取1960年国民经济继续跃进。

1960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展望60年代》，宣布已经实现了提前3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号召。说：我们不但对于1960年的继续跃进和更好的跃进，充满了信心，而且对整个60年代的继续跃进，也充满了信心。

1月2日，《人民日报》再发社论：《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无需读其内容，只看标题，就能感觉到领导者的那种浮躁与浮夸。

1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1月9日，毛泽东再次向与会者发问：资产阶级都能够实现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实现大跃进？他的意思是明确的，无产阶级完全能够实现大跃进。1月23日，他在一个文件的批示中把这个问题说得更清楚了：看来，连续大跃进是可能的。

上海会议批准了国家计委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提出产钢1840万吨，产粮6000亿斤。会上还讨论了二五计划后3年设想和未来8年的初步设想。3年设想是，提前5年实现赶上英国的口号，提前5年实现12年农业发展纲要，提前5年实现12年科学规划。8年总要求是：以共产主义的雄心大志，尽可能地加快建设，保证工农业生产不断跃进，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建立起完整的经济体系。同时，基本上完成集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在分配制度中要逐步增加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的因素。

上海会议后，各地再次掀起大跃进高潮，各种“大办”一轰而起。3至4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1960年的大跃进计划。

2. 坚守公共食堂的“社会主义阵地”

在继续大跃进的同时，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做法又重新发展起来。庐山会议后，中共中央在对农业部党组《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的批文中，把邓子恢等人在 1959 年春夏为调整人民公社体制，克服“浮夸风”、“共产风”而提出的主张斥责为“猖狂反对社会主义道路逆流”，要求各地把这些“反动的、丑恶的东西”彻底加以批判。

1959 年 10 月，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提出了由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过渡的问题。12 月，中共中央召开的浙、皖、苏、沪四省市座谈会，讨论了人民公社由基本队有制到基本社有制的过渡问题。在此之前，华东协作区委员会议提出过分配给社员每人 200 元左右的过渡条件。座谈会同意这个条件，并认为，要每人分到 200 元，人民公社的总产值每人平均一般要达到 600 元到 800 元。这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江苏全省人民公社总产值要在 1959 年 56 亿元的基础上提高三四倍，安徽要在 1959 年 57.36 亿元的基础上也提高三四倍，上海的现有基础较各省要好，但提高的标准也高一些，平均每人总产值要求达到 1100 元到 1300 元，也要提高三倍多。这样，从基本队有过渡到基本社有，上海的条件较好，大约要 3 到 5 年或者 5 年的时间，其他各省大约要 5 年左右，或者更长一些时间才行。会议提出，过渡的时间是一个大致的杠子，具体过渡起来，各公社要有先有后，各生产大队过渡条件的成熟程度有早有晚，条件成熟了不过渡，就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影响生产发展；条件不成熟，勉强过渡，也不利于生产的发展。因此一般公社的发展趋势，将是分批过渡，成熟一批过渡一批，有些公社，大队情况基本平衡，同

时具备了过渡条件的，也可以一起过渡。

为了创造条件过渡，座谈会提出要积极发展社有经济，特别是社办工业，实现公社工业化，要求采取措施扶持穷队翻身。关于这些要求，上海打算在1960年基本达到，江苏打算在1962年基本达到。

1960年4月6日，谭震林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阐明过渡问题。他说：我们的前途是从队基本所有到社基本所有，然后再从社基本所有过渡到全民所有。就实现社基本所有制的条件来说，第一，全社的经济发展达到了每人年平均收入150元至200元的水平；第二，社有经济部分在全社经济中占有优势；第三，穷队赶上了富队；第四，农村的机械化和半机械化达到了一定程度。

根据这种精神，各省开始了试点。为了快一些发展社有经济，大办社有工业，大办养猪场，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各种“大办”一齐上；为了扶持穷队赶富队，在资金劳力、生产资料等方面搞“共产主义大协作”、“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浮夸风和强迫命令风卷土重来，变本加厉。平调的范围很广，土地、房屋、粮食、生产工具、劳力、家具等无所不有，搞平调的单位，有的上至省市，下至小队，而以公社为多。

在继续大跃进和重新部署过渡时，强化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制度，就成了必然的做法。

庐山会议上，公共食堂问题成为分歧的主要问题之一。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接连对公共食堂问题写批语，批评解散公共食堂是“悲观主义思潮”，是“腐蚀党的，腐蚀人民的一种极坏的思潮”。

1960年2月16日至18日，贵州省委召集地、州、市委第一书记会议，讨论公共食堂问题。会后向中央报告了全省13万个食堂80%是巩固的，20%左右是不巩固的情况，以及整顿食

堂的措施。省委报告反映：不固定的食堂有三种情况：一是虽然集体做饭，但做得不够吃，分给各户，推出了事；二是时办时停；三是各户单独起伙，食堂有名无实。目前，当务之急是对不固定、不巩固的食堂立即加以整顿。省委的报告提出：农村经过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之后，富裕中农同我们作斗争的主要矛头是针对食堂。去年贯彻八届八中全会精神之前，他们的主要活动，是闹土地下放，包产到户，牵牛拉马。现在千方百计扯垮食堂，这就是挖人民公社的墙脚。所以食堂也是我们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也就没有保证。报告还提出了把社员自留地转交给食堂的问题。中共中央转发贵州省委的报告，并将口粮分配的原则改为“指标到户，实物到人，凭票吃饭，节约归己”。

毛泽东很赞赏贵州省委的这个报告，说这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 5 年至 10 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

3 月 5 日，黑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向中央汇报农村公共食堂情况和经验。毛泽东在汇报记录上即兴写下了几句话：加强领导，全民食堂，猪菜丰富，计划用粮，指标到户，粮食到堂，以人定量，凭票吃粮，节余归己，按月算账，明明白白，账单上墙，生产生活，两样都强……

3月 15 日，中共中央又转发了《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河南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1959 年年底全国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等文件，毛泽东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批示。批示说抓食堂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要求各地在今年一年内，认真大抓两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学贵州、河南等省那样作出科学的总结，普遍推行。毛泽东写道：“就全国说来，能够争取占全体农村人口百分之八十的人到食堂吃饭，就很好了。像河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上海、安徽七省市争取了百分之九十以

上的人到食堂吃饭，当然更好。但其他各省、市、区，暂时达不到这个程度的也不要勉强，两三年内争取逐渐达到，是可以的。”

贯彻中央的指示，到1960年4月，据14个省市的统计，参加食堂的户数达到农村总户数的88.9%，人数占总人数的88.6%，河南省达99%。

3. 城市人民公社也来凑兴

1960年的大跃进还有一个新的插曲，即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建立人民公社。

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主要在农村进行。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没有对城市提出要求。但在公社化浪潮中，郑州、哈尔滨等少数城市一些居民自发地成立了人民公社。其性质类似社区服务性组织。

1958年12月，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正式提出城市人民公社问题。决议指出，城市中的人民公社将来会成为旧城改造和新城建设的工具，成为生产、交换、分配和人民生活福利的统一组织者。

不过，此时中央的态度较为谨慎，考虑到城市与农村的诸种差别，《决议》要求在城市中应继续试点，一般不忙大量兴办，在大城市中更要从缓，只作酝酿工作。要等到经验多了，原来思想不通的人也通了，再大量兴办起来。

然而，1960年初，在反右倾和大跃进的号召下，城市人民公社也凑兴而生。

1960年3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拟发的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指示稿上批示：“看起来，以大工厂、以街道、以机关学校三种为中心，而又有各种所有制（国有制、社有集体制、

社以下集体所有制）同时存在于一个公社内，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很好的。”

对于指示稿中的一些提法，毛泽东也作了修改，使之更能鼓舞人心。例如，原稿中有一段话：在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五个大城市，也不要在一个时期满街挂上人民公社的牌子（过去已经挂上者不取消）。但是一切有关城市人民公社的实际工作，都应当放手发动群众去进行。

毛泽东显然感到没讲够。在后边加了几句话：

慢慢挂上公社牌子则是可以的。除这五个大城市外，其他一切城市则应一律挂牌子，以一新耳目，振奋人心。

毛泽东还讲到了城市人民公社的领导组织方法问题。他继续批示道：

最好有一位书记专管城市人民公社。中央希望今年上半年全国城市普遍试点，取得经验，下半年普遍推广。各城市应派一位书记率领几个干部到哈尔滨、天津、郑州等处去参观那里的人民公社。

1960年3月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批示》，指出：中央认为对于城市人民公社的组织试验和推广，应当采取积极的态度。这表明，中央在八届六中全会上主张稳妥试验的立场发生了转变。

3月30日，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对城市人民公社问题显得更加乐观。会议认为正在全国城市中大力兴办的人民公社将把城市人民更加广泛地组织起来，解放成千上万的家庭妇女，这不仅有利于生产建设的发展，而且有利于城市社会生活的彻底改造。

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事实已经证明，城市人民公社和农村人民公社一样，具有伟大的生命力，它的成长将是我们实现1960年以及今后的继续跃进的一个新的重大的积极因素。

从4月1日开始到4月8日，新华社接连发表了系列报道，分别介绍了郑州、哈尔滨、北京、重庆等地的城市人民公社的典

型事迹，中央和各地主要报刊都迅速转发了这些消息。这就大大突破了中央3月9日批示关于城市人民公社不要登报的精神。4月9日，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的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五大城市的市委书记作了题为《建立城市人民公社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联合发言，盛赞城市人民公社不仅能促进生产高速度的发展，而且还是彻底改造旧城市，使之适合于现阶段社会主义建设和未来共产主义理想的重要工具，并表示，大城市也必须逐步分批地实现人民公社化。

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以后，在全国迅猛地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兴办城市人民公社的群众运动。据统计，截至1960年5月10日，在全国180多个大中城市、6900万人口中，已建立人民公社1039个，入社人口达3900万余，占全部城市人口的55.6%。公社兴办的工业生产单位达9万多个，兴建的服务站达10万多个，公共食堂9万多个，托儿所和幼儿园9.5万个。

然而，与农村相比，城市在原有工矿企业和街道组织之上，再建人民公社，总使人感到叠床架屋。而且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其来势虽然汹涌，却有些生不逢时。此时，大跃进



1960年上半年，为适应大跃进的形势，开始掀起了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图为南京市民庆祝南京市白下人民公社成立。

已成强弩之末，1960 年下半年中央工作的重点转入应付危机，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就虎头蛇尾。对社会的影响远不及农村人民公社那样深刻而广泛。

4．农村的形势越来越严峻，毛泽东认为是少数坏人兴风作浪

严重的问题首先在农村暴露出来。在继续大跃进和准备条件向更高层次的生产关系过渡的双重压力下，基层干部花样翻新，演绎出许多违法乱纪的事情来。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一度有所收敛的共产风、瞎指挥、强迫命令风再次卷土重来，而且变本加厉。这种情况，终于引起许多省市的重视。

从 1960 年 2 月开始，先是广东，后有山东、江苏、山西等省采取召开省、地、县、区、社、队等五级或六级干部大会的形式进行纠正，解决一些社队急于向公社所有制过渡和在发展社有经济中平调生产大队财物问题以及干部多占多吃、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作风问题。

江苏省委 3 月报告中说：公社干部多数有早过渡的想法，认为早晚要过渡，晚过渡不如早过渡，富队干部怕过渡，认为过渡就是“一平二调”，穷队沾光，富队吃亏；穷队干部盼过渡，认为“穷家难当，不如交给公社算了。”有人提出“一年铺路，二年试点，三年过渡”，“今年苦干，明年过渡”，“春夏准备，秋冬过渡”等口号。

在抢先过渡思想支配下，各地公社大办社有经济，急于达到过渡标准。于是，平调之风不可遏止。据 4 月 10 日中央批转山西省委报告，发展社有经济中平调的方法五花八门，无偿抽调、

低价收买、不平等交换、有价无款、摊派发展社办企业基金、随意占用土地、随意抽调劳力。见什么好就调什么。这引起生产大队的恐慌性破坏性抵制，或藏、或拆、或卖、或杀。生产力遭到再次破坏。

4月4日和11日，中央批转的江苏省高淳县事件的通报和上海市奉贤县事件的报告，反映出少数干部胡作非为、残害百姓的情况，令人发指。

江苏省委通报说：高淳县在1958年和1959年春，发生了浮肿病、消瘦病、妇女子宫下垂病患者14000多人，非正常死亡6000多人，外流人口10000多人。该县县委采取了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劳动人民，提出："那怕流血牺牲，也要保收3000斤水稻"，"深翻好像打仗，在战场上如有士兵临阵脱逃，可以就地正法！"等口号，造成部分基层干部严重强迫命令，采取吊、打、关、押、罚跪、停睡等手段，甚至发生逼死人命的事件。

上海市委的报告说：奉贤县自1958年春耕起到秋耕秋种，全县因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而直接被逼死的群众有156人，无辜被撤职、停职的干部660余人，各社和生产营，都搞了"劳改队"，先后劳改了2866人，集训了2907人。对群众捆绑、吊打、乱斗、乱关、罚跪、游街、停餐等更为普遍。为了消灭红铃虫，被烧、拆民房1823间，仓库1345间，强迫集中居住又拆民房2147间，兴修水利拆房3188间。报告说：站在高处看奉城，就像鬼子大扫荡后的情景一模一样，"断瓦残壁，历历皆是，触目惊心，一片凄凉"。

这些报告上来，给予毛泽东的第一印象是，少数阶级敌人混进干部队伍搞破坏，因而要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来解决。中央在高淳事件通报上指示说：上海市奉贤县原县委书记王文忠、副书记李少峰和一些暗藏的特务分子、坏分子窃夺和把持县委和有些公社的领导权，胡作非为，残害群众。

4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两个报告，要求“对坏人坏事彻底检查认真处理”，认为这些都说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相当复杂的。在某些地区和某些方面还是尖锐的。

5. 各地粮食告急，经济调整提上日程

当时全国最为严重的问题还是各地粮食告急。

1960年2月份，周恩来收到江苏省委的报告，全省城市浮肿病患者共有12.6万人。另据镇江、扬州、徐州、淮阴四个专区和南京市不完全统计，农村外流人口达14.8万余人。

3月29日，周恩来收到习仲勋送来的一封群众来信。这封自称“一位不愿署名的政协委员”的来信，反映安徽省和县铜城闸与无为县粮荒严重，曾发生饿死人事件，有些农民逃亡在外，有的抛弃儿女，干部作风恶劣。这时还在年初，尽管对情况的判断一时还没有把握，周恩来认为这封群众来信中反映的问题决不能忽视。他立即将这封信批给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转上一信，请阅后派人前往两县一查，也许确有其事，也许夸大其词。但这类个别现象各省都有，尤其去年遭灾省份，更值得注意。主席在批转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文件上，也曾着重指出这一点。请查明后复我一信。”

这时，许多严重情况还被掩盖着，容易被看作一时或局部的问题。薛暮桥回忆说：1959年农业大减产，情况极为严重。但是公社干部不敢反映农民的呼声。

到了1960年夏天，全国性紧张局面暴露出来。

1959年粮食产量下降，1960年的夏粮比上一年又大幅度减产。夏收之后收购不快，1至7月累计征购了244亿斤，比上年

同期减少26%。实际是农村早已卖了过头粮库存减少，调拨不灵。5月以后，各应调出粮食的省所调出的粮食仅完成计划的一半。而粮食销售量却大为增加。1957年到1958年度销售粮食是423亿斤，1959年到1960年度增到590亿斤。

大跃进以来，工矿企业从农村大量招工，城镇人口猛增。1960年比1957年增加3124万人。这一方面大大减少了农村劳动力，另一方面需要向农村大大增加粮食征购，而粮食却没有那么多。

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售，库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

6月6日，中央又发出《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入夏以后，北京、天津、上海、辽宁等大城市和工业区的粮食库存非常薄弱，北京只能销7天，天津只能销10天，上海已经几乎没有大米库存，辽宁10个城市只能销8、9天。在最紧张的日子里，京津沪库存只剩几千万斤，甚至还不到，形势十分危险。一旦发生断粮，后果不堪设想。另外，1960年粮食出口收购计划是100亿斤，而到5月底只能完成30亿斤，在对外贸易方面也很被动。如此严重的粮食危机，当时并没有向社会公开宣布，以免引起人心的普遍恐慌，造成国际影响。这副重担就压在国务院财贸委，尤其是周恩来的身上。当时国务院综合部委有两个办公室，一是李富春、薄一波负责的计委经委办公室，一个是李先念负责的财贸委办公室。薄一波回忆说，他们这一边紧张，李先念那里也不轻松，各地要粮 电话昼夜打来，不能不急事急办，只好采取“挖东补西”、“抽肥补瘦”等措施，紧急调运粮食，帮助断粮地区渡难关。周恩来的秘书李岩事后回忆：“各省市天天向中央告急，搞得总理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在那段日子里，周恩来亲自指挥调运粮食，被称为“粮食调度的总指挥”。根据周恩来的工作台历记载，那时，他每星期要几次约粮食部门的负责人谈话。当年任粮食部党组书记的陈国栋回忆说：“去总理处，主要是谈粮食问题。他一般都是晚上找我们去，地点经常是他的办公室。有时是晚上九十点钟或深夜十一二点去，谈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有时是凌晨二三点才去。”

各地缺粮食，粮从何来？还得从有余粮省调。在当时，这是件艰难的事。严格地说，并没有余粮省，各省都遇到了困难，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要求调入省份“嗷嗷待哺”，调出省份面有难色。周恩来只得亲自出马，游说各方“大员”：急他人所难，为国家分忧。

对于全国缺粮的严峻形势，此时毛泽东也是比较了解的。这一年，毛泽东七个月没吃一口肉。常常是一盘马齿苋便充一餐饭，一盘炒菠菜就支撑着工作一天。卫士长李银桥替他按摩时，他脚背踝部的肌肤按下去就是一个坑，久久不能平复。这是浮肿。周恩来一次又一次来劝说：主席，吃口猪肉吧，为全党全国人民吃一口吧！毛泽东摇头：你不是也不吃吗？大家都不吃。

到 1960 年夏，毛泽东感到了压力，对他倡导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做法、口号，开始感到心中没底，自信心有些动摇。

这一年的 6 月 14 日至 18 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经济问题和国际问题。14 日，毛泽东在扩大会议开幕时指出：建设时间还太短，认识不足，要经常总结，使我们的认识更加全面一点。不要隐讳我们犯的错误，只有抓紧总结，才能及时指导。

会议期间，毛泽东用两个小时时间，写下了《十年总结》。18 日印发与会者。名为十年总结，实为三年总结，即对大跃进的总结。

《十年总结》是毛泽东首次，也是惟一一次系统回顾和总结三年大跃进的文字。关于写这篇文章的意思，毛泽东在6月18日下午讲话时说：你们看怎么样，这是从历史说明问题。使我们认识事物，主动性多一点。主动是来源于对客观事物的准确性，要主动，就要对客观实际认识准确。要盲目性少一点，自由多一点，就是主动多点，被动少一点。我写这篇文章的意思就是如此。

毛泽东在他的《十年总结》中虽然还坚持认为，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制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认为1959年夏天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是一个胜利，但从总体上看，此时毛泽东的头脑较之过去要冷静、清醒多了。

毛泽东在总结1956年的经验时，没有再提“反冒进”的问题，而是说：“1956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这是一个全新的提法。二五计划正是周恩来根据反冒进的指导思想在中共八大上提出来的。会后不久就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被认为右倾保守，是消极平衡。1958年初在大批“反冒进”中推翻了二五计划。现在承认二五计划是好的，是间接地撤销了对“反冒进”的批评，非正式地给周恩来“反冒进”问题平了反。

尤其不同异常的是，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一文中，还第一次谈到了自己在大跃进中的缺点和错误问题。他说：我本人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1959年完成3000万吨钢；12月武昌会议同意了可以完成2000万吨，又在上海会议同意了1650万吨。例如，1959年3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主张对一平二调问题的账可以不算；到4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启发，才坚决主张一定要算账。如此等等。

对反冒进问题的平反和毛泽东的自我批评，为经济调整提供

了两个至关重要的信号。

6. 毛泽东号召大炼“争气钢”，周恩来提出“八字方针”

上海会议上，毛泽东请周恩来谈谈农业问题。

周恩来刚刚出访回国，但他对农业形势已经心中有数。他明确提出了这些年来由于高指标、高估产带来的严重后果。针对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反复讲经济工作中的主动权问题，他指出：1956年八大上提出粮食5000亿斤左右、棉花4800万担左右、猪3亿头的计划，这三个数字基本上提得太高，很难达到。从1958年开始，对这三年的产量都估高了，1958年出现第一次被动，一直到去年庐山会议才改下来。今年一月把去年的产量又估高了，粮食报5400亿斤，实际上只有4800亿斤；棉花宣布4820万担，实际上只有3800万担，现在又被动了。因为去年估高了，今年的计划数字也高，就是在去年的数字上头增加10%，即粮食5940亿斤，棉花5300万担，现在看今年是完不成的。今年能够保持去年的产量就了不起，就是很大胜利。现在，我们不但今年陷于被动，而且到1962年的计划也有完不成的危险。

他说：“两年灾荒之后，明年就很难保产了，要很大的人力去克服。所以估计1962年的计划，就要放在一个比较保险的可能的数字上，来争取实现或超过。”

毛泽东插话：“一次把主动权拿过来。”

周恩来接过毛泽东的话，建议降低粮食、棉花和养猪的指标。他提醒大家：农业指标如果提高了，不仅直接影响人民生活，而且影响轻工业的原料，转而又间接影响到人民生产，所以

它比重工业感觉更灵，这是3年农业被动得比工业感觉更厉害的原因，大家反映吃不饱，我们就不安。

毛泽东问："那么究竟怎么来转这个弯子呢?"

周恩来说：既然完不成，主席昨天也讲了要转入主动，必须在今年的党代会上埋伏一笔，使今年年底的实际数字到明年公布时能够得出为什么减产的结论来。他还说：不但要为今年着想，而且要为1962年着想，全部转入主动，就是1962年提的指标跟原来八大的建议差不多或者比八大的建议还少一点都可以，这才能转入真正的主动，不然还是不能主动，因此，后3年的补充计划，无论是农业指标还是工业指标，就要把它调低，其目的为使我们留有余地。

大家都赞成毛泽东的总结和周恩来的意见。刘少奇说：完全赞成指标这么改，毛主席这个总结很重要，已有的经验就需要学习。农业指标我们3年被动，能够在这一次转入主动就好了。邓小平也认为这次会议提出争取主动是很大极大的好事。

中央主要领导人开始统一了思想，就为下决心调整计划指标、争取主动、扭转困难初步奠定了基础。

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整整用了一个月零五天时间，主要讨论国际形势和安排国民经济计划。会议批准了李富春、薄一波提出的《1960年第三季度工业交通生产中的主要措施》，通过了《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等文件。会议还决定以后计划不再搞两本账，只搞一本账，不搞计划外的东西。确定压缩基本建设战线，认真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保证农业生产。

在北戴河会议初期讨论运输问题时，李富春曾根据前段时间的生产情况，提出应该对工业进行整顿、巩固、提高。但是，这个想法提出后，计委内部争论很大，有人认为没有必要这样做。

北戴河会议上，多数人赞成调整经济，但不赞成降低钢铁指

标。7月中旬，毛泽东找李富春、薄一波、陈正人等谈话。他说：“办钢铁要大搞小土群、小洋群。浙江的情况只有4个钢铁厂，小洋群不够。各省都要布置一批小洋钢铁厂、小洋铁路。今冬可能动员7000万人来干。1962年搞到3500万吨，可能更多一些。今年可能搞到2200万吨，如果今年有2200万吨，后年可能达到3800万吨。第二个10年可能搞到1亿吨。”他还说：“世界上没有不搞实力的，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我们处在被轻视的地位，就是钢铁不够。要继续跃进，不仅资本主义国家看不起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不给技术，憋一口气有好处。10年搞1亿吨，上天。”

毛泽东在这里讲“社会主义国家也不给技术”是有所指的。当时，中苏关系已经恶化。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外交部，提出撤走全部在华的苏联专家。25日，苏联政府又通知中国政府，从7月28日至9月1日，将全部撤回在华专家1390人，停止派遣专家900多名，并撕毁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苏联的这种做法，极大地刺激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讲“憋一口气”，号召全国大炼“争气钢”。

北戴河会议后，各省市的报告上来了，群情激愤，大家决心大炼“争气钢”，给毛泽东主席争气，给国家争气。

然而，形势不容乐观。尽管作了广泛发动，采取种种措施，钢铁生产的原计划指标还是难以完成，钢铁重要生产基地东北又遭受水灾，眼看着计划就要落空。于是，中共中央一再发出督促令。

8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把钢的产量指标由2040万吨降为1900至1950万吨，发出了“工业交通战线上的全体同志们必须紧急动员起来，为在今年完成1900万吨到1950万吨钢而奋斗”的号召，采取了全国保钢的各种措施。

8月30日，李富春等到中南海西花厅向周恩来汇报工作，

周恩来支持李富春的意见，并将报告中提出的对1961年国民经济实行“整顿、巩固、提高”的方针增加了“充实”二字。9月5日，他又将“整顿”改为“调整”，使它的含义更加明确。9月30日，周恩来签发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委《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第一次正式并且完整地表述了这八字方针。然而此时，最高决策者的注意力并没有集中到调整上来。

10月8日，中央书记处发出了狠抓钢铁生产的通知。11月中旬，钢的平均日产量突破了6万吨。但下旬又跌了下来。同时铁、煤、运输也呈现逐日下降的趋势。

7. 信阳大量饿死人的报告终于送到最高领导层

就在工业苦撑局面的时候，农村的灾荒已弥漫全国。

对于农业生产北戴河会议上已经作出了相关的决议。为了检查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谭震林主持，于9月20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了晋、冀、鲁、豫、京5省市农业书记会议。

会议要求安排好农村人民的生活，压低口粮标准，把12个月的口粮作13个月安排，大种蔬菜，搞代食品，办好公共食堂，实行冬春100天半日劳动半日休息制；要求确保把由基本建设战线压缩回农村的劳动力，80%用于农业生产。会议提出：在今冬明春给广大群众以休生养息的机会。10月7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会议的纪要，要求彻底肃清“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和某些干部特殊化作风，以使广大群众心情舒畅，从而调动起更大的生产积极性，战胜目前的暂时困难，顺利地渡过灾荒，争取

明年的丰收。

10月24日，一份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等问题的调查报告送到了毛泽东的书案上。这是一份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4名干部写的调查材料，经李富春之后转送毛泽东的。于是，一个共和国历史上空前残烈的事件，终于送达了“天庭”。

信阳事件只是大跃进的一个缩影，但这个缩影震动了毛泽东。

1959年8月中旬，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从庐山回到郑州。回来后，他立即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在全省又一次掀起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高潮。

这一年，河南遭遇水旱灾害，粮食和经济作物大幅度减产，全年粮食的产量只有210亿斤，但吴芝圃硬是估产为450亿斤，并按此下达征购任务。于是，“共产风”与“反瞒产”结合在一起，与“反右倾”结合在一起。哪个基层干部完不成征购任务，就是“小彭德怀”，就得像在土改时期斗地主那样挨斗；哪个农民交不够粮食，就会被捆起来，吊打追逼，关押拘留，拆毁房屋。

信阳地区位于河南省南部，其辖区内的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是全国第一个成立的人民公社，当初曾是全国农业的一面旗帜。信阳地委后来敢于大刀阔斧地搞“五风”，也许与这面红旗不无关系。

光山县是一个典型，从县委书记到公社干部几乎人人参与打人整人。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带头斗争“右倾”的县委书记张福洪，亲自动手毒打，众人拳打脚踢，活活将他整死。

这个县的另一个县委书记刘文彩，到一个公社去主持“反瞒产”运动，由于农民无粮可交，他便大打出手，一天竟连续拷打40多个农民，其中5人被活活打死。

在县委主要领导的带动下，公社干部也都大打出手。据有关

资料说明，整个光山县的公社一级干部，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的竟占93%。

从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的人数就达1774人，其中36人死于狱中；短期拘留的达19720人，死在拘留所的667人。

如此凶狠的“反瞒产”，把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甚至是喂牲口的饲料，尽数掠劫而去，到了1960年春天，整个信阳地区的公共食堂普遍断了炊，最严重的村子达80天没有一粒粮食，浮肿病大面积蔓延，农民也开始大量地外逃或者是饿死。在后来河南省委向中央的检讨中，称这个时期的信阳“形成了一种恐怖的世界，黑暗的世界”。

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以下全区打人成风，手段千奇百怪，骇人听闻。

就在农民大量地饿死或外逃之时，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说：“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因为思想问题。”1959年11月间，当他从潢川县驱车返回地委，沿途看见倒毙在公路旁边的死人，拦车要粮的群众，被父母遗弃的孩子时，仍下令要公安部门“限期消灭人员的外流”；指示社队的干部民兵，封锁村庄，不准群众外出逃荒；指示城镇机关、工厂、企业单位一律不准收留农村来人；还要求各个县委做到街头、交通要道没有一个流浪汉。

1960年12月22日，信阳地委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其中讲到了全区各县打人死人的情况，读来确实令人触目惊心：

正阳县原报去冬今春死1.8万多人，现初步揭发已达8万多人；新蔡县原报去冬今春死3万来人，现在增加到近10万人。过去认为较好的社队，现在揭发出来的问题很严重。西平县原来只发现二郎庙公社问题严重，现在全县13个公社，除城关公社问题较轻外，其余12个社问题都很严重。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

社，过去只报死600余人，现在揭发死人近4000人，占总人口10%，有的队人口死亡达30%左右。

其实，不仅是信阳地区，也不仅是河南省，全国都处在经济困境中。

8. 实际情况比人们能够认识到的还要严重许多

由于1960年上半年的高指标、“共产风”等错误比1958年的错误还要严重，影响范围也更为广泛，并且发生在1958年的错误造成的国民经济困难尚未得到基本缓解、全国许多地区又出现严重的自然灾害，因而造成了比1959年上半年更为严重的国民经济困难。

由于基本建设规模膨胀，重工业生产指标太高，加上“共产风”和自然灾害的影响，1960年的农业总产值只完成415亿元，在1959年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又下降了12.6%；粮食产量2870亿斤，比1959年减产530亿斤，下降15.6%；棉花产量2126万担，减产1292万担，下降37.8%；油料产量3405万担。粮、棉产量降到了1951年的水平，油料产量甚至比1949年还低。其他主要农副产品的产量也大幅度下降。轻工业总产值只完成550亿元，比1959年下降9%。这是建国10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现象。

严重缺粮问题1960年5月就已经开始出现。当时，各粮食调出省所调出的粮食，只完成了调出计划的一半。100亿斤的出口收购计划也只完成了30亿斤。虽然中共中央5月28日和6月6日等几次指示紧急调运粮食，但是，粮食的调运工作一直进展不快。11月，中央确定调运粮食24亿斤，有关省、区却只完成14.5亿斤。同月，北京、天津、上海共销售粮食5.7亿斤，而

调入的粮食却只有3.7亿斤。实际上，当时实在是没有多少粮食可供调运。据统计，从7月1日到8月25日，征购粮入库仅139亿斤，比上年同期减少51亿斤；而粮食销售152亿斤，比上年同期增加13亿斤。这样一减一加，再加上6月底以前的库存减少数，使这个时期的粮食库存比上年同期减少了100亿斤。以至于不得不压低城镇居民的粮食供应标准。

至于农村，缺粮的问题更为严重。由于粮食减产和征购量较大，1960年农村留粮比1957年减少37.1%，人均粮食消费量比1957年减少35.3%。以至于山东、河南、山西、安徽、江苏等省的一些地方，在夏收刚过就出现了偷青吃青和人口外流等情况。

由于重工业发展过快，基本建设拉得太长，1960年全民所有制职工人数高达5044万人，比1957年增加2593万人。全民和集体所有制职工的工资总额也由1957年的217.6亿元增加到324.1亿元。加上巨额赤字，1960年的社会购买力就从1957年的675.1亿元猛增到716.7亿元。这样，在农业、轻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1960年的市场供应出现了比1959年下半年更为紧张的状况。社会商品购买力大于社会商品零售额74.8亿元，差额占当年社会购买力的10.4%，年终未实现的购买力总额达到了176.4亿元。

1960年，全国居民的消费水平比1957年下降13.6%；人均消费量，粮食由406.12斤，降到327.24斤，下降了19.4%，其中城镇由392斤降到385斤，下降1.7%，农村由409斤降到312斤，下降23.7%；猪肉由10.15斤降到3.06斤，下降69.9%，其中城镇由17.95斤降到5.42斤，下降69.8%，农村由8.7斤降到2.44斤，下降72%；食油下降到3.7斤，比1959年减少18%；棉布由24尺下降到不足21尺。在1960年的大部分时间内，除某些特殊供应外，市场上几乎没有禽、蛋等食品的供应，就连锅、碗、盆、筷之类日常生活用品，也很难买到。

大跃进还导致了国家财政的危机。1960 年 7、8 月间，财政收入大幅度下降。7 月份收入 53 亿元，比上月减少 12 亿元，下降 17.3%；8 月份，又比 7 月份减少 2.3 亿元，下降 4.3%。到年底，国家财政收入共 572.3 亿元，支出 654.1 亿元，财政赤字高达 81.8 亿元。货币流通量达到 95.9 亿元，比上年增加 20.8 亿元，增加 27.7%；而当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只比上年增长 9.2%。全国集市贸易的价格比 1957 年上涨了 25.4%。

粮食的极度缺乏，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据部分省、区和共青团中央反映，有相当一部分职工、学生和居民患了浮肿病。例如，10 月和 11 月间，重庆市 9 所大学患浮肿病的人数占师生总数的 10%以上；太原市 14 所大学占 13.5%；山东省财政厅竟占到了 35%以上。另外，患肝炎和妇女病等疾病的人数也不断增加。更为严重的是，全国相当一部分农村还出现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现象。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1960 年全国人口净减少 1000 多万。如果加上自然出生人口，非正常死亡人口肯定要大于这个数字。

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的薄一波在 30 年后回顾这段历史，仍感沉痛。他说："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

到了 1960 年 10 月，中共中央领导已经普遍地感到了农村形势的严峻。10 月 21 日，陈毅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今年已经有几个省开始缺粮，秋收以后就缺粮，寅吃卯粮，明年会更缺了，有个怎样渡过的问题。一个山东，一个河南，一个辽宁，一个河北，是最难过的，其次是山西，还有几个省。1958 年，1959 年几个大战役，把我们的存底挖空了，把我们的存粮箱箱柜柜都拿来吃光了，又来了连续两年的灾害，所以引起困难，明年春天又来个灾害怎么办？

9. 为了刹住“跃进”战车，各项应急措施纷纷出台

如果说，在1960年初总结1959年的工作时中共中央还认为国民经济比例正常、市场繁荣稳定、1960年应该继续“跃进”的话，那么，面对1960年年中之后出现的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中央就不得不再度采取措施纠正大跃进的做法，并开始从根本上考虑大跃进战略是否正确的问题。

中共中央在10月27日下发的指示中指出：人是每天要吃饭的，不论办工业、办交通、搞基本建设，办任何一项事业，都离不开粮食。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当忘记这个最简单的、千真万确的道理。

“人是每天要吃饭的”，这确实是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但为了弄懂并记住这个道理，我们的国家却付出了如此惨痛的代价。

一些应急措施其实在上半年就开始制定并实施了。

首先降低的是棉布的供应标准。5月7日和22日，中共中央先后批准商业部的报告和发出通知，分别将人均2.4尺的棉布定量降低了2尺和1尺多。9月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指示，决定降低农村和城市的口粮标准。农村的口粮标准，淮河以南可维持在360斤左右，丰收地区可提高到380斤；淮河以北，则应在300斤左右，灾区压低在300斤以下。城市的口粮标准，除高温、高空、井下和担负重体力劳动的职工以外，其他人口每月一律压低2斤左右。9月23日，中央还发出指示，把直辖市、省辖市和县城等城镇居民每月的食油定量分别从10两、7两和4两压低到了7两、5两和3两。对于粮、棉、油之外的其他食品

和日常生活用品，也大都压低了供应标准，实行了严格的凭票限量供应。以北京市为例，1960年实行凭票供应的商品高达50种之多，零售额占到社会商品总零售额的40.7%。

粮食和副食品的极度匮乏，迫使人们寻找其他东西替代。当时，在农村，不仅食用野菜、野果，就连农作物的秸秆和一些树叶，也被加工制作成了代用食品。在城市，也普遍开展了采集和制造代用食品的运动。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指示，号召立即开展一个大规模的采集和制造代用食品的运动。根据科学院的建议，中央推荐了玉米根粉、玉米秆曲粉、橡子面粉、叶蛋白、人造肉精、小球藻等多种代用食品，要求人们利用秋收已经完毕的时机大规模地采集和制作。中央指示，目前应把重点放在群众过去习惯食用的、大量的、制作简单的、“粗”一些的代食品方面；同时，也应有重点地试制和推广一些新的、技术性较高的、营养成份较大的、“细”一些的代食品。为了领导代食品的采集和制造，中央和各地区、各部门还专门成立了各种领导机构。

原计划1960年增加职工200万人，可到6月底，职工总数就达到4796万人，实际增加了235.7万人。8月底，又猛增至4905万人，超过原计划增加人数144万人。鉴于这种情况，196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国家计委和劳动部党组《关于当前劳动力安排和职工工资问题的报告》，决定：今后3、5年内，一切机关、企业事业单位都必须停止从农村招工；今冬明春减少基本建设职工150万人，精减各类企业的非生产人员以及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的工作人员；1960年和1961年，除安排大专、中专、技校毕业生、少数复员军人以及为以后几年培养新技工所必需的学徒之外，不再增加新职工；今后3、5年内不再提高职工工资标准，而且从1960年10月起，逐步降低17级以上党员干部的工资标准。12月17日，中共中央为领导精减职工而专门设立的关于劳动力安排和干部下放5人小组还进一步提出了

1961 年精减职工 502 万人的任务。

1960 年 8 月 5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力紧缩社会集团购买力的指示》，要求全国一切机关、团体、部队、学校、企业、事业单位，在今后 5 个月内，要把公用经费中的商品性支出部分压缩 20%左右，全国共压缩 5 亿元。节约下来的经费，属于地方的，归各省、市、自治区处理；属于中央部门的，50%留归各部门。但这些经费（包括归中央的和归地方的）都应当存放在人民银行，在 1961 年 2 月底以前不得动用。为进一步减少市场上流动资金，12 月 20 日，中共中央还发出了《关于冻结、清理机关团体在银行的存款和企业专项存款的指示》，决定自 12 月 25 日起，冻结截止到这一天的各单位除工资、伙食费、助学金、救灾款、外事费、企业流动资金和对人民公社的退赔款等以外的所有存款；经审查清理，凡是资金来源合乎国家规定的，应当承认存款单位的所有权，但在 1961 年 6 月 30 日以前原则上不得动用。凡是资金来源不合乎国家规定的，应一律交回中央或地方财政。

1960 年上半年，基本建设规模急剧膨胀。鉴于这种情况，8 月 19 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国家计委和国家建委提出的《关于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保证生产的措施》，决定，凡是没有开工的限额以上项目，一般不再开工；已经开工的项目，除确保一批增产原料、材料和支援农业的重点项目外，其余项目应停建的停建，应推迟的推迟；规模过大的要化大为中，化大为小；非生产性的公共建筑和文化福利设施，除必要的学校、宿舍、营房外，尚未开工的一律不再开工，刚刚开工的一律停建。根据上述要求，1960 年国家预算内投资计划由第二本账的 382 亿元压缩为 344.8 亿元，第二本账计划施工的 900 多个限额以上项目，299 项停建和缓建，38 项缩小规模，567 项单项工程减掉。计划外的 116 个限额以上项目，除 13 项列入计划外，其余一律停建。

为了改变财经纪律松弛、资金管理混乱和财权分散的状况，

12月31日，财政部作出了加强财经管理的一些规定，包括适当缩小专区、县（市）和公社的财权；一律不搞赤字；控制预算外资金；加强企业的资金和成本管理；监督基本建设投资；工商税目的增减和税率的调整由中央决定。为了加强现金管理，9月22日，中共中央还批转了中国人民银行党组《关于严格实行现金管理制度的报告》。

11月3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这是受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委托，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一份重要的文件。指示信在一些经济政策方面实现了重大的突破，其中规定：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这一制度，从1961年算起，至少7年不变。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凡是平调的各种财物，都必须认真清理，坚决退还。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劳力、土地、耕畜、农具必须坚决实行“四固定”，固定给小队使用。生产队对生产小队实行包工、包产、包成本和超产奖励制度。三包必须落实，奖罚必须兑现。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

虽然指示信还坚持公共食堂、部分供给制等政策，但在其他方面的政策规定简明扼要，易于贯彻，易于记忆，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

10.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确定了关于调整经济的“八字方针”

1960年11月15日至12月23日，第九次全国计划会议在

北京举行。会议进一步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讨论了准备提交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审议的1961年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和计划安排要点。李富春在会上的报告中总结了大跃进运动的主要经验教训。这些教训包括：发展国民经济必须真正以农业为基础；人民公社必须坚持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计划指标必须留有余地；必须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必须充分注意产品的质量和品种；必须把权力适当集中于省、市和中央。

1961年1月14日到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八届九中全会。参加全会的有中央委员83人，候补中央委员87人。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23人列席了会议。在全会之前，从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举行了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的召开作了准备。

确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是八届九中全会的第一项内容。

关于当前的经济形势，全会在充分肯定了1960年大跃进的巨大成绩后指出，当前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是，粮食、其他农产品以及工业原材料供应紧张，工业品质量下降，许多设备没有得到必要的维护和修理，某些地区和部门的“共产风”等错误严重。全会认为，产生上述困难和问题的主要原因：一是连续两年的自然灾害；二是连续三年的大跃进产生了新的不平衡，特别是工业和农业之间的不平衡；三是没有认真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某些计划指标定得偏高，基本建设战线拉得太长；四是权力下放过多偏下，某些规章制度也没有建立和得到严格执行；五是少数领导干部思想方法上有主观片面性，工作作风上有官僚主义。

基于上述分析，全会决定，从1961年起，在两三年内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即调整各个部门之间已经变化了的相互关系，巩固生产力的发展和变革中获得的硕大成果，充

实新发展起来的一些事业的内容，提高那些需要进一步改善的新事物的质量。

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的安排，全会指出，要努力加强农业战线，适当缩短工业战线；要认真注意品种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适当放慢数量的增长。在工业生产建设的安排中，要先生产、后基建，先采掘、后加工，先维修、后制造，先配套、后主机，先质量品种、后数量，以便在现有数量的基础上，加强薄弱环节，填补缺门，完成配套，维护设备，增加品种，改善质量，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在采掘工业中要首先注意对煤炭、木材、铁矿的安排。这样，八届九中全会就正式确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根据这一方针安排了1961年的国民经济计划。

八届九中全会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主要分析了当前的农村形势，总结了各地整风整社试点经验，讨论了进一步开展农村整风整社运动和贯彻执行中央紧急指示信的问题。八届九中全会，则讨论通过了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农村整风整社的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作出了纠正“共产风”等错误的一些政策规定。

为了切实纠正“共产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纪要》规定：提高粮食、油料、生猪、禽蛋等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将社员自留地占总耕地面积的比重由5%提高到7%，20年不变；生产队、生产小队和社员个人种植的桑、茶、果、木等各归其自己所有；在养猪方面，公私并举，以私养为主，允许社员家庭私养母猪；鼓励社员饲养鸡鸭兔羊等家禽、家畜以及经营其他小规模的家庭副业；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所需要的手工业；放手活跃农村集市，不要作过多的限制；列入国家计划的生产资料生产，必须保证完成，力争超过；继续调整和压缩各方面的劳动力，充实农业生产第一线，等等。

八届九中全会确定了经济调整的方针，但在具体政策方面，成效是有限的。全会确定1961年的钢产量与1960年持平，为1900万吨，原煤计划产量比1960年还略高，基建投资略有减少。基本的思路是维持在1960年的水平上。

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分别作了讲话。他强调，要缩短重工业和基本建设战线，延长农业和轻工业战线。指标不要太高，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今后几年，要着重搞质量、品种、规格，搞企业管理制度、技术措施，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搞好成龙配套，搞好调整、提高。鉴于大跃进以来许多决策严重脱离实际的经验教训，毛泽东一再强调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他在讲话中指出，做工作要求三点：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情况明是第一条，是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无从谈起。因此，就必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1961年，要搞一个实事求是年，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第八章　调查研究，扭转时局

1. 毛泽东发出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毛泽东对于调查研究历来是重视的。1960年11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就明确提出：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

1961年1月13日，也就是中央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在讲话中说：今年搞个实事求是的一年。当然，不能讲我们过去根本一点不实事求是，也不能这么讲。我们有实事求是的传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跟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不摸底了。

1月18日，即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在讲话中再次强调：希望今年这一年，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说：“大家回去实事求是地干，不要老是搞计划、算账。要搞实际工作，调查研究，去督促，去实践”

“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这个口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毛泽东本人在这方面更是亲自抓，亲自管。

1月20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还没有结束，毛泽东就给他的秘书田家英写信，要求田家英、陈伯达、胡乔木每人带一个调查组深入农村做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已告陈胡，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三个组，每组组员六人，连组长共七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组成。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六个组员分成两个小组，一人为组长，二人为组员。陈、胡、田为大组长。一个小组（三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时间10天至15天。然后去广东，三组同去，与我会合，向我作报告。然后，转入广州市作调查，调查工业又要有一个月，连前共两个月。都到广东过春节。”

按照毛泽东的布置，三个调查组1月21日即离京赴农村。这三个组出发时，每组7人，共21人，除组长3人外，组员有邓力群、许立群、王力、张超、梅行、王录、杨波、胡绩伟、逄先知、吴介民等。后来，有关中央局和省委也有一些人参加，如参加浙江组的有华东局农委副主任董家邦，浙江省委副秘书长薛驹。

据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逄先知回忆，田家英领导的浙江调查组迅速组成，第二天离开北京，22日便到了杭州。浙江调查组经与浙江省委商量，按照毛泽东抓两头的调查方法，决定在嘉善县选一个差的生产队，在富阳县选一个好的生产队。通过调查，很快发现了一些问题。

三个调查组出发后，1月26日晚，毛泽东也带着急于了解农村真实情况的紧迫心情，乘火车离开北京，经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杭州、南昌、长沙，于2月24日到达广州。在这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他沿途听取了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和广东7个省委和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三个调查组组长的汇报，还同一些县委书记谈了话，作了一路的调查研究工作和调查研究的动员工作。

2月初，毛泽东到达杭州时，田家英将浙江调查组的初步调查情况向他作了汇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提出了一些意见。

其中包括：怎样克服“五风”改变面貌问题；关于人民公社的退赔问题；农村自留地问题；食堂问题和起草一个工作条例，规定公社三级怎么做工作等问题。这些问题，大体反映了毛泽东当时对人民公社以及农村政策问题的一些基本看法，有些是已经明确了的，有些是正在酝酿之中。后来他又听了湖南、广东等调查组的汇报。这就为广州会议的召开和主持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做了准备。

《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也就是后来常被人们简称为“六十条”的文件，也是田家英在汇报时向毛泽东提的一个建议。后来，毛泽东在广州会议上提到这个工作条例的由来时，是这样说的：“我是听了谁的话呢？就是听了田家英的话，他说搞条例比较好。我在杭州的时候，就找了江华同志、林乎加同志、田家英同志，我们商量了一下，搞这个条例有必要。搞条例不是我创议的，是别人创议的，我抓住这个东西来搞。”

毛泽东刚到广州时，就看到陈伯达带领的广东调查组 2 月 19 日报送给他的《调查纪要》。《纪要》提到：公社各级的关系，在解决了自下而上的“共产风”问题后，似乎应当注意更适当地解决队与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在分配上的某些平均主义。关于队与队的平均主义，《纪要》举例说：新兴县里洞公社蒙坑大队，是由原来的两个高级社合并起来的。一个在山上，副业门路多，收入高，原来一个劳动日 1.2 元；另一个在平地，副业门路少，收入低，一个劳动日 0.7 元。合并后，收入都降低了，而且降成一样都是 0.4 元，两个大队的社员都有意见，收入降低多的社员意见更大。关于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纪要》认为：主要表现在供给与工资的比例、公共食堂的某些制度上。大沥公社平均每月共发工资 500 元，可是按人口平均供应的粮食、菜、油、盐、柴，合计每月 260 元，按劳分配的工资部分还占不到总分配数的 20%，而按人口平均分配的供给部分却占了总分配数

的80%多。公社干部认为，劳动力强的和弱的都一样地吃，能挑百斤泥的人没有劲了，劳动力弱的也不积极，有些人就“走自发”，谁也瞧不起工分了。据典型调查，农村里劳动力多、人口少的家庭和人口多、劳动力少的家庭，大体都占农户总数的40%左右。人民公社要分配合理，重点就是处理好这两类户之间的矛盾。《纪要》提供的这些情况和所作的分析，受到毛泽东的重视。他察觉到：1960年11月3日，中央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中规定的12条，只解决“调”的问题，没有解决“平”，即平均主义的问题。

2. 邓子恢通过调查提出一系列调整农村政策的建议

毛泽东在1960年底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希望1961年成为调查研究的一年。其实在此之前，邓子恢已经开始就农村人民公社的一些急迫问题进行调查了。

庐山会议时，邓子恢因为身体不好，没有上山参加会议，算是躲过了一劫。1960年9月初，中共中央刚刚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后不久，刘少奇得知休养了一年多的邓子恢病情稍有好转，立即约见他。问了问病情后，就向他提出：近年来，农村工作中的错误颇多，造成的后果很是严重，中央正在考虑解决农村工作中的问题，赶快把农民情绪稳定下来。希望你到农村去作些调查，了解些真实情况，研究些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邓子恢二话没说，当即应承了下来。

9月上旬，邓子恢带领工作组下乡，首站是山西省汾阳县万年青人民公社。他在这个公社住了两个星期，重点深入到两个管

理区：一个是工作比较先进的贾家庄管理区，一个是工作比较落后的金井村管理区。调查告一段落，回京途中，他又在河北省石家庄停留，在市郊铜冶人民公社做了一个星期的调查。他轻装简从，走家串户，同管理区、生产队干部、社员、党员、老农开座谈会，查看农田、养猪场、水利工程、食堂，接触了许多群众。

调查结束之后，邓子恢回到北京，同工作组的人们一起，对调查的情况进行了一番认真的分析研究。他认为，现在要改变反右，继续纠“左”，把庐山会议后中断而现在又重新开始了的人民公社体制调整工作坚持下去。从三个基本核算单位的情况看，当前有些政策急需重申、坚持、执行。这就是：稳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这个制度。当前不要搞过渡，搞过渡对发展生产不利。坚持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要给生产小队一定的自主权；生产小队利用渠边地边生产的杂粮瓜菜要归生产小队所有；对生产小队的“三包一奖”要兑现，要承认差别；要允许生产小队办养猪场。坚决纠正平调的错误。要满足社员要求，从公社到社员层层算清账目，再不要搞平调。允许农民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分配要合理，要兑现。

他调查很细致，研究更认真，由表及里，抓住了问题症结，想出了解决办法。立即亲自动手，就调查所得的第一手材料和研究的意见，向中央写了《山西、河北两个人民公社三个基本核算单位的调查》报告。

报告送出之后，他同工作组的人们说：我们这次了解的情况是北方农村的，南方农村的情况到底怎样？有了南方农村的情况，问题可能抓得更准些。9月底，他带着急于了解南方农村情况的急迫心情，又率工作组从北京直奔江苏无锡县。他在无锡县住了20多天，深入到一个公社的几个基本核算单位。仍是走访社员家庭，召开各种座谈会，参观生产设施，多方接近群众。

在无锡调查过程中，邓子恢对同来的调查人员说：我们这次

调查，有个问题不知道你们发现了没有？从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以来，中央发了好些文件，但到了基层，有的没有同群众见面，有的执行不认真，有的执行打折扣，甚至走样。这一方面可能与某些具体规定不切合实际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与某些具体规定朝令夕改有关。现在有没有条件像搞初级社社章、高级社社章那样，搞个公社社章？搞社章不成，搞个条例也行。现在人民公社内部矛盾很多，有的很尖锐。如果能把现有的处理人民公社内部矛盾的方针政策、办法归纳起来，使之条理化，规范化，公布于众，这对纠正农村工作中的错误，稳定农民生产情绪，发展农村经济，将起重大作用。大家同意他的想法。

当调查告一段落，邓子恢同工作组的人们一起，即着手草拟《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并邀请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安徽、福建、江西等省市委农村工作部长到无锡来参加讨论修改。

回到北京后，邓子恢当面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了这三省的农村调查情况，并提出搞个《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周恩来支持这个意见。于是，他组织一班人协助修改《条例》。经过 40 多天，一次又一次的研究、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修改稿）》终于于 11 月底定稿。

《条例》分 14 章 66 条，着眼于解决人民公社内部的经营管理问题，特别是解决人民公社内生产大队之间，也就是原高级社之间穷富拉平的平均主义问题。《条例》于 1 月 23 日由中央农村工作部报送中央，周恩来看到了，很高兴。这个《条例》成了后来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村六十条（草案)》的重要参考材料，也可以说是《农村六十条（草案)》的前身。

《条例》定稿后，邓子恢又感身体不适，遂赴海南岛榆林港休养。路经郑州，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前来看望。吴芝圃从 1941 年开始就在邓子恢领导下工作，俩人交往较深。1958 年邓

子恢曾两次路过郑州，吴都来看望。邓子恢耳闻河南有浮夸，一再提醒吴：河南工作不要搞过了。吴总是漫不经心地说：我知道了。结果河南果真出了问题，饥馑遍地，饿殍遍野。在这种背景下两人再次见面，吴老泪纵横，羞愧难当。只说了一句："真后悔当初没有听你的劝告，造成了工作失误。"

1961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在23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对邓子恢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的创举予以表扬。毛泽东说：邓子恢同志那个时候顽强得很。邓子恢同志，为了说服你，我跟你谈过多次话。现在我跟你统一了。我跟你没有矛盾了。去年他在山西、石家庄、江苏南部作了一次调查，作得很好，他的观点很正确。农村工作后头犯的错误，是谭震林同志他们有份，他没有份的。你们看不起邓子恢同志那是不行的，人家现在正确了。

这一天的会议，邓子恢到得稍迟一些，就坐在会场的后边。毛泽东讲着讲着，忽然两眼向会场横扫了一遍，未见到邓，就问："邓老来了没有?"大家不约而同的眼找邓子恢。有的看到邓子恢惊奇的样子竟笑了起来。邓耳朵有点背，没有听到毛泽东的询问，就问坐在身旁的叶剑英："他们笑什么?"叶说："笑你哩，毛主席表扬你了!"邓子恢开始认真地听毛泽东讲话。毛泽东说："农村工作部找谁呵，还是邓老。他有很多意见是正确的。他同我谈过，我介绍他去跟总理谈。总理让他起草个文件，叫做人民公社的章程，首先创议的是总理。"

周恩来插话说："是他给我说的。"

毛泽东赶忙说："啊！首先创议的是邓老，然后总理支持。"

在这次会议上，邓子恢还作了一个大胆的发言。他认为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村六十条（草案）》规定的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把基础放在大队一级是不可以的。既名为基础，就意味着它是一个经营的实体和居于最底的层次。因此，把基础放在生产

队最为恰当，它是最基层，生产、生活都直接联系群众，又是生产的具体组织者和指挥者。同时，生产队规模一般只有二三十户，以它为基础和变成经营实体，很适应目前基层干部的经营管理水平。

邓子恢的这个发言是很有见地的，但在当时，他的意见没有为中央所采纳。

3. 调查研究的第一项重大成果——《农村六十条》

2月23日，毛泽东派出去的三个调查组在广州会合，准备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起草工作一直是在毛泽东的指导下进行的。25日，毛泽东邀集陶铸、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廖鲁言、赵紫阳等人开会，宣布条例起草工作班子由陶铸挂帅，陈伯达为副，3月10日起草好。起草工作分两段：前7天拿出初稿，后7天找些人来讨论。会后开始起草。初稿主要由廖鲁言、田家英、王录、赵紫阳分头执笔，胡乔木修改。3月6日写出初稿，不算序言，共8个部分，67条，连序言在内，近14000字。

3月10日，由毛泽东主持的“三南”会议在广州开幕，参加会议的是中南、华南、西南三个大区的中央局书记和各省市自治区书记，主要讨论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和农业问题。与此同时，由刘少奇主持的华北、东北、西北三个大区的“三北”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题也是讨论农村问题。

3月13日上午8时，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并“三北”会议写了一封信谈平均主义，号召大家亲

身到农村去调查情况，信中说：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大都也是如此，至今还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做亲身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或者看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走马观花的调查。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是同样犯了的。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

信写完后，当天上午，毛泽东在“三南”会议讲话，反复阐明要搞清两个平均主义问题，就要深入调查研究的道理。他要求各级党委第一书记亲自做调查研究工作，其他书记的调查研究工作由第一书记抓。他说：医生看病叫诊病，先诊，中医叫望、闻、问、切，先搞清病情，然后开处方。我们打仗，首先要搞侦察，侦察敌情、地形，判断情况，下决心，然后布置队伍、后勤等。历来打败仗都是情况不明。过去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就是因为情况不明。

毛泽东原定派陶铸去北京通报“三南”会议情况，并带去他写给刘少奇等人的信。但信写完后，他又改变了主意：请“三北”会议移师广州，合开广州会议。

3 月 14 日，“三北”、“三南”两个会议合并召开，在广州继续进行。与会人员对毛泽东的信和新发现的毛泽东的一篇旧作《关于调查工作》（后来公开发表时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反映强烈。中共中央随即将毛泽东的信发给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中央各部部长，中央国家机关党组成员学习。根据中央意见，由胡乔木执笔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这封指示信于

3月23日在工作会议上通过后发出。将《关于调查工作》一文作为附件，下发到县、团级党委，指示信要求联系最近几年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入地讨论。并指出：中央要求从现在起，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把深入基层（包括农村和城市），蹲下来，亲身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每年一定要有几次，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定出制度，造成风气。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践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

在大会讨论这封指示信时，田家英边念信稿，毛泽东边穿插作些解释。信稿不过800字，而毛泽东的解释记录却有上万字。毛泽东坦诚地说明：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情况不明，政策就不对，决心就不大，方法也就不对头。为补课起见，我现在提倡调查研究。第一书记亲身调查很重要，足以影响全局。

广州会议的另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修改、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这个草案初稿在3月6日由起草班子写出后，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审查，同时发给10日开幕的“三南”会议与会者。13日，毛泽东在“三南”会议的讲话，认为条例草案初稿内容太杂，篇幅太长，不能一气读完，要压缩到8000字左右。出席“三南”会议的许多人一致赞成搞一个条例。有人说：1960年11月的“十二条”虽好，但那是党内文件，需要一个公开的条例。还有人提出：目前，农村工作中问题很多，光搞一个条例，内容势必很杂，重点不易突出，建议条例只写经过实践已肯定的制度、政策和办法，另写一个党内指示，着重解决思想认识和党的领导等问题。也有人认为，鉴于公社体制在调整中间，在体制定型以前，条例可暂不搞。对此，毛泽东表示不同意。他说：这又不是圣旨，今年不行，明年再改；明年不行，后年再

改。后来，这个条例始终没有提交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形成正式法令，一直都只是修正草案，可能与毛泽东的这个解释有关。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三南”会议讨论，由胡乔木执笔，又对条例作了一次大的修改，15日上午修改完毕，这就是条例草案的二稿。二稿首次定名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共9个部分，50条，9000多字。

15日下午3时，毛泽东召集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廖鲁言谈条例问题，决定将条例印发会议讨论。会议共讨论了两天，有一个争论的问题，就是关于是否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会议没有作出结论。

3月15日，刘少奇在中南、华北小组会上有一段插话。他说：第一，对“五保户”实行部分供给制，实际上是社会保险，农民是赞成的。但其余的统统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多劳多吃。活劳动转化为死劳动，劳动力就是钱，就是物资。所谓经济工作越做越细，就是要节约劳动时间，提高劳动效率，所以加班加点一定要给钱。第二，搞家庭副业、自留地，这是经济民主。这段插话表明刘少奇当时已经对平均主义的供给制持否定态度。

3月19日，开始修改工作条例第二稿，吸收每一个大区一至三人参加。华北是陶鲁笳，西北是白治民，东北是冯纪新，中南是王延春、赵紫阳，华东是林乎加、薛驹、魏文伯，西南是黄流。胡乔木向起草组传达了毛泽东当天中午的谈话：这个条例怎么样？没有危险吗？农业问题抓晚了一些。这次一定决心解决问题。第二次郑州会议，问题解决得不彻底，只开了三天会，而且是一批一批地开，开会的方法也有问题。庐山会议本应继续解决郑州会议没有解决的问题，中间来了一个插曲，反右，其实应该反“左”。1960年上海会议对农村问题也提了一下，但主要讨论国际问题。北戴河会议也主要是解决国际问题。“十二条”起了很大作用的，但只是解决了“调”的问题，没有解决“平”的问

题。12月中央工作会议，只零碎地解决了一些问题。农村问题，1959年即已发生，庐山会议反右，使问题加重，1960年更严重。饿死人，到1960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

21日，第二稿修改完毕，是为草案的第三稿。三稿共10章，首次定型为六十条。

3月22日，中央工作会议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要求各地对条例进行认真讨论，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切实解决人民公社中的问题。

草案坚持第二次郑州会议确定的体制，规定：以生产大队的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在生产大队范围内，除了生产队和社员所有的生产资料以外，一切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都属于生产大队所有。草案根据新发现的问题，规定人民公社各级的规模都不宜过大，特别是生产大队的规模不宜过大。公社一般应该相当于原来的乡或者大乡，生产大队一般应相当于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草案还规定：在一切有条件的地方，生产队应该积极办好公共食堂。

广州会议，用毛泽东的话来评价，这是公社化以来中央同志第一次坐下来一起讨论和解决农业问题。

4. 刘少奇轻车简从返故乡，深入农家体察民情

对于毛泽东提出的号召，刘少奇从来都是积极响应的。1961年3月，刘少奇在广州参加过中央工作会议后，便决定到湖南省

做一次深入的调查研究。因为湖南是他的家乡，到那里便于了解真实的情况。

动身前，他去向毛泽东辞行：

“主席，中央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我打算去湖南看看！”

毛泽东说：“很好。前两年，搞什么亩产万斤、几万斤，那是哄人的。近年遭了点灾，饿了点饭，又搞得人心惶惶。也就是蔬菜少了一点，头发卡子太少，没有肥皂嘛。情况不明，政策就不对，决心就不大，方法也就不对头！”

刘少奇说走就走。4月1日打电话通知了湖南省委，4月2日上午就到了。

为了迎接国家主席，湖南省委接连开会。首先是选点派人，决定省委书记李瑞山为总队长，组成省委工作队陪同刘少奇下乡。再就是调配车辆。国家主席的专车理应豪华、舒适一些，湖南又是他的家乡，为尽地主之谊，省委为他安排了一辆那时档次最高的苏制吉姆轿车。另外还有数辆小车供随行人员使用。生活上也作了周到的安排。按照当时的规定，干部待遇分大灶、中灶、小灶，13级以上干部可以吃小灶，现在国家主席来了，更应妥善安排。于是，他们就在宾馆专门抽调了一位技艺高超的厨师为他做饭。乡下条件太差，另派一辆卡车装着席梦思、沙发、办公桌，还有其他生活必需品，人到哪，家具和生活用具就带到哪。

刘少奇说来就来了。省委以为他要在长沙住几天，但他说时间很紧，马上要下乡。在庐山会议后，张平化接替周小舟担任了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便向刘少奇汇报了省委的安排。

刘少奇听了，半天没吭声。一会，他问道：

“平化，我记得你做过酃县的县委书记，那是什么时候？”

张平化据实回答：“酃县是我的家乡。从1929年秋天起，我就当酃县县委书记，一直到1933年初。”

刘少奇笑着说：“时间不短嘛！”

“那时候，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扩大工农武装。任务相当艰巨，但大家的工作热情很高……”张平化说起当年的峥嵘岁月，显得有些兴奋。

刘少奇又笑着问道：“你那时也是相当一级的干部了，你们下乡，是不是也住招待所?”

张平化愣住了，他弄不明白刘少奇主席这话是什么意思。

刘少奇开始言归正传：在战争年代，我们有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人民战士处处爱人民。干部下乡了，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决不打扰老百姓。我这次下乡调查研究，如果按你们那样安排，怎么去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呢？眼下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我们还穷讲究，摆阔气，高高在上，群众心里会怎么想？哪个还敢向你讲真话啊！

张平化解释说：我们考虑到您年纪大了，乡下的条件又确实太差！

刘少奇摆摆手说：眼下不是讲排场的时候。我下乡蹲点调查，不要影响省委的日常工作，你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李瑞山同志也不要陪同了。更不要什么席梦思、大沙发，那样会闹大笑话。我仍旧采取老区的老办法，吃住都在老乡家！

张平化说：还是派李瑞山同志去领领路吧！

刘少奇坚持说：李瑞山同志是北方人，你别为难他了。我是去我的老家，通衢大道，山林小径，哪个地方不熟悉！好啦，就这么定了！

当天下午3时左右，刘少奇乘坐的苏制嘎斯69吉普车离开了湖南省委招待所，经长沙五一路向西驶去。车前没有警车鸣笛开道，后边没有车队跟随，就像一位普通干部外出办事。与他同行的只有夫人王光美、秘书吴振英和几个工作人员。

刘少奇的吉普车来到了宁乡县一个叫王家湾的小村子，这里距刘少奇的故乡炭子冲只有8里路。由于刘少奇离开家乡将近

40年了，估计这里的人们一时认不出他来。这倒便于他开展调查研究。于是，刘少奇决定就先在这个村子里进行调查。

为了工作的顺利开展，刘少奇不打算一开始就公开自己的身份。他交代过身边的工作人员，人家认识就认识，不认识也不要急急忙忙地介绍。先保密，后公开。时间长了，人家就会认出来。到那时，我们的调查工作可能就有了进展了。

刘少奇把调查组的住处选择在一个"万头养猪场"里。这个万头养猪场其实最多时只养过几十头猪，而且还都是从各农家集中起来的。刘少奇一行人来时，这里只剩下两头猪了。刘少奇要随行人员把他的住处安排在猪场的一间饲料房。其他工作人员就住到了旁边的一间空猪舍里。

秘书们找来门板，为刘少奇架床，工作人员则只能打地铺。这里原本是鱼米之乡，此时工作人员竟找不到像样的铺床稻草！

刘少奇信步走到屋后山坡上。放眼望去，只见田地荒芜，杂草丛生，几个衣衫褴褛的孩子在挖野菜。路边有一堆已经风干的人粪。刘少奇走过去，用脚搓开，仔细瞅了瞅，不禁摇头叹息。他对秘书们说：你们看，这里面多是粗纤维，是粮食吃得少、野菜吃得多的缘故，农民吃饭已经成了问题。

在王家湾，刘少奇白天走村串户，深入到社员家里和田间地头，体察民情，了解情况，他的足迹遍及这里的山山岭岭和田垅阡陌；夜间，他就找来干部、社员，或促膝谈心，或召开小型座谈会。每天他的工作总是安排得满满的。

调查获得的情况是令人震惊的。

一个叫张纪富的大队长告诉他，他所领导的大队，原来有830多人，现在剩下740多人了。跑了40多人，死了38人。另外还有100多个病号。这里讲的死亡都是指非正常死亡。有人给他讲述了一个叫王四大汉的社员惨死的故事。

在湘中乡下，大汉就是大力士。这个王四大汉典型的大力士形象：个子很高，背阔腰粗，力气很大，一肩能挑400斤。他的肚皮也大。据说他去为岳丈祝寿，按照乡俗，进门先要吃长寿面，他一口气吃了14碗！他性格豪爽，队里的重活难活都叫他，他从不推辞，因而人缘极好。但在食堂吃饭，吃不饱肚子，饿极了，便饥不择食，竟去挖观音土吃！

湘中的一些地方，在山坡边挖下去几尺深后，会有一种乳白色的胶泥，质地极细，像糯米粉，还粘牙。相传在明朝万历年间，此地发生大饥荒，不少人就是以观音泥充饥而没有成为饿殍。这是300多年前的传闻，想不到今天，在国家主席的故乡竟真的有人去尝试。

王四大汉挖来一桶观音泥，撒上一点盐，味道还确实不错，他便大口吃了起来。谁知吃过以后，肚子就开始感觉鼓胀，胃在下坠。晚里睡不着觉。天亮的时候，去解大便，解不出，死用力，肛门竟掉了下来。抬到卫生院，医生给他洗胃。胃里不是食物，怎么洗得下来呢？这样熬了两天，他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死的时候，鼓胀的肚子里全是泥土！

刘少奇在王家湾进行了5天的调查研究。他想找一个先进的地方看看，了解点先进的经验便于推广。经与湖南省委联系，张平化向他推荐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那是省内外都闻名的红旗大队。

4月12日上午，刘少奇来到天华大队。这里是湖南省的一面红旗，全国闻名。就在当月出版的《中国妇女》杂志上还有一篇近万字的文章，介绍天华大队和大队支书彭梅秀：

由于以彭梅秀为首的党总支委员会认真贯彻了党的政策，领导群众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天华大队由穷走上了富裕。不仅粮食丰收，社办工业也收入达3.2多元，生猪生产也发展了一步。全队98%的社员增加了收入。今年过春节时，食堂杀了猪，有



1961年4月至5月中旬，刘少奇回到他的家乡湖南省宁乡县和毗邻的长沙县，进行了44天的农村调查。这是刘少奇走访农民家庭。

的食堂还杀了羊，杀了鸡，网了鱼；此外有白糖、饼干、白酒、海带、银耳……

但刘少奇一来就发现了问题。

一天早起，刘少奇在前屋后屋转转，走到一个叫余泽福的家里。自从吃公共食堂以来，他就饿得害病，当时他已几乎不能下床。他对刘少奇说：早几天我还想吃一顿饱饭，现在我只怕没有力气吞下去了。

刘少奇叫王光美赶快去叫医生。经医生检查，余泽福严重的营养不良，患的是重症水肿病。医生给他开了一些药，王光美又送给他一包白糖，还亲自为他泡了一杯白糖开水。

随着形势的好转，余泽福死里逃生。30多年以后，1996年12月5日，有客人来到王家塘找到余泽福寻觅当年的故事。余

仍然健在，84岁了。当时他正在坪子里晒太阳。提起35年前的故事，他对来访者说："我这条命是王光美用白糖开水救出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说我吃了修正主义的迷魂汤，糊我的大字报，批斗我。我反抗不得，心里可明白着呢。这主义那主义，能救人性命就是好主义。王光美同志也快80岁了吧，你们如果能见到她，请给我捎个话：我惦着她。好人咧！"

刘少奇在调查中还了解到这里存在着严重的"浮夸风"问题。一位因为敢讲真话而被定为"右倾分子"的原天华大队党总支副书记段树成向他讲了实情：

天华1300多亩田，最好的年景为1957年，产量只有80万斤，1960年田里减了产，实际只收72万斤。但上报到公社的产量是120万斤，虚报了48万斤。送给国家的征购和超产粮是32万斤。人均口粮不足400斤。这400斤是稻谷，打成大米只有280斤。一年有365天，每天平均只有7.6两米，每餐2.5两米。

段树成说：上级号召以粮为纲，全面跃进。粮食确实是个纲。粮食减产，副业都上不去。1960年生猪年底存栏全大队只有17头，上报的却是500多头。鲜鱼出塘只有几百斤，上报为7500多斤，每天工值只有2角3分钱，上报到公社是5角钱。这2角3分钱的收入，吃饭、穿衣、点灯、治病、小孩上学……全在里边，根本无法维持正常生活！

与1957年相比，社员生活大大降低了。全队患水肿病的人超过100人，上报到公社只有十几人。1958年全大队死亡48人，报到公社11人，少报了37人！

他还对刘少奇说道：这几年，根本不能讲缺点。动辄扣帽子、批斗，哪个还敢讲呢？

情况调查清楚了。刘少奇召集大会，省、县、区有关领导都参加了。刘少奇在会上说：社员群众生活过得很苦，不能完全怪基层干部，上边也要负主要责任。有些事是中央提倡的，如大办

食堂，大办水利，大办万头猪场，根子还在中央。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对你们不起。

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说：报喜不报忧，根子在省委，省委听到好的就高兴，助长了浮夸风。

长沙县委副书记、县长李满成说：我们没有走好群众路线，假如多听听群众意见，怎么会有这么多损失呢！

一位常来天华跟踪报道模范典型的报社记者说：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我写过许多夸大模范典型的报道，感到很沉痛。

国家主席、省委书记、县委领导，还有报社记者都真心实意、深刻沉痛地向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当面道歉，人们增强了信心，看到了希望，决心齐心协力走出困境。

5. 把饭碗还给百姓，乡间农舍又见炊烟升起

刘少奇在湖南农村开展的这一次调研，不仅发现了一些影响全局的重大问题，而且就地解决了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他率先主持了大面积解散公共食堂的工作。

刘少奇在天华大队作调研的时候，有一次，请了七位普通社员重点座谈公共食堂的问题。通过几天的调查研究，他已经了解到了人们生活的艰辛。他对大家说：

“听说社员群众对公共食堂意见很多，比如，对供给制有意见；比如，对粮食有意见；比如，对住房有意见。大概意见最多的还是食堂。请你们敞开讲，讲错了也不要紧。讲错了也不批评，不戴帽子，不辩论。这几年，我们听群众的意见太少了。这几年，我们办了不少错事，使大家吃了许多苦头。”说到这里，

他环视着一张张面带菜色的脸，然后庄重地站起身来，立正脱帽，向大家深深一鞠躬，又说："今天，你们是先生，我们——"他指指担任记录的王光美和另两位工作人员，"包括我，大家都是你们的学生。学生向先生请教，请放开讲吧！"

七位社员手足无措，惶恐不安。

老实巴交的杨运桂开腔了，说："刘主席，您来的头天，队里就开会打招呼，不准我们讲落后话、反动话。今天您这样看重我们，我要斗胆讲一句落后话！"

杨运桂说的"落后话"就是："公共食堂不好。"

有人开了头，其他人也都开始讲了起来：

"每天定量老秤 12 两，新秤合 7 两半。在保管室里老鼠吃掉一点，也许事务长炊事员还要刮掉一点，余下的不够我一餐吃。油很少，菜也不多。讲句不怕您刘主席见笑的话，屙出的屎也像猪粪一样！假如不吃公共食堂，各家各户自己做饭，没有人刮我的粮，田埂地角多种一点蔬菜，至少我的肚子会填得饱一些，干活的力气会大些。我总闹不懂，政府号召大家努力生产，多打粮食，又不让作田人吃饱饭。人是铁，饭是钢呀。你不让人吃饱饭，怎么去搞生产啊！"

"把住人家的饭碗，政府这一手真厉害！"

"开始办食堂的时候，说可以节约劳动力。就说我们施家冲食堂，72 人吃饭，做饭、整米、种菜、挑水、喂猪，一共占了 7 个劳动力、两个女劳动力，食堂用工占全队用工的 1/3。如果不办公共食堂，整米、种菜的活儿早晚捎带干了，哪里要专门的劳动力？还有刚办食堂的时候，上级要求生活集体化，全食堂 72 个人集中在施家冲居住。因为住得太挤，生活太不方便，不少人又陆续搬回去了。现在分别住在三四个屋场，远的有一里地，近的也要走一阵。一天三餐，来去六次，这要耽误多少工！刮风下雨，打着雨伞上食堂，生活多么不方便！""办公共食堂，对山林

破坏也很厉害。从前，烧柴只劈枝桠，扒地上的落叶，还烧一部分稻草。现在，没人扒柴了，稻草也没人及时收管，在地里沤坏了。食堂要柴火，就派人上山砍树。砍了大树砍小树，几年就把山砍光了。过去，天华的山上有老虎、野猪、鹿。不要害怕老虎，虎啸太平年。好几年都听不见老虎吼了，果然就遭灾、饿饭！”

“我是个困难户，女人去年得浮肿病死了，留下六个小孩。但我还是主张不办食堂。我的大孩子16岁了，老二、老三也做得事了。可以捡柴、种菜，我利用早晚的时间也可以开荒种自留地。这样会辛苦一些，但吃进肚里的粮食和蔬菜肯定要多些。老古班说，两脚忙忙走，全为身和口。公共食堂把大家箍在一起，年头忙到年尾，身和口都顾不上，不知政府为何硬要这么做！”

刘少奇还是第一次听到群众对公共食堂如此直言不讳的批评。他说：“那好，食堂办不办，由你们自己决定！”

一位社员问道：“假如我们都不赞成办食堂呢？”

刘少奇的回答很肯定：“那就不办！”

在与7名普通社员座谈的第二天，刘少奇接到了毛泽东批转的胡乔木在韶山的调查报告。胡乔木在报告中说：

“公共食堂，多数人不愿意办，据韶山片六个大队统计，153个食堂，1116户中，主张办常年食堂的只有5个，占3.64%；赞成搞公饭私菜的食堂65个，251户，占21.4%；部分人主张，部分人不主张办的食堂18个，152户，占17.4%；坚决要求散伙的食堂65个，674户，占57.6%；在主张办食堂的人中，有不少人是为了应付。这个统计说明，当前农村中的大部分人，是不愿意办食堂的。”

“民以食为天”，对于这个涉及到亿万农村人吃饭的大问题，刘少奇抓得很紧。他连夜赶回长沙，与湖南省委交换了意见，又去看望了正在长沙的毛泽东，与毛泽东统一了意见后，很快就回

到了天华大队。

时间是4月17日晚上。刘少奇召集大队支部委员和其他负责人开会。会议采取了漫谈的方式进行。

刘少奇首先介绍了自己调查的情况和与省委交换意见的经过，请大家敞开谈。

公社书记讲了自己的顾虑："公共食堂的毛病，我们也看出来了。只是办食堂的时候，上级有指示，社队干部为了贯彻上级的指示，不知开了多少会，跑了多少路。对那些有抵触情绪的群众，有的批评过，还有的挨过斗争，个别四类分子还以破坏罪关押过。现在叫散，难免不有顾虑，说这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巴子！"

刘少奇说："办公共食堂由中央负责任，不要你们负责。跟施家冲社员座谈时，我就说了这个意思。我向他们道歉，他们都很通情达理。共产党员随时准备修正自己的错误，为了人民的利益，我们有什么错误不可以纠正呢？"

区委书记说："办公共食堂，我们是犯得有错误。过去哪个敢讲呢？直接影响了生产的发展。就说家庭副业吧，公社化前，全区有40000多只鸡鸭，去年统计只有4000多只。1958年全区收红薯80万担，堆集如山，去年只有4000多担。"

刘少奇问这位区委书记："如果准许散食堂，全公社有多少食堂会解散？"

这位区委书记回答得非常肯定："如果敞开散的话，一个都会留不住！"

刘少奇坚定地说："那就敞开散，只要是真正自愿。过去，我是主张办食堂的，事实证明不行。卡住人家吃饭比什么都厉害，比捆绑还厉害。你把人家的饭碗拿在手里，这不行。现在要把饭碗还给人家！"

大家看法比较一致了，会议就作出决定，分头下去，发动群众开展讨论，还办不办公共食堂。如果还有一部分人愿意办，那

就一定要设法办好。如果不办，也不可匆匆忙忙解散。散会时，刘少奇又再三叮嘱：

“公共食堂办也难，解散起来也会有许多难处。群众再经不起折腾了，我们要多替他们想想。想细一些，做好周密安排！”

在家乡炭子冲，刘少奇也重点调查了公共食堂的问题。

公共食堂本来是一个生活组织，但因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小队便成了基层政权的一个小单元。食堂是以小队为单位建立的，公共食堂因此也包含有基层政权的内容。炭子冲属首子冲食堂管辖，刘少奇的调查便从首子冲食堂开始。

首子冲食堂共有23户，56口人。工作人员5名，另有两个全劳动力负责食堂柴火。事务长领着他参观公共食堂。卫生搞得不错，里里外外打扫得很干净。进入厨房，挂菜篮子的地方挂着一块猪肉，约10多斤；地上的盆子里还有两条鱼，活的。那时猪肉供应紧张，在县城，除了五一节、国庆节、春节，每人凭票供应2两猪肉外，肉店平时关门。这个食堂有肉还有鱼，刘少奇高兴地说：“食堂还办得不错嘛！”

事务长兴致勃勃地展示食堂的经济实力。接着又搬出油盐坛子，满满的一壶菜油，盐也很充足，还有一大箱豆腐。

与事务长告别返回住地时，刘少奇说：“如果这里的情况属实，也不能千篇一律说公共食堂不好！”

刘少奇所说的“不能千篇一律说公共食堂不好”的前提是“如果这里的情况属实”。但很快他就发现这里的情况并不属实。

第二天，他的一位亲属，在首子冲食堂就餐的居民鲁渭媛对他说：“假的，那都是假的。您老人家前脚走，猪肉菜油都让人提走了！”

刘少奇吃惊不小。他已经38年没有回炭子冲了，没想到回来的第一天看到的竟是一场专门对付他的“戏剧”！

在家乡，刘少奇见到了许多早年的朋友，听到了许多在各级

汇报材料里看不到的“逆耳忠言”：

“叫我看，去年粮食减产，天灾有一点，但只有三分。七分是人祸。‘五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平调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都是人刮起来的祸害，这就是那七分人祸！”

“报告刘少奇主席！这公共食堂还要办下去，将来会弄得人死路绝，国破家亡！”

“常言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解散了食堂，不知要救多少人的命。这当然是最好不过！”

“今天我可要讲几句反动话！再这样搞下去，不要很久，连抬死尸掩埋的人都会找不到了。国家主席啊，这人都死光了，这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还办不办?!”

刘少奇这次回炭子冲是来作调研的，时间安排得很紧张。但不管怎样，他还是要抽时间到离炭子冲八里远的赵家冲，去看望他的六姐刘绍德。

刘少奇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六姐比他大八岁。由于那时普遍存在的重男轻女思想，六姐没有上过学。家里人口多，母亲的家务担子很重，照顾小弟弟的任务就落在了六姐身上。六姐总是将弟弟驮在自己的背上，用布带捆好，然后，姐弟俩就到屋后的树林里听鸟雀啼鸣。后来不需要六姐驮了，六姐仍然处处帮助他。在他的童年记忆里，六姐是除母亲之外，最亲最爱也最让他牵肠挂肚的亲人。

姐弟俩见面的场景是让人伤心的。六姐一见面就对他说：“你姐夫少陪了！”

当地的乡下老人忌讳说死，只说“少陪了”，也就是告别人世的意思。

刘少奇的姐夫是去年冬天死的。因为吃不饱饭，弄来些米糠饼充饥。年岁大了，消化不了，憋了两天两夜，活活给憋死了。

刘少奇问：“刚才，在山坡上看见一片新坟，那是怎么一

回事?”

家里人告诉他:“那都是今年开春以来的新坟呀。我们队里就死了11个。有的是吃了糠饼野菜树皮,拉不出,憋死的。有的是得水肿病。”

刘绍德哽塞着对她的弟弟说:“你姐夫,还有队里的那几位,都是饿死的咧。老弟,你在中央做事,要给老百姓饭吃啊!”

刘少奇从六姐家回到炭子冲。心情还是很不平静,他对乡亲们说:我主张扎扎实实算一盘损失账,算得大家心里疼。然后开一个单子,某年某月,由于乱搞,损失东西多少。再把这些内容,刻一块石碑,竖在路边上,让过往行人都能看见,子子孙孙传下去。以后就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调查所得是刻骨铭心的。此后,刘少奇很少再讲大跃进的伟大成就,很少再宣传“三面红旗”的完全正确。在这一点上,也使他与毛泽东渐渐地拉开了距离。

刘少奇在湖南调研44天,在此期间,他与地方党委一道,果断地调整政策,敞开口子,凡农民自愿的,都可以解散食堂,自己回家做饭。用他的话说,就是要把饭碗还给农民。

5月9日,刘少奇离开了炭子冲。那天早上,他看到了一座座破败不堪的农舍又出现了缕缕炊烟。这是延续了几千年的农家炊烟,它表明了生命的延续。但是,从1958年10月开始,在全国的大部分地方,这种农家炊烟竟中断了两年半!于是出现了饿殍遍野的凄惨场景。如今,乍一恢复,人们无疑还面临着许多许多的困难:他们没有锅,一口锅张家炒完菜,李家再借去用,有的一口锅供10来家使用;他们没有灶,不少人家就用几块破砖支起个临时的“灶”;他们没有米,没有柴,没有菜刀,没有菜板,没有碗筷,甚至没有住房——就像是一群群落难逃荒的人。但是,毕竟“又见炊烟升起”,人们就有了一种死里逃生的希望。

今天的人们,可能很难想象为了农家可以自己生火做饭,我

们的国家所付出的惨痛代价。

一位叫张步真的作家，当年曾亲历过解散公共食堂的过程，他作过这样一段回忆：

1961年3月初旬，我被分配到平江县瓮江公社金罗大队当驻队干部。一起去的，还有一位后来颇有建树的工笔画家，他驻在隔邻的生产队。

我们下去的任务是办好公共食堂，组织好春耕生产。我召开社员会议，将上级的指示照本宣科，那当然是走过场了！

大家都愁眉苦脸。这时，有一个青年女子说："开会就讲现话，听得耳朵都长老茧了。在地里干活，饿得腿巴子发软，这种日子我不想过了，我想死！"

我训斥她，队长也训斥她。

第二天，也许是第三天，我和队长去坡地里察看。忽然，坡下的坪场里一片闹腾。有哭的，也有叫的。我们急跑下坡，有人跳塘了！

果然是昨天那个说傻话的傻丫头！人们七手八脚地把她从塘里打捞上来，人已没气了。姑娘的母亲在坪场里呼天抢地。

我心里难过，社员情绪更加低落。这时，有传言说，隔邻的长沙县，一个叫天华大队的地方，公共食堂都解散了，而且是刘少奇主席下令解散的。

瓮江公社与长沙县搭界，两边互有亲戚。消息是那里传过来的。首先是我不相信。我刚在县里开了扩大会，上级强调政治到食堂，干部下伙房。再说，我们也不知道刘少奇主席到了天华。我慎重其事地召开会议，劝告社员不要信谣传谣。眼下生活困难，谣言和小道消息很多，大家要保持警惕。

只过了两天，公社通知所有驻队干部回公社，收听县委召开的电话会议。县委决定：解散公共食堂！与会者全都愕然。电话会由一个小喇叭将音量扩大，不是很清晰，大家以为是听错了。

电话会结束，公社书记还打电话去县里核实。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所有的人都喜形于色。太阳快落山了，公社书记留大家在公社住一宿，明天再下队贯彻。不管是路远的，路近的，都不愿意留了。这是天大的喜讯啊，决不能过夜！

金罗大队距公社有 10 多里地，我几乎是一路小跑。回到队里，立刻通知全体社员开会。有人已经睡了。我说，不行，睡了也要起来。不来开会，会要后悔的！

我传达县委电话会议精神。人们一片惊骇：这怎么可能呢？

我告诉他们：这全是真事。

屋里静静的，谁也没有说话。忽然，前几天投水而亡的姑娘的母亲，一位年近 50 岁的老大娘，“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妹子，我的苦命的妹子啊，只要再熬两三天，你就熬到头了呀……”她转过脸来朝我发问，“既然要解散食堂，为什么拖到今天才散呢？早散几天，我的妹子就不会死啊！呜呜呜——”

我的眼眶也潮湿了，不知如何来安慰这位母亲。

哭声也像传染病。有人开了头，一个老汉也哭了。他为他的老伴死于水肿病。一个中年汉子哭了，他为食堂的事挨过斗……

我劝慰他们：“这是喜讯呀。一切都过去了，你们怎么还要哭呀！”

他们反而哭得更厉害。

农民把解散公共食堂称为“第二次解放”。

6. 周恩来武安调研与农民交朋友

广州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提出 5 月中旬在北京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的任务是继续广州会议尚未完成的工作：收集农民和干部的意见，修改农村工作条例六十条和继续整“五风”。

为了开好这次会议，毛泽东要求参加会议的人，在会前对农村中若干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如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等进行重点调查。

为落实毛泽东关于深入农村，进行重点调查的部署，4月底至5月初，周恩来先到河北邯郸，听取河北省负责人的汇报。随后，在5月3日至8日到河北武安县伯延公社进行深入调查，走访几十户农民家庭，视察了生产队的集体食堂，还到公社商店了解商品价格。周恩来在社员家中看到的情况令他十分震惊。他后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除了树叶、咸菜、野菜以外，就没有东西了，硬是没有存粮。"

抗日战争时期，武安曾是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所在地，当地群众为支援八路军打击日本侵略者做出过重大贡献。看到这里的乡亲们生活仍旧这样贫困，周恩来感到十分痛心和内疚。

到武安的第一天中午，周恩来提出到食堂就餐，食堂的人赶快叫社员们先打饭吃。等周恩来一行人就餐时，不见一个社员的影子，桌上为他备了猪肉和鸡蛋。周恩来知道是在做假，硬是让工作人员端走了。

村干部以为周恩来不会再去食堂了。过了一天，他又悄悄来到另一个村子的食堂，但还是去晚了，社员已经吃完回家。炊事员一见周恩来来，措手不及，连忙盖锅盖，说没有吃的东西了，随同的公社干部就叫周恩来回公社吃。周恩来也不说话，径直走到大锅前，揭开锅盖，见里面还剩些玉米糊糊，二话不说，拿碗就盛。这是周恩来在农村吃到真正的食堂饭。玉米糊糊下肚了，周恩来心里对食堂的情况也清楚了一半。

周恩来召集社员开会，黑压压挤了一屋。周恩来坐在会场的主席台上。开始，群众不敢说话，说话的人也只说食堂好，能吃饱。周恩来见有压力，笑着指指身后墙上的画像，"我叫周恩来，就是墙上的那个人。你们看像不像？这次我来是想听大家的心里

话，有话只管说，说错了也不要紧。”

会场还是很静。周恩来见一个农民蹲在他身边，闷头吸烟，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怎么不说话？”别的人回答说他叫“张二廷”。

张二廷见总理问他，弹簧似的猛地跳起身，直着脖子问：“总理，你叫说真话，还是假话。”

周恩来说：“当然是真话啦！”

张二廷说：“要说真话，刚才说的食堂好，全是假话。食堂不好，食堂吃不饱。”

周恩来立即直起身子，神情异常认真地问：“为什么吃不饱？”

张二廷也认真起来：“总理你算算，一共几两指标？司务长、炊事员多吃一点，他们的老婆孩子爹娘老子再多吃一点，干部多吃一点，到我们社员嘴的才有三四两，能吃饱吗？要自己做，汤汤水水的总能糊饱肚子。别看我死了老婆，一人拉扯几个娃娃，我还是愿意自己做！”

张二廷的话像拉开了闸，大家七嘴八舌诉说食堂的苦衷，有人竟然号啕大哭起来。

周恩来心情沉重地说：“乡亲们，我的工作没有做好，我这个总理没有当好，让大家挨饿了。食堂办不好，就不办。”

张二廷不相信地问：“不是糊弄我们？”

“不是！”周恩来斩钉截铁地回答。

张二廷愣冲冲地说：“你要是糊弄我们，总理，再过两三年，你也会饿死的。”

会场顿时陷入沉寂。过了好一阵，周恩来突然拍了一下桌面，高声对张说：“好！你往下说，为什么两三年，连我也会饿死？”

张二廷也无所顾忌了：“说就说！我们吃不饱，没劲干活，地里打不上粮……长那一点粮还不够咱生啃着吃呢！哪有粮食往

上交？一年不交，有国库，两年不交，还有国库，三年不交呢？国库还有吗？你当总理也要吃饭，国库没粮，你能不挨饿？”

周恩来的眼眶潮湿了。他激动地说：“二廷，你是我下来碰到的第一个敢讲真话的人，你批评得对，我很难过。上面不了解情况，下面乱指挥，搞得你们减了产，生活困难，我能不难过？”说着，他站起身，拉住张的手，放在自己的胸口上，又说：“我周恩来走南闯北，很少有人能说住我，今天算你行，说住了我。二廷，咱们交个朋友吧！”

第二天一早，天色蒙蒙亮，周恩来找到了张家。面对和蔼可亲的国家总理，张二廷如实地谈了许多情况，并希望周恩来以后再来伯延。周恩来表示有机会一定来，自己来不了，也一定会派人来。周恩来没有失信，直到“文化大革命”前，他年年都派人到伯延，并代他看望这位敢说真话的农民朋友。

在伯延公社调查过程中，周恩来发现，社员最不放心的是多征购粮食，害怕挤掉他们的自留地。社员们要周恩来当场保证：“分下去的自留地再不要收回了，再不要拿自留地顶口粮指标了。”周恩来认为：“既然摸点，总要摸出个情况来，总要给他一点合理的保证。”所以，他当着地委、县委、社委的领导说：“我可以保证。”社员们又要求周恩来以后能够每半年来一次他们才能放心。周恩来回答说：“我个人能否半年来一次，还不能担保，有时可能忙于什么事情去不成，但是工作组总是要去。”

5 月 6 日，临离开伯延的时候，周恩来召集社员开会，亲口告诉大家一个决定——伯延村解散食堂。满满一院子群众，一听总理下命令，呼啦啦地往周恩来跟前挤，想和他握个手。周恩来身不由己被沸腾的群众簇拥着走出会场大院向南走去——南面还有好多群众等着和他握手告别。周恩来见此情景，索性绕着伯延的街走了一圈。



1961年4月至5月间，周恩来到河北省邯郸地区调查研究。这是他在武安县伯延公社向农民了解情况。

在村东头，突然从人群里挤出一个老汉。他二话没说，冲着周恩来“扑通”双膝着地，磕了一个响头：“周恩来大人……我给您请安！”

大家都被这一突如其来的动作搞懵了，周恩来则一把把泪流满面的老汉搀起来。

原来这是另一个村的一名单身汉，吃不饱，浑身浮肿无力。有人给他出主意，叫他去找周恩来总理反映情况，不吃食堂。他一早奔到伯延来，没想到周恩来正好在宣布解散食堂。于是，他的一肚子苦水化为一个跪拜和两行热泪。

通过对伯延公社的调查，周恩来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情况。他发现《紧急指示信》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中关于开办食堂和保持部分供给制的规定，并不符合农村实际情况，

是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群众意见比较集中、反应比较强烈的两个问题。5 月 7 日，他请秘书孙岳用保密电话向正在上海的毛泽东汇报了调查的情况，汇报中说：

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我正在一个食堂搞试点，解决如何把食堂解散好和如何安排好社员回家吃饭的问题。

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现在社员正在展开讨论。

三、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评工记分的办法，但是已有发展。办法是：包产到生产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因此，这个办法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四、邯郸专区旱灾严重，看来麦子产量很低，甚至有的颗粒不收，棉花和秋季作物还有希望。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社员的体力和恢复畜力问题。

毛泽东十分重视这些意见，连夜将这份汇报批转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先后收到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真、胡乔木等从各地寄来的调查报告。这些报告中反映的问题和周恩来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几乎是相同的，普遍不赞成办食堂，不赞成在分配上实行供给制。这些调查研究工作，为中共中央进一步修改《农村六十条（草案)》做了重要准备。

7. 修改“六十条”，抛弃不得民心的“共产主义因素”

《农村工作六十条》在广州工作会议通过并正式下发后，很

受各地群众欢迎，但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广州会议后，由各级领导干部率领的调查大军，带着“六十条（草案）”下乡到基层，同群众一起讨论，向群众作出解释，听取意见，了解情况，研究问题。与此同时，各级党委、党政机关、民主党派、群众团体也进行了广泛讨论。各种修改意见，通过不同的渠道，源源不断地汇集上来。

“六十条”从总的精神上是要坚持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制度，对此农民当然是不满意的。各地调查组很快就发现并反映了这一点。

1961年3月，广州工作会议以后，朱德到四川、陕西、河南等省农村做调查研究。5月9日，他给毛泽东写了封信，说他在四川看到的是：社员吃饭“两道烟”。所谓“两道烟”就是，在食堂打饭，自己回家做菜，浪费人力物力。到陕西，反映更强烈，说食堂有五点不好：社员口粮吃不够标准；浪费劳动力；浪费时间；下雨天吃饭不方便；一年到头吃糊涂面。据河南省的调查，河南荥阳县大彦滩食堂，是个模范食堂，得到过县委的锦旗，但全村32户中，只有4户五保户和单身汉愿意吃食堂，其余28户都要求回家吃。

广州工作会议以后，邓小平、彭真大多数时间在北京主持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利用日常工作的间隙，他们还直接组织了5个调查组，在北京市顺义县、怀柔县进行调查。经过调查研究，5月13日，邓、彭给毛泽东写信，反映食堂问题在北京郊区比较复杂。居住分散的队不办，常年食堂一般主张不办。至于农忙食堂，群众意见很不一致。北京市各县、区向群众宣布三条：吃食堂、不吃食堂都完全根据自愿：吃食堂、不吃食堂都好，都光荣；吃食堂、不吃食堂都给予便利。结果远郊区的食堂大部分都散了。

4月9日，胡乔木在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六十条（草案）”

下达后，韶山公社的生产队干部对食堂问题有三派：赞成、反对、中间，调查组有意识地把三派人找到一起开会，持反对态度的队长一开口就问赞成办食堂的队长："把良心拿出来，说真心话：你说你家生活比三年前过得怎样？"几句话问得那个赞成办食堂的队长面红耳赤，说不出话来。4月26日，胡写给毛泽东的报告，附有调查组关于韶山公社食堂问题的详细调查材料。报告说，在讨论"六十条"中，遇到的最突出问题就是食堂问题。从群众反映来看，大多数食堂目前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中的一个疙瘩。主要是因为它同工分值降低、社员收入减少、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直接联系在一起，又在群众的每天生活中引起许多不便。因此，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愈早解决愈好。毛泽东把胡乔木的报告批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并单给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写去一封信，嘱他立即将报告及附件印发三级干部会议讨论。

与此同时，中央在广州会议以后，还派出了大批的由其他领导人带领的调查组，仅农村调查方面，就有谢富治领导的河北省邯郸调查组，杨尚昆领导的徐水、安国调查组，习仲勋领导的河南省长葛调查组，胡耀邦领导的辽宁省海城调查组，钱瑛领导的甘肃天水调查组，王从吾领导的黑龙江省双城调查组，平杰三领导的山东省泰安调查组，陈正人领导的四川省简阳调查组，廖鲁言领导的山西省长治调查组等。这些调查组通过深入农村，与农民座谈，开展调查研究，都程度不同地发现了一些问题。如，中央河北省邯郸调查组谢富治4月19日给中央报告说：调查组一进村，群众就问"食堂要不要下放到户？"又说"食堂好比紧身袄，穿在身上怎么也不自在"。初步调查，80%的社员赞成回家做饭。此时，大队一位副支书说话了："食堂不能散，食堂是方向，散食堂就是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谁要散，得经过县委批准。"群众听他这么一说，要退出食堂的也不敢退了。为了让群众表达

真实的意见，调查组在5个生产队进行无记名投票公决。投票结果是赞成停办食堂的户占90%，赞成继续办的户仅占10%。海城调查组胡耀邦5月6日报告：青壮年、妇女、老年人，基层干部，没有一个说食堂好话的。干部们说：自从办起公共食堂，通常有一个队长顶着，不是丢就是坏，不是修就是补，不是吵就是闹，这个说"饼子有大有小"，那个说"勺子长眼睛啦"，伤透了脑筋。干部们还说：宁肯领导两个生产队，也不分管一个食堂。徐水、安国调查组杨尚昆5月20日报告：两县不少社队食堂已经散了，但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出现了一批"支应食堂"或各户轮流派代表去食堂吃饭的"代表食堂"。

一大批来自实践的有说服力的调查报告，终于使这个问题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农村六十条"起草工作班子于5月上旬着手研究修改，5月22日拿出"草案第一次修改稿"。经过5月北京工作会议讨论，6月5日产生了第二修改稿。6月8日，毛泽东阅后，第二修改稿付印。根据大家的意见，对印出的第二次修改稿又进行了一些文字性的修改，6月15日由毛泽东审定后发出，这就是"六十条（修正草案)"。

"六十条（修正草案)"明确提出："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社员的口粮，不论办不办食堂，都应该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

"六十条（修正草案)"另一项重大突破是彻底否定了供给制。

在广州工作会议制定的"六十条（草案)"第33条第2款规定："在生产队（包括食堂）分配给社员的现金和实物当中，一般地工资部分至少不少于七成，供给部分至多不能多于三成。有些地方，还可以只对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疾的社员，家庭人口多劳动力少的社员和遭到不幸事故，生活发生困难

的社员，实行供给或者半供给或给以补助，其余的社员都按劳动工分的多少，进行分配。”

“六十条（草案）”下达后，包括调查报告在内的来自各方面的反映，大多数不赞成供给制，只同意把“五保户”包起来，即对农村中缺乏劳动力、生活没有依靠的鳏寡孤独的社员，在生活上做到保吃、保穿、保烧、保儿童上学、死后保葬，对困难户给予适当照顾。

经过调查研究和北京工作会议的讨论，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也一致了，原草案第33条第2款被全部删掉了。至此，从1958年北戴河会议以来突出宣传的关于人民公社分配方面的两项“共产主义因素”都被否定了。

8.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说：总结经验，我看是时候了

1961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开了20多天，到6月12日才结束。

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只有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有一整套具体政策。

刘少奇刚结束湖南农村调查不久。5月31日，刘少奇在讲话中向与会者提出了一个问题：造成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是什么？

这是一个十分敏感而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当时，党内外的思想仍然相当混乱，集中表现在对形势的看法上。一部分人坚持把困难原因归咎于自然灾害，还有的人习惯于把成绩与失误说成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经过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刘少

奇显然不能接受这样的公式。他说：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组织跃进的工作中间，有很多的缺点错误，甚至有严重的缺点错误。

刘少奇还反问道：如果不是严重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减产？为什么要后退？难道都是天老爷的关系？说到责任，中央负主要责任，我们大家负责。他又说，我们现在所犯的错误还不是路线错误，但是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回头，还要坚持，那就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

刘少奇要求全党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下一个很大的决心，把思想转变到调整工作上来。他大声疾呼：

我看在座的同志应该是有经验了吧！饿了两年饭还没有经验？铁路还要修几万公里吗？“小洋群”还要搞那么多吗？工厂还要开那么多吗？还舍不得关厂吗？还舍不得让一部分工人回去吗？招待所还要盖那么多吗？恐怕应该得到经验教训了。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面的人也饿饭，全党、全国人民都有切身的经验了。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我看是到时候了。

在会上，周恩来也就总结历史经验的问题谈了意见。他说：庐山会议以来，由于我们缺乏分析，而把反右倾和工作上的问题混淆起来，更重要的是没有实事求是，所以尽管想搞好一点，结果却是适得其反。一切都搞全民化，动摇了集体所有和全民所有，得罪了小资产阶级。另外，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劳动关系上的命令主义，上层建筑上的规章制度一般化、简单化，认识上的主观片面性，作风上的“五风”问题，有些问题在理论上也说

不通，如以农业为基础，但是农林牧副渔普遍减产了；以工业为主导，由于战线拉得太长也不起主导作用了。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问题呢？那时，就是有点革命，不能深思熟虑，不能冷静下来，“欲速则不达”，跌了大跤。

周恩来讲到这里，刘少奇在一旁插话说：想要快一点，结果是跌了大跤，反而慢了。看来，搞社会主义光有好的道德、好的感情、好的干劲不行，还要适应客观规律。这一跤是要跌的，跌得越痛越好，跌得不痛就感受不深。问题是跌痛了没有。

周恩来说：我是感到痛了。

当时，各方面的矛盾集中地表现在粮食问题上，就像刘少奇所说的：“人人都要吃饭。城里人要吃饭，乡下人也要吃饭，读书人要吃饭，我们这些做官的人也要吃饭。”所以，怎样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是这次会议的一项重要议题。

5月31日，会议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粮食问题和压缩城市人口的报告。他指出：粮食的形势还没有好转，还在继续紧，1960年到1961年粮食紧张，城市重于农村，这是一个特点。他从产、购、销、调、存几个方面分析了全国粮食的情况，说明从现在的情况看，农业生产不可能很快恢复，因为农村机械化少，水利比例小，化肥少，电力少，“四化”程度不高，农业主要建立在人力、畜力、手工生产的基础上，所以，每年要供应城市500亿斤粮食是困难的。周恩来提出，要解决问题，根本的方针是“从城市压人口下乡”。他说：人如何压下去呢？最重要的方针就是人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三年压两千万，这是一个艰巨的工作。”

陈云十分赞成周恩来提出的方针，在发言中对城市人口下乡的意义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说：现在的问题，实质是这样：城市人口如果不下乡，就只好再挖农民的口粮，现在全国在讨论贯彻“十二条”和“六十条”，但是，如果粮食征购任务不减少，

“十二条”和“六十条”就起不了应有的作用。因为农民最后还是要看我们征购多少。如果征购数量还是那么多，农民还是吃不饱，那么，他们的积极性仍然不会高。所以，面前摆着两条路要我们选择：一个是继续挖农民的口粮，一个是城市人口下乡。两条路必须选一条，没有什么别的路可走。我认为只能走压缩城市人口这条路。

主持会议的刘少奇也表示：现在就是要下一个很大的决心，减少城市里面的人口。

会上，各大区认真讨论了周恩来的报告。经过对讨论中所提意见的综合分析，周恩来连夜主持起草出《关于粮食问题的九条办法》。6月6日，周恩来在会上对这九条办法逐一作了说明。经过讨论，又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这个文件在会议的最后一天——6月12日通过，并在6月16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下达。文件的题目改为《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供销量的九条办法》。这九条办法一直是调整时期指导城市精简工作和解决粮食问题的纲领性文件。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经过热烈讨论，终于在贯彻八字方针方面迈出了一大步。刘少奇总结会议精神说：中心的问题，就是要坚决缩短工业战线，延长农业战线和轻工业战线，压缩城市人口下乡。会议最后决定，当年就要下放1000万城镇人口，钢产量也要进一步压缩。会上还决定对“反右倾”等运动中受批判处分的共产党员和干部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平反。

这次会议还在调整重工业的计划指标方面取得了进展。

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上确定的钢产量与1960年持平，为1900万吨，原煤计划产量比1960年还略高。然而实际情况是，开春以来，产量逐月狂泻，财政收入下降50%。商品奇缺、物价飞涨、货币急贬。这种形势迫使国家计委不得不提出对1961年的计划再作调整。

要确定工业规模、基建规模、城市规模，关键是摸清农业的家底，粮食的家底。于是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重新核实几年来农业的实际产量。结果真可谓：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

1958年粮食产量不是公布的5000亿斤，而是4000亿斤；1959年不是公布的5100亿斤，而只有3400亿斤；1960年不是估计的4100亿斤，而只有2870亿斤；1961年估计全年粮食产量只有2700亿斤。

农业的情况见了底，工业上的问题也就全面地暴露。工业规模过大、基建战线过长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八届九中全会定的计划显然无法维持，既不是进，也不能站，而必须下决心退。

5月10日，李富春在计委会上说：如果不采取坚决措施把过高的生产建设计划落到实处，国民经济全面被动的局面就不能扭转过来。

在这次会议上，李富春提出把1961年的钢指标从1900万吨，调低到1100万吨。他说：重工业这样下降，是一个惩罚，是没有按规律办事，重工业速度发展过快，基本建设拉长了，城市人口增多了，工农矛盾突出了，所以退也是应该的，你不退，有什么办法？

周恩来焦虑地说：问题已经成了堆，不动大手术是不行了。现在的问题集中表现在速度上，中心是三年内要放慢建设速度。他斩钉截铁地指出：现在光有冷静不行，还要有勇气。

毛泽东表态了：去年1850万吨钢，现在1100万吨，降下来750万吨，我看可以。无非是外国人骂中国人不行。

从口气上可以听出，毛泽东对于如此大幅度地调低钢产量指标是心有不甘的，但现实摆在这里，他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毛泽东在6月12日的大会讲话中，特意向大家介绍刘少奇在湖南农村调查研究的情况。还说：我也要向少奇同志学习，亲自去做调查。毛泽东的又一次提倡，使调查研究之风再度

兴起,大批领导干部在会议结束后，打起背包、轻装简从下了基层。

但是，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毛泽东本人没有能够亲自去做调查。他能够做的只是听取别人的汇报或者阅读别人写来的调查报告。这就不能不限制他对于大跃进运动所造成灾害的认识程度。

9. 陈云四下青浦，研究解决农民私人养猪和家庭副业问题

毛泽东发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之后，1961 年 6 月下旬到 7 月上旬，陈云到老家上海青浦县开展调查。这是他解放后的第四次青浦农村调查。1955 年 1 月、5 月，1957 年 3 月，他也曾回故乡进行过农村调查。1958 年 6 月还到甘肃农村调查。

出发前，他请经济学家薛暮桥，中国农科院江苏分院院长顾复生、长期搞工会工作的领导人陆铨 3 人，加上与他长期联系的两个青浦农民组成先遣队，先去青浦县小蒸乡、观音堂乡摸底。后来陈云说，之所以选择小蒸乡，是因为 1927 年陈云曾与顾复生和陆铨在这里搞过农民运动，解放后又常有联系，对这里情况比较熟悉，农民也知道他们，比较敢于讲真话。

先遣队于 6 月 19 日抵达小蒸。经过摸底后研究决定，这次主要调查种双季稻、公私养猪等农民最有意见的问题。

一星期后，陈云从北京出发，先到上海，同上海市委负责人交谈后，坐火车到青浦县石湖荡镇下车。随后陈云从这里坐上小船，前往小蒸。



在中共高层领导人中，陈云较早地察觉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这是 1958 年 6 月陈云在兰州市桃林农业生产合作社调查。

小蒸地处江南水乡，湖荡中的一个个村庄，原来树木葱茏，竹林茂密。现在却是一片荒凉，村庄孤零零地散落在湖荡中。看到家乡的情况，陈云心里很不好受。他说，原来这里都是茂密的竹林包围着村庄，远处看都看不见房屋，公社化竹林都归公了，树木也归公了，结果都被砍光。农民的竹林作用是很大的，这里的生产用具、生活用具都离不了竹子，还可以制成竹器到市场上换钱用，农民从来不花钱到市场买竹扁担、竹筐用，现在也只好花钱买了。

6 月 27 日，陈云到小蒸后，住在自己娘舅一族的亲属、农民廖开弟的家里，作了 15 天的调查。

每天上午，陈云都深入农民家里，跟农民谈话，观察他们养

猪、种自留地、住房和吃饭等情况，并参观了公社的工厂、商店和仓库。

青浦县原来是生活比较好的鱼米之乡，过去农民习惯每天吃三餐，农忙时加一餐。调查组到那里的时候，由于组织人民公社，社员都到大队办的公共食堂吃饭。食堂缺少粮食，结果一天三顿饭，顿顿喝稀粥。他们到一个大队去参观时，大队正在开饭，看到一大锅粥。胆子大的农民愤愤地对调查组说："蒋介石手下受难，还吃干饭；毛泽东主席手下享福，却要吃粥。"这话很尖刻，但确是事实。农民吃不饱饭，把大队种的作为绿肥的红花草都吃光了。

那时，中央虽然已经决定，农民可以种自留地。但各地方执行的时候都打折扣，青浦也是这样。在小蒸，合作化以后，还给社员留了700亩自留地，到了人民公社化的时候，一声令下，自留地统统归公。郑州会议后纠"左"，1959年春天又分给农民300亩自留地。可是春天刚分下去，庐山会议后风向变了，反"右倾"，于是当年秋天自留地又收归公有，自留地里农民精耕细作的粮食，也折价归公。田边地头农民开的一些小块地，当地叫做"十边地"，搞公共食堂的时候，也收去当了菜地。就这么朝令夕改，收了放，放了收，把农民搞怕了。

陈云对自留地问题很关心。他说，自留地是一个与农民生产生活关系重大的问题。农民祖祖辈辈都得有点自己的地种着，自留地不仅是某家的自留地，也是社会生产生活中不可少的地，生产队只按计划生产的那几种作物是不能满足社会和社员的各种需要的。

陈云很带感情地说：农民有了自留地，我就放心了，不会饿死人了。农民没有粮食吃呀。中国的农民真好，饿死人不想起来造反。中国历来农民造反，都是在粮食问题上造反的。有自留地，农民就安定了，自留地要留足！

在当地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宣传中，有个“一条龙”的创造。所谓“一条龙”，实际上就是过集体生活的居民点。有一天，陈云踏着泥泞小路去看这个“一条龙”。

陈云等踩了一脚泥，走了好半天才到地方。在一块平地上，建起了几排新房，房与房之间有回廊相通，有食堂、商店、制衣点、医院、托儿所、养老院等等，干部能想到的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公社负责人还介绍起这样的社会主义新村的长远规划。对这种做法，陈云很不赞成。他皱眉说，社员群众不会愿意这样生活，这商店里货架上也没有商品，以后不要搞了，已经修起来的房屋要注意管好，不要弄坏了。

小蒸地势低洼，人均耕地少，无霜期不够长，农民向来是种一季水稻，种一季夏熟作物，如大豆、小麦。大跃进后非得让种双季稻，虽说比单季稻每亩多收 220 多斤粮食，但陈云找他所认识的老农算了笔细账，发现种双季稻各方面损失很大，实际上并不合算。因为算上因种双季稻给寄秧田、秧田造成的减产，算上每亩多用的种子，算上不能种夏熟作物损失的收成，就少收了 250 到 270 斤粮食，还不算多耗的肥料，少收的稻草、豆麦与水稻差价带来的收入损失。

那时农民明明连饭也吃不饱，干活都没有力气，公社还要逼迫他们种双季稻，立秋前抢割早稻、抢种晚稻时，一昼夜要弯腰劳动 16 个小时以上，这样插秧进度很慢。后来公社决定包插到户，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插秧勉强完成了。

陈云在田头看到，水稻田里的禾苗，有的碧绿，有的却是还没有转青的黄秧。有老农向陈云反映，秧是插下了，凑合了事，插得不好，要减产。陈云问怎样能不减产？老农说要联系产量，包产到户，以促进加强田间管理。这事引起陈云的深思，回来时路过上海，听到安徽省包产到户的消息，他要薛暮桥同周太和认真研究这个问题。

通过调查，陈云得出结论，历史上长期形成的耕作习惯，不宜轻易变更，作物安排必须因地制宜，像小蒸这样无霜期不够长，地势较低，人均耕地少的地方，不宜种双季稻，种夏熟作物，也要看土质情况，多种蚕虫，少种小麦。这样也要相应改变口粮年度安排。

陈云对农民的意见不仅耐心听，而且作了解释，有些还主动承担责任。他在几次座谈会讲话时，都先说这么几句：我是国务院副总理，现在把你们搞得没有饭吃，犯了错误，对不起老乡们。请你们把我这个意思也给各位老乡讲一讲。他还风趣地问大家：我是好人，还是坏人？群众说：你是好人。他接着说：我虽是好人，结果办了错事情。

多少年来，对于农民来说，养猪等于开了一个活的“家庭银行”，农民的大宗费用、年节开支，都指望养猪卖钱来解决。大跃进时期，农民私人养几头猪、几只鸡鸭成了小资本主义的表现，不准农民养。等到市场缺少肉蛋，又勉强发还。

对农民私养的猪和鸡鸭，曾经两次没收，两次发还。第一次没收是 1958 年秋人民公社化时期，到 1959 年春发还；第二次没收是 1959 年庐山会议以后，到 1960 年冬发还。这么两通胡闹，吓得农民心惊胆战，养家禽的积极性一落千丈。

陈云对农村养猪的事情是非常关心的。在小蒸，陈云调查得很仔细，开专题会，仅养猪一项就召集公家养猪的六七人和私人养猪的六七人各座谈两次。公社有 15 个养猪场，调查组看了 10 个，陈云亲自去看了 2 个。

在集体养猪场，陈云看到，饲养员责任心不强，喂猪时就像食堂开“大锅饭”，干稀一律，哪头猪吃得多，哪头猪吃得少，根本没有人管。在大大的猪棚下，猪圈卫生极差，里面只薄薄地铺了稀稀落落的一点稻草，湿漉漉的，猪滚得遍体泥浆。

公社干部汇报说，去年一年公社养猪没赚到钱，反而亏了

3.8 万元，平均每个农户要负担 16 元。建猪场，搞基建还花了 7 万元。

以前，即使粮食很紧张的时候，陈云也主张，为了保证肉食供应，粮食分配时要考虑猪的饲料粮，但毛泽东听说后不以为然，说：猪吃百样草，看你找不找，养猪可以不费粮。陈云这次下乡调查，也很想具体了解一下这个问题。调查以后，他得出结论，养猪还是要用粮的，只喂草，某一段时期可以，长久下来就不行，每头猪少不了 100 斤原粮。

在一次老农座谈会上，陈云问老农："把你们的猪没收对，还是发还对?"农民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说话。一个老农作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回答："上面说没收、发还都是对的。"

陈云又问："你们现在敢不敢养猪?"

那个老农说："还不大敢，说不定哪一天又是没收对了。"

陈云对大家说："没收不对，发还才是对的，以后再不会没收了。"

陈云的这个明确表态，开会的老农听了都喜出望外。当天这个消息就传遍了全公社。第二天是 7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的生日，公社宣布放假一天。农民几乎家家都到别的公社去抢购苗猪，妇女们把所有的小船都开出去抢捞养猪的水浮莲，掀起了一个养猪的高潮。

看到农民的积极性，陈云非常高兴，他对调查组说：你们看，现在猪归私养，妇女养猪的积极性就起来了。她要是不养猪，收工回家，除了做饭，劳力就闲起了。这样算下来，要闲下来多少劳力呵！他还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党犯了错误，必须向农民承认，不然就是改正了，农民还不相信我们的正确政策。

7 月 12 日下午，陈云一行完成调查任务，离开小蒸。

为了论证在小蒸公社调查的问题，进行比较，陈云又到与青浦情况相似的杭州、苏州找了几个县委书记和若干个大队支部书

记，研究种双季稻和种小麦的问题，也问了养猪和自留地情况，然后又到与青浦土地、人口、气候条件不同的浙江省萧山、江苏省无锡两县调查种植情况。

在杭州，陈云把调查结果向毛泽东作了汇报，随后又向周恩来作了汇报，他们都认为很好。

此后，陈云又就养猪、农作物种植安排、自留地三个问题同上海市委、江苏省委、浙江省委交换了意见。

最后，陈云把这次调查发现的问题和几点建议整理出来，专门给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写了一封信。陈云在信中把这次了解到的群众意见概括为四点：一是粮食吃不饱；二是基层干部不顾实际、瞎吹高指标，参加劳动少，生活特殊化；三是干部在生产中瞎指挥，不向群众进行自我批评；四是没有把集体生产组织好，农民积极性差，相反，对自留地、副业生产积极性高。随信附了这次青浦农村调查的 3 个专题报告：《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

10. 再上庐山，毛泽东提出开一个心情舒畅的会

6 月北京会议以后，毛泽东决定再上庐山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专门研究工业和城市调整问题。

庐山，景色多变，风诡云谲。庐山，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实在不是一块福地。

中共中央曾先后在庐山召开过三次会议，第一次庐山会议是在 1959 年的夏季，结果是批判彭德怀，将彭德怀和支持他观点的人们打成“反党集团”；第三次庐山会议是在 1970 年的夏季，结果是毛泽东与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反目成仇，并随之进行了

一番真正意义上的生死较量。所幸的是，毛泽东凭借他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在全党全军的崇高威望，战胜了林彪，而林彪则最终摔死在异国荒野。

我们现在叙述的是第二次庐山会议，这次会议召开的时间是1961年8月28日至9月16日。

毛泽东上山前对他的秘书田家英说：这次要开一个心情舒畅的会。

这次庐山会议重点是研究工业问题，会议的主要议程是由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主持的。毛泽东这时认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意见。会议期间，毛泽东听了关于会议的情况汇报，对中央常委说：听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心情很舒畅，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有辩论，你辩过来，我辩过去，需要。

的确，这次会议没有重蹈第一次庐山会议的覆辙。没有紧张气氛，没有批判场面。大家的心情平静而舒畅，比较敢于批评和议论工作中的问题和失误。

庐山会议通过了几个重要文件，如《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等。其中尤数《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最为重要。这个《指示》在讲到经济调整问题时指出：我们已经丧失了一年的时机，现在再不能犹豫了，必须当机立断，该退的就坚决退下来，必须退够。切实地进行调整工作。如果不下这个决心，仍然坚持那些不切实际的指标，既不能上，又不愿下，我们的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就会陷入更被动、更严重的局面。

毛泽东同意了会议形成的所有文件。但他多次流露出困难已到“谷底”的思想。他说：问题暴露出来了，走向反面，现在是退到山谷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这个上升与过去

不同，认识接近实际，可以稳步上升了。

他还说：现在指标低，不要悲观，不会长期的，很快会发展起来。

在谈到这几年的错误时他甚至说道："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人哪能不犯错误？人不犯错误，天诛地灭！"

8月24日，周恩来在会上作《各地贯彻农业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的报告》。他说：农村形势有好转，但问题还存在。群众反映"千锤打锣，一锤定音"，粮食问题不解决，条条是空的。他说：今年的灾情比去年、前年都大。农业恢复要3至5年。他还说：现在看来，城市还没有发生问题，但是若不注意，可能发生难以预料的事情。

据逄先知回忆，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听过毛泽东的讲话后也感到了不安：当时毛泽东对国内经济形势的估计是已经到了"谷底"。田家英认为，在农业方面可以这样说，在工业方面就不能这样说，因为工业生产仍在继续下降。

庐山会议快结束时，毛泽东为他的夫人江青所摄庐山仙人洞照片题写了一首旧体诗：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毛泽东渴望着摆脱一年多来的抑郁沉重的心情，重新回到亢奋的状态。

11.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人民公社体制基本形成

在3月份召开的广州会议通过的《农村六十条（草案）》规

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当时所说的"队"，是指生产大队。虽然在那次会议上，邓子恢提出人民公社应当实行以生产小队为基础的体制，但中央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广州会议以后，《农村六十条（草案）》开始付诸试行。

在试行《农村六十条（草案）》的过程中，一些地方的人民公社开始试行了扩大生产队核算，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分配等办法。9月16日，中央庐山工作会议闭幕以后，毛泽东来到了湖北，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向他报告了两个生产大队试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材料，一个叫"大队委托生产队进行分配"，一个叫"扩大生产队核算"。实际做法是：生产队的收入除了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和上交大队的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之外，其余全归生产队进行分配。试行效果很好，解决了生产队为生产的基本单位和生产大队为统一分配的单位的矛盾，瞒产私分的问题可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穷队与富队间的"一平二调"问题也可以基本上得到解决。在经营管理上简便易行。毛泽东听了，连连称赞。

9月27日，毛泽东在邯郸，邀集河北、山东两省省委负责人和邯郸、保定、邢台、石家庄、张家口五个地委书记谈话。谈话反映"三包一奖"既繁琐，又没有真正解决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谈话还反映，河北一些单位创造了一种叫"大包干"的办法，来解决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经济关系问题，既大大简化了手续，又使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很受群众欢迎。毛泽东听了汇报后，当即表示：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

10月3日，邓子恢受毛泽东的委托，在怀仁堂召开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的座谈会，座谈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10月6日，邓子恢向毛泽东报送《关于座谈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问题的情况报告》。《报告》说："大家完全拥护主

席所提人民公社所有权下放到以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指示”。对在基本核算单位下放时土地、耕畜、农具、征购如何处理提出了建议。

中共中央同意邓子恢的《报告》，于10月7日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指示说：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比较好的。它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改变生产的基本单位是生产队，而统一分配的单位却是生产大队的不合理状态，解决集体经济中长期以来存在的这种生产和分配不相适应的矛盾。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在10月下半月和11月上半月内，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10月22日，毛泽东约见邓子恢。毛泽东问：你又要下去，下去干什么？

邓子恢答：下去搞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试点。

毛泽东说：这个问题已经肯定了，不要试点了，就这样办。毛泽东停了停，又说：不过这样办了，还有些什么问题，需要去摸一摸就是了。

邓子恢说：现在有一种思想，以为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是一种权宜之计。这种思想要不得。我看，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要几十年不变。即使几十年后要变到大队所有制，也不能是现在这样一种形式。

毛泽东说：大队基本核算问题，现在根本不考虑这件事。这是30年、50年以后的事情。

10月24日，邓子恢又带领工作组离京南下，经郑州、南昌时，听取了河南、江西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试点情况汇报。28日，来到他的家乡福建省龙岩。这是他1961年内第二次到龙岩调查。

邓子恢一到龙岩，就随工作组到东肖公社的后田、邓厝、孟头等大队搞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试点。经过10天的紧张

调查工作，试点工作已接近尾声。11 月 9 日，邓子恢向中央写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试点情况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说：

对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各级干部和群众一致拥护，认为这对克服平均主义、官僚主义，贯彻民主办社、勤俭办社，调动社员积极性，发展副业生产都有极大好处。

《调查报告》还对试点中牵涉到的许多具体经济问题和组织问题及其解决办法，列举了 10 个方面。其中特别是关于生产队规模和生产大队的权力问题非常具有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关于生产队规模，报告说：一般都按照 1956 年初级社规模作了调整，20 户到 30 户左右，也有十几户的，群众认为这样调整合理。

关于生产大队的权力，报告指出：今后大队主要负担四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政权方面的工作；第二，党与政治工作；第三，联村社的工作；第四，办好大队企业。

对邓子恢的这个报告，中央认为很好，于 11 月 23 日批转了。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批示中写道："认真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做出具体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建议在 12 月 20 日以前，各省委第一书记带若干工作组，采取邓子恢同志的方法，下乡去，做 10 天左右的调查研究工作。"

1962 年 2 月 13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宣布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作为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至少 30 年不变。《指示》下达后，全国很快改变了农村的基本核算单位。

至此，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事实上已经不存在，农村基本上恢复了 1956 年初级社时的经济体制。

第九章　应该结束了，其实并没有

1.“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少奇的讲话震撼着七千名与会者的心

1961年11月16日，中央发出《关于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通知说：1958年以来，在中央和地方的工作中间“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并且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作风，妨碍着克服困难，必须召开一次较大规模的会议来统一思想认识。

刘少奇负责起草代表中央向大会作的报告。报告由中央组织的写作班子写出初稿，在刘少奇主持下反复修改，至1962年1月9日形成第一稿，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当天就看完了前两部分，并在给田家英的信中要他转告刘少奇、邓小平等：报告前两部分已看过一遍，“觉得好”。

1961年12月20日至1962年1月10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在京的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主要领导100多人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为即将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做准备。20日晚上，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讲到了形势与责任等问题。第二天，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重点讲了毛泽东谈话的内容。

关于形势到底是好是坏的问题，毛泽东说，他感觉去年前年心情不那么很愉快，究竟国内形势怎样？做一个总分析，还是不

错的。今年很高兴，因为我们的具体政策凡是搞了的都见效了，首先见效在农村，六十条一搞，最近把队为基础更进一步解决了，现在反映农村见效了。

关于对过去几年如何看。毛泽东认为，过去几年，包括大跃进，三年总的来说我们办的好事是基本的。有些缺点错误，我们也把它总结起来了，好的成功的、错误的统统总结起来了，就变成了财富。然后，我们就有可能制定一套合乎实际的正确的具体政策，我们的事情就会办好。

关于责任。毛泽东责成中央书记处将 1958 年北戴河会议以来的工作情况作一研究，中央书记处编了毛泽东的讲话和中央指示两个本子，认为前者没有错误，后者毛病很多。毛泽东说，有些问题是部门、地方出的主意，为什么中央听呢？他认为责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

关于有没有希望的问题。邓小平在报告中说，应该是有希望，是扎扎实实有希望，是真正有希望，毛泽东主席的方法，他多次跟我们讲，就是不断革命，一个任务完成了就要提出新任务，要不然灰溜溜的。

1962 年 1 月 9 日，中央工作会议分组讨论了为刘少奇准备的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书面报告第一稿。

1 月 11 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正式开始。这次会议的规模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包括了中央、中央局、省、地、县五级领导干部。出席会议的，除中共中央、中央局负责人外，全国每个县委 2 人，地委 3 人，省委 4 人，中央部委 4 人，还有大型厂矿企业和军队单位的负责人，加起来总共达 7118 人，所以又叫“七千人大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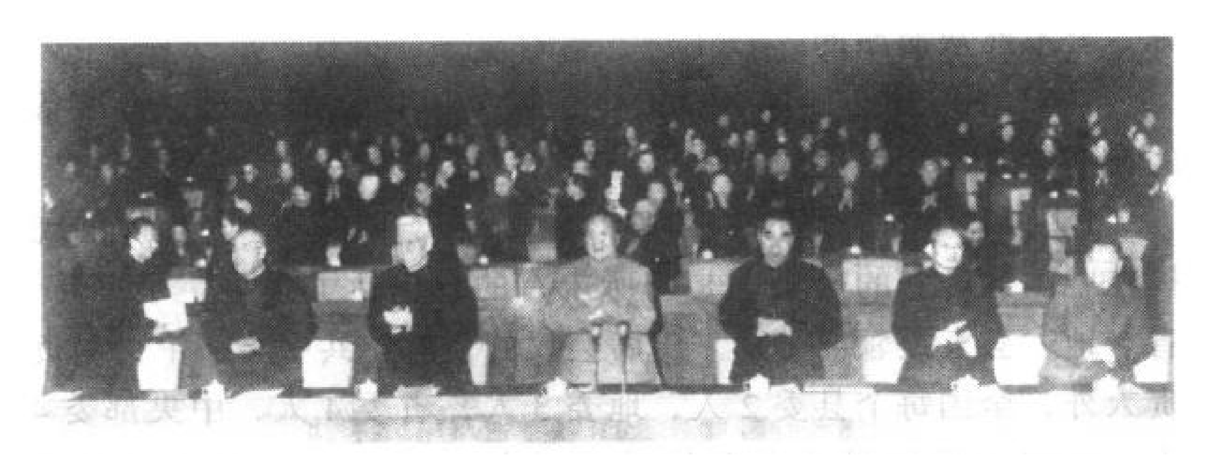
会议的主要议程，是讨论通过刘少奇代表中央所作的报告。报告的初稿已经印出来了，长达 4 万多字。按以往的惯例，报告稿经中央政治局审定后，由报告人刘少奇在大会上宣读。毛泽东

这次提出一个新建议：不要先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直接把报告稿发给与会人员，同时由刘少奇主持一个高层次的起草委员会，吸收会上意见修改定稿。

这样，“七千人大会”开幕后，首先就分组讨论刘少奇的报告稿。修改后的报告稿准备在1月27日再次发给到会人员。毛泽东这时又提议，刘少奇的报告不要照念了，改为书面报告，大会上由刘少奇再放开讲一讲，对书面报告作补充和阐述。

刘少奇原来没有打算在这一天讲话。毛泽东提议后，他立即着手准备，连夜写了个口头讲话的提纲。1月27日，在全体大会开始之前，毛泽东等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前来到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休息室，传看刘少奇拟出的讲话提纲。毛泽东看完一页，就交给其他常委看，接力棒似地一页页传阅。好在总共只有10来张纸，字又写得很大，不长时间就传看完了。

7000多名代表早已在会场内坐定。常委们传阅完刘少奇的讲话提纲，在一片掌声中走上主席台。毛泽东主持开会，宣布由刘少奇讲话。



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在大会主席台上。

刘少奇用特有的深沉清晰、带湖南口音的声音开始了他的

讲话：

“同志们：我代表中央向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一个书面报告。现在，在这个书面报告的基础上，我再讲几个问题……”

他首先讲了全国目前面临的困难形势：

“实是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的困难表现在，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1959、1960、1961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40%，或者还多一点。1962年的工业生产也难于上升。这就是说，去年和今年的工业生产都是减产的。由于农业生产、工业生产都减产，所以各方面的需要都感到不够。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前，我们原来认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是大跃进。……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

对于形成困难的原因，他认为：“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那一个是主要的呢？到底天灾是主要原因呢？还是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他的讲话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关于两个“三七开”的分

析："总的说来，从 1958 年以来，我们的成绩还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第二位的……总的讲，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些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区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有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的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刘少奇在最后还谈到了对于"三面红旗"的总的看法："'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 5 年、10 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应当说，刘少奇的这个讲话是相当有勇气的，特别是关于两个"三七开"的分析，对与会人员震动很大。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曾亲历那次会议的吴冷西后来评论道：

"少奇同志提出和坚持这两个'三七开'的观点，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很不容易的，需要非常的胆略、卓识和韧性，又需要十分耐心和细致的说服工作。经过充分的讨论，这两个观点先在起草委员会、后在中央政治局得到了一致的赞同。只是在书面报告最后定稿时没有直书两个'三七开'，而是用比较委婉的词句来表达。关于成绩与缺点错误，报告中列举成绩 12 条，主要缺点错误归纳为 4 条。关于当前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报告是这样写

的：‘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上述工作上和作风上的错误所引起的。’”

2. 毛泽东公开做了自我批评，但林彪的发言却别出心裁

在七千人大会期间，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等中央领导人，都大讲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极端必要性，刘少奇还号召全体党员干部发扬毛泽东提出过的“五不怕”精神，即：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他们所强调的民主集中制虽然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倡导的原则，但在经历了大跃进“一言堂”以后，提倡这样一种原则，其含义是耐人寻味的。

1月30日，毛泽东作大会讲话。他讲了很多问题，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公开做了自我批评：“去年6月12日，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向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任的应是我。”

毛泽东公开说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众多与会者很受感动，有人还激动的落下泪来。

在刘少奇讲话的两天前，即1月29日，林彪作大会发言。

林彪发言的主题是军事工作。但在开始部分以“党的工作”为题，谈了对“三面红旗”的看法，整个基调是颂扬毛泽东。

“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譬如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需要多、需要快、需要好、需要省的，是能够多、能够快、能够好、能够省的。……我们不能有相反的作法，不鼓干劲的作法，不争上游的作法，少慢差费的作法——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间的毛病。”

在议论缺点错误时，林彪提出了“付学费”的说法：“我们这几年在物质方面有所减少，这种减少，就像学生们上学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一个小孩子，从上小学起，一直到大学毕业，十七八年的时间，他什么也没有生产出来，相反地，尽吃，尽穿。但是他学了以后，就会起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付出那一点物质和时间，不让他学那么一下，他就不行。”

林彪发言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颂扬毛泽东的一番话：“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我想，事情千千万万，项目多得很，而最大的，首要的，是党的团结。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泽东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而且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些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毛泽东主席的警告、毛泽东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泽东主席的话，体会毛泽东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小得多。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泽东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泽东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毛泽东思想在任何工作中，永远是第一位的，是起决定作用的，是灵魂，是命根子。有了它，就一通百通，旗帜鲜明，方向正确。”

林彪接着说："正确的东西，是唯物主义，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泽东主席的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泽东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泽东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泽东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泽东主席走。"

显而易见，林彪这些话并非以深刻总结经验为出发点，而是话中有话，言有所指。在大多数人都对错误进行反思，甚至要追究决策者的责任时，他偏要讲一番歌功颂德的话，而且把这番歌功颂德与"加强党的团结"联系在一起，其用心可谓良苦且深不可测。

会后，林彪把他的发言稿送给了在武昌的毛泽东。毛泽东很快作出批示："要发给党内干部学习"。毛泽东还称赞道："这是一篇很好的很有份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为高兴。"

毛泽东有一次私下问罗瑞卿："林彪的这一篇讲话，你讲不讲得出来？"

罗瑞卿回答道："我怎么讲得出来？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讲得出来。"

毛泽东带着称赞林彪的口吻对罗瑞卿说："讲不出来，要学啊。"他还说："你们这次给他准备的稿子不能用，还不是他自己写出提纲去讲。我也是这个方法，在会上边听边想边写提纲，最后就按提纲去讲了一遍。"

在当时特定的情况下，毛泽东对于刘少奇的报告没有提什么不同意见，但是，5 年以后，1967 年 2 月 3 日他在接见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卡博和巴卢库时说：在 1962 年的"七千人大会"上，

"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显然，毛泽东的这番话是针对刘少奇说的。

3. 谭震林就"五风"问题主动检讨，承担责任

谭震林是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最活跃的中央领导人之一，有人曾评论说他是大跃进中冲锋陷阵的带头人。

但是谭震林又是一个尊重事实、勇于承担责任的人。对于自己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失误，他通过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经过反复思考，逐步有了较深的认识。

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以后，谭震林到山西、山东等地进行调查研究，检查八届七中全会贯彻落实情况。不久，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汇报了山西不少县和公社中的问题解决得不彻底，建议对权力下放、算清账目、生产指标三个方面进行一次补课。

1959 年 5 月中旬，谭震林深入到湖南省攸县作调查。在调查中，他看到虚报浮夸现象很严重，便严肃地指出："算清楚只有 3000 斤，去年却报了 2 万多斤，多报了七八倍。本来很漂亮，可是擦了那么多粉就不好看了。吹了一点牛皮，没有讲老实话，这是不应该的！"

通过在攸县调查，谭震林的思想受到进一步的触动。在同年 5 月召开的南方九省、市农业会议上，他对大跃进的问题和失误，作了认真的回顾。他说，1958 年的毛病，第一是刮"共产风"。把桌椅、板凳、簪子、耳环、银元、房屋、牲畜，直到鸡、鸭都共了。第二是大兵团作战。大兵团作战否定了按劳分配，否

定了评工记分，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实际上是把劳动效率降低了。第三是浮夸风。浮夸是从 1958 年 7 月开始的，发展最高峰是大炼钢铁。第四是放“卫星”。你一个，我一个，互相比赛，毛病就出来了。第五是“一平二调三收款”和以公社为单位的统一分配。这是挫伤群众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原因。第六是“拔白旗”。去年“拔白旗”起了不少坏作用。现在看来，无例外的全国的红旗县没有不出问题的。绝大多数的红旗县都是粮食最紧张的。

难能可贵的是，谭震林在分析了大跃进的失误之后，勇于承担自己应负的责任。他说：“这些问题，教训是深刻的，我应该负责。因为中央书记处分工我管农业，我没有管好。虽然不跃进了，可是过了五关，斩了六将，最后走了一个麦城。”他还说：“江苏提出‘敞开肚皮吃饭’，我把它作了介绍，我应该负责任。”

1961 年年初，毛泽东发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4 月，谭震林到河南省新乡七里营蹲点调查。通过调查，他的认识进一步接近实际。他在新乡地委民主办社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五风主要来自上面，来自中央各部门，来自中央做具体工作的同志，我就是其中之一。请你们再看看我在 1958 年写的论夏季大丰收的文章，在郑州农业书记会上的总结，在河南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以及 1959 年在郑州谈争取小麦大丰收的问题，棉花现场会上的讲话，都是共产风、浮夸风和瞎指挥风，尤浮夸风更为突出。所以说，我们中央负责具体工作的同志应该负主要责任。”

在“七千人大会”召开之前，谭震林多次召集农办负责人开会，认真总结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并写出了书面检讨，亲自送给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请他批交“七千人大会”。邓小平认为他早已作过数次检讨，中央已经承担了责任，不必再在大会上作书面检讨了，便将书面检讨批交他本人。

谭震林认为，中央虽然承担了责任，并不意味着可以减轻自

己的错误，承认和改正错误，可以使全党引以为鉴，便于今后少走弯路，把工作做得更好。于是，他先在农口分会检讨，然后将检讨稿批印给农林口各部党员科长以上干部。

在检讨中，谭震林着重分析了四个方面的错误：第一，1958年以来，农村工作方面所以发生的错误，首先是在处理人民公社的生产关系方面。第二，几年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过高，其危害是严重的。第三，由于单凭热情办事，急于求成，脱离实际，在生产方针、生产措施、生活安排等方面，都曾经提出过一些不恰当的甚至是错误的意见。第四，在组织纪律方面的分散主义错误。最后，他沉痛地说："在过去这段时间内，我的错误是严重的，今后一定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改正自己的错误，做好工作。"

20多年后，他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文章中回顾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对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后期批"小脚女人"等一系列重大失误进行了深刻分析。在分析中他还讲到了自己。他写道："这件事情之所以对我的印象特别深刻，还因为在批'小脚女人'之后不久，我曾主管过一个时期的农村工作，我仍然没有从这件事吸取教训，没有当好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参谋。我们党在农村工作方面所犯的错误，特别是1958年所犯的错误，我是负有责任的。我在这里再次提到，以便同志们记取这个教训，使工作能做得更好一些。"

4. 陈云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伤筋动骨"的调整

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几次请陈云在大会上发言，陈云说在作工业调查，还没有调查完，现在还没有把握来讲话，谢

绝了。

毛泽东在大会讲话中还曾说，做经济工作，他不如陈云。第一次整理的毛泽东讲话稿中还有这些话，后来修改稿几经改动，愈改愈少，改到最后这段话就全被删掉了。但是这句话毕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使陈云受到了很大鼓舞。

七千人大会结束后，财政部门向中央反映，发现当年财政有二三十亿元的赤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刘少奇决定专门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进行讨论。

2月2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除毛泽东、林彪离京外，其余的政治局常委都参加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书记处成员和中央经济部门负责人共16人。由于这次会议是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的，后来人们就称这次会议为“西楼会议”。

西楼会议是七千人大会的继续，在分析国民经济状况和落实调整政策方面比七千人大会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会议首先讨论国家计委和财政部提出的年度报告。核算下来，发现当年财政收支将出现30亿元赤字。这在经济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将十分危险。刘少奇批评经济部门没有揭露矛盾和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说：“收入要可靠，争取的数字不能打上。支出要打足，各种支出都要打上。实际支出如超出了预算，作预算的人要负责。有赤字要提出来警告大家，采取措施来弥补。过去几年没有揭露赤字是不对的。搞不好，经济还要继续恶化。只有暴露了问题，才好解决问题。”他说：“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1949年的3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他针对那种一味歌功颂德的现象批评说：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

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

陈云在会上作了系统的发言，全面地谈了目前财政经济上的困难和克服这些困难的意见。他列举目前财经困难的主要表现，认为当前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农业减产，粮食不够吃。陈云对这个问题最重视。他说，我们都是干革命的，搞社会主义的，对于这样关系全国6亿多人民的大事，关系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事，是不能不关心的。同时，他还指出了经济形势面临的其他几大困难：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当时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城市的钞票大量向乡村转移，一部分农民手里的钞票很多，投机倒把在发展；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够，物价上涨，实际工资下降很多。

陈云把当时面临的困难讲得这么透彻、这么严重，是为了从中找出经验教训，从而找到走出困境的办法。但这样做是有很大的政治风险的。从批评反冒进、特别是庐山会议批判“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和反右倾机会主义以后，大家讲困难都要先把光明面多讲一点，以免被看作是“右倾”、是把形势说成“漆黑一团”。

但陈云还是明确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目前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对这些问题事实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种不一致是正常的，难免的。不要掩盖这种不一致。这几年处在大变动中，大家对形势自然会有这样那样的看法。取得认识的一致，需要时间，需要事实的证明。大家的认识，在实践的过程中，可以逐步地一致起来。把各种不同的看法说出来，进行讨论，不是坏事而是好事，有利于使认识趋于统一。高级干部的看法统一，非常重要。经过讨论，如果还有不一致的意见，可以保留，可以再看一看，保留不同意见是容许的。

为了克服面临的困难，陈云提出了六条调整措施：第一，把十年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

发展阶段；第二，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第三，采取严格管理现金、尽可能增产人民需要的生活用品、坚决同投机倒把活动作斗争等办法，制止通货膨胀；第四，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第五，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第六，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且在国家计划里得到体现。

经过3天讨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参加会议的有关部门负责人意见完全一致。大家都认为陈云提出的几项办法切实可行。刘少奇对他说：“光是你在这个会上讲、我们赞成还不行，建议召开一次国务院的会议，更充分地讲一讲，让参加国务院会议的全体成员都了解我们的经济情况，了解我们的方针政策。”

国务院立即落实刘少奇的提议，通知2月26日在国务院小礼堂召开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传达贯彻西楼会议精神。到会的大多数是部长、副部长。陈云在会上作了题为《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重申和发挥了他在西楼会议讲话的内容。部长们用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表达了他们由衷赞同的心情。

当时大家听了以后，有一个深刻的印象，觉得这么一讲，困难讲够了，心里踏实了，办法也确实可行。会后，各部委都纷纷要求传达。

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时，邓小平说，全部传达，怎么讲就怎么传达。刘少奇也同意用中央的名义转发全国，而且还对怎么写转发批语提了一些意见。说对困难的估计，是有十分只讲八分好，还是有十分就讲十分好？他的意思是要把困难估计够，工作才能主动。

3月12日、13日，刘少奇再次在中南海西楼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批转陈云等人的讲话和另外几个文件。在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批转陈云等同志的讲话的指示》中明

确提出：“我们现在的经济是处在一种很不平常的时期，即非常时期。”“中央认为，在这样的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大力恢复农业，稳定市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也就是说，目前全党必须集中力量，增加农业生产和日用品生产，解决吃、穿、用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至于基本建设，在最近两三年内，除了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工程和十分必要的扩大再生产的某些工程之外，其他都要一律停止。”

西楼会议和国务院各部委党组负责人全体会议后，中央酝酿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统管经济工作。刘少奇和周恩来都主张陈云当组长，陈云一再推辞，说身体不好，当组长不合适，可以当成员，有意见时可以提。于是，当时确定李富春当组长，周恩来、陈云都是组员。

在3月13日的会议上，刘少奇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刘少奇说，有人向他建议，恢复后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请陈云任组长，李富春当副组长，是不是再议一下。李富春马上说，陈云当组长最合适，他自己当助手。会议就这么定了。

这次会议陈云没有参加，知道后他还是谦让。刘少奇说，大家都同意你当，你就当，就我个人来说，全力支持你，支持到底。

通过中央转发讲话的指示和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决定以后，刘少奇说，我们这个会是通过了，毛泽东同志不在北京，我们要立即向他汇报。

第二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就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说，我们同意陈云讲话，起草了一个指示，会议上是通过了，还要请主席看一看。刘少奇还说，这个问题我也在会上讲了，如果主席同意，我们就发出去；如果主席不同意，我们重新开会议论。

毛泽东看了陈云讲话和中央转发讲话的指示，表示同意

发出。

以后，此类事例越来越多，毛泽东越来越经常的不参加中央的会议，而会议的决定却都要经过毛泽东的同意之后才能生效。

建国以后，在毛泽东、刘少奇之间，逐渐形成了一个“二线”与“一线”的关系。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在大多数情况下处于“二线”，并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央日常工作由处于“一线”的刘少奇来主持。在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主席，刘少奇当选为中央排名第一的副主席。在八大修改后的党章中，还专门增加了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

1961年毛泽东在同熊向晖和浦寿昌谈话时特意讲到了党章中的这一条。毛泽东说：“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美国总统空缺，副总统当总统。我们的副主席有六人，排头的是谁呀？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

毛泽东的这段话主要是从接班人的角度来讲的，也就是明确刘少奇是自己的接班人。但毛泽东、刘少奇之间二线与一线之分其实并不很明确，这大概与“日常工作”与“非日常工作”的界线并不十分清晰有关。在有些时候毛泽东也会由二线走到一线，比如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发动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等都是在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实施的。

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把调整国民经济的繁重任务交给了刘少奇等一线领导，自己退居二线到外地去了。而且在此后几年时间里，他没有再回到中央一线岗位上来，因此渐渐地与中央一线领导人疏远了，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他把一线领导看成是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1962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将陈云西楼会议讲话加了批语

转发各省市区和各部门。

陈云走马上任后，在中央财经小组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就主张现在可以不搞十年规划，先搞五年计划。只有恢复好了，才谈得上发展。在恢复阶段，可以逐渐看清楚发展阶段的问题，当前主要是恢复。在情况清楚以前，甚至连第3个五年计划指标也可以不忙搞。陈云还主张对1962年计划也要做相当大的调整，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重点是“伤筋动骨”这4个字。要痛痛快快地下来，不要拒绝“伤筋动骨”。再不能犹豫了。要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发展放慢一点，以便把重点真正放在农业和市场上。

周恩来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陈云讲话时周恩来插话说，可以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

陈云在讲话中还开始对总路线的理论基础予以否定。他公开对积极平衡和消极平衡的提法进行了分析，指出在这个问题上，认识是不同的。他提出，要从现在综合平衡的经济水平出发，经过切实的研究和计算，看远景规划能达到什么水平，而绝不能采取倒过来的办法。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所谓短线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

这次会议后，刘少奇觉得陈云经济工作的意见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于是，他要邓力群组织几个人，把陈云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讲话和报告收集起来，准备印发有关部门学习和参考。

陈云对此曾几次表示不同意，刘少奇劝说道：“可以不广泛印发，只发给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和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同志看看。”

邓力群抓紧时间把陈云的13篇讲话和报告编印了出来，并写个1万多字的内容提要。为此，刘少奇特地给毛泽东写了封

信，推荐这些论述：

“主席：

最近，我要邓力群找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一些意见来看，他找来了，并搞了一个摘要。我只看了这个摘要。现特送上，请主席看看。此外，陈云同志在今年3月7日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也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意见，很值得一看。

以上几个文件，已要办公厅发给中央常委、书记处和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是否还要发给其他同志？请主席阅后酌定。再征求陈云同志意见。”

4月19日，经毛泽东同意，刘少奇签发中共中央通知，向全党宣布了陈云任中共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决定。

5. 周恩来抱定“壮士断腕”的决心，安排经济调整

西楼会议后，繁重的经济工作使身体一向不好的陈云病倒了，领导中央财经小组的重担实际上又落到周恩来肩上。

4月上旬，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财经小组多次听取并讨论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2年国民经济计划的调整方案。这个方案对1962年的计划作了大幅度的调整：尽可能挤出一部分材料来增加农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尽可能安排较多的原料、材料和燃料来增加日用工业品的生产；根据农轻重的方针和实际的可能，降低了绝大多数重工业产品的生产指标；进一步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从原计划的投资60.7亿元降低为46亿元。经过这样的调整，1962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指标从原计划的1400亿元下调为1300亿元。中央财经小组讨论时认为，国家计委党组这个方案

对国民经济存在的严重不平衡状况仍然认识不够，用周恩来的话来说，就是“没有按照中央指出的方向进一步暴露问题，没有斩钉截铁地大胆地提出问题。”他提出，解决问题的方针要按照陈云讲的“争取快，准备慢”，还要增加：“争取好，准备差一点”；要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企业要关一批，并一批，转化一批，缩小一批。

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 1962 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报告中提出了几项重大措施：第一，大幅度削减基本建设规模。同时，合理使用有限的财力物力，确保一批重点项目和支援农业、满足市场、出口需要的工业项目继续建设并按时投产。第二，除砍掉 10 万个小高炉外，对那些消耗大、成本高、质量差、效益不好、经过整顿仍然亏损的企业和那些原料、燃料、动力供应不上或生产任务严重不足的企业，下决心关、停、并、转。第三，继续压缩城镇人口 1000 万，其中精简职工 850 万人，以缓和城镇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的紧张状态。

报告起草完成后，周恩来派薛暮桥送到杭州向陈云报告，得到他的同意。

为了进一步统一思想，做好调整工作，5 月 7 日至 1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讨论《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 1962 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同时提交会议讨论的还有周恩来改定的《中共中央关于批发 1962 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指示》。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出席会议的人员包括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各中央局书记、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共 105 人。这次会议，后来通称为“五月会议”。

刘少奇在会上痛切陈词：“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

“从经济上来看，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对困难的估计，无非是这样三种：估计够了，或者估计过了头，或者估计不够。我看，对困难估计过分危险性不大。我们估计有那么多困难，后来发现好一点，困难没有那么多，这好，这危险不大。但是，对困难估计不够就危险了。我们多少年都是因为估计不够而陷于被动。是估计过头了危险，还是估计不够危险？比较起来，还是估计不够危险。现在还没有那种因为把困难夸大而使工作受损失的危险。将来可能有那种危险，但是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我们应当充分估计当前的困难以及现在还设想不到的困难。要准备迎接困难，克服困难。否则，对克服困难我们就会精神准备不够，这是危险的。一个人，充分估计了困难，但不害怕，还是干劲十足地挺起胸膛前进，这是勇敢的。分明有困难，却说没有困难，这样的人，不能算勇敢的人。共产党员的革命气概，应该是充分估计困难，而且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是挺起腰杆前进。我想，我们革命家的气概，马克思主义者的气概，应该这样。对困难估计不够，自己安慰自己，那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周恩来在5月11日的会议上，围绕当前的经济形势和方针任务等问题有针对性地作了讲话，他指出：中国目前还是处在一个严重困难的时期，我们主观上的失误造成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后果，不是短时期能够扭转好的，只能逐步扭转。经济工作千头万绪，要越做越细。调整要成为一个阶段，第三个五年计划恐怕就是个调整阶段，甚至第三个五年计划还可能不够。在调整过程中，首先是恢复农业，在这个基础上工业必须有一个大幅度调整。调整的方针是“按照短线，不留缺口，并且留有余地。”

周恩来认为，农轻重的次序现在是严重失调，这一点七千人大会上就说了，现在更表现出来。所以，我们首先就应该抓住这个关键来调整。

会议通过了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和中央的指示，向全党明确地摆出了问题，明确了解决问题的方针，确定了进一步调整1962年计划的各项指标。薄一波回忆道："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认识，又比西楼会议深入了一步。有的同志在会上表示，面对困难，要有'毒蛇噬臂，壮士断腕'的决心，才能把国民经济调整好。"

五月会议在扭转严重经济困难局面中，是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会议。会后，在全国范围内大刀阔斧地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用刘少奇的话说，就是"'左'了这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

6．为了摆脱困境，越来越多的领导人主张实行包产到户

五月会议前后，围绕如何尽快恢复农业生产，有一个问题成为人们议论的重要话题，并对以后政治形势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就是农业生产中的包产到户问题。

包产到户是一种统称，实际上包括60年代初在我国农村中形成的各种形式的以家庭为主要单位的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最初出现在安徽省农村。

安徽是大跃进比较积极的省份，后来农村困难形势也表现得极为突出。

1960年初，安徽省宿县一个农民向公社要求带着生病的儿子上山开荒种地和休养。父子俩开荒16亩，收获3300斤粮食，扣除自用，上交粮食1800斤、现金60元。他汇报了自己的经验并向有关领导建议，最好把田包给社员去种。省委了解到这个建

议，震动很大，省委书记曾希圣亲自向华东局负责人柯庆施汇报，柯庆施只说，这个办法可以试验，不要推广。1961年2月，柯庆施路过安徽省全椒县古河镇，几个老农向他当面提出要求实行“责任田”，并问：“为什么不相信我们?”安徽省委派一个工作组搞的联产到户试点，也受到农民的欢迎。3月6日，安徽省委讨论了试点情况后，请示了毛泽东，决定全面试行“责任田”的办法。

1961年3月15日、16日，广州会议期间，曾希圣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个问题，毛泽东表态时也只是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毛泽东没有明确表示反对，使曾希圣如释重负，他兴奋地打电话告诉安徽省委的其他负责人：“已经通天了，可以搞。”

这边曾希圣正在兴奋不已，那边已经有人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了。

广州会议期间，田家英将安徽省的一个关于包产到户的材料送给毛泽东，并写了一封信。田家英看到材料里讲到一些缺乏劳动力的社员、特别是孤儿寡妇在生产生活上遇到的困难，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含着眼泪写了那封信。信中说：“寡妇们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下，只好互助求生。她们说：‘如果实行包产到户，不要我们的话，要求给一条牛，一张犁，8个寡妇互助，爬也要爬到田里去。’看到这些，令人酸鼻。工作是我们做坏的，在困难时候，又实行什么包产到户，把一些生活没有依靠的群众丢开不管，作为共产党人来说，我认为，良心上是说不过去的。”信中还说，为了总结经验，包产到户作为一种试验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普遍推广，依靠集体经济克服困难，发展生产，是我们不能动摇的方向。

田家英在这封信里所表达的主张和流露出来的情感，同毛泽东是一致的。毛泽东立即将这份材料连同田家英的信批给政治局

常委和几位大区书记。

中南局书记陶铸见到田家英说："家英呀，我赞成你的意见。"

陈云则对田家英的意见不以为然，说：安徽搞包产到户，应当允许人家试验嘛！他主张不要急于表态，先派人去调查再说。

在会上，田家英的观点代表了会议的主要看法，曾希圣不再喜悦。他不得不再次给安徽省委打电话，通知暂停推行，同时给毛泽东等人写信，解释"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办法不是1959年受到过批判的"包产到户"，争取毛泽东的理解和支持。这一次，毛泽东又是没有表态。

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具体了解包产到户办法对粮食生产的作用，陈云让粮食部派一位副部长去安徽省调查。于是粮食部派出周康民带队前往安徽省。调查的结果，认为他们有五个统一：统一安排粮食生产计划，统一大农活，统一管水用水，统一打场，统一分配，不是单干，是克服困难的办法。这份调查报告以"简讯"的形式上报中央。

由于农民和基层干部已经在实践中尝到了包产到户办法的好处，此时想刹车也不容易了，包产到户的办法迅速推广开来，安徽省委也一再向中央解释，极力辩明他们的办法与1959年包产到户的区别。1961年7月，曾希圣在毛泽东来安徽省蚌埠时当面汇报，毛泽东勉强说，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

随后，包产到户办法在安徽全省推广。不久，河南、广西、湖南、浙江、陕西、甘肃、贵州等省部分地区也相继出现不同形式的包产到户。

在1961年12月，毛泽东在无锡把曾希圣找去，用商量的口气说，生产恢复了，是否把"责任田"办法变过来。曾希圣没有附和，他对毛泽东说，群众刚刚尝到甜头，是否让群众再搞一段时间。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终于因安徽省“大跃进”中刮“五风”受到批判，又说他主张搞“责任田”是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带有修正主义色彩，被撤了职。

1962年2月25日，毛泽东把田家英叫去，要田家英再组织一个调查组，到湖南省韶山等地作调查，主要了解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

3月底，田家英等人一进村，却遇到一个没有料到的情况：社员普遍要求包产到户，而且呼声很高，尤以韶山、大坪为甚。对这一情况，田家英没有精神准备，大家也都没有精神准备。农民列举事实，讲了包产到户的许多好处，同时历数人民公社化以来集体经济的缺点和困难，同时同调查组的人辩论到深夜。田家英认真听取和思考农民的意见，觉得很有道理，调查组内也有人主张实行包产到户，田家英便组织全体组员进行讨论，鼓励大家畅所欲言。

田家英当时心里很矛盾。他本来不赞成包产到户，但通过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他的思想开始发生了变化。他认为，从实际情况看，搞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明显地对恢复生产有利。另一方面，他又觉得，事关重大，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轻举妄动。

带着这种矛盾的心情，田家英去向毛泽东汇报。当时毛泽东在上海，碰巧，陈云也在上海。田家英同时将有关调查报告送给毛泽东和陈云。得到的反应却迥然不同。陈云读后很称赞，说“观点鲜明”，在此之前，田家英已经把在刘少奇老家炭子冲大队的调查报告寄给了刘少奇，刘少奇认真地看了，也认为很好。而毛泽东却反应冷漠，大概没有看，只听了田家英的口头汇报。毛泽东对田家英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这是毛泽东对包产到户问题的一次明确表态。

包产到户的问题，自然也引起了中央农村工作部长邓子恢的

重视。他两次派人到安徽省农村考察，并根据考察所得的结果肯定了包产到户的做法。

1962年5月9日，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子恢在谈农村工作问题的发言中提出：有些地区，特别是受灾地区和山区分散地区，如果适合搞包产到户，农民也有搞包产到户的积极性，那就让他们搞。自留地、饲料地、借冬闲田、自由市场等也可以适当放开或扩大。他说："我认为，当前在一定范围之内，扩大小自由没有危险。过去我们对自发资本主义的危险，我看也有点太夸大了。因此，可以适当扩大小自由。""适当扩大小自由，包括自留地、饲料地、借地、借冬闲田等，总不要超过总耕地的20%。主要的生产关系还是集体所有制，加上20%的小自由，就变资本主义呀？干部是我们的，国家主要的经济是我们的，就发展资本主义呀？把资本主义看得太厉害了。"以后，他又应邀在军委总后勤部、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央党校等单位作报告，多次阐述了这样的观点。

邓子恢提出的是一件十分敏感的事情，在中央领导人当中认识也不一致，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也没有展开讨论。1961年，刘少奇在湖南农村搞调查研究的时候，就遇到过这一问题，当时他只讲有些零星的生产可以包产到户。但由于这是一个十分敏感、而且涉及全国的政策性很强的问题，毛泽东不在北京，在没有征得毛泽东同意的情况下，为慎重起见，刘少奇没有在正式场合明确表态。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也只是说：邓子恢同志讲的这些问题，以后再来讨论。

为了让毛泽东了解当前农村的情况和问题，并支持解决这些问题，邓子恢把他在会议上讲的问题，写成报告，于5月24日送给了毛泽东，也送给了中央。

在会议期间，邓子恢还收到了安徽省宿县符离集区委书记武念慈的一封来信，向他保荐"责任田"。来信说，符离集区从

1961 年 3 月开始试行“责任田”办法，粮食产量当年增长 18%，深受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欢迎。但到 1962 年 3 月，省委却又作出了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说这个办法是迎合农民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办法，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我们对这个决议进行了多次学习和讨论，思想仍然不通。恳请调查了解，弄清情况，予以解决。

接到这封信，邓子恢反复思考。因为 1961 年 3 月在中央广州工作会议期间和 5 月路经合肥，他都听曾希圣说过“责任田”是个好办法。可是，1962 年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受批判，名义上是因为“五风”错误，实际上也有“责任田”问题。安徽省委改正“责任田”是毛泽东的意思。他感到问题棘手——过问吧，毛泽东面前怎么交待；不过问吧，下边的企盼要落空，与当地农民生死攸关的“责任田”要夭折。经过再三考虑，他终于下决心，派工作组去安徽省调查“责任田”问题。5 月 25 日，由中央农村工作副部长王观澜带领的工作组到达淮南当涂。

6 月 16 日，邓子恢收到了王观澜写的调查报告——《安徽省当涂县责任田情况调查》。报告说：当地 80%生产队的责任田做到了“五统一”，由于把责任制和产量结合起来，农民个人利益与集体经济结合紧密了，社员的劳动热情空前高涨，对恢复生产起了积极作用。报告还说：责任田还解决了自农业合作化以来一直存在的社员劳动不顾质量，以及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与集体生产争肥料、争时间的矛盾。

邓子恢看了报告，认为既然大多数生产队责任田不涉及所有制性质，只是集体经济经营管理的一种形式，就不应全盘否定，而应总结经验，加以提高。为稳妥起见，他又叫工作组到淮北宿县，就是曾经写信给他的符离集区委书记武念慈所在县，再作调查。

田家英的调查工作也在继续进行中。此时，包产到户在全国呈现迅速发展之势，推行包产到户的呼声日益高涨，成了党内议

论的重要话题。为了进一步弄清这个问题，田家英派出两位工作人员又赶赴包产到户搞的比较早的安徽无为县去进一步开展调查。他们调查的结论大致是：包产到户对于解救已经遭到严重破坏的农村经济的危机，迅速恢复农业生产，肯定是有利的和必要的；但是，将来要进一步发展农业经济，就可能要受到限制。

6月24日，陈云从上海回到北京，立即与刘少奇、邓小平等讲了对包产到户的意见，得到了他们的赞同。

从5月下旬开始，周恩来到东北视察工作。6月26日，周恩来从东北回到北京。他多次去看望陈云，就恢复农村经济问题交换意见。周恩来也赞成陈云在包产到户问题上的意见。

6月下旬，中央书记处开会，听取华东局农村办公室关于安徽省“责任田”问题的汇报，华东局认为安徽省搞“责任田”就是单干，是方向性错误。会上赞成和反对派各占一半。邓子恢说：“责任田”没有改变所有制性质，多数能做到“五统一”，怎么能说成是方向性错误呢！“责任田”就是社员劳动和产量直接结合起来。加强了社员责任心，是找到了搞好集体生产的一条出路。

邓小平支持邓子恢的意见，他说：在农民生活困难的地区，可以采取各种办法。邓小平还引用刘伯承经常讲的一句民谣：“黄猫、黑猫，只要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试试看。

会议结束时，刘少奇要求华东局转告安徽省委，对“责任田”不要下结论太早，可以由中南局搞一个包产到户的文件，将来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时再议。

6月底田家英一行人回到北京。田家英回到北京后，立即就农村调查中遇到的问题向刘少奇作汇报。汇报刚开了个头，就被刘少奇打断了。刘少奇说：“现在情况已经明了”，接着就提出关于实行包产到户的主张，并且详细讲了对当时形势的看法。田家

英问："少奇同志这些意见可不可以报告主席?"刘少奇说："可以。"刘少奇又吩咐田家英把他的意见在"秀才"们中间酝酿一下，听听反应。他为慎重起见，并且希望能够真正听到"秀才"们的真实意见，嘱咐田家英不要说是他的意见。接着，田家英又向邓小平报告了有关情况，邓小平的话不多，但很干脆："赞成"。田家英还向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人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得到一致赞同。在许多中央领导人的支持下，田家英开始起草政策性文件，题目初拟为《恢复农村经济的十大政策》。

7月初，邓子恢又收到了一份安徽省宿县符离集区委全体工作人员写来的《关于"责任田"问题的汇报》。《汇报》对"责任田"更带理论性和系统性，其中列举了7条理由证明"责任田"方向是对的，列举了10个变化说明"责任田"确实好得很。邓子恢读着这份汇报，越发感到"责任田"是个创造，为搞好集体生产找到了出路。

7. 中南海游泳池，毛刘之争，惊心动魄

要想将包产到户在全国普遍推广，就必须获得毛泽东的同意与批准，这是全部问题的关键所在。

7月6日，陈云给毛泽东写了封信，信中说：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谈，估计一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

田家英也决定以秘书的身份向毛泽东进言。他此时有些兴奋，但心里也有些不安。因为事情虽然看来进行得很顺利。但是，中央究竟是否确定推行包产到户，还要通过关键的一个关口，那就是毛泽东的同意。田家英似乎觉得比较有把握，因为几位中央常委几乎都支持搞包产到户，至少是不反对；但是他心里

又有些嘀咕，不知道毛泽东现在的态度究竟怎样。他知道提这样的建议是要担风险的，但他不顾个人得失，终于下决心，以秘书的身份向毛泽东进言。这时，毛泽东正在河北省邯郸视察工作，田家英打长途电话要求面陈意见。那边传来电话说：'主席说不要着急嘛！'从这句话里，我们已经微微感觉出毛泽东的不耐烦的心情了。

7月9日，毛泽东回到北京，田家英被召见，地点在中南海游泳池。田家英系统地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大意是：现在全国各地已经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30%，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可能达到40%，另外60%是集体的和半集体的。现在搞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是临时性的措施，是权宜之计，等到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这种情况，同刘少奇性急地打断他的汇报，滔滔不绝、毫无保留地讲出自己的意见，完全不同。最后，毛泽东突然向田家英提出一个问题：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一下子把他问住了。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提问，他毫无准备。毛泽东接着又问："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田家英答："是我个人的意见。"当时，毛泽东没有表示意见。没有表态，这就是一种态度，不过没有说出来而已。

田家英从游泳池回来，情绪不大好。他说："主席真厉害。"意思是说，毛泽东把问题提得很尖锐，使他当场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毛泽东善于抓住对方谈话的要害，出其不意地提出问题，迫使对方无法含糊其词，无法回避问题的实质，非把自己的观点确定而鲜明地摆出来不可。

当天夜里，毛泽东约陈云谈了一个多小时。陈云向毛泽东提

出在农村实行分田到户，这个办法实质上就是包产到户。他主要阐述了个体经营与合作小组在我国农村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还是要并存的，现在要发挥个体生产的积极性，以解决当前农业生产中的困难。当时，毛泽东同样没有明确表示意见。

第二天，毛泽东召集会议，田家英参加了，还有陈伯达。毛泽东终于说话了，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条”，却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会上，毛泽东指定陈伯达为中央起草关于巩固集体经济、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

从此，田家英这位跟随毛泽东几十年、深得毛泽东器重的才子，日益被毛泽东所疏远，并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最先受到批判，并成为这场运动中继邓拓之后第二个自杀身亡的中共高层领导人。

田家英关于包产到户的意见，是受到刘少奇影响与支持的。但他为了不在两位主席之间造成裂痕，把全部责任都自己承担了下来。这种品格受到后人的称赞。1980 年 3 月 28 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田举行的追悼大会上，邓力群在代表中央所作的悼词中还专门讲到了这件事：

“尤其值得提到的是，当党内斗争出现错误偏向的时候，在最关键的时刻，家英同志为了维护党的团结，保护同志，不惜牺牲自己，把责任全部承担下来。”

在批评了田家英之后，毛泽东接着通知刘少奇到中南海游泳池来谈话。

刘少奇的儿子刘源记得父亲对他讲过游泳池里的那一幕：

“刘赶到游泳池时，毛泽东游兴正浓。刘快步走到池畔，亲热地问候毛。见刘来了，毛在池子里声色俱厉地质问刘：‘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刘一惊，似觉不便谈话，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泽东起岸，坐到跟前，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

没有错。’毛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会议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双方都显得有些动感情，毛淤积在心的不满倾泻而出，刘也要一吐而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刘冷静地讲了自己的想法，大意是三面红旗不动，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等等。毛也冷静下来，同意经济调整还得继续。

刘回来感到压力很大，但经济调整能够坚持，以为得到理解，总算长舒了口气。”

7月17日，邓子恢应约去见毛泽东。此时毛泽东对包产到户问题的态度已经大致明朗化了，但邓子恢还是向毛泽东谈了自己的意见。他谈了符离集区委全体工作人员《关于“责任田”问题的汇报》的内容，陈述了自己对“责任田”的看法，明确说：“责任田”能做到“五统一”，不是单干；“责任田”是一种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适应广大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广大农民的需要，有强大的生命力，广大农民不愿改变。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只是在邓子恢起身要走时才说了一声：把你给我的报告和符离集区委同志的汇报送来，我要看看。

在毛泽东明确表示不同意实行包产到户后，刘少奇收回了自己的意见。7月18日，他在接见中央下放干部的讲话中，专门谈了巩固集体经济的问题。他说：“现在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不够巩固，相当多的集体经济发生动摇，许多地方的农民，甚至于干部，要求单干，要求分田到户，或者包产到户。”“对于这个问题，中央正在讨论，即将规定若干政策措施。你们到农村工作的、到地委和县委工作的同志，要抓巩固集体经济的问题。”

也就是在刘少奇已经公开表态不再支持包产到户的这一天，

邓子恢又收到了中央农村工作部工作组从安徽省宿县王楼公社王楼大队和城关区刘合大队发来的调查报告。调查的结果与上次王观澜的调查一样，责任田做到了“五统一”。报告说：由于粮食显著增产，群众感到包产到户责任田越干越有奔头，最好一辈子不要再变；他们一再表示，我们一不怕蒋介石，二不怕自然灾害，就怕改变责任田。县委、区委、公社党委书记都认为，包产到户责任田，在集体农业生产的经营管理上找到了一条出路，是增产粮食的最好办法；他们再三要求，不要给他们戴方向性错误的帽子，允许他们试验三年，粮食过了关再改。邓子恢越想越感到，安徽省的责任田有“五统一”，不是单干；不但不是单干，而且正是搞好集体生产，防止单干的好办法。对安徽省的责任田应重新评价。

各地实行包产到户的情况，整理成材料，供中央北戴河会议之用。工作组的陈正人、王观澜、郝中士等人，都劝他调查报告暂时不要送了，中央北戴河会议快开了，看看情况再说。他很生气地说：“责任田”是于民有利的事情，等到北戴河开会，就晚了。于民有利，怕什么！你们怕，我不怕，不怕丢乌纱帽！

7月22日，邓子恢把中央农村工作部工作组写的《安徽省宿县王楼公社王楼大队实行责任田的情况调查》和《安徽省宿县城关区刘合大队实行包产到户责任田的情况调查》送给了毛泽东。

8. 八届十中全会大讲阶级斗争，风声从此一日紧似一日

7月25日至8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会前，中央发出通知。在这个经过刘少奇、周恩来审阅修改

的通知中，规定这次会议所要讨论和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第一，目前农村中的一些问题；第二，粮食问题；第三，商业工作中的问题；第四，国家支援农业的问题。通知还列举了41个与此有关的问题，请各地准备意见。

显然，按照刘少奇的计划，是要开一个讨论经济问题的中央工作会议。

7月下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先后来到北戴河。中央各部门和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也陆续抵达。

在会议开始之前，毛泽东又一次约见了邓子恢。邓还在坚持着他的主张，他向毛泽东再次保荐安徽责任田。他直言陈述自己的观点，试图说服毛泽东。他说：责任田不牵涉到所有制的问题，是一种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形式，确实能增产，群众欢迎。

毛泽东不同意他的看法，说：包产到户搞了几千年，还要搞吗？如果搞包产到户，不用几年就有人雇工、讨小老婆。你怎么又动摇了，波兰搞自由化，还不敢解散合作社。

邓子恢说：包产到户不是解散合作社。

邓子恢没有说服毛泽东，反而惹得毛泽东极为生气。后来，9月25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董必武讲话谈到“单干风”时，毛泽东插话说：邓子恢曾当面和我谈过保荐责任田，我跟他谈了一个半钟头的话，我就受了一个半钟头的训，不是什么谈话，是受他的训。

7月25日会议开始。会议围绕着几个文件的初稿按部就班地讨论。内容涉及形势、农村包产到户、甄别平反等等，虽小有争论，但总的说比较平静。

8月6日，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这个讲话完全打乱了会议的原定日程，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会议的气氛。毛泽东

说：现在有一部分同志把形势看成一片黑暗了，没有好多光明了，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了。农村集体化还要不要？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在8月9日，毛泽东在中心小组会上插话说：单干风从何而来？党内有些人变坏了，贪污腐化，讨小老婆，搞单干，招牌还是共产党，而且是支部书记。这些人很明显，把群众当奴隶。有些同志马克思主义化了，化的程度不一样，有的化得不够。我们党内相当多的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他批评邓子恢等人支持包产到户是代表富裕中农要求单干，甚至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

接着，在11日、13日、15日、17日、20日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各中央局书记等20多人参加的中心小组会议上，毛泽东又多次插话，继续阐发他的观点，严厉批评“黑暗风”和“单干风”。这样，会议改变了原定议题，转到着重讨论阶级斗争问题和开展对“黑暗风”、“单干风”的批判。

毛泽东在前段时间与刘少奇在游泳池交锋时，就指责“西楼会议说得一团黑暗”，现在批判“黑暗风”，显然就是指这件事。至于“单干风”，无疑是指陈云、邓子恢、田家英等人支持包产到户一事。这两件事，都与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直接相关，因此刘少奇便不得不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

在8月11日的中心小组会上，刘少奇说：“形势问题，一月会议我们做过一次估计，当时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五月会议又有一个估计。现在看五月会议对困难有两点估计过分了。第一是认为夏收减产已成定局，现在看没有减产还增了产。第二是那时估计单干在全国已占20%，现在看全国最多也不过10%。因此五月会议上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是指全国讲的，有些地方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五月会议下了决心，减轻征购任

务。当时对困难估计有三种设想：一是估计够了，二是估计不够，三是估计过头。当时认为把困难估计得充分一点，即使出现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也会有思想准备。但是有些丧失信心。”

批判“单干风”重点是批判邓子恢。8月9日的中心组会上，李井泉揭发邓子恢6、7月间的几次报告有问题，会上就把邓子恢6、7月间的几次报告记录稿拿来批，硬说邓子恢在困难面前发生动摇，是代表富裕中农阶层搞资本主义农业的要求。邓子恢不得不申明：这些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有些记的与讲的有较大出入。

陈伯达批判说：邓子恢同志对于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有许多荒谬的说法，什么人民公社不如高级社，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单干，实际上他要求的，是资本主义道路。

柯庆施批判说：邓子恢同志他是赞成以农业为基础的，因为他是管农业的，但他思想上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认为目前自耕农的生产方式是最先进的，他这个思想是十二年一贯制，所以实际上他成了富裕中农的代表。

邓子恢在8月11日的中心组会上开始做自我批评。他说：6、7月间的几次讲话，说到包产到户，说包产到户有各种不同形式，有些是属于所有制的改变，已成为单干；有些介于集体与个体之间；有些则仍然属于集体经济范畴，是集体经济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应区别对待，如果仍属于集体经济是应当允许的，是方向性的错误，也是我马列主义水平不高，毛泽东思想水平不高，思想方法上主观片面、组织上无组织无纪律的具体表现。这是1955年以来又一次大错误，应该向党作检讨。

邓子恢虽然作了检讨，但毛泽东在8月12日一个文件上的批示，仍然对邓子恢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毛泽东说：邓子恢同志动摇了，对形势的看法几乎是一片黑暗，对包产到户大力提倡。

这与他在1955年夏季会议以前一贯不愿搞合作社；对于搞起了合作社，下令砍了几十万个，毫无痛惜之心；而在这以前则竭力提倡“四大自由”，所谓“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是相联系的。他没有联系1950年至1955年他自己显然还是站在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因而犯了反对建立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错误。后来，他在会议上又多次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搞资本主义，邓子恢是资本主义农业专家。

1962年包产到户的文件就这样胎死腹中。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包产到户才大规模地在全国农村推行开来。但此时，田家英、刘少奇、邓子恢已先后离开了人世，中国农业的发展整整耽搁了20年之久。

由于毛泽东提出的问题是带有全局性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会议决定，紧接着在北京召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8月24日，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中央办公厅重新按照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范围调整出席人员，把开会地点移往北京。

8月26日至9月23日，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中全会的预备会议。在预备会议期间，又发生了两件事：一是彭德怀分别给中央和毛泽东写信，请求对他的问题进行全面审查，做出正确的处理，这两封信被认为是翻案，是向党提出挑战，在会上受到严厉批判。二是，批判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利用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这两件事在会上被称为是“翻案风”。

9月23日至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正式召开。毛泽东在24日的大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的讲话，提出：在社会主义国家，要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我们可以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开一次大会就讲，使全党提高警惕，使我们有一条清醒的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路线。并再次批判了“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

26日，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他表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并再一次对前一阶段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评，承认“今年五月对困难估计得多了一些。”在谈到阶级斗争问题时他提出：对全党干部进行教育是必要的，但要划个范围，“不要都卷入这个斗争中，受它干扰，妨碍工作”。在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期间，刘少奇两次提出对会议精神的传达要划个范围，只传达到党内高级领导干部，不向下传达。中央接受了他的提议，毛泽东说：“决不可以因为阶级斗争妨碍我们的工作。”“要把工作放到第一，阶级斗争跟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不要让阶级斗争妨碍了我们的工作。”全会规定会议精神只传达到17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不向下级传达，也不开展全党讨论。

八届十中全会结束了。全党全国的工作在会后呈现一种复杂的“两张皮”的情形：政治上，阶级斗争一步步升级，扩大化越来越严重；经济上，调整工作基本上照常进行，生产逐渐恢复和上升。

结束语：二十年后辨是非
三面红旗尘埃落定

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大讲阶级斗争，以“多”和“快”为主要特征的“总路线”事实上已被“以阶级斗争为纲”所取代。大跃进运动也由于国民经济的调整而基本划上了句号。但是，人民公社并没有取消，“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一直延续了下来。而且，“三面红旗”在理论上仍然被肯定。

1966年5月16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多次亲自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以此为标志，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在这场历时十年的动乱中，“三面红旗”在理论上得到了大力颂扬，而在历史上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的一些说法和做法，提出过批评意见，或采取过抵制行为的人们，则被戴上“反党”、“修正主义”等帽子受到了严厉的批判。

许多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重要人物死于“文化大革命”时期。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受尽折磨惨死于开封；1971年12月14日，邓子恢受尽磨难与世长辞；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在遭受残酷迫害后含冤告别人世；1976年1月8日，过度劳累的周恩来在北京病逝。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带着他的满腹未了心愿撒手人间。同年10月6日，在粉碎“四人帮”的夺权阴谋后，华国锋开始

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也由此结束。

在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在理论和实际工作中都坚持“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按照“两个凡是”的原则，关于“三面红旗”，人们仍坚持原有的认识与主张。

历史总是要前进的。在老一辈革命家的推动下，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领导职务。邓小平的复出，使人们看到了新的希望。此前，他在同两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就明确讲：“‘两个凡是’不行。”

1977年9月28日，陈云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强调：“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

1978年5月11日，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这篇只有7000字的文章，引发了一场规模宏大、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真理标准的讨论招致了“凡是派”的激烈反对，他们指责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的思想。

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支持了这场大讨论。邓小平在同几位负责人的谈话中说：“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

“禁区”从此被一个个突破。

就人民公社而言，改变局面的突破口，仍然是那个“包产到户”的问题。

1978年夏秋之交，安徽省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尽

管省委号召全省人民“倾家荡产，奋力抗旱”，但全省农业大幅度减产已成定局。由于秋季无收，秋后大批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灾民离家乞讨。

在这种情况下，安徽省委于9月1日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渡过这场特大旱灾的对策。时下正值秋收秋种季节，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大片土地将被搁荒，来年的境况将不堪设想。如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阻止外流，留下搞生产，便成为摆在省委面前的最为紧迫的问题。显然，不给农民以土地的自由使用权，而仍采用“文化大革命”中那种“学大寨”运动的做法，已很难奏效。而给农民少许土地的自主，势必会诱发包产到户的出现，这是被严厉批判和明令禁止的。

人命关天，当时全面主持安徽工作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在会上动了感情。他激动而又朴实地说：要全力抗旱，能多收一斤就多收一斤，能多收一两就多收一两。我们不能眼看着农村大片大片的土地搁荒，那样明年的生活会更困难。与其抛荒，倒不如让农民个人耕种，充分发挥各自潜力，尽量多种“保命麦”，渡过灾荒。

经过讨论和激烈斗争，省委做出了“借地种麦”的决定，规定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农民种麦、种菜，鼓励多开荒，谁种谁收，国家不征统购粮。这项为战胜死神而作出的大胆决定，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自救的积极性，超额完成了秋种计划，扭转了被动局面。同时也直接诱发了包产到户的新政策。

安徽省委的做法招来了不少非议，有人提出：“借地”调动起来的不是集体主义的积极性，不符合社会主义方向，这样做是违反中央文件和上级指示的。

面对种种责难，万里回答说：土地种上庄稼总比抛荒强，不管是集体还是个体生产的粮食，吃了都解饿，都可以度荒。贯彻执行中央文件和上级指示，也要和各地实际情况相结合，如果照

搬照套，把中央文件和上级指示当教条，那不但不是组织纪律性强，而且还是对革命的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

就在安徽省委为度荒而研究对策时，肥西县山南公社的一些农村，自发的悄悄搞起了包产到户，附近不少大队起而仿效，包产到户迅速在山南等公社掀起热潮，在肥西县扩展并涉及到其他县。

指责很快就到来了。9月20日，一封署名“人民群众”的匿名信送到了万里手中，这封信尖锐地指责肥西县搞包产到户是分田单干，“是刘少奇路线的翻版”、“是曾希圣阴魂不散”。万里将这封信转交省农委，要他们调查研究，不要急于表态。



1978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是邓小平在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现

代化建设上来。在全会进行的增选中央领导中，陈云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这次会议标志着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局面的结束，邓小平开始成为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全会原则通过了两个有关农村人民公社的文件：一个是《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这两个农业文件肯定了在一些地方出现的联产计酬的做法，受到了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欢迎，称这两个文件是“抢救农业、富国裕民”的好文件。

1979年春天起，生活在人民公社体制中的农民们，三家五户地结为一个小组，将人民公社的耕地依照优劣不等、面积大小以及远近不同，重新划块分界，实行起了包产到组、联系产量、超产奖励等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到这一年春耕开始的时候，至少已有200万个大队，推行“划分作业组”，有3亿多社员参加了这一行动。

但是，在“包产到户”问题上的禁区并没有消失，争论仍很激烈。

1979年2月2日，安徽省委派出工作组到肥西县调查包产到户问题，6日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听取工作组汇报。万里在听取了各种不同意见后说，我主张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在小范围试验一下，如果试验成功，最好不过，如果试验失败，也没什么了不起，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我们有办法把它拉回来，没什么可怕。会议在万里主持下，对山南公社包产到户统一了认识，结论是：不宣传，不推广，不登报。再看看，秋后再总结，让实践检验是否正确。

如果说肥西县山南公社包产到户是省委认可默许而公开搞的，那么凤阳县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则是“瞒上不瞒下”的秘密进行的。

1978年冬天，凤阳县犁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组。

20户人家划分成4个包干组，不久又分成了8个小组，每组只有两到三户，但仍矛盾重重，积极性调动不起来，还是干不好。12月的一天夜里，生产队召开社员会，商量解决矛盾，把生产搞上去的办法。穷透了底、在饥饿中求生的小岗人，斗胆秘密商定，把全队的耕地按人均分到户，并诅咒发誓，一致同意通过了三条保证：（1）实行包产到户不许向外透露，要严守秘密，"瞒上不瞒下"；（2）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该是国家的给国家，该是集体的留集体，不准任何人到时装孬；(3）如果干不成，干部为此坐牢，全队社员保证把他们的孩子养活到18岁。然后，17个农民在保证书上按了手指印，3个农民盖了图章。他们连夜抓阄分牲畜、农具，丈量土地，一个早晨就全部分好了。

小岗的秘密很快就让外面知道了。公社知道后，让他们再把户并到组里干，但小岗人硬是不并。县委书记了解了内情后，也来了个"瞒上不瞒下"，他说：小岗已经穷"垮"掉了，还能搞什么资本主义？已经分到户了，就先让他们干到秋后再说吧！

这年夏天，万里亲自来到凤阳。他在了解了真实情况，亲眼看到实行包产到户，农民种粮积极性格外高涨后，对这种做法给予了支持。

1979年底，小岗生产队大丰收，全年粮食产量由原来的3万多斤提高到12万多斤。这个自农业合作化以来从未向国家上交粮食的小岗生产队，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还了贷款。

1980年1月11日到2月2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会议围绕安徽省代表作的题为《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强大生命力》的发言，展开了十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就是包产到户是姓"社"还是姓"资"，符不符合中央政策规定？反对包产到户的意见认为，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单干，是资本主义性质。如果放任自流，不加以坚决制止，继续滑下

去，人心一散，就会丢掉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包产到户调动的积极性不符合社会主义方向，是农民的个体生产积极性。治穷的办法多得很，何必非要包产到户，而且中央文件明文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也不要包产到户”，“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写到《宪法》上的，搞包产到户既违反了中央文件规定，也违反了《宪法》规定。

1 月 31 日下午，中共中央领导人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领导听取了会议情况汇报。华国锋在讲话中强调：责任制和包产到户单干不要混同起来，已经搞了包产到户的要认真总结经验，提高觉悟，逐步引导他们组织起来。

这次会议结束后，万里奉调回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他多次向邓小平汇报了安徽一些农村搞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情况和引起的争论。

正当包产到户争论沸沸扬扬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以极大的勇气和魄力站出来支持农民搞包产到户。

4 月，中共中央召开经济发展长期规划会，邓小平在会上指出：甘肃、内蒙、云南、贵州等省区的一些农村，生产落后，经济困难，应当实行包产到户。5 月 31 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人的谈话中又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省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

根据邓小平谈话精神，在几个月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决定将自发状态的包产到户加以总结提高，以倡导全国的农村工作。1980 年 9 月 14 日至 22 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各省市

区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会后，中央于9月27日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即中发（1980）75号文件。《通知》指出："凡有利于鼓励生产者最大限度地关心集体生产，有利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增加商品的责任制形式，都是好的、是可行的，都应加以支持，而不可拘泥于一种模式，搞一刀切。""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产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不包产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这是中央文件首次给包产到户上了"户口"，使包产到户合法化了。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文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也涉及到了"三面红旗"。

关于总路线，《决议》说："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

关于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决议》说："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这个决议使全党对"三面红旗"有了统一的认识。

人民公社的堤坝正在被一点点地冲溃。

1981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

1982年1月中央批转了这次会议通过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即中央1982年一号文件。这是第一个关于农业问题的“一号文件”。文件明确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这便第一次正式肯定了包产到户等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社会主义性质，为几年来的争论做出了结论，给农村干部和广大农民吃了“定心丸”。

1982年10月至11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和全国农业书记会议。在两会讨论的基础上，形成了《当前农村经济改革的若干问题》的文件，12月31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并通过，于1983年1月2日作为中共中央1983年一号文件印发，这是第二个关于农业问题的“一号文件”。这个文件在承认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强调要继续稳定和完善这一制度的同时，还提出现行的人民公社体制要进行生产责任制的改革，逐步实行政社分设。文件说：政社合一的体制要有准备、有步骤的改为政社分设，准备好一批改变一批。

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标志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改革的一项战略决策的正式确立。此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我国广大农村普遍推广开来，成为我国农村改革的突破口，中国农村从此开始了真正历史性的变革。到这年底，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已占生产队总数的93%，有12000多个人民公社宣布解体。

为了稳定农村改革，及时消除一些不必要的忧虑，进一步解放思想，以促使农村商品生产更加蓬勃发展，在分析1983年一号文件贯彻以来农村出现的新形势的基础上，确定1984年农村工作方针，1984年1月1日，中央发出1984年一号文件《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这是第三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

件”。针对农民怕变的忧虑，文件宣布：延长土地承包期，承包期一般应在 15 年以上。

1984 年，又有近 4 万个人民公社宣布解体。

1985 年 1 月 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即中央 1985 年一号文件。这是第四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文件针对农村经济改革前进中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作了十项政策规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改革农产品统派统购制度。规定，从今年起，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任何单位不得再向农民下达指令性市场计划。同时，文件还郑重宣布：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户家庭经营长期不变。

这一年所余的 249 个人民公社宣布解体。至此，人民公社体制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中终于寿终正寝。

人民公社解体之后，政权职能由重新成立的乡政府行使，经济职能交给了新建立的经济管理委员会行使。“政社合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都不复存在。我国农村不同层次的集体经济组织不再具有行政隶属关系，它们均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相互之间是建立在平等互助、等价交换原则基础上的一种新的经济交往关系；原来的生产关系上的逐步过渡也不再存在，而是根据生产的需要，开展各种经济联合和合作，并且打破了公社内部划地为牢、限制生产力各种要素进行自由流动的框框，允许集体和农民个体的资金、劳力、技术等要素进行跨地区流动。中国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面貌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至此，“三面红旗”落下帷幕。

后　记

本书全面地记述了共和国一段重要的历史，因而写作时本人也就格外谨慎用心。书中行文虽力求通俗，但叙史论事皆有所依据，绝无主观臆断。凡引用重要人物的讲话、谈话，都引自公开发表的权威性资料；凡涉及重要会议、事件及情节，都对各种记载、论著进行了考辨，力求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本书从选题到结构安排、内容取舍等，都是与云南人民出版社杨云宝编审反复研究的成果。在书稿的修改过程中，得到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有关专家的指导与帮助。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高放教授审读了书稿并作序，更丰富了全书的内容。云南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的专家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在书稿将要付梓之际，谨向他们致以衷心的谢意！

全书涉及事件复杂，人物众多，写作中参考了许多专家、学者的论著，限于本书的体例所制，未及逐一注明，只在书后附主要参考书目，书稿交付之日，自知失当之处难免，恳请专家同仁海涵和赐教。

作　者

2001 年 10 月 25 日

主要参考书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缅怀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李银桥著：《走向神坛的毛泽东》，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

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

《谭震林传》，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金冲及主编：《朱德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庞松等著：《立国兴邦》，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版。

郑谦等著:《晚年岁月》,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版。
叶永烈著:《张春桥传》,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陈利明著:《谭震林传奇》,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
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吴冷西著:《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
朱地著:《1957:大转变之谜——整风反右实录》,山西人民出版社、书海出版社1995年版。
杨先材主编:《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综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
孙业礼等著:《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董边等编:《毛泽东与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崇文等主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谢春涛著:《庐山风云:1959年庐山会议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
邱石编:《共和国重大事件和决策内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陈明显著:《晚年毛泽东》,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顾保孜撰文,杜修贤摄影:《红镜头:中南海摄影师眼中的

国事风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李剑主编：《中共历史转折关头：关键会议亲历实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

朱正著：《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韦君宜著：《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张步真著：《渴望真话——刘少奇在1961》，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

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邓力群著：《我为刘少奇同志说些话》，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

黄峥主编：《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

唐振南等著：《刘少奇与毛泽东》，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晋夫编著：《“文革”前十年的中国》，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

刘爱琴著：《我的父亲刘少奇》，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陈雪薇主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大事件和决策调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

李锐著：《“大跃进”亲历记》，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

叶永烈著：《陈伯达传》，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

杨奎松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肖冬连等著：《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红旗出版社1999年版。